新疆人民出版社

中亚通史

古代卷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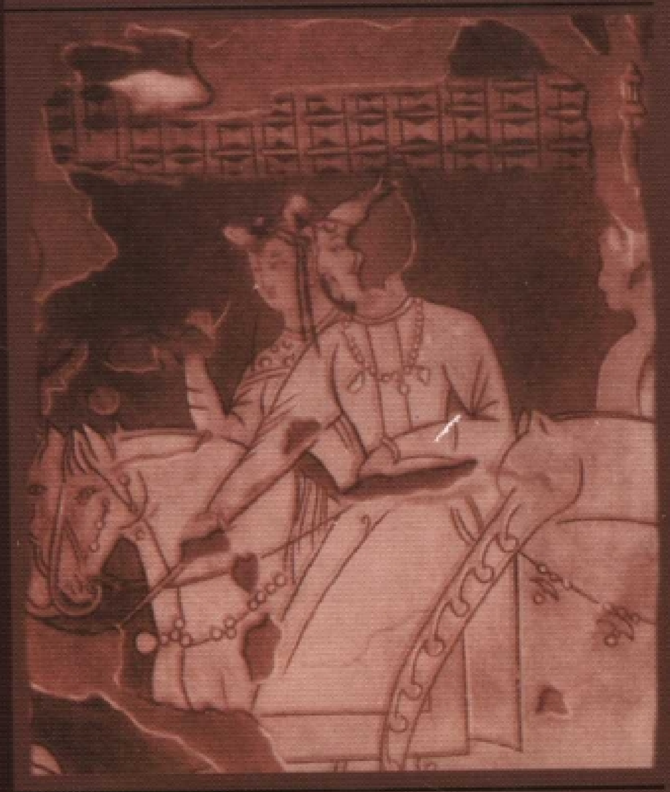
王治来 著

王治来 著

中亚通史

古代卷

上



ZHONGYATONGSHI

ISBN 7-228-08125-0

9 787228 081257 >

ISBN 7-228-08125-0 定价:25.00元

K360
W463
:3.1

中亚通史

王治来 著

ZHONGYATONGSHI

古代卷 上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亚通史. 古代卷.上/王治来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2

ISBN 7-228-08125-0

Ⅰ.中... Ⅱ.王... Ⅲ.①中亚—通史②中亚—古代史Ⅳ.K36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51828号

国家测绘局审图批准号(2003)150号

策划编辑
责任编辑 张 田 李春华
责任校对 钟 鸣 卢 艳
装帧设计 王 洋
地图编制 张惠琴

中亚通史 古代卷(上)

王治来 著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编 830001
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0991-2816212
印刷 新疆金版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25
字数 300千字
版次 2004年2月第1版
印次 200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228-08125-0 定价:25.00元

总 序

经过数年的努力，四卷本的《中亚通史》在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想就一个必须加以说明而且具有学术意义的问题作一番交代。这就是关于“中亚”的含义、本书叙述的地理范围以及本书为什么题为《中亚通史》的问题。

关于“中亚”的含义，本书同迄今国内外出版的中亚史著作一样，在第一章的开头也作了一段说明，兹不重复。本书叙述的地理范围，是以阿姆河与锡尔河两河流域作为中心，附带涉及其周围地区。这么大的一个范围，用俄文著作中的地理名称说，是把“中亚”和“哈萨克斯坦”都包括进来了，而从现在的国家疆域看，则包括了中亚五国的全部。既然如此，本书为何不叫中亚五国通史，而要叫《中亚通史》呢？

的确，现代史学的主要部类是国别史，而国别史又是以各国的现有疆域作为其历史活动的主要舞台。近代的民族国家都利用国别史来论证该国的历史存在并以之作为凝聚民族感情的工具。这是无可非议的。中亚五国早在苏联时期就已经出版了各自的通史。但在西方的历史著作中，我们限于见闻，却只读过笼统的中亚史，而未见过中亚五国的国别史。各种著作给自己定下的主旨不同，其写作的内容与体例亦随之而异。

我们不是没有考虑过写中亚国别史的问题，但由于一些原因而改变了主意。

本书在第三卷中提到一位美国学者的观点，他说：现今的中亚各民族是十月革命以后俄罗斯人为了破除穆斯林的宗教意识而界定出来，因而将他们称为新民族。中亚五国也是对应这些新民族的出现而建立起来的。按照这一说法，则在苏联以前，中亚不但没有现在的五国，连这五个民族也没有。关于中亚诸民族的形成问题，本书并不完全同意这位美国学者的观点。我们认为，现代中亚各个民族的基本特征在公元16世纪时就形成了。只是由于伊斯兰的宗教意识超过和掩盖了他们的民族意识，才使得他们甚至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仍然自称为穆斯林，而不能自觉地认识到属于某个民族。但是，宗教并不是形成一个民族的要素。形成中亚各民族的主要要素，是经济、文化、血统、语言等方面的一些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产生的特征。而就在这些方面，中亚各民族也还有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再加上他们曾经有过的共同历史，就足以提供根据让我们把他们的历史放在一起来写。这绝不是把宗教作为民族认同的基础。

我们觉得，如要写中亚的国别史，就需写五本。那样，各国在苏联以前时期的古代和近代历史会多有重复。如果把五国的历史综合地写在一本书中，又与一般的中亚史没有多少差别。因此，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将本书称《中亚通史》。一方面将中亚史的古今上下贯通起来，另一方面把中亚五国及其周邻地区贯通起来。这样，我们在时间上和地域方面就包容了更大的范围，在叙述上就更加灵活，更能反映历史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这样作只是为了编写上的方便，绝无否定中亚国别史的意思，也绝对没有不尊重现今中亚五国各族人民的意思。

中亚地区同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有着自石器时代起以至现代的悠久历史，但也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多民族、多宗教和多种文化并存。正如我们以前在《中亚近代史》一书的前言中谈到的，研究中亚史“好比一个人站在摩天大楼顶上往下看，只见大街上人来人往，一群一群的人聚集起来，忽又解体，散

去，融合，往复循环，如一场杂乱无序的运动”。“中亚就像一条通衢，一个舞台，各种民族在这里来来去去，出现过各种战争和动乱。最后，在近代由俄国人的征服而统一起来。”[①]

讲到中亚的多民族性，应当说中亚乃是印欧种雅利安人的故乡。直到公元1000年，印欧种人都在中亚占着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无论是波斯的阿赫门王朝，亚历山大东征后建立的希腊王朝，乃至公元9~10世纪时的萨曼王朝，都可以说是印欧语族的王朝。中间虽有闪族阿拉伯人的征服，但伍麦叶朝之统治中亚为时甚短，后继的阿拔斯朝及所属中亚的萨曼王朝，实际上都是东伊朗人建立的王朝。萨曼王朝在公元999年的灭亡，标志伊朗语族在中亚的全面统治宣告结束。

中亚历史上的民族异动，受到了东西三次重大事件的影响。第一次是匈奴的兴起及北匈奴的西迁，第二次是突厥汗国的扩张和西进，第三次是蒙古的西征及诸蒙古汗国的统治。这几次的历史事件都曾引起欧亚大陆的民族大迁徙，并促进了中亚和钦察草原的突厥化。当然，突厥化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即使承认匈奴人是突厥语族，也只能表示当时有操突厥语的人来到了中亚。甚至西突厥汗国对中亚的统治也未能当即使中亚的印欧语族突厥化。实际上，中亚突厥化的加速是在公元11世纪诸突厥语族王朝（如喀喇汗王朝、哥疾宁王朝和塞尔柱王朝等）统治的时期。到蒙古西征时，中亚地区的突厥化可以说是基本完成了。

这里所说的突厥化，是指突厥语族与本地原有操伊朗语的居民通婚、混血，并使突厥语成为当地普遍使用的语言。还应当指出，“突厥”一词这时已经变成了个语种的名称，操突厥语的各族都有他们的部族名称，如古思人、塞尔柱克人、葛逻禄人、钦察人、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土库曼人等等，而不

① 王治来：《中亚近代史》，第3~4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版。

是自称为突厥人。公元 9~10 世纪时，穆斯林作者笔下的所谓“突厥人”乃是指锡尔河右边草原地区不信仰伊斯兰教的游牧人。如阿拉伯地理学家雅库特就指明，锡尔河以北费尔干纳的卡散城是“位于突厥斯坦的边境”（按：指南部边境）。他还指出，锡尔河下游的毡的和养吉干（新城）也是突厥斯坦的地方。而在 10 世纪的波斯文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一书中，“河中”与“突厥斯坦”是两个不同的地理概念。该书将河中、呼罗珊、费尔干纳、花剌子模的古尔甘齐等地称为“通往突厥斯坦的门户”。[①]这些说明，河中地区过去并不叫做“突厥斯坦”，将其称为“突厥斯坦”是 19 世纪以后的事。

俄国从吉尔吉斯草原（今哈萨克斯坦）南取中亚，曾设突厥斯坦总督（过去译为土耳其斯坦总督）以管治其新征服的土地。总督的权力甚至扩展到中亚南部。十月革命以后，又一度成立过所谓的突厥斯坦共和国，但是这个共和国存在的时间并不长。

1922 年 12 月，根据列宁的提议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接着，在 1923 年 4 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揭露和批判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以后，在各民族地区还揭露了苏丹·加里也夫等人的鞑靼民族主义集团与斐祖拉·和加也夫等人的乌兹别克民族主义集团。他们都是泛突厥主义的鼓吹者。由于 1924 年实行的民族划分，遂成立了乌兹别克苏维埃共和国、土库曼苏维埃共和国和塔吉克苏维埃共和国，在草原地区则成立了哈萨克苏维埃共和国和吉尔吉斯苏维埃共和国。这五个中亚的民族国家都加入了苏联，苏联解体后仍然以独立民族国家的面貌继续存在和发展着。

由此可见，为了使读者正确了解中亚的历史，我们不但要

① 佚名作者：《世界境域志》英译本，（Hudud al- ‘A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A Persian Geography,372A.H.~982A.D.Translated and Explained byV.Minorsky），第 25 章，第 23 章，第 25 章第 45 节、第 26 章第 25 节，1937 年版。



叙述中亚五国的由来和突厥语诸族的历史，而且也要叙述中亚其他民族和突厥语族来到中亚以前的历史。

在中亚历史上，曾活动着多种民族，也流行过多种宗教。关于在世界各民族远古时代都有过的原始宗教，这里就不多说了，就说伊朗人最古老的宗教——祆教吧！祆教和它的创始者雅利安人，我们认为也是起源于中亚。[①]从那以后，无论是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或是起源于西亚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摩尼教，都曾最先传播到中亚，并从这里向东方传到中国。尽管现今在中亚地区是伊斯兰教占居统治地位，但在伊斯兰教传入以前，上述种种宗教都在中亚地区留下了自己的遗迹，有的曾经十分繁荣，创造了丰富、发达的文化。我们是否应当叙述伊斯兰以前的文化和宗教呢？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都是继承其先行的文化遗产而发展起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和国家也不例外。

如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当他们还在阿拉伯沙漠中游牧的时代，恐怕很难说有多少文化。可是，在其占领了肥沃的新月地区和波斯、埃及等地以后，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些地区的古老文明吸收过来，而其中希腊的文化遗产和伊朗文明就成了他们的主要营养资源。伍麦叶王朝的统治者们也不拒绝这些古文明地区的知识分子来为自己服务。在那时，叙利亚人（阿拉米亚人）、波斯人和埃及人可以说是哈里发政权下执掌文化、科学明灯的力量。正如希提所说："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文化，基本上是希腊化的阿拉米亚文化和伊朗文化。这种文化是肥沃的新月地区古代闪族文化逻辑的继续。这种古代文化是亚述人、巴比伦人、腓尼基人、阿拉米亚人和希伯来人所创始的和发展起来的。"[②]

到文化极为繁荣发达的阿拔斯王朝时期，这一点就更为明

① 王治来：《中亚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上册，第203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显了。阿拉伯人不懂希腊语文，他们必须经过翻译才能掌握希腊的文化遗产，所以在阿拔斯朝时期开展了大规模的翻译工作。这与阿拔斯朝哈里发在文化方面的开明和宽容有很大的关系。有一个传说，哈里发马蒙曾在梦中看见亚里士多德对他保证，理性和教典之间没有真正的分歧。又据说，马蒙曾派密使到君士坦丁堡去见利奥皇帝，向他索取希腊语的著作。当时从事翻译工作的主要是一些犹太人或叙利亚的基督教（景教）教徒。他们是先将希腊文的著作译成叙利亚文（阿拉米亚文），然后再译成阿拉伯文。从阿拔斯朝（公元 762 年）建成巴格达城起，只花了 75 年的工夫，就译出了亚里士多德的主要哲学著作，以及新柏拉图派的主要注释和盖隆的医学著作的绝大部分。自公元 750 年起，阿拔斯朝的翻译工作继续了 100 年左右，除译出了希腊著作外，还译出波斯的文学作品和印度的科学著作。希腊人花了好几百年才发展起来的东西，阿拉伯学者在几十年内就把它完全消化了。

不但在文化上，甚至伊斯兰教中的苏菲主义也是受到了新柏拉图派的影响。它的苦行生活和神秘主义则受到了印度的影响。阿拔斯朝政府甚至还任命一个佛教和尚（巴尔马克）的儿子哈立德为大臣。巴尔马克人当时曾豪富尊荣，位高权重，享誉于天下。可见，在早期伊斯兰教并不是不能包容和宽容，也不是完全排斥异教文化的。这与后来的所谓原教旨主义显然不同。

也正因为能开明地接受各种先进的文化，阿拔斯朝遂成为伊斯兰教历史上一个智力觉醒的时代。由此创建的阿拉伯文化，在中世纪时是领先于欧洲先进文化的。它后来由西西里和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引发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近代欧洲文明的兴起。

作为阿拉伯帝国和伊斯兰世界一部分的中亚，其文化也被说成是阿拉伯文化的一部分。中亚作者的作品多半是用阿拉伯

文作为表达形式的，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样的中亚学者在阿拉伯学术界占了很大的比例。如哲学家法拉比、医学家阿维森纳、天文学家费尔干尼、数学家花拉子弥、语言学家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等，可以说是世界知名、众所周知的大学者。他们的成就，都是继承了希腊、波斯、印度甚至中国的文化遗产或接受了其影响。

因此，我们与某些伊斯兰历史家在写世界或地区的历史时将伊斯兰以前的历史一笔勾销不同，既要写伊斯兰时期的宗教和文化，也要写伊斯兰时期以前的宗教和文化。

中亚的另一特点，是它同周邻国家（或地区）的关系。在古代，尽管有雅利安人自北南迁伊朗和印度，成为那里的统治者，但由于中亚本地没有形成统一强大的政权，以后总是受到外来王朝的统治。如果说，阿赫门王朝的波斯人和亚历山大帝国的希腊人是中亚印欧种人的同族，那么，从匈奴西迁以后，就逐渐有操突厥语的人来到中亚。自张骞通西域开辟中西交通，借助于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中国历代的王朝差不多都与中亚有较密切的联系。除了经常性的贸易（朝贡）以外，中国的统一王朝（如汉、唐、元、清）还曾将其统治权延伸到了中亚。因此，《汉书》及其以后中国各个朝代所编正史中的《西域传》，都把中亚列在"西域"之中。两千多年来，中国特别是中国的新疆地区，同中亚的关系可以说是密不可分，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是互相影响的。

在公元11~12世纪基本上实现突厥化和伊斯兰化[①]以后，中亚和中国新疆地区逐渐变成了以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语族为主要居民的地区。从公元16世纪以至近代，现今的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都是中国和中亚国家之间的跨国民族。中亚的乌兹别克族也有一部分定居在新疆。这种一

① 王治来：《论中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载《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



个民族分布于相邻国家之间的情况，使中国同中亚之间的密切关系又增加了一种亲情。由于这种关系，国界两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必然互相影响。加上历史上的种种因素，就使得中国对中亚的事情分外关注。但因为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内地的大多数人对中亚的历史和现状还是不够了解的，这也是我们要写一部《中亚通史》的缘故。

中亚五国同中国一样，都是经过革命洗礼的国家。十月革命后经过数十年的建设和发展，中亚五国已摆脱了革命前落后的封建经济制度的束缚，并废除了反动的政教合一制度，正在致力于建设独立、民主、富强、统一、政教分离的主权国家。这是世界上一切发达的现代文明国家的共同目标。但是近年在实现这种目标的征途上却存在不少的干扰，这就是中亚五国同中国共同关心的主要问题。

关于这类的干扰，我们认为应当着重指出的就是极端主义。极端主义有几种。一种是极端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突厥”，现在并不是一个族名，仅为一个语种的名称，这在前面已经讲过了。而泛突厥主义却主张把一切操突厥语的民族都包括到所谓的“大突厥族”当中来，并鼓吹建立一个从中国长城到亚得里亚海的大突厥国家。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否定民族国家，并要分裂各个民族国家。泛突厥主义思潮在苏联解体以后大肆泛滥起来。例如，泛突厥主义支持新疆的东突厥斯坦组织的活动，这就是要分裂中国。又如，伊朗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操突厥语的（主要是阿塞拜疆人），其人数相当于原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人数的两倍，而泛突厥主义却号召把伊朗的阿塞拜疆区合并到阿塞拜疆共和国。这不是要分裂伊朗吗！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必然会发展成为分裂主义。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

另一种极端主义是宗教方面的，即原教旨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这种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是与现代世界局势的发展息息相关



的。回顾历史，19世纪上半叶是伊斯兰国家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走向衰落的时期。故当时的伊斯兰思想是以主张改革为主。到19世纪的下半叶，便有泛伊斯兰运动的兴起。泛伊斯兰主义的理念是“宗教兴则国家兴”，是企图以共同的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为纽带把全世界的穆斯林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欧洲列强的侵略，建立一个超国家、超民族、跨地域的伊斯兰帝国。这种主张也易于同泛突厥主义相结合，它是否定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土耳其也在1924年的革命中确定了民族认同和政教分离的原则，这并不适合泛伊斯兰主义的理念。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高涨，故当时民族主义是主流，原教旨主义并非主流派。甚至像伊斯兰世界联盟（麦加）和伊斯兰会议组织（有50多个成员国）等也接受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现实，把尊重国家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等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只是到20世纪70年代，才又开始了伊斯兰革命和伊斯兰的复兴运动。

由于伊斯兰国家还没有摆脱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压迫，民间传统宗教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复兴，以及伊斯兰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加强宗教对国家政治的影响等等，原教旨主义便有了发展壮大的基础，而成为主流思想。原教旨主义因鼓吹宗教思想政治化和宗教组织政党化，故被西方称为“政治的伊斯兰”。其政治主张是反对现代化、西方化和世俗化。它重新提出伊斯兰化，企图以伊斯兰政府来代替各国现存的世俗政权。这种主张是与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即政教分离原则（具体要求宗教服从政治，宗教组织服从于国家）相违背的。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原教旨主义也在中亚狂热起来。它对中亚五国和中国新疆地区来说，都是危害性极大的。

第三种极端主义是行动上的，即恐怖主义。这里所说的行动，即指贯彻实行其原教旨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行动。具体

是以宗教的名义进行暴力恐怖活动。这类恐怖活动，不但在中东和世界各地频繁发生，苏联解体后，中亚和中国新疆地区也频繁地发生宗教狂热分子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恐怖活动。中亚和中国新疆地区分离主义势力的活动，严重危及该地区各国社会的稳定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故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都把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作为共同的任务。

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大西北的开发。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将使中国西北地区的各族人民摆脱愚昧和贫困，进入富裕与文明，也将使古老的丝绸之路重放光彩。这样，中国同中亚各国的联系将更为密切，这就更加需要加深中国人民同中亚各族人民的互相了解。只有加深这种相互间的了解，才能促进相互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利于各国的建设和发展。如果这部《中亚通史》能对促进中国同中亚各国之间的交流和了解发挥一些作用，我们就感到十分的欣慰了。



序 言

本卷叙述的是从远古旧石器时代到公元9世纪前期阿拉伯征服和统治时期中亚的历史。其中，阿拉伯人的大举入侵中亚是从8世纪初开始，在那以前的入侵只是不时打劫的性质。在从8世纪前期到9世纪前期这一百年当中，阿拉伯人虽然征服了中亚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但其入侵一直遭到当地操突厥语部族的抵抗，其统治也并不是巩固的。在8世纪时，中亚的伊斯兰化尚未完全实现。

国外关于中亚历史的书，有的也将8世纪作为一个分期的界限，即将其以前称为前伊斯兰时期，以后称为伊斯兰时期。这种分期不管是否科学，却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中古时代及其以前，中亚地区的各个民族并不信仰伊斯兰教。

把中亚地区说成历来是突厥人的地方，同样也是不正确的。从本卷对中亚原始文化的叙述可以看到，中亚的远古居民乃是属于印欧种的雅利安人，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的草原是雅利安人的故乡。广布于欧亚大陆北部草原的安德罗诺沃人，也属于欧罗巴人种。甚至后来的塞种、月氏、乌孙、哌哒等也不能认为就是突厥种。中亚的操突厥语部族乃是后起的民族。所以，中亚地区在被突厥化以前不能称为“突厥斯坦”。实际上那时也没有这个地名。

从自然条件看，中亚过去主要是草原游牧地区，适合于游

牧部落的生存和发展。历史上曾经活动于该地区的游牧部落不计其数，而中亚农业地带的定居居民则常处于这些游牧部落的统治或控制之下。氏族部落组织下的游牧人，其生活状态是流动的，逐水草迁徙的，在部落纷争中，有的不得不向远方转移。如从东向西，自西伯利亚迁往南俄和欧洲；从北向南，自中亚迁往伊朗和印度。如安德罗诺沃人、雅利安人、塞种人以及月氏、乌孙、匈奴、突厥等古代游牧部族的迁徙和他们在中亚的统治，都在本卷中做了叙述。

从地缘关系上说，中亚地区是处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在古代，中亚还是东西方诸大国强国如波斯、希腊、中国、大食（阿拉伯）的角逐之所。由于帕米尔高原雄峙于阿姆河与锡尔河的上源，形成不易逾越的屏障，故在古代，中国文明对中亚的影响不如其对新疆的影响之深。首先对中亚进行统治的是波斯帝国和希腊亚力山大帝国。较早地把中国文明带到中亚的是那些来自中国和受中国文明影响较深的月氏、乌孙、匈奴、突厥等。后来，到唐朝平定西突厥，中国才将自己的政权扩展到中亚，将其地列入自己的版图。以后，中国的文明才对中亚发生了较深刻的影响。不仅如此，中国文明还从此进一步地传播到西方。

在传播文明方面，商业贸易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中亚地区由于处在东西交通和商路必经之地，遂成为“丝绸之路”的中枢。所谓“丝绸之路”，实即沟通东西方的商路，只是因为丝绸在古代东西方贸易中为商货之大宗才有此称。而处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各国，也往往为了争夺东西方商贸之利，特别是为了争夺对丝绸贸易的垄断权而发生争斗。

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活动，也对宗教的传播起到了媒介作用。传教者或者与商队同行，或者自己也从事商业活动。中



亚地区既是丝绸之路的中枢，又是传播文明的十字路口。所以，世界历史上的几种主要宗教，都曾在中亚得到传播、发展与繁荣。宗教不但深刻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成为一个时代文化的主体，而且影响到政治，在某些时代导致政教合一。

本卷主要按时代先后叙述了东西方各个强国在中亚争霸和建立王朝进行统治的历史。如最早的波斯阿赫门王朝、亚力山大帝及希腊王朝、匈奴、贵霜、哌哒、西突厥、唐朝和大食（阿拉伯）等。其中，除本地民族建立的王朝以外，无论是波斯、希腊、唐朝和大食，都视中亚为边疆地区，其统治并不十分巩固。

在唐朝时期，中国文化对中亚的影响是相当深的。在片吉肯特壁画中，曾有身着唐朝官服的人物像；阿拉伯征服中亚以后，甚至仿中国建筑的风格来建清真寺。中国内地和中亚之间文化的双向交流也十分频繁，互相影响也很明显。只是由于8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唐朝的衰退，伊斯兰文化才逐渐在中亚占了优势。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在历史上中国如果统一强大，就能维持对边疆的统治。反之，像唐朝末期以后那样，国家走向分裂，相继出现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瓜分，辽、宋、金鼎立那种情况，必定会丢掉边疆，丧失国土。

目 录



第一章
中亚的原始文化

中亚或中央亚细亚，是一个地理名词，它既非国名，也不是一个或几个政治实体之名。现在中亚之分为五个共和国，是苏联时期的产物。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亚研究计划，它不但是指今中亚的几个共和国和中国新疆，甚至把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也包括了进来。德国地理学家洪堡（ Alexander von Humboldt ）曾认为，中亚的地理范围是指西起里海，东至阿尔泰山，南至兴都库什山，北界西西伯利亚之间的地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西诺尔教授（ Denis Sinor ）则改用"内亚"（ Inner- Asia ）和"中欧亚"（ Central Eurasia ）来代替中亚这一地名，并把这二者作为同义语来使用，以指处在中国、东南亚、印度、伊朗、西亚和欧洲诸文明中心包围中的地区，或者说处在这些主要文明中心的边缘地区。随着上述诸文明国家的扩展，中欧亚的范围也就不断缩小。本书叙述的范围，则是以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两河流域作为中心[①]，附带地涉及其周围地区。这个地区在历史上同中国、伊朗、印度、西亚、希腊、罗马、西欧以及欧亚草原的各民族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海路开通以前，中亚是古代中国通西方的门户，是东西交通和商路必

① 有的也称这个地区为"突厥斯坦"，但这个地名的产生为时甚晚。参看拙文《话说所谓："土耳其斯坦"》（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1 期）及《论中亚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载《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

经之地，也是东西文化接触之地和传播的渠道，有的称之为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丝绸之路”也因其起到了加强中西各国人民友谊的作用至今为各国人民所称道。

阿姆河，希腊人称为奥克苏斯河，古伊朗语称为瓦赫舒河。中国的《史记》、《汉书》称为沩水，《魏书》、《隋书》、《新唐书》、《旧唐书》写作乌浒水，为奥克苏斯的对音。《大唐西域记》写作缚刍河，则为瓦赫舒的对音。阿姆河发源于帕米尔高原，共有二源：一为穆尔噶布河（阿克苏河）；一为喷赤河。流过小帕、大帕，顺兴都库什山而下，成为阿富汗北面界河，经过古大夏之地，再西北流，经卡拉沙漠，入土兰平原，至古花剌子模三角洲，从南人咸海。阿姆河上游流域以及咸海沿岸一带，都是古代人类聚居之地和中亚文化发源之所。古代波斯传说把阿姆河看成是伊朗与土兰之间的界限。

锡尔河，中世纪波斯语作亚克萨尔特河，意为“珍珠”或“明珠”。汉文史料中作药杀水，即其对音，或作真珠川、叶河。阿拉伯人称为Saihun河[1]。该河发源于天山，西流经过费尔干纳盆地，然后转向西北，沿克孜尔库姆沙漠东缘，从东北角注入咸海。

从帕米尔以西的阿赖山、兴都库什山、帕勒帕迈塞斯山和科彼特山一线往北，地势是越来越低。咸海周围的土兰平原是一个大盆地。土兰平原的东北是哈萨克丘陵，地势稍高，北面和西北面是乌拉尔山脉及其余脉木哥扎雷山，二者之间是土尔盖谷地。如果土兰平原与西西伯利亚平原都是海，那么土尔盖谷地就好像是沟通这两个海的海峡。

西西伯利亚平原的西面是乌拉尔山脉。乌拉尔山与东经60°经线相合，地势独高，把欧洲和亚洲分开。东面是叶尼塞河，河东为中西伯利亚高原。西西伯利亚平原，整个地势低下，中多沼泽

① 汉文史料写作睢合水或译为锡洪河、色洪河、细浑河。

河流。鄂毕河与额尔齐斯河发源于阿尔泰山，流经这个大平原，而北入北冰洋。

地质学家们推测，土兰平原和西西伯利亚平原原来是连在一起的海洋，咸海、里海与黑海原来也是相通的。后来在第三纪和第四纪之际（即距今一两千万年前），地壳发生剧烈变动，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天山、兴都库什山、帕米尔等山脉升高，海水向北冰洋退走。结果黑海、里海与咸海分开，锡尔河与阿姆河流入咸海，西西伯利亚剩下鄂毕河与额尔齐斯河等无数的河流。在上述高山形成以前，中亚与西伯利亚气候温暖潮湿，雨量充足，森林茂密，草木繁荣。而在那以后，由于高山阻挡了印度洋暖流的进人，在土兰平原形成大片的沙漠，只在河流两岸、山麓地带、下游三角洲地区以及湖泊水泉附近才适于人类的居住及种植。如阿姆河上游、费尔干纳谷地、塔什干周围、花剌子模三角洲、泽拉夫善河流域、卡腊山南北坡、叶尼塞河上游、额尔齐斯河上游等处，就是这样的文化中心。而在锡尔河与咸海以北到鄂毕河与伊施姆河上游一带则是大片草原地区，它东接蒙古草原，西连南俄草原，是古代游牧民族的故乡。草原地区游牧民族同绿洲地区农业居民的关系，在古代中亚历史上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第一节　石器时代的文化

中亚地区可以说是处在南部农业文化同北部草原游牧文化交接的中间地带，因而历来受到这两方面的影响。几十年以来在中亚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已经发现了许多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及从旧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漫长时期中人类活动的遗迹。总的看，是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较少，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遗存较多。以旧石器时代而言，多见于塔吉克斯坦的西北和西南。如卡依拉克·库姆沙漠的绍尔库尔，和卓·巴基尔干，卡菲尔尼干河

右岸的科依基套，瓦赫什河右岸的克孜勒卡拉，霍扎·戈尔，达劳特库尔干（在阿赖谷与克孜勒苏河上）等处。最著名的是，1938年奥克拉德尼可夫在苏尔汉河的拜松山附近的捷希克·塔什山洞中发现的古人化石。据研究，在这个山洞中埋葬的是一个七八岁的儿童。与这个儿童一起被发现的还有属于穆斯特期的石器、火堆和很多动物的骨骼。捷希克·塔什山洞所在的峡谷，海拔1500米，是喜萨尔山的支脉，处在阿姆河的上游流域，东为帕米尔高原。捷希克·塔什山洞深达21米，长期为人类穴居之地。从该洞中发现的石器看，当时人们主要使用穆斯特型的尖状器、刮削器等。他们已经知道用火，有炉灶；他们猎食的主要是野山羊；此外也猎取野猪、鹿、马、豹和飞禽等。石器有尖状器、刮削器，用来进行切割，也可用以杀死动物、割肉、剥皮。骨针是缝制兽皮衣服的工具。在距捷希克·塔什山洞不远的拜松山，还发现属于这个时期的另一个人类文化遗存阿密尔·帖木儿。这说明，阿姆河上游地区是原始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

此外，从1938年起到1956年，考古工作者发现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地点还有：里海沿岸，卡腊山地区，费尔干纳谷地，纳林河流域，宰桑湖与塞米巴拉金斯克之间的额尔齐斯河流域。这些地方曾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手斧，比捷希克·塔什人更早。而属于穆斯特期的石器则还见于阿曼·库坦山洞，费尔干纳，塔什干，布哈拉，吉尔吉斯，曼格什拉克半岛，卡腊山，塔拉斯河流域（如江布尔所属的彼里·卡兹干和坦尼尔·卡兹干），奇姆肯特以北的阿里斯坦迪河流域，萨雷苏河中游，巴尔喀什湖以北，伊施姆河上游，额尔齐斯河上游等地。

古人是从猿人转变到新人之间的中间环节。世界上一切人种都曾经历过古人的发展阶段。古人在体质上仍然具有同猿类相似的原始特征，但已比猿人进步，接近于现代人。古人的社会还是处在原始群的阶段。有两个因素似乎促成了从古人向更先进的现代

人进化:一是食肉和用火,再是血族群婚的限制。在捷希克·塔什洞穴里,每一个文化层中都发现有一个或两三个烤火堆,其周围堆着大量的野生动物和鸟类的骨头,还有石器。这说明,当时的人是把猎获来的野牲烤着吃的。同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血缘家庭逐渐为普那路亚家庭所代替。而氏族制度就从这种家庭中直接产生出来。结果,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就发展成为现代类型的新人,人类社会由原始群过渡到了母系氏族制度的阶段。

中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迹发现不多,主要在土库曼西南和塔吉克的中、南部。1939年和1958年又在撒马儿罕发现此时期的人类居住遗址,有三个文化层,其中有一个青年妇女的下颌骨(新人)和各种石器以及马、鹿、骆驼、绵羊等动物的骨骼。1942年修建塔什干运河时,在乞尔乞克河谷发现制造刮刀的燧石,又在该地托伊·求别村之东发现一个烤火堆遗迹,其周围留有各种野牲的骨头。这些都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母系氏族人类活动的见证。

西伯利亚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物较多,主要在鄂毕河与叶尼塞河上游以及贝加尔湖周围。克拉斯雅尔斯克附近阿凡托瓦山遗址的发现说明,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随着冰河时代之快要结束,猛犸、犀牛等大兽日益减少,小兽成了当时人类猎捕的主要对象。另外在布赫塔尔马河河口不远处曾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猎人临时居住的山洞。1950年第一次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发现当时人类居住遗址。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同中国多伦、满洲里、海拉尔以及北京山顶洞的文化颇为相似。前苏联学者柯斯文明确认为那是蒙古种人类所创造的。[1]它们的发源地也可能就在中国北部的蒙古地区。

旧石器时代,人类的主要谋生方式是狩猎、渔捞和采集,这大

① 柯斯文:《原始文化》,张锡彤译,第35~36页,三联书店1962年版。

约相当于摩尔根所说的低级和中级蒙昧社会。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时，制造石器的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并广泛使用了骨器与角器，产生了钻孔的技术。狩猎与采集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人们在冬季已长期居住在洞穴或住宅中，会在岩石上和骨头上刻画人、动物和鱼的形象。特别常见的是女人的雕像，这与母系氏族社会中女人所处优越的社会地位有关。野兽的崇拜和图腾制的发展，表明原始的宗教意识已经产生了。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在狩猎和渔捞中，往往要顺着山脉或河流行走到遥远的地方。正如摩尔根所说的："他们沿着海岸或湖岸，沿着河道四处散布，可以遍及于地球上大部分地区。我们在各个大陆上都发现处于蒙昧社会状态中的燧石器和石器遗物，其中有充足的资料足以证明上述人类迁移的事实。"[1]因此，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的迁移达到了很大的规模，有时甚至是洲际的迁移。这种迁移，同后来游牧民族的迁移一样，往往是过惯定居生活从而安土重迁的人们所难于理解的。所以，西伯利亚当时的物质文化同河套文化以及山顶洞文化相似，也是不足为怪的。

从狩猎过渡到牲畜家养和从采集过渡到早期农业，可以说是一场"食物生产的革命"。有的学者将其说成是"自从发现火到十七八世纪工业革命之间生产力发展中最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发生在公元前第七千纪到公元前第四千纪的新石器时代，所以也被称为新石器的革命和人类生存方式的巨变。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布列伍德把公元前第七千纪称为伟大的一千纪。近来人们又把这场革命叫做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浪潮。由于新石器时代生产工具的革命，导致生产率的提高，从此便逐渐出现了剥削和阶级分化，并逐步产生了文明。可以说，锄头之声就宣告了文明基础的建立。

① 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第20页，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战后所进行的考古研究工作，已经得到大量的资料证明，向农业和牲畜家养的过渡最早是发生在中近东，也即在所谓的“肥沃的新月形地带”[①]。至于中亚，近年的考古研究证明，南土库曼的哲通乃是早期农业的关键地区之一。

据碳素放射线的测定，哲通文化属公元前第七千纪末到公元前第六千纪，是中亚早期农业文化的关键地区之一。哲通经济是一种食物生产经济，以农业和牲畜牧养业为基础，但仍保存着采集的因素。哲通的生产工具，有原始的挖掘棍。在这种工具上安装石头尖，就能使生产力提高二倍半。还有刀口经过修装的收获用镰刀，带有齿状刀口的镰刀。刮刀的改进刺激了皮革工业技术的进步。

在哲通还发现手制的粗陶，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伊朗和阿富汗东北部出土的陶器很相似。哲通的住所，是泥砖建筑，有标准的方形房屋，规模为16~30平方米。房屋有灰泥涂盖的地板，有黑色或红色的图画。每个房子内部有一个坚固的火炉，有一个供家内活动用的小院子，常常还有延伸的杂屋。哲通的房屋，尽管大小不一，却没有分化为等级的证据。房屋中发现泥塑人像。陶器上也绘有图画。动物的骨骼有狗、羊和牛，都为家养。由于发现纺锤，表明渐能生产羊毛织物。据研究，当时哲通地区的气候较现在潮湿，春季时有众多的小河与溪流。因此，人们在这里从事农业，同时也兼营畜牧与渔猎。

新石器时代食物生产革命的另一个方面是牲畜的家养。中亚的克尔特米纳尔文化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克尔特米纳尔是阿姆河北面的一条干涸的古代支流。该文化于1939~1940年发现。在克尔特米纳尔河床之北的詹巴斯·卡拉四号废墟，发现许多遗址

① 这一名词是由美国学者J.H.布列斯提德创始的，其解释见所著的《世界古代史》，第101~102页。具体是从波斯湾的东边开始，及于卡伦、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盆地，然后转向西，沿着地中海东岸地区向南，经过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到埃及。

和墓地。有的墓地，约有30个墓葬集中在一起。墓地由一条沟渠及公社房屋包围。在一个坟墓中发现大量骨饰。从中可以看到，向新型经济的过渡，伴随着各种文化的表现。其住房，有的是一个单间房屋，为帐竿结构，有一芦苇制的或树皮制的屋顶，规模宏大。屋内有许多火炉，其中一个巨大的中心火炉，可能是经常烧着火的。另一种住房，包括几个80~120平方米的长方形房屋。其中有几个家用火炉，这常常被认为是这所房子包括了几个小单位（可能是包括几个小家庭）。许多这样的大房子联合成一个克尔特米纳尔公社，比哲通文化的还要大得多。

克尔特米纳尔文化遗址中发现众多制作精细的细石器（如刮削器、燧石刮刀、骨针和箭镞等），也发现大量手制陶器，饰有几何纹。这种花纹或者是用模压成，或者是画上去的。某些陶器有彩色纹，有的纹饰呈串珠形式。发现的装饰品有项链和耳环，是用海贝壳、彩色石块或鸟骨制成。在后期阶段的克尔特米纳尔文化中，曾发现家养动物的骨骼，说明存在一种牲畜饲养类型的经济。据考古学家的研究，牲畜饲养业在当时食物生产经济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而只有大规模地过渡到了定居的农耕和牲畜的家养，才能使社会的进步有坚实的基础。

发现牲畜家养文化遗址的还有：喜萨尔，在塔吉克斯坦的西部，时间属公元前第六千纪到公元前第四千纪，有家养动物的骨骼。再是哈萨克斯坦的北部，发现羊骨（山羊或绵羊），时间为公元前第五千纪到公元前第四千纪。在北哈萨克斯坦的巴特底（Batdy）遗址曾发现马骨。载伯特（V.F.Zaibert）曾在阿特·巴扎尔（意为马市）发现家养动物的骨骼，时间属于公元前第五千纪到公元前第四千纪。在乌斯特·纳伦的新石器遗址曾发现羊骨（山羊或绵羊）。同时在伊曼·布拉克的一个沙丘遗址中也发现家养动物的骨骼。但总的看来，大牲畜在北哈萨克斯坦草原地区比在南方定居社会中起着更大的作用。有理由认为，向草原牲畜饲养业文

化的转变，是发生在亚洲沙漠草原地区。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出，动物的驯养最初大概是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草原的边缘上进行的。不过最早的畜牧业，由于牲畜数量不多，不需要广大的牧场，所以多是与农业相结合的，即经营农业的居民在其居住地的附近从事放牧，不必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求水草。这时畜牧经济还没有从农业经济中分离出来。

随着家养牲畜的增加，畜群越来越大，其所需要的饲料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解决牲畜饲料的办法仍然是去寻找更广阔的天然牧场。为此就需要从定居放牧过渡到游牧。在一年四季"逐水草迁徙"的条件下，人们只有放弃农业。欧亚草原上游牧部落就是这样形成的。

对于游牧部落，马的驯养是极为重要的。马的起源地在亚洲，即在东亚和中亚，这可以说已经是人所公认的定论。在北美，曾经发现过更新世时期（Pleistocene period）马的化石，据认为马也是从亚洲迁过去的。到更新世之末，美洲马灭绝。以后一直到新石器时代，欧洲都不曾发现马骨。而在里海以东的中亚地区，印欧种的游牧人已经养马。也就是说，马的驯养是始于中亚，这大约已经是青铜时代的事了。各地的考古遗址，也只是到青铜时代以后才发现较多的马骨。到公元前2000年，马就传到了小亚细亚和西亚。以后，一方面从叙利亚传入埃及，另一方面从小亚细亚传入希腊。公元前1世纪初，马已从叙利亚传到了阿拉伯。公元8世纪时，阿拉伯人将马经由西班牙传入欧洲。[①] 所以，人们认为现在世界各地的马是从亚洲中部传流开的。

中亚游牧人是最早饲养马的人。有了马，人们就可以用它来驾车、运输或搬迁，以适应游牧生活的需要。最后，人们才用马作

① 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上册，第21-2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为乘骑和战骑，在广袤无际的草原上驰骋。中亚既有北部广大的草原地带，也有南部绿洲地带，这为游牧和定居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到青铜时代，即公元前二千纪的前期，以中亚草原为故乡的游牧部落终于从众多的部落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与农业经济相对立的两种经济。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生产的生活资料，不仅比其余的野蛮人多，而且也不相同。同其余的野蛮人比较，他们不仅有数量多得多的牛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有兽皮、绵羊毛、山羊毛和随着原料增多而日益增加的纺织物。这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而且，"自从游牧部落分离出来以后，我们就看到，各不同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以及它作为一种经常制度来发展和巩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①

第二节　青铜时代的文化

中亚的青铜时代，约当公元前第二千纪前半期到公元前800年之间。它与中国中原地区青铜时代的不同在于，那时后者已经发展到了阶级社会，而中亚的原始社会不但延续到青铜时代，而且还延续到铁器时代初期。

关于中亚的青铜时代，有着丰富、完整而且是连续不断的文化遗迹发现，反映了当时游牧和农业这两种经济相并存在的事实。而在这两种类型的经济当中，又开始显示出原始公社制度解体的迹象。在青铜时代，中亚的各部落不仅创造了更多的物质财富，而且也创造了更发达的精神财富。他们是古代东方文明同欧亚大陆草原文化之间的中介。

过去，比较重要和著名的青铜文化遗址，是阿什哈巴德附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6页，人民出版社1972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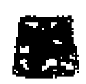
的安诺。近几十年以来，由于前苏联学者进行的大量考古工作，已经发现大量更重要、更丰富的青铜文化遗址。与之相比，安诺只能算一个小小的古迹了。在这些新发现的遗址中，规模较大的要数土库曼的纳马兹噶达坂。当然，从考古学史的角度说，安诺的发现较早，发掘者美国考古学家彭沛雷（Raphael Pumpelly）在这方面还是有开创之功的。

安诺是科彼特山前阿什哈巴德附近的一个绿洲。这里有两个巨大的土丘，一个在北，一个在南。1884年，俄国的科莫洛夫将军曾在此地挖一条沟，但并未大量发掘。1904年，彭沛雷在此进行全面的发掘和研究，始将古代的安诺文化展示于世。彭沛雷认为安诺北丘的文化早于南丘。他确定北丘的安诺Ⅰ属于石器时代，时间在公元前8000年。北丘的安诺Ⅱ属于金石并用时代，时间为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南丘形成于公元前5200年。南丘的安诺Ⅲ为铜器时代，时间为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南丘的安诺Ⅳ为铁器时代。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彭沛雷对北丘文化所定的时间太早。北丘文化（包括安诺Ⅰ与安诺Ⅱ）应属于铜石并用时代，存在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而南丘的安诺Ⅲ则属于青铜时代，存在于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和公元前二千纪。[①]前苏联学者认为安诺属于铜石并用时代。

安诺文化是农业文化，其特点是彩陶，为手制。彩陶底为红色或绿色，几何图案为棕黑色。公元前第四千纪下半期，图案改为金黄色，底为淡白色。到安诺Ⅱ时期，陶器由手制进步为轮制，更为精细。安诺彩陶同中国仰韶彩陶颇为相似。

早在安诺Ⅰ，就已会种植大麦和小麦。在安诺Ⅱ，已经驯养了狗、牛、绵羊、山羊、猪、马和骆驼。这些从事农业的古代安诺居民，同时也进行狩猎与畜牧。其猎取的对象是野马、野猪、狐、鹿、羚羊与狼等。他们砌房子用的砖是晒干的，不会用火烧的砖。从安诺文

① 加富罗夫：《中亚塔吉克史》，肖之兴译，第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化看，谷物的种植早于动物的饲养。因此，彭沛雷认为当地农业的产生应早于畜牧业。[①]

南土库曼的纳马兹噶达坂，位于阿尔梯克之南，在卡阿赫卡西南六公里。该处文化遗址规模甚大，已取代安诺成为“考古之都”[②]弗。根据前苏联考古学家小马松的分期，纳马兹噶Ⅰ—Ⅱ属于公元前第四千纪，纳马兹噶Ⅲ—Ⅳ属于公元前第三千纪，纳马兹噶Ⅴ属于公元前第二千纪前半期，纳马兹噶Ⅵ属于公元前第二千纪后半期。在纳马兹噶，早自公元前第四千纪到中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到青铜时代便成了巨大的文化中心。

纳马兹噶遗址有丰富的陶器。在属于公元前第三千纪下半期的地层中，发现许多赤陶小像。这一时期的陶器为手制，有着色的几何图案。到公元前第二千纪，陶器进化为轮制，无彩绘。小马松认为，纳马兹噶Ⅴ的某些遗址，到公元前第二千纪下半期即消失，是由于缺水的缘故。纳马兹噶的陶器绘有多种动物的风格，表明其受到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响。纳马兹噶Ⅱ文化类型陶器上的山羊图像和许多几何形母题，同伊兰彩陶的纹饰相当近似。前苏联考古学家李特文斯基认为，根据公元前第二千纪下半期南土库曼遗址的陶器特点，以及草原青铜文化的墓地的存在，可看到那里曾发生草原部落向定居农业部落分布地区的强烈渗入。草原居民的迁移使南土库曼某些居民集团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特别是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③]前苏联的另一学者Б.Б.皮奥特洛夫斯基认为，当时已经开始形成中亚的发展特点，即农耕民和游牧民的文化并存。而在这个时期，畜牧业发展较快，农业的发展则较慢。

① 彭沛雷：《突厥斯坦发掘报告》，第1卷，第67页，华盛顿1908年英文版。

② 弗鲁姆金：《苏联中亚考古》，第7章，新疆博物馆1981年印本。

③ 李特文斯基：《苏维埃时期塔吉克斯坦的考古发现与中亚古代史上的若干问题》，《古代史通报》1967年，第4期。

表明草原游牧人曾经南迁的考古资料，曾出现于花剌子模。这就是所谓安德罗诺沃草原文化的变种塔扎巴格雅布文化。这种文化遍布于阿克恰河地区，其时间属于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期到公元前第一千纪初。属于铜器和石器（细石器）并用的文化。细石器为畜牧部落所用。

已故前苏联考古学家托尔斯托夫认为，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下半期，曾有人来自中亚草原，沿着阿克恰河，穿过花剌子模，南下进入土库曼、波斯和阿富汗。这种类型的文化也分布于七河流域、塔什干草原、费尔干纳盆地、撒马儿罕以及泽拉夫善河下游等广大地区。这些地方既发现带有压制的几何形花纹或螺纹与网状纹的平底陶器，也发现各种青铜工具如镰刀、斧、鱼钩、枪尖等，说明塔扎巴格雅布人从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他们比其先行者克尔特米纳尔人已有进步。

与塔扎巴格雅布同时的还有苏雅尔干农业文化。这种文化发现于阿姆河三角洲地区干涸的苏雅尔干河上的詹巴斯卡拉六号居住遗址。这是一种农业文化，其住宅呈直角形，系由树枝搭成。还发现有许多彩陶，是当地特点与安诺特点的结合。据研究，这里的农业居民同定居的安诺居民比较没有固定性，这可能是由于阿姆河下游或咸海附近的河流经常泛滥所致。也有的认为，苏雅尔干文化部落是从南方来的，他们从科彼特山附近迁入，同当地原有的克尔特米纳尔文化部落相结合，使花剌子模地区居民的民族成分发生变化，创造出一种新的农业文化。它既具有当地的特点，又具有安诺的特点。

塔扎巴格雅布人同苏雅尔干人看来是属于不同的民族，但后来这两个民族集团却融合在一起了。到青铜时代后期（或早期铁器时代），发展成为所谓阿密拉巴德文化。这也是一种农业文化，其陶器为黑色，平底，边缘刻有图案以为装饰。房屋长达70米，宽约20米，建于沙丘之上，有两排房间，可居住一个大家庭。

中亚北部草原地区的青铜文化，可以米努辛斯克盆地的文化作为代表。米努辛斯克盆地位于萨彦岭之北，叶尼塞河的上游。早在旧石器时代，这里就已有新人的文化遗迹。从铜石并用时代起，这里有一系列前后连贯的文化，延续到青铜时代末期，反映了从狩猎、畜牧发展到游牧的过程。

阿凡纳羡沃文化，属铜石并用文化，时间约当公元前第三千纪末到公元前第二千纪初。此种文化系由米努辛斯克盆地巴帖尼村附近的阿凡纳羡沃山旁的墓葬遗物而得名。其分布主要是在叶尼塞河流域及其主要支流的下游。但同一类型的文化在古代卡通河流域也有发现。从墓葬的遗物看，有牛、马、绵羊的骨骼，也有金花鼠、狐、狍、鹿、麝、野牛、梭鱼和大蜗牛属的动物。这说明，阿凡纳羡沃人从事牲畜的牧养，但还没有抛弃狩猎和捕鱼业。他们可以说是南西伯利亚最早经营畜牧业的人。另一方面，在阿凡纳羡沃墓葬中，也发现有丰富的手制陶器，这说明他们过着定居的生活，畜群不大，无需从事游牧。前苏联考古学家利朴斯基在阿斯基兹村发现的阿凡纳羡沃石棺墓随葬的香炉，同伏尔加河与德涅伯河之间洞室墓的香炉完全相同。在帖西村发现的阿凡纳羡沃陶器同安诺型陶器也很相似。这说明阿凡纳羡沃文化同西方和西南方（中亚）的遥远地区都有联系。阿凡纳羡沃人，据人种学家的研究，认为是属于古欧罗巴型。整个地看，从旧石器时代起，在南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地带明显居住着蒙古利亚部落，他们近似于通古斯人。而在西伯利亚草原地带却住着古欧罗巴人类型的居民，在阿凡纳羡沃古冢内发现的就是这种欧罗巴人的遗体。

安德罗诺沃文化，属青铜时代的早期和中期，即公元前第二千纪的中叶。1914年修筑阿琴斯克—米努辛斯克铁路时，在前阿琴斯克州安德罗诺沃村附近发现一处墓地，以后同类的遗址便因此而得名。安德罗诺沃文化分布的范围，要比阿凡纳羡沃文化广阔得多。据迄今的考古发现，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分布，不仅包括

米努辛斯克盆地的所在地区，而且遍及从叶尼塞河到乌拉尔河的整个西西伯利亚，达于乌拉尔地区的东南部，直至奥伦堡。在七河地区和伊塞克湖沿岸的沙丘遗址，也有同安德罗诺沃极其相似的陶器和金属制品出土。乌拉尔以西，安德罗诺沃文化同伏尔加河下游、顿河和顿涅茨河流域诸草原的木椁墓期遗存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可见，欧亚大陆广阔草原众多的民族都经历了这一历史发展阶段。其对周围地区的影响是很大的。

安德罗诺沃文化，既有农具也有众多的陶器。陶器的形制有缸形器，平底，几何纹。这表明，安德罗诺沃文化部落仍然是定居的，从事原始农业和定居放牧。但畜牧业比阿凡纳羡沃时期已有所发展。这时，人们饲养了两种绵羊——粗毛羊和细毛羊，不但发现了牛、羊骨，而且发现了马骨。又有石制锄头、马鞍形磨骨器以及小麦茎与麦粒。青铜器为短剑、刀、斧、手镯之类。由于经营畜牧业，人们不仅取得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可以有兽皮、羊毛、山羊毛以及各种纺织物，并以之来进行交换。不过当时畜牧业尚未同农业完全分离。只是到了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最后阶段，即公元前第二千纪末和公元前第一千纪初，才过渡到游牧经济。其中，马的驯养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随着畜群增多，牧场扩大，就必须利用马来放牧、搬迁。最后导致游牧与农业完全分离。

安德罗诺沃文化，在费尔干纳、花剌子模以至西南部的农业绿洲也有发现。这种文化同南土库曼的定居农业文化有所不同，主要以手制陶器和地穴式住房为其特点。在草原和半沙漠的条件下，安德罗诺沃部落的经济首先是作为畜牧业经济而发展的。但它同南土库曼的农业经济都是生产性经济。这里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部落的民族学特点同一些哈萨克斯坦及西伯利亚的遗存相同，说明这些安德罗诺沃部落是迁移来的。

安德罗诺沃人的体型，据前苏联人类学家捷别茨的研究，亦属于欧罗巴型，其头骨的主要特点与阿凡纳羡沃居民相同。但他

认为米努辛斯克的安德罗诺沃人同阿凡纳羡沃人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而是来自西南的阿尔泰或巴拉巴。

安德罗诺沃青铜文化的起源问题以及它同雅利安人究竟是否有关系，现在还是一个在研究中的问题。恩格斯曾经认为雅利安人是起源于亚洲。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经典著作中，则具体指明雅利安人原来是游牧在奥克苏斯河（即阿姆河）及亚克萨尔特河（即锡尔河）的草原上。经过欧洲学者的研究，学术界现在广泛地承认雅利安人的故乡是在中亚草原。故一般的教科书，如美国东方史学者J.H.Breasted在他写的《古代史》（Ancient Times）教科书中就说，雅利安人的发源地是在里海东面和东北方的广大草原地区。当时他们尚处于石器时代，其时间不晚于公元前2500年。印欧人最东边的诸部落约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游牧于里海以东的大草原上，被称为雅利安人。他们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瓦解，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向东南游动，最后到达印度。另一部分则向西方和西南方迁移，进入肥沃的新月形地带边沿的山区，这部分印欧人被称为伊朗人，即雅利安人的变音。他们当中有两个较强的部落，即米底和波斯。J.H.Breasted把印度雅利安人和伊朗人算作印欧人的东支，把希腊人、罗马人、克耳特人以及赫梯人、弗里吉安人（Phrygians）、斯基泰人和亚美尼亚人等都算作印欧人的西支。[①]汤因比则说，在古巴比伦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约公元前1792~前1750年）去世后"其帝国崩溃，促成雅利安人民族大迁移时期的开端"。[②]应当说，在东面大约还有一部分雅利安人迁到了帕米尔以东的塔里木盆地以至河西走廊一带。这可以说是19世纪末欧洲学术界达到的对印欧民族的起源和分布的初步认识。

李特文斯基曾经指出，雅利安人的迁移是一系列复杂的过

① 布列斯提德：《世界古代史》，英文版，第174、176页。

② 汤因比：《历史研究》，中译本，第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程。西安德罗诺沃部落可能是操雅利安语的，他们同木椁墓部落有非常相似的文化。关于他们之间的联系，关于从欧亚草原（安德罗诺沃文化和木椁墓地区）迁来的民族集团在中亚的分布，关于草原青铜文化在中亚的分布，都有考古资料可以证明。在青铜时代，中亚无疑是一部分雅利安人部落迁入的地区。这些雅利安部落一方面成为后来中亚民族的主要成分，另一方面又把雅利安语传到更远的地区——伊朗东部、阿富汗和印度。[①]前述塔扎巴格雅布文化和纳马兹噶文化都能提供这种迁移的证据。

近代以来欧洲学者在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也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来说明上述问题。正如汤因比所说："19世纪发现的全部语言和波斯、印度北部的语言古典伊朗语和古典梵语，都彼此有关，好像都是一个巨大的语言家庭的成员似的。" 他又说："印欧语系在今天分散在两块彼此隔绝的地区，一块在欧洲，一块在伊朗和印度。这是因为在突厥语的传播者尚未在这里定居下来以前，欧亚草原上的印欧语的传播者曾在这一带传播这种语言。"[②]

欧洲学者发现印欧语是很早的。早在16世纪时，到印度果阿来传教的一个意大利牧师就发现了印度语言和意大利语言（也即和欧洲语言）相近，有亲属关系。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向东方殖民扩张的进展，东来的欧洲学者就进一步研究印度、伊朗的语言。他们发现，梵语、古波斯语（Zend语）与希腊、拉丁、日耳曼和克耳特（celt）等欧洲语言，无论在基本词汇和语法方面都是一致的，这说明它们之间具有亲族的关系。1786年，英国人琼斯（William Jones）提出，这种相同乃是由于它们同源。19世纪，德、法、英、美诸国的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来研究印欧语系的各种语言。1833年，德国学者波普（Franz Bopp）还刊行了印度

---

① 李特文斯基：《苏维埃时期塔吉克斯坦的考古发现与中亚古代史上的若干问题》，《古代史通报》1967年，第4期。

② 汤因比：《历史研究》，中译本，第36、2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Sanskrit)、波斯(Zend)、希腊、拉丁、立陶宛、哥特、斯拉夫和德语的比较语法，证明欧洲的语言和印度的语言是同一个来源，从而建立了所谓印欧语系的比较语言学。

这么多的语言既然同属一个来源，那么，它们必有一个共同的母语，而说这个共同母语的人应该是他们的共同祖先。经过欧洲学者的研究，他们得出了一个大致相同的看法，认为印欧人和印欧语的发源地是在中亚。1861年，德国人缪勒(Muller)把印欧人的祖先称为雅利安人，把他们的母语称为雅利安语。印欧语系的语言学家们又把这个语系分为西支和东支。西支指欧洲的各种语言，它们称一百为Centum，故亦称Centum系统。东支指印度的语言，它们称一百为Satem，故亦称 Satem 系统。

但是，1900年以前，世界上还不知道帕米尔以东的中国新疆和甘肃等地在远古时期也是印欧人居住的地区。20世纪初，欧洲的考古学者开始闯入新疆和敦煌等地，以后又陆续有人前来，发现并盗走大量书写古代语言的文书。其中以英国人斯坦因、德国人勒柯克、法国人伯希和等盗走的文物最多。此外，俄国和日本的考古学者也掠夺不少。如斯坦因先后四次到中国西北。第一次在1900~1901年，第二次在1906~1908年，第三次在1913~1916年，第四次在1931~1933年。他盗去的文物除汉晋人留下的大量木简以外，还有无数的古梵文、古波斯文及突厥、回鹘诸种文字的文书。勒柯克率领的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考古队，大约与斯坦因同时来新疆，也有四次：第一次在1902~1903年，第二次在1904~1905年，第三次在1905~1907年，第四次在1913~1914年。据卡特在柏林亲自看到他们盗去的文物后所述："在普鲁士探查队所得的文件中，有代表十七种不同的文字，包括叙利亚文、梵文、波斯文、汉文、若干希腊字以及本地的吐火罗文和突厥文。"[1]根据上述欧洲人盗走

① 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第110~120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的古代文书的研究，学术界才知道在古代的中国新疆曾经存在过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

总之，中亚地区（包括东面的中国新疆和甘肃西部）在远古时期可以说是印欧人分布的地区。至于本章所述的南西伯利亚古代居民的情况，前苏联人类学家捷别茨经过研究认为，在西伯利亚的草原地带起自米努辛斯克盆地而跨阿尔泰、西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地区，自古以来就居住着欧罗巴人种类型的居民。[①]以米努辛斯克盆地为例，这里曾经存在过三种连续的文化：一是属于公元前第三千纪末到第二千纪初的阿凡纳羡沃文化，吉谢列夫称其主人是已经从事畜牧业的古欧罗巴人种类型的部落。其后，是属于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广泛分布于西西伯利亚，甚至向西分布到南俄草原。位于其东面的阿尔泰地区与阿凡纳羡沃文化有密切关系。东部安德罗诺沃文化在公元前13~前12世纪发生了大的转变，而西部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则一直存在到西伯利亚青铜时代的末期，即继续存在了四五百年。这种变化有两个主要的内容：一是畜牧业从定居放牧过渡到了游牧，二是中国北部的游牧部落大量迁入。从而产生了所谓的卡拉苏克文化。

卡拉苏克文化。这一文化是因最先在哈卡斯巴帖尼村附近的卡拉苏克河畔发掘的一些墓葬而得名的。属于青铜时代的末期，时间约当公元前1200~前700年，相当于中国的商周时期，也与西部（伏尔加河下游）的木椁墓文化晚期（即赫瓦冷期）以及黑海沿岸草原的钦麦尔期（Cimmerian）同期。故其分布比安德罗诺沃文化更广，同一类型的遗物在西面见于托木斯克和北阿尔泰的比斯克附近。有些卡拉苏克兵器已传到额尔齐斯河。在米努辛斯克

① 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莫斯科1951年俄文版）第2章："在西方，则同伏尔加河下游、顿河和顿涅茨河流域的木椁墓期遗存相似。而安德罗诺沃人可能与印欧种的雅利安人是同一来源，或即操雅利安语。"

南面的唐努乌梁海地区也发现有卡拉苏克型的饰物。外贝加尔地区所出尤多。最后，卡拉苏克型遗物还见于中国内蒙古（原绥远省）和华北。如果说，安德罗诺沃文化主要同西方联系密切（叶尼塞河是该文化遗物分布的极东界线），那么，卡拉苏克文化的分布在萨彦—阿尔泰以西是十分有限的。它主要是同东方有密切关系。在叶尼塞河以东，经常在外贝加尔、蒙古和中国华北出现卡拉苏克铜刀、短剑和铜锛。

卡拉苏克墓葬中发现的食物残余中多家畜的骨骼。其中绵羊骨占58.6%，牛骨占33.3%，马骨占6.3%，骆驼前腿骨占1.8%。可见当时养羊业颇为发达。出土的陶器仍为手制，多为圜底。其居住遗址层次薄，时间短。有的墓葬在山地，表明利用山地作夏牧场。可见卡拉苏克人从事游牧经济，流动性大，不在一个地方长久定居。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畜群的形成，在适于畜牧的地方导致了游牧生活。卡拉苏克文化正代表着这样一个阶段。“现在，日益前进的游牧民族——住在印度五河和恒河地区，以及当时水草更丰富的奥克苏斯河和亚克萨尔特河流域的雅利安人，住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闪米特人——已经有了马、骆驼、驴、牛、绵羊、山羊和猪等畜群，这些财产，只须加以看管和最简单的照顾，就可以愈来愈多地繁殖起来，供给非常充裕的乳肉食物。以前一切获取食物的方法，现在都退居次要地位了”。①

卡拉苏克式的工具和兵器，有铜锛、铜刀（包括曲柄刀、凹背刀和弧背刀）、铜戈等。所有这些器物，都同蒙古和中国华北的极为相似。如在别亚河畔发现的卡拉苏克铜锛，与中国内蒙古发现的一样，据认为是起源于东方。有的把卡拉苏克的曲柄刀同中国周代的刀币相比。弧背刀在长城以北各地都有出土。至于戈，早在商殷时代，中国就流行玉戈和铜戈。内蒙古出土的铜戈，就好像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卡拉苏克式铜戈的模型。所以,前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认为,中国绥远的卡拉苏克式铜器是仿照中国中原比较古老的商殷标本制成的。而蒙古戈则是安阳戈和西伯利亚卡拉苏克式戈的一个中间环节。绥远刀和卡拉苏克刀很可能出于同一原型——商代大刀。

吉谢列夫又说,米努辛斯克盆地出土的卡拉苏克器物中有中国北部居民带到叶尼塞河沿岸的器物。这对刀和戈来说是可以肯定的。关于短剑和某些饰物,也可以这样说。在卡拉苏克时期,叶尼塞河沿岸的青铜工艺,在西西伯利亚没有任何相似的现象。只有极少数几件器物在西部被发现,这应当被认为是远离了故土。而卡拉苏克文化同东南方却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某些事实推测,早在商殷时代(前1766~前1112年),就有人从中国北部迁来叶尼塞河流域。

关于这个时期当地卡拉苏克人的头骨和骨架,即当地居民的种族情况,捷别茨进行过多年的研究。他在1931年和1932年两次指出,卡拉苏克人大部分与其以前的阿凡纳羡沃人及安德罗诺沃的人的头骨之间有显著的区别。[①]从而证明当时有来自东南方的蒙古人种华北类型的成分大量进入该地区,与那里原有的居民混血,导致卡拉苏克人体型的变化。也就是说,有来自东南方的蒙古人种华北类型成分曾大量渗入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居民当中,而与当地居民融合为一体。他的这些研究揭示了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中国的北方人远迁到南西伯利亚,也说明了那里的原住居民确为印欧种人。

从时间上看,中国内蒙古的卡拉苏克式铜器是同殷商时期的铜器在公元前14~前13世纪平行出现的。到公元前12世纪初期,这种铜器就广泛北传。与此同时,米努辛斯克盆地始有新的民族成分从东南方涌入。但叶尼塞河中游并非卡拉苏克器物传播的终

① 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第4章,莫斯科1951年俄文版。



点，而是继续向西传入托木河下游。这一人种的迁徙和文化的传播，确是欧亚草原上的重大历史事件。

公元前12世纪初期进行这种迁徙的究竟是什么人呢？吉谢列夫肯定说是中国史料中提到的丁零人。实际上，先秦史籍中所说的“狄”、“狄历”、“翟”等，都是丁零的异译。商周王朝几次对翟族鬼方的进攻，显然曾经迫使该族向北方蒙古草原迁徙。后来的丁零人应即他们的后裔。当然，丁零人的分布是较广的。东丁零分布于从贝加尔湖到鄂毕河地区，西丁零分布到额尔齐斯河的上游。在卡拉苏克时期，正是东丁零地区的贝加尔湖沿岸、米努辛斯克、托木斯克和鄂毕河上游等地，在物质文化上十分相似。所以，吉谢列夫认为是丁零人携带了新的卡拉苏克文化从中国北部来到西伯利亚南部。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卡拉苏克文化的分布地区同中国史书所记载的丁零人的分布地区如此吻合。

从中国北部迁来的蒙古利亚人种并没有消灭当地原有的安德罗诺沃人，而是同他们融合了。这种融合对南西伯利亚的民族成分有着长远的影响。

游牧部落的形成，使他们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第一次的社会大分工也就出现了。这对于游牧民族说来，不仅由于畜产品的增多而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而且成为他们生活的绝对必要。于是，部落间、民族间的交换和贸易也就逐步地发展起来了。

在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后期到公元初年，欧亚草原地区的游牧部落很多，如钦麦尔人（西米里安人）、斯基泰人（西徐亚人）、月氏人、乌孙人、匈奴人等等。前苏联的著作中一概以“早期游牧民”这个名称来称呼上述各游牧部落。

这里的钦麦尔人，早在希腊的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就已提到了，说他们生活在大洋（指黑海）那边的一条河边，其地雾气弥漫，不见阳光，为世界的边缘。据研究，钦麦尔人大约在公元前

1200年时即已分布于南俄草原。他们的物质文化遗存,属于青铜时代晚期,但大多与其他民族的文化遗存混合了。在考古学上,把黑海沿岸草原的前斯基泰时期的文化称为钦麦尔期,把钦麦尔期断为同伏尔加河流域的赫瓦冷期文化同时,都属于木椁墓文化的晚期。在南西伯利亚则相当于卡拉苏克文化时期。

钦麦尔人究竟是什么人?前苏联学者季亚科诺夫认为,钦麦尔人是一种他称,即希腊人和小亚细亚人用来称欧亚草原原操伊朗语的游牧民群体的通称,意为"游动的马队"。钦麦尔人的语言属伊朗语。有的学者认为他们自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而是斯基泰·萨喀人的一部分。



塞马林—塔什和塔姆加林—塔斯的青铜时期岩画

希腊史料讲到,是斯基泰人将钦麦尔人逐出南俄草原,迫使他们取道高加索南下的。这一运动始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时,斯基泰人即控制了西到多瑙河口的广大地区。他们驱逐、跟踪钦麦尔人,来到高加索以南的乌尔米亚湖地区。当时亚述国王萨尔恭二世(前722~前705年)在位。

亚述文献称他们为Ashkuza （Ishkuza），在圣经中讹拼作Ashkenaz①。

钦麦尔人、米底人、斯基泰人大约在公元前625年开始进入西亚。他们企图攻掠与蹂躏埃及边境，但未成功，被驱散。但他们的攻掠从根本上震撼了亚述王国。②是什么因素促使斯基泰人从东北向西南移动呢？今人杨宪益认为，塞种（斯基泰）即中国史料中的九州戎。希罗多德所说的斯基泰人在公元前8~前7世纪之西侵，与秦逐西戎有关。他认为，按秦国的兴起实始于秦仲伐西戎时，其事在西元前825年或824年。后秦仲战死，子庄公又破西戎。幽王四年即西元前778年秦人又伐西戎。西元前770年始命秦襄公为诸侯。后此四年襄公伐戎卒于师。西元前 753 年，秦败戎师于岐。秦穆公霸西戎后，塞种已无力东侵，遂转向西方进展。亚述帝国的灭亡实由于塞种的西侵。故秦穆公的霸西戎对西方的影响并不下于汉武帝的伐匈奴。塞种初见于中亚。据西史，在西元前7世纪中叶，正是秦国庄襄二公初破西戎的时代。塞种在西方本为亚述帝国的与国，西元前612年忽会同其他游牧民族西侵，攻破亚述都城，而颠覆了亚述帝国，这正是秦穆公逐九州戎以后一二年，则其关系不难明了。③马雍也认为，最先对中亚东部产生影响的事件是公元前7世纪后半期秦穆公 （前659~前621年）的进攻西戎。而西方人最早所知道的中国就以“秦”为代表。

第三节 铁器时代的文化

在南西伯利亚，与斯基泰人兴起时期并行的是塔加尔文化。

① 见《旧约·创世纪》第10章，第2节。该处讲，Japheth 是 Noah 的儿子。 Japheth 有几个儿子，一个名叫 Gomer 。 Gomer 的后裔即Ashkenaz 人、Riphath 人和 Togarmath 人。参看D.Sinor，Inner Asia第80页。

②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叶启芳译，第221~222页，三联书店1955年版。

③ 杨宪益：《译余偶拾》，第229~230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

所以，有的也称为斯基泰——塔加尔时期的文化。这种文化是由于在米努辛斯克附近的塔加尔岛第一次发掘的冢墓而得名。其延续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第一千年初期到公元前1世纪。

塔加尔文化同斯基泰文化都属于铁器时代。在塔加尔文化的早期，当地人学会了专门的冶金技术。到塔加尔中期，就出现了最古的铁制品。这样，就为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奠定了基础。

塔加尔人的畜牧业同农业一起得到发展。与前一时期不同的是，塔加尔的墓葬中发现的多是牛、马的骨骼。这说明，牛、马等大畜在畜牧业中已经起重要的作用。这个时期，正是开始出现骑马用具的时期。在卡拉苏克时期，曾发现有套在带篷车上的马，但并无将马用于乘骑的迹象。人们广泛以马作乘骑用，不但便利于放牧，而且有利于战争。在塔加尔时期，当地部落显然要经常进行攻防的战争。随着部落内贫富不均现象的增长，部落首领往往发动对别部落的掠夺战争。在一个部落受到外来的攻击时，本部落的全体成员也要动员起来保卫自己的牧场、牲畜、田地、房屋和财产。塔加尔墓葬的遗物表明，这时期的兵器已有改进，出现了一些以前未见过的新式兵器。墓葬中绝大多数的男子和部分女子都带有兵器。塔加尔岩画，主要内容是行军的场面。有些地方甚至开始建筑防御工事。当时，氏族部落组织日益地变成一种军事组织。

在米努辛斯克盆地还发现属于塔加尔时期的一套动物烙印，共四件。这正是财产观念得到发展的一个证明。但总的看来，塔加尔人是处在父家长制时期，尚未进入阶级社会。如塔加尔早期的墓葬，绝大多数都是在封土下面埋葬一个家庭。但到了塔加尔中期，墓葬中就出现阶级分化的现象。

塔加尔的艺术也是动物风格的艺术。塔加尔人把各种动物的形象雕刻在诸如带扣、刀柄、短剑、牌子、镜、坠饰和各种艺术性的铜器上面。在这种艺术品中，经常出现的动物形象有：

野兽立像。早期主要是熊。斯基泰艺术中的野兽立像起初是

狮子。狮子的形象主要来源于小亚、近东。在古埃及、亚述、巴比伦等古国宫殿建筑的雕刻中，狮子的形象出现最早。受其影响，这种母题在早期的斯基泰艺术中特别流行。但在南西伯利亚，早期是没有狮子形象的，只有熊的形象。只是到后来，塔加尔才接受西部的影响，以致他们雕刻的熊样子很像狮子。

疾驰的鹿。奔鹿的形象在斯基泰艺术中曾经非常流行。黑海沿岸曾发现属于公元前7~前5世纪的锤叠在金片上的 “奔鹿”图像。在以前叶尼塞河流域的青铜器中没有鹿的艺术形象。早期塔加尔遗物中也没有。塔加尔人接受斯基泰艺术中鹿的形象的时间较晚，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初。塔加尔艺术品中的鹿，不但姿势而且其细部的处理（如分枝的双角和横伸至头部上方的钩状杈角）都与斯基泰艺术品中的鹿完全相似。以后，大部分斯基泰鹿像起了显著的变化。从前流行的“奔鹿”被代之以静态的、头部倚在背上的鹿。枝丫繁多的鹿角逐渐变成复杂的像植物一般的透雕。

卷身兽。主要是一些猫科的猛兽（如雪豹、老虎等），雕刻成卷作一团，或安然沉睡，或奋然欲跳。雕刻艺术家在作品上表现了野兽的凶猛，动作的奋迅或迟钝，刻画了野兽的紧张情绪。这种形象往往雕刻在纽扣、短剑、柄顶或按钉形镜纽上。

卷身兽的母题也传到了蒙古和中国。

塔加尔早期墓葬所出卷身兽像，体形笨重，肌肉有力地突出。后来则出现环形镂孔的脚掌，肌肉突出的特点，渐趋消失。在鄂尔多斯也曾出土这类带环行脚爪的猛兽立像。据研究，在斯基泰老式的作品上，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有带环行脚爪的野兽像。后来便成为公元前6世纪大部分“纯”斯基泰野兽形象的特点。它起源于黑海沿岸，同以螺旋纹表现脚爪的手法是并行发展的。而塔加尔艺术中的环行脚爪却出现得比斯基泰晚，所以被认为是仿照斯基泰标本的结果。

山羊立像。这种主体是本地固有的。而在早期的斯基泰艺术

中则不大流行。塔加尔早期的山羊立像，也像猛兽（熊）立像，笨重呆立，肌肉突出。后来则出现灵活轻捷、生动活泼的形象。斯基泰晚期的山羊立像，头部往往向后扭转作“疾驰”或“入睡”状态。山羊立像在中国北部也有发现。

猛禽头像。如在带钩上雕刻的狮身鹰头像，其大致轮廓却像野猪或麝的獠牙。在蒙古和中国北部也曾大量出土饰有本地风格的猛兽图像的钩子。其中有些带钩的纹饰与米努辛斯克盆地的猛兽和怪枭头像完全相同。

下面再来看一看戈尔诺—阿尔泰地区的迈埃米尔文化。这一文化由于发现于纳雷姆河河源附近的迈埃米尔草原而得名，其所属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7~前5世纪。这一文化的内容在许多方面同塔加尔文化相似。

根据迈埃米尔文化的遗物看，当地人当时从事畜牧、捕鱼和狩猎等活动来谋取物质生活资料。没有发现农业生产工具，但从其出土的大量陶器看，可能也从事农业，才导致人们有相当程度的定居。

1937年，前苏联考古人员在乌尔苏尔河畔的图雅赫塔村附近发掘四座属于迈埃米尔时期的古冢。其中发现大量的铁器，说明这时的阿尔泰地区同斯基泰·塔加尔一样，开始跨进铁器时代。据研究，图雅赫塔的随葬品大约属于公元前5~前4世纪，即相当于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沿岸的撒乌罗玛泰伊文化时期。在迈埃米尔的墓葬中，以马随葬的风俗占着统治地位。

迈埃米尔文化中的艺术，也都是表现野兽的形象。如铜镜边缘的透雕，不但有猛兽的形象，而且有中国龙的图案。马辔上雕有野猪的獠牙。在图雅赫塔村的墓葬中发现金项圈和一个金片，其形状像勾啄猛禽头像，布满卷涡纹透雕。据研究，卷涡纹流行于公元前第一千纪末，但出现的时间则较早。如在塔加尔镜的镜钮上经常见到的那种卷涡纹，最初见于公元前1200年的中国酒器。所

以专家们都公认，西伯利亚的卷涡纹源出于中国华北。

阿尔泰山区迈埃米尔文化究竟属于什么人？据前苏联人类学家捷别茨的研究，一方面在叶尼塞和阿尔泰再次出现了近似于阿凡纳羡沃—安德罗诺沃人的那种人种。另一方面在公元前5~前4世纪又有新的民族迁入阿尔泰地区。如图雅赫塔6号冢的墓主人，是一个带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点的男子。他很可能是来自萨彦岭以南。在那里发现的属于公元前6~前4世纪的墓葬，也多以马随葬，铁器很多，不少器物同阿尔泰出土者非常相似。所以，考古学家们认为，上述的蒙古人种显然来自东方。这证明，当时中国通过蒙古、萨彦地区以及阿尔泰，同西方存在着民族和文化方面的联系。

从上述斯基泰、塔加尔、迈埃米尔等游牧人的文化艺术发展情况可以看到，从中国的蒙古草原，纵贯欧亚大陆，直到东欧的广阔地域里，在文化上有很大的统一性，各地区之间在艺术上也互相影响。这同农业地区之间互相隔绝的状态有很大的不同。草原世界这种文化上的一致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骑马的游牧民在欧亚之间来来去去，使得许多文化特征都趋于一致。甚至中国北部的游牧民族，也接受了来自西伯利亚和西方的影响。游牧民族的动物艺术也影响到了农业定居地区。农业区在日常生活中的大量动物艺术形象，无疑与来自草原的影响有关。

第二章
波斯阿赫门王朝时期的中亚

第一节　斯基泰与萨喀

在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斯基泰人。希罗多德曾经说过："波斯人是把所有的斯基泰人都称为萨喀人的。"[①]美国学者弗莱伊认为："使斯基泰人同其更定居的邻人相区别的，可能是其生活方式，而不是种族和语言上的不同。"[②]如果相信这些说法，我们就可以把斯基泰和萨喀当成同一个概念，作为同一个部族来加以叙述。但实际上，这里是有差别的。因为希腊人当时对欧亚草原的知识，主要根据希罗多德。而希罗多德著作中所说的斯基泰亚，主要是指黑海和阿速夫海北岸向内陆延伸的一片正方形的土地，西起伊斯特河（今多瑙河）下游，东临坦奈斯河（今顿河）。[③]故他们的所谓斯基泰人乃是指黑海以北南俄草原的游牧人而言，或者说是对从喀尔巴什山到顿河的欧亚草原的游牧人泛称。其对伏尔加河以东、西西伯利亚和中亚北部草原的游牧部族，则言之不详。在后来的学术著作中，也都是把斯基泰人作为欧亚草原上的早期游牧人，把斯基泰文化作为铁器时代游牧文化的代表，把斯基泰艺

① 希罗多德：《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Ⅶ，64，王以铸译，第494页，商务印书馆1985版。

② 弗莱伊：《波斯的遗产》，第43页。

③ 孙培良：《斯基泰贸易之路和古代中亚的传说》，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辑。



术作为草原地区动物艺术的典型。而中亚绿洲农业地区的所谓萨喀人，其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则是属于另一种情况。斯基泰和萨喀在种族和语言等方面，虽属同类，但我们在讲述他们的历史时，还是应当加以区别的。

公元前8~前7世纪时欧亚大陆发生的民族西迁，我国学者杨宪益认为，与中国史料记载的秦穆公（前659~前621年）进攻西戎有关。这一民族迁移的运动，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也有反映。他说："伊赛多涅斯人被阿里玛斯波伊人赶出了自己的国土，斯基泰人又被伊赛多涅斯人所驱逐，而居住在南海（指黑海）之滨的奇姆美利亚人（Cimmerians）又因斯基泰人的侵逼而离开了自己的国土。"[①]他又在另一处说："居住在亚细亚游牧的斯基泰人，由于在战争中战败而在玛撒该塔伊人的压力之下，越过了阿拉克塞斯河，逃到了奇姆美利亚人的国土中去，因为斯基泰人现在居住的地方据说一向是奇姆美利亚人的土地。"[②]斯基泰人由于追踪奇姆美利亚人而侵入了亚细亚（伊朗西北），并灭亡了米底帝国。[③]"据说斯基泰人在追击奇姆美利亚人中，是因迷失了道路而攻入米底的。原来奇姆美利亚人是一直沿着海岸逃跑的，但斯基泰人追击时却是沿着右手的高加索前进的，因此他们最后竟把进路转向内地而进入了米底的领土。"[④]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到，首先是阿里玛斯波伊人将伊赛多涅斯人从其居地赶了出来，而伊赛多涅斯人又战胜了与其相邻的玛撒该塔伊人，后者又战胜了斯基泰人，这才迫使斯基泰人侵入奇姆美利亚人的居地。而最初促使阿里玛斯波伊人西攻的就是秦国的击逐西戎。

---

① 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Ⅳ，13，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奇姆美利亚人，前写作钦麦尔人和西米里安人，此处的《希罗多德书》中译本引文未加改动。

② 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Ⅳ，11，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③ 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Ⅳ，1，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④ 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Ⅳ，12，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经过上述的民族迁移,斯基泰人在公元前7世纪末到公元前3世纪时已占据了黑海以北的南俄草原（东起顿河西至多瑙河）。希罗多德时代的希腊人把整个斯基泰世界看成是统一的。他们把与希腊人邻近的那部分印欧部落称为斯基泰人,其中又分为农业斯基泰人和斯基泰游牧民,当然以游牧的占绝大多数。至于更北和更东人们不了解的地区,希罗多德都付之阙如。"因为找不到任何一个人敢说他亲眼看见过那里。即使是阿利司铁阿斯也不曾说他去过比伊赛多涅斯人的地区更远的地方。"[①]

但到希腊化时期的著作中,人们的看法就有所不同。这时,人们把东欧森林地区和亚洲的游牧人也看成为斯基泰人。如Hecataeus就把欧洲的Melanchlaeni人和亚洲的伊赛多涅斯人（Issedones）都说成是斯基泰人。公元前9~前8世纪时,一些斯基泰部落与奇姆美利亚人都游牧于黑海以北的草原上，如荷马史诗《伊利亚德》（Iliad）中就提到"喝马奶子的人（milkers of mares-milkconsumers）"。公元前8世纪或前7世纪的作者希西俄（Hesiod）也曾提到斯基泰人。

斯基泰人的起源如何？他们同前述的安德罗诺沃人是否有渊源关系？现在还说不清楚。罗斯托夫采夫（M.I.Rostovtsev）提出的假说认为，斯基泰·伊朗人（Scythians-Iranians）是来自亚洲。Terenozhkin认为斯基泰人最初来自中亚（InnerAsia）的草原上。西诺尔（D.Sinor）则认为斯基泰人是Srubnaya文化部落的后裔。这种部落于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期与公元前7世纪末之间从伏尔加—乌拉尔草原分几批迁人黑海以北，融合了留在那里的奇姆美利亚人。斯基泰人早期历史中的事迹,主要是侵人西亚,见于亚述—巴比伦的楔形文字文书记载。

波斯人和印度人把所有的斯基泰人都称为萨喀人（Saka）,张

① 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Ⅳ,16,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骞给汉武帝的报告译其音为塞，称为塞人。[①]可见他只知道萨喀这个伊朗语的名称，至于希腊人对萨喀人的称呼则非所知。张骞的知识，也可能先从匈奴中得知，以后则直接从塞人得知。这也可以说明塞人的语言族属。

这里，我们先叙述一下中亚北面和东北方面的斯基泰游牧民。据希罗多德所著《历史》一书的记载，中亚地区的东北方分布着三个部族：

一是秃头的阿尔吉派欧伊人（Argippaeans），他们是“居住在高山的山脚之下，这些人不分男女据说生下来便都是秃头的。他们是一个长着狮子鼻和巨大下颚的民族。他们讲着他们自己特有的语言，穿着斯基泰的衣服”。[②]

二是伊赛多涅斯人，住在“秃头者以东的地方”。[③]关于伊赛多涅斯人的知识，希罗多德又是得自于阿利司铁阿斯（Aristeas）。后者是一个诗人，出生于普洛孔涅索斯，曾到过伊赛多涅斯人的地区，并写下了希腊人称为《阿里玛斯佩阿》的叙事诗。据他在该叙事诗中所说：“在伊赛多涅斯人的那面住着独眼人种阿里玛斯波伊人（Arimaspeans）。”

三是阿里玛斯波伊人。“在阿里玛斯波伊人的那面住着看守黄金的格律普斯（Griffin）。”[④]在希腊的神话中，“格律普斯”是一种狮身鹰头怪兽，这位希腊作者就以之作为阿尔泰部落的象征性的命名。

① “塞”字古音作“sek”。《汉书·西域传》中提到的“塞王”，是指塞人之首领而言，如“塞王南君罽宾”。“塞种”是指塞人之种族而言，如“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塞地”，是指塞人之土地而言，如“乌孙国，……本塞地也”。故不可将“塞王”作为一个单词（族名）。参看Sten Konow,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Vol. Ⅱ, Part Ⅰ. Kharosthi inscriptions, 1929, Calcutta, p. XX., S.Rahul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1964, Calcutta, p.11, 23。

② 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Ⅳ，23，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③ 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Ⅳ，25，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④ 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Ⅳ，13，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以阿尔泰的部族作为基点可以推知，其西面的阿里玛斯波伊人应是分布在斋桑湖附近的额尔齐斯河流域。据《阿里玛斯佩阿》一诗的残句反映，阿里玛斯波伊人经营畜牧业，羊马成群。他们毛发毵毵，面貌奇特，只在前额当中长着一只眼，故被称为“独眼人”。在斯基泰语中，阿里玛意为一，斯波是眼睛的意思。他们经常同阿尔泰的部族为了争夺黄金而进行战斗。后者的“格律普斯”的外号，可能就是由独眼人的夸张说法演变而来的。

伊赛多涅斯人，其居地与住在阿拉克赛斯河（锡尔河）对岸的玛撒该塔伊人相对。[1]其西面是秃头的阿尔吉派欧伊人。从这个方位可以推知，伊赛多涅斯人应是分布在伊犁河至楚河一带。

关于秃头的阿尔吉派欧伊人，希罗多德曾讲到，斯基泰人的地区全都是平原，而秃头人的居地则多是岩石。我们知道斯基泰人是住在南俄平原，由此可见，其西面的秃头者（阿尔吉派欧伊人）就一定是分布在哈萨克斯坦的丘陵地带了。

再是玛撒该塔伊人，“住在阿拉克赛斯河的对岸和伊赛多涅斯人相对的地方”，“他们占据着里海以东的广阔平原”[2]，“穿着和斯基泰人相同的衣服，又有着同样的生活方式”。[3]研究者说“玛撒”是“大”的意思，故玛撒该塔伊即大的萨喀，所以有的说他们是斯基泰的一个民族。

再是撒乌罗玛泰伊人，他们说的“语言是斯基泰语”。[4]撒乌罗玛泰伊人是一个勇武善战的强大民族，他们住在东边日出的方向，其居住的地区在阿拉克赛斯河（指锡尔河）和伊赛顿人相对的地方。有一些人说他们是斯基泰的一个民族。[5]他们同斯基泰人的地区以塔纳伊斯河（顿河）为界。这条塔纳伊斯河流入麦奥

① 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Ⅰ，201，商务印书馆1985版。

② 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Ⅰ，204，商务印书馆1985版。

③ 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Ⅰ，215，商务印书馆1985版。

④ 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Ⅳ，117，商务印书馆1985版。

⑤ 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Ⅰ，201，商务印书馆1985版。

提斯湖（亚速海）。

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已证明以上这些部族是属于印欧人种，他们说着印欧语系的斯基泰语，不过有方言的区别，这是居住地隔离、不常接触所产生的结果。同时也证明，锡尔河以北的广阔草原这一最早被称为突厥斯坦的地区，在古代并非突厥人生息的场所，而是印欧种的塞种人的故乡。

再说南面的萨喀人。在波斯纳黑希鲁斯塔姆[1]的楔形文字石刻上，曾提到萨喀人的三个集团：一是豪玛瓦尔格·萨喀人（Saka-Haumavarga，希罗多德称为AmyrgianSakas，意为平原萨喀人或牧地萨喀人，与沼泽萨喀人相对；或说意为带着所崇拜的植物的叶子的萨喀人），分布于费尔干纳盆地及帕米尔、阿赖岭等地。二是提格拉豪达·萨喀人（SakaTigrahauda，意为戴尖顶帽子的萨喀人），分布于吉尔吉斯与南哈萨克斯坦的草原地带，即从帕米尔、阿赖岭以北，包括塔什干、天山以至巴尔喀什湖以南及西南的楚河、塔拉斯河流域。三是提艾伊·塔拉·达拉伊雅·萨喀人（SakaTyaiy-tara-draya，意为海那边或河那边的萨喀人），分布于阿姆河以北、咸海以东、索格底亚那之地。有的说他们即玛撒该塔伊人。色诺芬也称玛撒该塔伊人为"玛撒该塔伊·萨喀人"。[2]还有一种解释说玛撒是大的意思，玛撒该塔伊即意为大的萨喀族帐。无论从文献上看，或从考古资料看，都不能把玛撒该塔伊人同萨喀人分开。

在贝希斯顿铭文[3]中也提到萨喀人，说萨喀人的国家"在海的

① 纳黑希鲁斯塔姆为古波斯皇帝大流士等的葬地。在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1~前486年）所建都城波斯波里斯附近，其地在今设拉子东北不远，那里有波斯皇帝的宫殿。大流士墓系用石头修建，上面的楔形文字铭刻即被称为纳黑希鲁斯塔姆石刻。

② 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Ⅰ，1，4。

③ 贝希斯顿，是伊朗西部克尔曼夏以东的一个废墟。贝希斯顿铭文为大流士所制，用三种文字刻于从巴格达通德黑兰的大路边一块巨大的石灰岩峭壁上。铭文记述了大流士统治初期的事迹，其上方刻有大流士庆功图像的浮雕。

那边,那里的人戴着尖顶帽子"。

古代波斯人把伊朗高原以北中亚各地的游牧部落通称为萨喀人。对于中亚绿洲地带的定居农业部族,无论在希罗多德的著作还是波斯文献中,都是以其定居地区之名来称呼之。如玛尔吉亚那(谋夫)人、巴克特里亚人、花剌子模人、帕尔提亚人等等。印度人,同波斯人一样,对中亚操斯基泰语的部族,也称之为萨喀人。

斯基泰人的语言,现在确认是属于东伊朗语。但这方面可供研究的材料极少。古典作家的著作中保存了一些斯基泰语的词汇。只有有了文字以后,才可以确知其语言的状况,但那已是在公元后斯基泰人的后裔的时代了。印度作者罗侯罗列举了一些单词,如Taviti(火),Zarina(鹿),Svaliyu(太阳),Taritvaru(部落首领),Mahakanag(大王),Kanag(王)等。他又说,塞人称国王或首领为Fakpur。中世纪时波斯人称中国皇帝为Faghfur,即由此字演变而来。[1]这个例子也说明斯基泰语属伊朗语。

中亚一些绿洲地区的居民所说的语言,同斯基泰语是差不多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曾指出,花剌子模人是属于玛撒该塔伊人和萨喀人的一部分,又说索格底亚那人与巴克特里亚人在生活习俗上同游牧人很少区别。他还说明:米底人,波斯人,巴克特里亚人,索格底亚那人等所说的语言都是一样的,鲜有区别。司马迁的《史记·大宛传》也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2]中西史料说法一致,表明中亚各地农牧民说着不同的伊朗方言,可以互相了解。

无论是考古发现的文物和古典作者的记述,都使我们可以得知萨喀人的相貌和服饰状况。贝希斯顿铭文上方浮雕中表现的被

① 罗侯罗:《中亚史》,第10页,加尔各答新时代出版社1963年版。《世界境域志》第八节说,中国的"国王称为Faghfur-i-Chin,据说是法里顿的后裔"。见《世界境域志》密诺尔斯基英译本,第84页。

② 《史记》,第3174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俘的萨喀人，波斯波里斯浮雕中描写的向阿赫门王朝朝贡的萨喀人，牵骆驼的巴克特里亚人以及南俄库尔奥巴（刻赤）和沃罗涅日发现的金银合金瓶画中的斯基泰人，都是戴着护盖两耳的尖顶帽子，穿着宽大的衣服。正如希罗多德所描述的："属于斯基泰人的萨喀人戴着一种高帽子，帽子又直又硬，顶头的地方是尖的。他们穿着裤子，带着他们本国自制的弓和短剑，此外还有他们称之为撒伽利司的战斧。"而玛撒该塔伊人也是"穿着和斯基泰人相同的衣服，有着同样的生活方式；他们拥有骑兵和步兵，此外还有弓兵和枪兵，更有使用战斧的习惯"。[①]看来，前面提到的撒乌罗玛泰伊人以及秃头、独眼、伊赛多涅斯人等也是这种服饰。至于斯基泰人妇女的服饰，则见于花剌子模和额弗拉昔雅卜（撒马儿罕）发现的阿纳希特神像。这种神像是泥塑的，穿着长袍，肩上戴着披风。在塔利·巴尔祖古城和额弗拉昔雅卜古城发现的男人小塑像（可能是米特拉神像），也是穿长衣，着高靴，戴尖顶帽。所有这些关于斯基泰人的衣着情况，考古发掘得到的实物都与文献的记载完全一致。从波斯的石刻看，不但游牧人，而且南方的萨喀人也带这种尖顶高帽子。

斯基泰人的风俗习惯，在希罗多德的书中有较多的记载。这些记载表明，在欧亚草原上游牧人有许多共同的特点，颇具研究的学术价值。如玛撒该塔伊人有着与斯基泰人同样的生活方式，斯基泰人的一些风俗习惯也见于后来的突厥人当中。

如斯基泰人以敌俘的首级做饮器的习惯，就在后来的游牧民族中流行，并可能传到中国。具体做法是这样的："沿着两个耳朵在头上割一个圈，然后揪着头皮把头盖摇出来。再用牛肋骨把头肉刮掉，并用手把头皮揉软，用它当做手巾来保存。"至于首级本身，则是将"眉毛以下的各部锯去并把剩下的部分弄干净。如果这

① 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Ⅰ，215，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个人是一个穷人，那么他只是把外部包上生牛皮来使用；但如果他是个富人，则外面包上牛皮之后，里面还要镀上金，再把它当做杯子来使用”。[①]这种习俗在欧亚大陆早期游牧人当中可能起源甚古，但在中国历史上初次见到此种做法则是在公元前403年。史称：“（赵魏韩）三家分智氏之田。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②]在匈奴中也有这种习俗。如：“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③]又北魏明帝初年（约516年），高车首领“弥俄突与蠕蠕主丑奴战，败，被擒，丑奴系其两脚于驽马之上，顿曳杀之，漆其头为饮器”。[④]只是斯基泰人爱用黄金，而漆是中国的发明，故人头之作为饮器，前者镀金，后者上漆。斯基泰人剥下敌人的头皮挂于马缰上做手巾用的习惯，后来在西伯利亚的沃古耳人和奥斯佳克人当中亦有遗留。

关于斯基泰人的精神文化，我们所知不多。可以肯定，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他们是没有文字的。只是后来的历史书籍才提到斯基泰人的原始宗教情况。考古发掘出来的斯基泰人墓葬也表现出当时人对灵魂的信仰和对祖先的崇拜。由于人们对大自然的威力不能理解，也产生了万物有灵观念，但主要的还是对天、地、日、月、水、火的崇拜。希罗多德说，斯基泰人“在诸神中间只崇拜太阳，他们献给太阳的牺牲是马”，因为“只有人间最快的马才能配得上诸神中间最快的太阳”。[⑤]波斯人“同样地向太阳和月亮、向大地、向火、向水、向风奉献牺牲。这是他们从古以来就向之奉献牺牲的仅有的一些神”。又说：“（斯基泰人）用各种畜类作为牺牲，但主要的是马。”“完全不用豚类作牺牲，在斯基泰的国内是绝

① 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Ⅳ，64~65，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② 《资治通鉴》，卷一。

③ 《汉书·张骞传》。

④ 《北史·高车传》。

⑤ 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Ⅰ，216，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对没有养猪的习惯的。”中亚各地人之崇拜太阳与火，还表现在花剌子模这个地名。花剌子模就是“太阳的土地”的意思（“花剌”意为太阳，“子模”意为土地）。索格底亚那是火地（Fireland）的意思。

在斯基泰人中间，卜者很多。在国王生病时或其他重要事务上，往往进行占卜。而在后来突厥人的信仰中，也是以崇敬日出放在首位。中国史料就讲道：可汗“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①]至于占卜，林干先生说这是信仰萨满教的一种表现，突厥人中不仅有许多人相信占卜，而且在上层统治人物中还有自己懂得占卜之术的。

斯基泰人的殡葬和举哀的仪式在希罗多德的书中也有所描述，这里介绍一下他们在国王死了以后如何表示哀悼。据《历史》一书中记述：“割掉自己的耳朵的一部分，剃头，绕着臂部切一些伤痕，切伤他们的前额和鼻子，并且用箭刺穿他们的左手。”他们用车子载着国王的尸体遍行至各个部落，最后送到最远的盖罗司人的地方下葬。他们还用人和牲畜殉葬，即“同时埋葬他的一个行觞官、厨夫、厩夫、侍臣、传信官；此外还有马匹、所有其他各物的初选品和黄金盏”。[②]而后来在突厥人当中也有用所谓“剺面”来表示悼念的办法。那就是：人死后将其尸体停放在毡帐中，其子孙及亲属各杀羊马以祭，并走马绕帐七匝。其中一人至帐门用刀剺面痛哭，血泪交流，如此七次乃止。不过当时已不像斯基泰人那样实行用活人殉葬，而是择日取死者平时所乘之马和常用之物，与尸体一起焚毁，收其骨灰，待时而葬。如春夏季死，则候草木黄落；如秋冬季死，则候草木茂盛，始挖坑埋殓之。埋葬之日，亲属设祭及走马、剺面、痛哭，一如停尸之时。[③]在敦煌千佛洞中表现佛

① 《周书·突厥传》。

② 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Ⅳ，71，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③ 《周书·突厥传》及《隋书·突厥传》。

涅槃的壁画上，也可以见到各族信徒剺面举哀的场面。这些与希罗多德所描述的虽略有差别，但其基本做法和想法都是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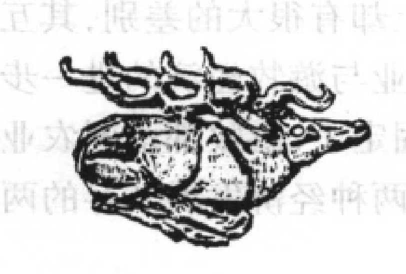
斯基泰人的艺术可以作为游牧民族艺术的代表，其主要的特点就是动物风格（Animal style），故被称为“动物风格的艺术”或“野兽纹艺术”，即用动物的形象来装饰各种用品，典型地表现了早期游牧人的审美观念。这种艺术初见于公元前8~前6世纪，到公元前3~前2世纪时渐趋衰落。斯基泰艺术与游牧人的生活有关，艺术来源于生活。游牧人牧养着各种牲畜，如马、牛、羊，也从事狩猎，与麋鹿、狮虎相接触，故在他们的思维中充满了这类动物的形象。他们出于天生的爱美观念想要美化自己的生活和环境时，很自然地就用这类动物的形象来装点一切用具。斯基泰人的艺术品因考古而发现的不少。如斯基泰墓葬中发现的具有动物雕像的物



早期动物风格（北哈萨克波沃耶湖出土青铜工具）



“西伯利亚特藏”金质斑鹿和金质圆牌（外衣装饰品）上的狼



奇里克丁古墓出土金制品



奇里克丁古墓出土木质箭筒，内有青铜箭矢，外饰金质雄鹿4只

品，主要有各种铁刀、小牌、带钩、斧柄、铜镜、饰牌和铜箭镞等。这些工具或兵器上雕刻的动物主要有狮子、奔鹿、狮身鹰头象、怪枭、猛禽以及猫科动物（老虎、雪豹）等。所刻动物要能适合于被装饰的对象。有时是几种动物组成一组雕刻，表现一个神话故事；有时是斗兽，有时有人物参加于其中。其中狮、虎的形象，显然起源于亚述、巴比伦和赫提，并受到伊朗西部和高加索·乌拉尔图的艺术的影响。有的地方出土的斧柄上的狮子，同见于爱奥尼亚花瓶、亚述宫殿的浮雕和迈锡尼饰板上的狮子，风格完全相同。制作这类艺术品的材料有各种金属，如金、青铜、铁、锡以及木、角、皮、毛等。由于金属品不易破损毁坏，故存留较多。

斯基泰的“动物艺术”在旧大陆影响甚广，甚至及于西欧和中国，影响的时间也绵延许多世纪。我国农业地区许多用动物作装饰的艺术，狮、象、麒麟等怪兽的形象，有的就可能是由北方游牧民族中传入，有的还是由中近东传入。所以，所谓斯基泰艺术在后来并不一定都是斯基泰人的产品。虽然所有游牧民族的艺术都以动物纹为其特点，但早在公元前第一千年中期就已产生的斯基泰艺术竟达到了这种艺术的高度水平。正如西诺尔教授说：“斯基泰人在其文明的这个方面和其他许多方面，可以说不仅代表骑马游牧民族草原文明的精华，而且可能也是这一文明能够达到的最高成就。”①

欧亚大陆草原地带游牧的斯基泰人和中亚南部绿洲地带从事农业的定居居民之间，尽管在人种、语言、服饰等方面有很大程度的共同点，然而他们在经济的发展上却有很大的差别，其互相间的关系也常常是敌对的。随着养马业与游牧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畜牧业同农业的分工更加扩大和固定了，游牧部落同农业地区之间的和平贸易和掠夺战争成为这两种经济发展共存的两个

① 西诺尔：《中亚》，第83页，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1年英文版。

必要条件,也促成了农牧业地区阶级和国家的产生。

研究游牧部落中阶级产生的历史,也主要依靠考古资料。但由于游牧人迁徙不定,没有长久的村落,只有短暂的停留地,故不能形成文化层。他们的墓葬(称为库尔干)也就成为窥见其社会生活的镜子。有的墓葬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埋葬的东西极为丰富,而另一些墓葬则很小,内容贫乏。墓葬中一般除死者的尸骨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武器、马骨以及羊骨等。贫人的墓葬和富人的明显不同。

公元前7世纪以来,草原地区游牧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能获得更多的畜产品,财产逐渐集中到氏族部落首领的手中,部落之间的贸易也发展起来。这种交易起初是通过各自的首领来进行,而在畜群变成了私有财产以后,个人之间的交换也就成了主要的形式。恩格斯说:"至于畜群怎样并且在什么时候从部落或氏族的共同占有变为各个家庭家长的财产,我们至今还不得而知。不过,基本上,这一过渡一定是在这个阶段上发生的。随着畜群和其他新的财富的出现,在家庭中便发生了革命。谋取生活资料总是男子的事情,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是由男子制造的,并且是他们的财产。畜群是新的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最初对它们的驯养和以后对它们的照管都是男子的事情。""从前保证妇女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务劳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随着男子在家庭中的实际统治的确立,实行男子独裁的最后障碍便崩毁了。这种独裁,由于母权制的颠覆、父权制的实行、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逐步过渡而被确定下来,并且永久化了。"[1]用上面这一段分析来衡量当时斯基泰人游牧部落的社会发展,可以说他们正是处在这样一个过渡的阶段,阶级的分化已经很明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7~15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斯基泰人可能是一些部落联盟。部落内已经产生一小部分最富有的上层。私人占有的畜群数量很大。这从斯基泰人的墓葬可以看出来。在库班河大乌耳斯克发掘的一个巨墓中，就发现有四百余匹马随葬。希罗多德曾说，斯基泰人中有祭司、战士和农民三个阶层，其中的祭司即属于统治阶级。古代印度、伊朗社会也是这样组成的，证明斯基泰人是古代印度、伊朗世界的一部分。

在斯基泰社会中，可能还保留着某些母权制的残余。据有的学者研究，萨尔马希安人之所以得名，就是因为在该部中妇女占有重要地位（Mata意为妇女；Sarva-Sarva，意为一切的一切。此二字构成Sarvamata或Sarmata）。妇女不仅取得死去的首领的地位，而且统帅军队参加战斗。[①]希罗多德在讲到玛撒该塔伊人时，说他们的统治者是一个在丈夫去世之后即位的女王。[②]我国古代也传说周穆王西征会见西域酋长西王母的故事。所有这些都应当是反映了同样的事实。

中亚南部诸河流域绿洲农业地区阶级社会的产生有较多的考古资料以供研究。如阿姆河下游的花剌子模，阿姆河中、上游的巴克特里亚，泽拉夫善河与卡什卡河流域的索格底亚那（包括今布哈拉与撒马儿罕），木尔加布河流域的玛尔吉亚那（谋夫），古儿甘河与阿特腊克河流域的帕尔提亚，赫里鲁德河（古称阿列亚河，下游名特振河）流域的阿列亚（今赫拉特）等地区，都是在这个时期产生了阶级和阶级社会。以花剌子模地区为例，在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前半期，当地的苏雅尔干文化发展到了早期铁器文化——阿密拉巴德文化。在花剌子模的居兹利·克尔古城，谋夫和撒马儿罕等地都发现过属于公元前7~前5世纪的铁制镰刀等物品。由于铁器的逐步使用，提高了人们的生产能力。“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

① 罗候罗：《中亚史》，第8页，加尔各答新时代出版社1963年版。

② 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Ⅰ，205、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①]从而导致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

农业上的突出进步是从依靠河水泛滥到兴修水利。在阿赫门王朝兴起以前,中亚显然已经兴建了一些水利工程。考古者已经发现多处这类水利工程的遗址。希罗多德谈到,当阿赫门王朝统治花剌子模时期,波斯国王也在其地兴建了一些巨大的水利工程。[②]波斯古经《阿维斯塔》中把灌溉农业看成是神圣的事业。因为在这些地方“如果没有灌溉,农业是不能进行的”。[③]修建水利工程,特别是牵涉到较广阔地带的大水利工程,不是个别家庭或个别氏族所能胜任的。公元前7世纪时,花剌子模农业文化比阿密拉巴德文化进步的地方也就表现在这些灌溉渠道的出现。研究者们认为,没有国家政权,这些灌溉渠是不可能兴建的。建造水渠使用的是奴隶的劳动力。

游牧人对绿洲地区的经常进攻,也是导致农业地区国家政权出现的原因之一。无论花剌子模和中亚其他地方,都发现了设防的古代村落或城镇。前述的居兹利·克尔古城,实际上是一个建了围墙的村子。目的是用围墙把牲畜和村民圈起来,以防游牧人的进犯。在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也有这类的村镇。

就是这个时期在灌溉农业和阶级对抗发展的基础上,中亚各地产生了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占有者社会,形成了以绿洲为中心的地方性的国家政权。

那时有一个名叫琐罗亚斯特(Zoroaster)的人(伊朗人称之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 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Ⅲ,117,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前苏联学者认为,这些水渠是在公元前8~前7世纪修建的(见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第586页)。汉布里指责苏联人的观点,说“苏联作者们在他们讨论花剌子模的巨大水利工程时,倾向于缩小阿赫门王朝的贡献,把这些水利工程的兴建提前到不可知的公元前第一千纪初期,这是奇怪的”。(Gavin Hambly, Central Asia, Delacort World History.vol.XVI, 1969, NewYork)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为Zarathustra;Zoroaster是希腊人的讹写),改革原始的雅利安宗教,宣扬一种新的教义,以阿胡拉·马兹达作为其奉事的最高神祇。关于此人的出生地和时代,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他是(伊朗西北部的)米底人。有的说他生活在公元前1000年或其以前。有的说他是阿赫门王朝时的人或是释迦牟尼的同时代人。据现在的研究,他应是巴克特里亚人,生活于公元前7世纪。①

琐罗亚斯特自称出身于显贵的斯皮达马家族。②他的一家大约是从索格底亚那迁到巴克特里亚来的。在《阿维斯塔》中,描写到他的故乡和他开始活动的地区时说:“那里有英武的领袖,统帅着众多的军队,管治其地;那里有高山,富于牧场和水草,生产一切为畜牧所需要的东西;那里有广阔的深湖,可供航行的大河,其奔腾的激浪,流过如下诸国:伊斯卡塔(斯基泰),薄乌鲁(喀布尔河谷),木鲁(谋夫),哈列瓦(阿列亚),伽瓦(粟特的一个地区),粟特,花剌子模。”③这里所说的“可供航行的大河”,无疑就是指阿姆河与锡尔河。

琐罗亚斯特在巴克特里亚传教时,曾得到当地国王维什塔斯帕的保护,后来该国王也成了他的信徒。波斯阿赫门王朝大流士皇帝的父亲也叫维什塔斯帕,人们据此来推定琐罗亚斯特生活的年代。但是现在还不能肯定巴克特里亚王维什塔斯帕同大流士的父亲是否同一个人。

琐罗亚斯特所鼓吹的宗教学说,主张在宇宙和人类生活中是由阿胡拉·马兹达(善神)和阿赫里曼(恶神)这兄弟俩统治着的,善、恶二神永远处在斗争中,最后是阿胡拉·马兹达取得胜利。

① 有人推定其生卒年代具体为公元前660–前583年,这当然是难说得确切的。参看俞阿尔特《古代波斯与伊朗文明》,第3编,第3章。

② 斯皮,是“白的”、“显赫的”的意思;达马,为字尾,相当于形容词的最高级。斯皮达马,即“最高贵”的意思。参见派克:《<阿维斯塔>中所见的伊朗雅利安人的宗教信仰》,第174页。

③《阿维斯塔·米赫尔雅什特》14节。

他还认为，火是阿胡拉·马兹达的儿子，故崇拜火。火代表光明，其对立面是黑暗，二者也是不断斗争着的。他的宗教反对台伐斯（Daevas），说台伐斯是邪神，是恶魔，是苦难的根源，因而要消灭台伐斯。北方的游牧人是台伐斯的崇拜者。他的同胞受到游牧人的压迫，他号召人民起来同台伐斯的崇拜者Drukhs人作斗争。由此看来，琐罗亚斯特是代表中亚南部定居从事农业的东伊朗语居民的利益，目的是要使绿洲地带居民团结起来抵抗游牧人的侵扰。

当时没有文字，琐罗亚斯特自然是不会书写的。他创作了许多传教用的诗歌，都是口诵相传的。他的这些押韵的诗歌，直到公元350年，即萨珊王朝初年才收集起来，编撰成书，名叫《阿维斯塔》。琐罗亚斯特传教用的诗歌称为《格塔斯》（Gathas），系用巴克特里亚语所作，但到其成书时，这种古代语言已经消亡了。《阿维斯塔》中除（最古的部分）《格塔斯》外，还有后人撰写的《雅思纳斯》（Ysanas），《文迪达德》（Vendidad），《雅希特》（Yasht），《维斯佩锐德》（Vispered）等。其中的《文迪达德》（破邪篇）为宗教礼仪书，写成时间最晚。琐罗亚斯特在“格塔斯”中以洋溢的民族感情，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反抗来自北方的征服者。所以，他与其说是一个先知和教主，不如说是一个战士和抵抗运动的领导者。

琐罗亚斯特的学说是祆教教义的基础。《阿维斯塔》不但是祆教的经典，而且由于其中反映了历史时代初期中亚和东伊朗的社会情况，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如第一章讲到阿胡拉·马兹达所创造的地方先后是AiryanaVaejo，Gau（其地有粟特），木鹿，Bakhdi（巴克特里亚）等，这暗示雅利安人故乡的所在及其迁徙之地。《阿维斯塔》中谈到当时的社会情况说，土地是归由个别家庭组成的氏族公社共同占有的，也讲到“大量畜群”的占有者。几个氏族组成为部落（赞图），最大的联合体是部落联盟（达希尤）。在一定的地域内部落联盟的首领是国王（卡维）。社会分为三个

等级，即祭司（Athravan）、战士与农夫。国王也是最高的祭司。在《阿维斯塔》中属于较晚的部分中又加上一个手工业者的等级。在《文迪达德》中说，虔信宗教的人，被授予"火、牛奶、妻子女儿和畜群，得享安宁。他们种植粮食，作物，饲料与果实，灌溉于旱的土地，以繁殖牲畜"。这反映一种农业生活，其中还讲到"谁耕耘土地，谁就给予土地好处，犹如丈夫将幸福赐予躺在床上的妻子。谁播种谷物，谁就是播种了正义"。此外还讲到农业所必要的水利灌溉设施。不止一次地提到"大量牲畜"的占有者，说明也有畜牧业存在。《阿维斯塔》又提到"最好的人"的会议，看来是指部落首领的会议。所有这些，不仅可以与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资料互相补充，而且能进一步丰富对当时中亚社会经济状况的认识。

第二节　阿赫门王朝入侵和统治中亚

前已谈到，从中亚草原迁到伊朗的雅利安人有两大部分，一为米底人（分布在伊朗西北），一为波斯人（分布于伊朗西南的培尔西达）。公元前7世纪以前，他们处在亚述强固的统治下。公元前612年，米底人和迦勒底人联合攻陷尼尼微，亚述亡，米底强国代之而起。波斯人附属于它。

波斯人是由许多部族结合而成的。希罗多德说："阿赫门族就是它的一个部族，而波斯的国王便是从这个阿赫门族出身的。"[①]所以，公元前6~前4世纪时统治波斯帝国的王朝称为阿赫门王朝。阿赫门家族的首领在其推翻米底强国以前已称安善王。[②]自安善王特斯佩斯（Teispes）三传至居鲁士，波斯人就强大起来了。

居鲁士于公元前558年即位，五年后，同米底军队统帅哈尔帕

① 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Ⅰ，125，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② 安善（Anshan）是一个地方，在巴比伦东北，波斯湾北端伊兰（Elam）之南部。

哥斯串通，进攻米底国王阿司杜阿该斯。由于米底军的叛乱，使居鲁士在帕萨尔迦代[1]大获全胜，米底王被自己的部下缚献于居鲁士。居鲁士继续进攻其首都厄克巴坦纳（即今哈马丹），陷之，米底强国于是亡，居鲁士称波斯王，时为公元前550年。

阿赫门家族建立波斯帝国，是古代的重大事件。其历史在一般的世界史教科书中是讲了又讲的，这里没有重复的必要。我们主要感兴趣的是其中与中亚史有关的部分。

中亚的萨喀人很早就参加过西亚的历史活动。如早在阿赫门王朝形成以前，萨喀人和巴克特里亚人就参与了米底和亚述之间的斗争，时而站在米底方面，时而站在亚述方面，并曾伙同斯基泰人侵入近东。公元前673年，亚述国王阿萨尔哈东曾进军到里海南部地区，势力达到伊朗东部的帕尔提亚。后来，帕尔提亚曾向米底纳贡。居鲁士在早期就同中亚各族有所接触，并同萨喀人缔结过盟约。

波斯人一天比一天强大起来的消息，使其西邻吕底亚（在今土耳其西部）深感不安。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以为，他有可能在波斯人的实力还不至于十分强大的时候，阻止他们那日益加强的力量。[2]于是，克洛伊索斯与希腊人结盟，整军越过哈律司河（即今克泽尔河）去进攻波斯人。居鲁士求援于中亚的萨喀人，随即纠合了一支军队前来迎击克洛伊索斯，初战未分胜负。吕底亚王返回首都撒尔迪斯（Sardis，在今土耳其格迪兹河谷伊兹密尔以东约80公里），准备取得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的帮助后，再与居鲁士决战。而居鲁士却不给他以喘息的时间，立即率军进攻吕底亚。公元前546年两军会于撒尔迪斯之前。克洛伊索斯的马队被波斯人的骆驼所吓跑，吕底亚人溃入城内。波斯军围城十日陷之，吕底亚亡。随后，波斯人又征服爱琴海东岸的希腊城邦。公元前538年，占领了巴比伦的大部分。于是，居鲁士便打算进攻埃及。

① 帕萨尔迦代（Pasargade），波斯古城，在波斯波利斯东北。

② 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Ⅰ，46，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波斯帝国的东境经常遭到中亚游牧部落的侵袭，这对于居鲁士想进一步征服埃及的宏图来说，显然是后顾之忧。因此，他决定先征服巴克特里亚和中亚诸部。关于居鲁士在东方的军事行动，我们所知极少。只知道他在公元前545~前539年间攻下了巴克特里亚，从而导致了玛尔吉亚那与索格底亚那的降服。居鲁士的势力达到了锡尔河，建立了居鲁士城（Cyropolis）等据点，以控制交通要道，作为进攻游牧人的基地。①

居鲁士也征服了帕尔提亚，并任命大流士的父亲维什塔斯帕为希尔克尼亚（Hyrcania，即今阿斯特拉巴德）太守。当时尚未迁到萨喀斯坦（Sacastene，即今锡斯坦）的萨喀人也被其制服。

对于居鲁士同中亚游牧人的斗争，有各种互不相同的记载。②希罗多德的说法是比较详细的一种。据说："当居鲁士把巴比伦人这个民族也征服了之后，他就想把玛撒该塔伊人也收归自己的统治之下。"③

这时，玛撒该塔伊人的统治者是一位在丈夫去世之后即位的女王托米丽司。她拒绝服从居鲁士的统治，并对波斯人的进攻予以坚决的抵抗。公元前529年，居鲁士遣使向托米丽司求婚，遭到拒绝，便把大军开抵阿拉克赛斯河（有人说该河即阿姆河的支流乌兹保衣河），着手在河上架桥，并在渡河用的浮桥上修筑舫楼，准备进攻玛撒该塔伊人。经双方议定，托米丽司的军队从阿拉克赛斯河后退三日的路程，居鲁士军渡河作战。

居鲁士渡河后行军一日路程，扎营，将老弱留下，又率其精锐返回阿拉克赛斯河。托米丽司之子斯帕尔伽披赛斯被诱，率军前来劫营，将老弱杀死，饮宴为乐。他们吃饱喝足了的时候便睡着

---

① 居鲁士城，中世纪时名忽毡，近代名乌腊提尤别。此城到亚力山大时还在。无论是居鲁士和亚力山大，似乎都没有达到费尔干纳。

② 《剑桥古代史》，第4卷，第15页，伦敦1926年英文版。

③ 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Ⅰ，201，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了。于是居鲁士所率领的波斯军返回袭击。斯帕尔伽披赛斯在醉中被俘获，在酒醒后自杀而死。

托米丽司为了报杀子之仇，把国内的全部军队都集合起来同居鲁士作战。希罗多德在他的著作中描写了这次战争的情况："据说在一开头的时候，他们双方在对峙的情况下相互射箭，箭很快射完，他们便猛冲上来用枪、剑之类的武器进行了殊死的厮杀。据说，他们便这样地厮杀了很长的一个时候，哪一方面都不想退却。结果是玛撒该塔伊人取得了胜利。波斯的军队大部分死在那里，而居鲁士本人也在统治了二十九年之后在这一场战争中战死了。托米丽司用革囊盛满了人血，然后在波斯阵亡者的尸体中间找到居鲁士的尸体，把他的首级割下来放到那只盛血的革囊里去，而且在蹂躏居鲁士的尸体。"[①]这位波斯帝国的创立者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

居鲁士死后，其长子冈比西即位。冈比西之胞弟巴尔迪亚则管治东部各省，如花剌子模、巴克特里亚、帕尔提亚及克尔曼。冈比西遵照其父居鲁士之遗命，准备出征埃及。由于害怕巴尔迪亚趁自己不在而夺取王位，便派人将巴尔迪亚秘密杀死，于公元前527年征埃及。[②]在阿拉伯游牧人的支援下冈比西迅速地征服了整个尼罗河流域，但于公元前522年回师途中死去。

在冈比西从埃及回师以前，波斯国内已经发生了起义。起义的领导者是一个祆教僧侣（玛哥斯僧，中国史料称为"穆护"），名叫高墨塔。他自称是居鲁士之弟巴尔迪亚，波斯王，宣布人民免服兵役并免税三年。这显然是反映了波斯人民对战争的不满，目

① 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I，212~214，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② 冈比西之弟，贝希斯顿铭文作巴尔迪亚，而希罗多德的《历史》则作斯美尔迪斯（Smerdis）；克泰夏斯作Tanyoxarces；色诺芬作Tanaoxarces。但希罗多德说冈比西是在出征埃及时将司美尔迪斯杀害的，而不是在其以前。见希罗多德《历史》，Ⅲ，29~31。苏联科学院编《世界通史》采用希罗多德说。

的是要恢复米底人的统治。①

高墨塔的政策引起了波斯贵族的不满。阿赫门家族的另一代表、特斯沛斯的玄孙大流士纠集力量，于公元前522年秋谋杀了高墨塔，夺得波斯王位。

大流士即位前后的波斯帝国处在一个到处发生叛乱的局面下，包括西部的伊兰、巴比伦、米底，北部的萨伽尔提亚（Sagartia，即今库尔德山区）和东部的希尔克尼亚、帕尔提亚、玛尔吉亚那等地的叛乱。这里主要讲一下东部的情况。

大流士的父亲维什塔斯帕当时是帕尔提亚地区的统治者。当帕尔提亚人叛离大流士而拥护米底的普拉瓦尔提什（Fravartish）时，也就抛弃了维什塔斯帕而暴动。大流士的父亲领兵出击，于公元前521年3月8日在帕尔提亚的维什帕乌扎提什（Vishpauzatish）地方打败了暴动者。这以后，大流士又派兵前去支援，维什塔斯帕才于公元前520年4月在帕尔提亚的帕提格拉班（Patigrabana）地方把暴动完全镇压了下去。

玛尔吉亚那的起义有广大的群众参加。起义者推举一个名叫普拉达（Frada）的人为首领。大流士指令巴克特里亚太守达达尔什（Dadarshi）领兵前去镇压，于公元前522年12月将玛尔吉亚那击破，杀死起义者5.5万人以上，俘虏6572人。可见参加起义的人数之多。

米底叛乱之后，波斯的游牧部落曾拥戴瓦黑阿兹达塔为王，以反叛大流士。瓦黑阿兹达塔也自称是居鲁士之子巴尔迪亚。在波斯立足数月后，他还想统治东部的阿拉霍西亚（Arachosia）②，便派遣军队前去进攻当地的波斯太守维瓦那（Vivana），但几次被维瓦那打败。瓦黑阿兹达塔率军逃到阿拉霍西亚的阿尔沙达要塞，又被维瓦那俘虏处死。

① 西方有的作者说假巴尔迪亚之说是大流士编造出来的。这种说法是很难认同的。

② 阿拉霍西亚，相当于今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周围区。

大流士在《贝希斯顿铭文》中历述了他平定各地叛乱的经过。他在当了国王以后的同一年进行了19次战争。这么多的战争全是在一年之内（即在公元前522年）进行的。有的书（如旧版《剑桥古代史》）则说这些战争是发生在公元前522年秋到公元前520年之间。大流士还说，他曾与萨喀人的军队一起到了萨喀人的国家。这个国家在海的那边，那里的人戴着尖顶帽子。以后，大流士在近海处修复了阿姆河上的浮桥。通过浮桥到了那个国家，击溃了萨喀人，俘获一部分，其中一部分被缚送到大流士处，其中有萨喀人的首领斯昆哈。大流士任命另一人统治萨喀部落。在《贝希斯顿铭文》上方的浮雕中，就雕刻着解送到大流士面前的九个被俘首领，其中最后一个头戴尖顶帽子的就是萨喀人的首领斯昆哈。另据波里比乌斯的记载，大流士一世步居鲁士的后尘，于公元前518年远征玛撒该塔伊人，也遭失败。萨喀首领希拉以苦肉计引诱波斯人进入无水草的沙漠中，使其大部分人困死。

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大流士还曾进攻南俄的斯基泰人，时间大约是公元前516年或公元前513年。这次进军的目的不明，可能是配合斯基泰人的敌人从东面和南面对斯基泰人进攻。大流士进军的路线是从其西面渡过博斯普鲁斯，穿过色雷斯而至多瑙河。但斯基泰人避免同波斯大军进行正面战斗，而是采用打了就走的游击战术，趁波斯军在睡觉和进餐时困扰之。大流士终因不能适应斯基泰人的战术而撤退。

经过一系列的镇压，各地的叛乱、暴动和起义都平息下来。由居鲁士时所开创、冈比西时得到发展而后陷于分裂的波斯帝国重新得到统一。大流士皇帝史称大流士一世，是波斯历史上最强有力的皇帝之一。在他统治时期，阿赫门王朝的疆域，西至地中海和埃及以外，北至黑海、里海和高加索，南至波斯湾和阿拉比亚，东至中亚的锡尔河。在公元前512年，大流士一世还征服了印度旁遮

普的大片地方，将其划为一个郡。[①]

从居鲁士时期起，中亚南部地区显然已经被纳入波斯帝国的行政管辖系统之内。这种管辖系统，到大流士一世时发展臻于完善。所以希罗多德说："大流士把他的领土分成二十个波斯人称为萨特拉佩阿的太守领地，随后，他又任命了治理这些太守领地的太守，并规定每个个别民族应当向他交纳的贡税。""交纳白银的指定要按照巴比伦塔兰特来交纳；交纳黄金的要按埃乌波亚塔兰特来交纳；巴比伦塔兰特等于七十八埃乌波亚的米那。在居鲁士和在他以后的冈比西的统治年代里，并没有固定的贡税，而是以送礼的形式交纳的。正是由于贡税的确定以及诸如此类的措施，波斯人才把大流士称为商人。"[②]

大流士时期的26个太守领地中，位于中亚和东伊朗地区的有如下几个：第七地区，指兴都库什山以南的撒塔巨达伊人（Sattagydae），健陀罗人（Gandarii），达迪卡伊人（Dadicae），阿帕里塔伊人（Aparytae），他们要交纳170塔兰特。第十二地区，指从巴克特里亚人的地方直到埃格洛伊人（Aegli）的地方，他们要交纳360塔兰特。第十五地区，指萨喀人和卡斯披亚人（Caspii）[③]的地方，他们要交纳250塔兰特。第十六地区[④]指帕尔提亚人、花剌子模人、索格底亚那人（粟特人）和阿列欧伊人（Arii）的地区，他们要交纳300塔兰特。第十七地区，指帕利卡尼欧伊人（Paricanii）和

① 俞阿尔特：《古代波斯与伊朗文明》，第55页，注1，伦敦1927年英文版。

② 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Ⅲ，89，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③ 按：《剑桥古代史》的地图将这个地区划在阿姆河的上游。而苏联科学院编《世界通史》则将这个地区划在里海东岸。当以后者为胜。

④ 弗鲁姆金《苏联中亚考古》（新疆博物馆1981年印本）称：公元前6世纪，波斯军先后在居鲁士二世和大流士一世的率领下侵入花剌子模，一时使花剌子模成为阿赫门帝国的第十六行省。这个时期花剌子模的特点是：由于采用新技术，建立了庞大的灌溉系统，甚至可能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奴隶制据说延续到公元前第一千纪。在此时期，早期斯基泰人的青铜文化一度与铁器文化并存（第43页）。在花剌子模，有大量古代灌溉系统遗迹被发现（可能是公元前第一千纪中期），表明当年这里有过一个中央集权的强大政权，因此灌溉发达，管理良好（第41页）。

亚细亚的埃西欧匹亚人的地区（相当于今俾路支），他们要交纳400塔兰特。最后，印度人是第二十地区，他们比其他任何地区所交纳的贡税都要多，即360塔兰特的沙金。[①]

色诺芬的著作已经谈到居鲁士大帝向阿拉比亚等地派太守的情况。贝希斯顿铭文还提到一些太守的名字。如前面提到的巴克特里亚太守达达尔什、阿拉霍西亚太守维瓦那。大流士之父维什塔斯帕曾长期统治帕尔提亚和希尔克尼亚之地，不过史书上未提到他有太守的职衔。这些太守都出身于波斯王族或显赫贵族，其主要职责为征收所治地区的赋税。太守的权力很大，其所辖的地区如同独立王国，所以在中央权力削弱时即趋向独立，使帝国瓦解。为了密切波斯宫廷同各郡的关系，在帝国内修建了四通八达的道路。希罗多德曾经描述过这种所谓御道的情况。这些道路，不仅使邮驿畅通，便于传宣王命，而且也有利于商业贸易与东西交通。保证这些道路沿线的安全，也是太守的职责。

波斯太守除为了向帝国上缴上述定额的税金外，还要额外地为自己掠夺财物，便尽量加重对各族人民的剥削。垄断水利就是他们对人民进行榨取的手段之一。希罗多德曾经谈到花剌子模的情况，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平原，在这些山中有五个峡谷”。“自从波斯人掌握了政权以来，它就成了国王私人的土地。从这周边的诸山中，有一条称为阿开司的大河流出来。这条大河分成五个支流，在先前它们分别穿过五道峡谷而灌溉了上面所说的土地；然而自从波斯的统治开始以来，花剌子模人就倒霉了。国王封锁了山中的峡谷并用闸门把每一个山路封闭起来，这样水就不能流出来，山中的平原就变成了一个湖。结果以前使用这条河的水的人们不能再用了，因而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因为夏天他们需要水灌溉他们播种的小米和胡麻，因此只要没有水给他们，

① 关于波斯帝国的郡，波斯波里斯铭文上列举了24个，纳黑希鲁斯塔姆铭文则为28个，到大流士晚年实际上达到31个。

他们就和他们的妇女到波斯去，在国王的宫殿门前高声哭号。国王终于下令把通到他们中间最需要水的人那里去的闸门放开，而当这块地方把水吸足了的时候，闸门就关上了。于是国王下令再为其他那些最需要水的人开放另一个闸门，而在他开放闸门的时候，他在租税之外，还要征收大量的金钱。”①这说明，对水利的垄断是政府榨取财富的手段。

在波斯阿赫门王朝帝国统治的时期，花剌子模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有了相当的提高。由于采用了新的技术，才有可能建立庞大的灌溉系统。据前苏联时期进行的考古研究，这类古代的灌溉系统遗迹有大量的发现，证明当时灌溉发达，管理良好。古代学者色诺芬就曾经提到过波斯政府积极的农业政策。大流士一世甚至曾在苏伊士开挖运河。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或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中间每一个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的经营者，在那里，如果没有灌溉，农业是不可能进行的。"②

在波斯，早在古代就已开始有一种挖掘地下水渠的办法。这种地下渠，波斯语称为karez（坎儿井），阿拉伯语称为qanats。古希腊作者波里比乌斯曾经谈到过这种地下水渠，说是私人兴建的，所以它所灌溉的土地为私人所利用，可世袭至五代。这种享用土地之权是波斯政府给予的。③在阿赫门王朝时，巴比伦的灌溉技术和波斯的修建地下水渠的方法应已传入中亚。

中亚农业地区除种植各种粮食作物以外，还普遍种植葡萄和各种果木。饲料之著名者则为苜蓿。希腊马格内夏的铭刻提到大流士对种植粮食作物甚感兴趣。人们认为原产于中国的桃与杏就是在大流士时期传到中亚的。印度的稻米也可能在阿赫门王朝时

① 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illegible]，117，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9页，人民出版社1972版。

③ 见波里比乌著作集（Polybius），X，28，3。

期传入。甘蔗与柑橘则在此时期传入了伊朗。[①]

在波斯入侵以前很久，在中亚，商品的生产与交换已经有所发展，商业的范围远达四方，逐渐成为中西商路经过之地。古老的商道西去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通西伯利亚，南达印度，东去中国。故早在安诺文化时期就曾发现有来自巴克特里亚的天蓝石。巴达赫善出产的天蓝石从中亚输往美索不达米亚和近东。大流士建筑宫殿用的黄金据铭文说是来自巴克特里亚，实际上可能是产于阿尔泰山或叶尼塞河上游。铭文还说所用的青金石和玛瑙来自索格底亚那，绿松石来自花剌子模，象牙来自印度。中国生产的丝在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已见于波斯的市场，也说明早在那个时候，阿赫门王朝就已经同中国有了联系。到公元前4世纪末，著名的亚里士多德已经明确地描写过中国的丝织品了。由此可见古代中亚、伊朗以及西方的商业贸易概况。

为了收税和商业流通的需要，波斯帝国铸造了货币。居鲁士在当政时即已开始铸造金币，名达利克（Daric），主要通行于伊朗西部和巴比伦等地。在东伊朗和中亚等地，则用零碎黄金论重计值。大流士是第一个铸造带有国王像金币的人。希罗多德也说："大流士曾用成色极高的黄金铸造金币。"[②]这种金币重8.4克，一面铸有手持弓箭的国王像，流通于国内外。波斯的达利克曾在怛密故城废址和撒马儿罕附近的额弗拉昔雅卜故城发现。有的研究者认为，头一批大流士金币是在公元前516年铸造的。货币的发行是由于商业贸易的需要，它反过来又促进了贸易的发展。波斯奴隶主贵族集团利用它作为经商和剥削人民的手段，因而大发其财。

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以来，中亚南部已成为波斯阿赫门王朝统治的地区，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受到波斯很大的影响。这里着重谈一下波斯的文字，因为它对后来中亚文字的形成是有关系的。

① 汉布里：《中亚史》，第24页，伦敦1969年英文版。

② 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Ⅳ，166，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像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伊兰最早的波斯人可能有过图画文字（象形文字），后来波斯人借用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也就是说采用楔形符号来书写波斯的语言。[①]如《贝希斯顿铭文》与《波斯波里斯铭文》都是用楔形文字写的。亚述、巴比伦人使用的楔形文字比较繁复，波斯人借用时已简化到39个符号，从而具有字母的性质。有的书上说，楔形波斯文也曾在中亚作为官方文书使用。[②]因楔形波斯文仍然是繁难的，故后来并用阿拉米亚文。

阿拉米亚人，也常被称为叙利亚人，操北闪米特语（阿拉米语）部落联盟成员之一，于公元前11~前8世纪之间据有叙利亚的北部，后又夺得两河流域之地。其语言接近希伯来语与腓尼基语。阿拉米亚人善于经商，足迹遍于西亚各地。他们的文化发达，掌握当时的商业大权。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时，他们借用腓尼基的文字，创造出自己的拼音文字，使用埃及人的笔墨和羊皮纸。由22个字母组成拼音的阿拉米亚文远胜于巴比伦的楔形文，故后者迅即为其所代替。阿拉米亚的语言文字成为西亚各国通用的语言文字。

阿赫门王朝也采用阿拉米亚文来发布命令，书写政事日志与备忘录，以及发送外交公文，书写商业文书。大流士在贝希斯顿铭文中说过，他曾把铭文的各种文字的抄件"送到所有的省去"，这里当然包括阿拉米亚文的抄件，当然也送到了中亚。在埃及就发现了《贝希斯顿铭文》的阿拉米亚文抄件片断。又在埃及的厄勒蕃廷（Elephantine）也发现了阿拉米亚文的文书。[③]

① 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第583页，三联书店1956年版。

② 见《乌兹别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通史》，第50页，塔什干1955年俄文版。

③ 厄勒蕃廷是上埃及尼罗河上的一个岛，位于阿斯旺对面第一瀑布下。这里有古城和许多古建筑的废墟。所谓厄勒蕃廷文书，于1907年在这里发现。其中有一封信是用阿拉米亚文写的。这是迁居在那里的六七百希伯来人在公元前407年写给巴勒斯坦的波斯长官的信，控诉埃及祭司煽动暴民捣毁他们在尼罗河畔建造的耶和华神庙并洗劫了庙中的金银宝器，要求这位名叫Bagoas的长官利用他对埃及波斯长官的影响，允许他们重建这所被毁的神庙（见J.H.Breasted, Ancient Times，第215页）。

波斯的官吏们，无论是外出征税，或是出使旁国，或是与人民交往以及从事其他政府公务，都是用阿拉米亚文作为工具。因此，阿拉伯文便同古波斯文一起成为阿赫门王朝两种并用的文字。波斯人从这种文字学到关于字母的概念，甚至用阿拉米亚字母来拼写波斯语。楔形波斯文的创造可能即是受到这种影响的结果。波斯帝国统治下的中亚和印度，肯定也通用阿拉米亚文。后来在索格底亚那创造出来的粟特文和在旁遮普形成的佉卢文，都是来源于阿拉米亚文。在花剌子模附近的科依·克雷尔干·卡拉（意为死羊城）发现一个属于公元前3世纪的陶罐，其上的铭文（可能是陶罐所有者的名字）据说也是起源于阿拉米亚文。[①]

阿赫门王朝对中亚的统治，并没有改变当地各民族内部的社会制度。原来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早期的比较落后的经济，在中亚各地方与各部落中继续维持着。波斯帝国通过地方官员征收赋税，征取兵员，垄断水利，控制商业，加重对人民的压迫。中亚开始出现一些设防的城镇或堡垒等。如玛拉坎达（今撒马儿罕）、巴克特拉（Bactra）以及索格底亚那和费尔干纳的其他城镇，都有相当的规模，其中的玛拉坎达城周匝达10公里左右。它们是奴隶主贵族的据点，也是商业贸易的中心。中亚各族农牧民，在阿赫门王朝的军队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有许多中亚的花剌子模人、索格底亚那人、巴克特里亚人，后来都参加了波斯对希腊的战争。那时中亚曾是波斯帝国的重要后方基地。

阿赫门王朝的统治在中亚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时期，波斯文化在这个时期对中亚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但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波斯帝国未能进一步向东、向北扩张。

① 蒙盖特：《苏联考古学》，第239页，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

第三节　中亚北部的游牧部落

公元前7世纪以前，世界上一些最古老的文明中心都在东方，如中国的黄河流域，印度的恒河流域，中亚的阿姆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与埃及的尼罗河流域等。中国的商周奴隶社会经过千年的发展，到公元前7世纪时已趋于衰落，逐渐过渡到封建社会，出现大国争霸群雄割据的局面。这在文化上的反映就是出现互相斗争的各种学说，产生了老聃、孔丘、墨翟、庄周等著名思想家，儒墨并立，百家争鸣。然而在列国斗争、战乱相寻的条件下，整个中国都被削弱了。在印度，公元前6~前5世纪，也是列国混战的局面。公元前6世纪时，孔丘（前551~前479年）的同时代人悉达多（前560~前480年）创立了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宗教——佛教。在十六国分裂的条件下，印度的政治、文化势力也没有能力向外扩张。只有刚踏出野蛮阶段的波斯人，以其英雄时代的勇武，战胜了周围诸部族。阿赫门家族所建立的王朝，不但统一了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而且征服了埃及，把中亚南部广大地区和印度西北也纳入了波斯帝国的版图，在吸收了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基础上，创造出古代的波斯文化。这充分表现了政治上统一的优越性，尽管这种统一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

波斯帝国在中亚地区的扩张，向东由于地理条件险阻，未能越过阿姆河的发源地帕米尔高原而进到塔里木盆地，向北由于游牧部落的顽强抵抗，未能达到锡尔河以北。如果说，波斯的影响主要限于中亚南部地区，那么上述波斯势力达不到的地区，则主要处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之下。从近代考古发掘的资料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赖斯（Tamara Talbot Rice）说："在阿赫门王朝时期，亚洲平原的中部大都被萨喀部落所控制。他们据信是从突厥斯坦的极东

部、西藏和天山迁到那里来的，有的学者认为他们是突厥人的先驱者。他们在离开自己的故乡后向西迁往今阿富汗与波斯之地，直到公元前8世纪才达到了乌拉尔山山麓。然后，他们从巴尔喀什湖分出，出现于阿尔泰，并随即在今吉尔吉斯之地建立大本营。"[①]可以说，在阿赫门王朝境外，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及巴尔喀什湖以北，从乌拉尔山到阿尔泰山广大草原地区的居民，是属于萨喀人及其亲族部落。但关于这些萨喀部落的具体情况，中西史料的记载都极为简略。《阿维斯塔》中提到与定居的雅利安人相对的游牧的土兰人，应是对他们的泛称。近代考古发现的大量实物，大大补充了文献资料的不足。

在前面第一章中，我们已经叙述过了叶尼塞河上游的塔加尔文化和阿尔泰的迈埃米尔文化。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阿尔泰的游牧部落也过渡到了早期铁器时代，同时青铜器仍继续使用。这主要见于阿尔泰地区发现的游牧人的墓葬。前苏联考古界的研究把这些墓葬分为三个时期，即迈埃米尔时期（前7~前5世纪），巴泽雷克时期（前5~前3世纪）和希伯时期（前2~1世纪）。[②]这一节主要介绍巴泽雷克时期的文化。

巴泽雷克是1929年发现的一批古墓群的名称，在前苏联戈尔诺阿尔泰省乌拉干区乌拉干河畔，卡通河与比亚河的上游。发掘出的巴泽雷克墓共有五个：巴沙达尔两个，卡坦达、别列尔与希别各一个。学术界认为，这些墓的时代有先后，其中以巴泽雷克一、二号墓为时较早，卡坦达与希别墓的时间较晚。关于巴泽雷克墓所属的时代问题，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属于公元前6~前4世纪，有的认为属于公元前3~前1世纪。看来，巴泽雷克遗存比迈埃米尔文化要晚，但不会晚到公元前1世纪，大约处在中国战国时期。

巴泽雷克墓是一些巨大的石冢。石冢下面有厚厚的冰冻层，

① 赖斯：《中亚古代艺术》，第42页，纽约1965年英文版。

② 波塔波夫：《阿尔泰人历史纲要》，第61~62页，苏联科学院1953年俄文版。

直达墓底。冰冻层以内是木结构的墓室。墓室内有棺具。也就是说，墓冢内的一切都是被冰雪裹封着的。这冰冻层亘古不化，其作用是保护墓内的东西不致腐败。据估计，是在秋季将棺椁埋葬。这个季节湿气能够进入，待至冬天，湿气冻结，冰雪覆盖，然后再在上面修筑石冢。这样，到夏天时阳光热气就不能进入墓内，墓内的冰雪就能保持永久冻结，直到被考古者发掘之时。

考古者发掘巴泽雷克墓的方法，是在揭开石冢后用热水浇注，使冻结层融化。当冰雪消融后，考古者惊异地发现，墓内的一切，无论是埋葬的尸体，或是随葬的物品，皆完好如新。特别是丝绸、衣服和各种艺术品，皆颜色鲜艳，光彩夺目。两千多年以前的东西，好像是昨天葬下去的一样。为保存这些物品，参加发掘的画家只有当场临绘，以免颜色褪失，无法复原。

巴泽雷克墓葬中发现的物品，当时震惊了世界。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丝织品，包括用细丝线织成的平纹织物，有整块的，也有整幅的（铺盖在皮衣服的上面）。巴泽雷克五号墓出土的茧绸，其上用彩色丝线绣了凤凰的形象，据认为这是一块鞍褥面。此外，还发现整块的中国丝绸、布匹和用中国丝织品制作的衣服。

在巴泽雷克五号墓中，还发现白色的金属制的中国镜一面，其直径为11.5厘米。据研究，这种镜是秦式镜的变形之一。该镜为素卷边，镜背有“羽状”地纹，其上缘边有四个“山”字形雕饰。其年代大约属于公元前4世纪。

在发现有凤凰绣缎的巴泽雷克五号墓中，还发现一辆古代马车。马车由车厢和四个车轮组成。车厢上有专设的座位。座位上方的四角，有四只毡制的天鹅。可套四匹马。该墓随葬品除这辆马车外还有四匹马。

以马殉葬当时大约很普遍。如巴泽雷克一号墓发现有十套马骨，这些马显然是杀殉的，都有马具。马勒上饰有金叶。有一个马

鞍子的坐垫下塞满了鹿毛。还有马的面罩、被覆和其他装饰品。

巴泽雷克墓的随葬品总的说都是非常奢侈豪华的。墓主人穿的皮毛衣服，主要用貂皮、灰鼠皮、银鼠皮等制成。衣服上装饰着上色的皮子、串珠及成百上千的金片。还有战士戴的盔甲。他们日



巴泽雷克墓中发现的毡织挂毯局部（公元前4~前3世纪）

用的东西有木制的、陶质的、皮制的和角骨制的（如西伯利亚大角鹿、驼鹿、狍等的骨头和野猪牙等）。也发现中国的玉器、漆器、金器和青铜器等。

巴泽雷克墓主人的住房的装饰品更是珍贵。有一幅绣帷，其上绣着非本地所有的飞鹤，这可能是最早的中国纺织艺术珍品。有一张巨大的挂毯，其花纹是表现一个授职的场面，左面坐着一

个神，手执生命之树，接见一个骑士。这可能是当地的一个神话。另一块结了花边的最古老的毛毯，为迄今所仅见。其边上织了伊朗阿赫门王朝风格骑士、麋鹿、玫瑰花和怪兽，表现出受到伊朗艺术的影响。本地制作的毡剪裁品，上面也有斗兽花纹。

巴泽雷克墓中除发现整套的马骨以外，还有牛、羊（绵羊、山羊）、犁牛的骨骼以及黑貂、银鼠、水獭、灰鼠和野猫等的毛皮或生皮。随葬的食物有干酪，由于处在冻结的情况下，连香味都还保存着。由此可以推知，当时的阿尔泰部落，主要从事游牧的畜牧业。前苏联考古学家鲁金科认为，他们除了饲养矮种马以外还饲养高种快马，其质量不亚于后来的著名的帕尔提亚（安息）和巴克特里亚（大夏）的战马。同时，他们还饲养大量的细毛羊，也饲养少数山羊和大角牲畜（包括犁牛）。阿尔泰部落也从事狩猎。狩猎的对象是野羊、野猪、山鹿、麋鹿以及贵重的软毛兽。

看来，这时阿尔泰部落中贫富的差别是很悬殊的。巴泽雷克各墓的主人生活如此奢华，而另外一些穷苦游牧人的墓葬则极为贫乏，没有什么随葬品。有的只有一匹马，或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墓葬的规模及各墓中什物的性质表明，在阿尔泰早期游牧人中已经产生对立的阶级。富有的上层掌握大群的牲畜，穿着华贵的衣服。吐爱克廷一号墓的随葬马匹达22匹之多。部落上层的财富是基于对牲畜的私有制，通过剥削和对外战争而掠夺来的。

巴泽雷克时期的生产工具，仍然大量使用青铜，铁器也占有一定比重。会制作金器与陶器。商品交换和贸易也很发达。上述中国制造的丝绸及其他织物，各种玉器、漆器、青铜器等，肯定是通过商业贸易，经中国北部各族而得到的。从巴泽雷克墓中发现的物品看，该地同伊朗也是有商业联系的。

再从西方的发现看，美国《国家地理》杂志1980年3月号曾刊载乔治·比尔的一篇文章，题为《从一座凯尔特墓里出土的瑰宝》。该文作者曾在联邦德国南部斯图加特西北20公里的霍克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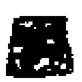
夫村发掘出一个2500年前的古墓，内藏珍贵文物多件。值得注意的是，发掘者在死者的骷髅上发现有中国丝绸衣服的残片。这也足以证明在先秦时代，中国同欧洲已有交通。故赖斯说："在公元前5~前4世纪期间，巴泽雷克是东西方贸易的中心。"[①]从中也可以看到，当时阿尔泰人的文化并不是很落后的，或者说是相当高的，尽管没有文字。

阿尔泰巨墓中的所有尸体，都像斯基泰部落的上层首领人物，经过香料涂敷。1949年发掘的巴泽雷克二号墓，为男女合葬。墓主人后脑壳上有三处被尖锤（钺）击穿的痕迹。头皮已被剥去，完全同斯基泰人剥去打死的敌人头皮的情况一样。头上缝了用犁牛皮制的假头皮。身上绘有纹饰。手、胸、背和脚上都绘有真实的和幻想的动物形象。巴泽雷克一号墓的主人也是男女合葬。男女脸带黑色，颧骨稍高。两尸皆保存在油膏中。男人纹身，身上刺着像猫一样的动物，有翅。另一动物则为鹿身鸟嘴猫尾。当时人相信文身能保护自己，以避魔鬼。其妻秀丽。

所有巨墓中的葬仪都相同。巴泽雷克一号墓高2.2米，直径47米。使用石块达1800立方米。在当时的生产工具的条件下，要建造这样巨大规模的墓冢，只有部落首领役使大批部民用集体的力量才能完成。

阿尔泰和西伯利亚的古物，除近代考古发现的以外，还应提一下17世纪中叶的发现。从17世纪上半期起，沙皇俄国的殖民者（主要是一些哥萨克人）已经深入到西伯利亚地区。哥萨克人贫困无奈，就在鄂毕河与额尔齐斯河地区挖掘当地的古墓，盗取墓中珍贵物品，拿去卖钱。早在1669年在西伯利亚的市场上就已经见到这类古物。到17世纪末，哥萨克人盗掘的墓葬更多，以致古代的金属制品，包括金和青铜制的带钩、衣襟上的饰物和其他个人

① 赖斯：《斯基泰人》（T.T.Rice, Scythians. London, 1957.）。



用的装饰品，竟充斥于当地的市场。这类古物的价值首先是得到荷兰学者威特森的重视，他最早呼吁，并主张给予保护。威特森是俄皇彼得大帝的朋友。也许是由于他的建议，彼得大帝才下令征集这些宝物，集中于圣彼得堡的爱米尔塔吉博物馆。

但是，正如巴德利说的："当时人们对文物出处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并不重视。每件物品在何处出土，墓内情况又如何，均未留下记录，因此，这批文物的科学价值就很小了。"[①]现在，学术界认为彼得大帝收集的西伯利亚古物所属的时代，大致是在公元前6~前2世纪。这与巴泽雷克墓葬大约同时。西伯利亚古物与巴泽雷克墓葬中的饰物表现出一种同样的动物风格艺术。

巴泽雷克文化时代的阿尔泰人，究竟属于何种种族尚无定论。鲁金科认为，他们基本上属于带有黄种成分的白种人种类型。看来，他们可能就是希腊作者所说的"看守黄金的狮身鹰头兽格立芬"。因阿尔泰山以产黄金著名，格立芬应是斯基泰人夸张的说法。

希罗多德还记载说，据斯基泰人讲，在前述那些部落以北有一个酷寒的地方，空中密布羽毛，以致人们无法通过。希罗多德认为，这是比喻当地大雪纷飞的说法。

中国方面关于这一带地方和阿尔泰部落的记载要多得多，如《穆天子传》、《山海经》、《周书》、《庄子》、《国语》、《楚辞》、《管子》、《尚书》、《吕氏春秋》、《战国策》等先秦古籍都提到西域的情况。《庄子》一书曾提到一个"穷发"之国，在极北的地方。《山海经》中提到"一目国"。这些，与希罗多德书中谈到的"秃头的阿尔吉帕人"和"独目人"，都可能反映的是同一传说。

上述史料中最重要的当然要算《穆天子传》。该书于公元3世纪后期（《晋书》说在公元279年，荀勖《穆天子传序》说在公元

① 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196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81年）在汲郡一座战国魏王墓中发现，大约是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作品。书中所述周穆王西行的故事不见于其他史书记载，可能是虚构的，但其所反映的地理情况应是战国时期东西商路的实况。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书是作者根据当时来往于这条道路的商人所提供的资料写成的。书中所述周穆王西征的旅程是从洛阳出发，先向北，涉漳水，越鈃山而至河套以北的蒙古草原。此后出现一段脱文，一下子便从昆仑山开始叙述。近人研究，认为昆仑山应是指阿尔泰山而言。这比以前的解释（认为是指塔里木盆地以南的昆仑山或甘肃的祁连山）比较近乎真实，并有上述考古资料作为佐证。①

以上述说法为根据，可知周穆王是从阿尔泰山中段的东麓越过山口，经该山西麓再沿黑水（喀拉额尔齐斯河）西进，到达一个宜于畜牧的平原，那里居住着以鄄韩氏为名的部落。该部拥有大量的马、牛、羊和狗，还有猎获的封牛与野马。其物产有穄麦。再往西，过一山口，到达西王母之国，国中有瑶池（应指斋桑湖）。周穆王在那里举行狩猎。有无数大鸟在湖边解脱它们的羽毛。穆王装载这种珍贵的鸟羽百车之多。这段记述，与上引希罗多德转述斯基泰人传说空中密布羽毛的地方又正相符合。斋桑湖及其周围就是这个地方。这似乎表明，东西方的记载是基于同样的事实。

往常人们根据《汉书·西域传》中关于自玉门阳关去西域的道路的记载，以为所谓的古代"丝绸之路"只是经过塔里木盆地。但根据上述丰富的考古资料和东西方文献史料的记载，完全可以设想，在先秦时代，中西商路可能是经过北方草原地区，即经过蒙古草原到西伯利亚草原，然后南去伊朗，西去南俄草原。至于南面的塔里木盆地，那时还是偏僻和比较封闭的。因为长途贩运大批（而不是零星）沉重的货物，没有大群驼、马、牛、驴来担任运输是

① 孙培良：《斯基泰贸易之二路和古代中亚的传说》，在《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



不可想象的。在这方面，游牧民族所起的作用显然比农业民族所起的作用为大。

从公元前6世纪左右开始，中国的丝织品正是沿着《穆天子传》所描述的道路运往中亚，以至欧洲。这条中西商路，要经过阿尔泰山区和额尔齐斯河上游。那里居住着前述的巴泽雷克人。无怪乎公元前5世纪的巴泽雷克墓葬中发现那么多精致的丝绸品和刺绣着凤凰图案的茧绸、漆器以及“山”字纹青铜镜。居住在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早期游牧部落，像蒙古草原的早期游牧人一样，在古代东西方的贸易中处于一种十分重要的中介地位。

第三章
亚力山大的东征和中亚的希腊王朝

第一节 马其顿亚力山大的崛起与东征中亚

阿赫门王朝是建立在一个包括众多的部落和民族，具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说着不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经济基础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合体之上的王朝。维系这个联合体的是强大的王权和军事力量。当这个王朝的权威遭到削弱时，它统治下的各个地区就发生暴动或反叛。自从居鲁士大帝征服小亚细亚的各希腊城邦以来，那里的希腊人一直进行着争取解放的斗争。在爱奥尼亚人反抗波斯统治的斗争中，雅典人曾给予支援。大流士一世为了惩罚雅典，于公元前492年夏天出兵，经赫勒斯滂海峡，越色雷斯，入欧洲，进攻希腊，从而肇始了延续43年的希波战争。其间经历大流士一世、薛西斯一世、阿塔薛西斯一世三帝。由于后方诸部经常叛乱，力量不支，遭到多次失败，终以与雅典订立和约而告终。

希腊各城邦在取得希波战争的胜利以后，经济文化得到迅速的发展，奴隶制趋于繁荣。希腊北部的马其顿地方，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逐渐开化进步，在原始公社制解体的基础上，于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形成为巴尔干半岛的大国。马其顿王腓力二世向外扩张，打垮希腊诸城邦的反抗，迫使希腊人在公元前337年召开的科

林斯会议上承认马其顿对希腊的霸权，并决定远征波斯。

科林斯会议以后不久，腓力二世就开始准备对波斯作战，但尚未出师就遇刺身死。其子亚力山大即位。东征的计划就是由他来付诸实施的。

马其顿亚力山大进攻波斯帝国是在为希腊人报仇雪耻的口号下进行的。在攻入伊朗本土以前，亚力山大先征服了原属于波斯的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然后于公元前331年出埃及，同年9月与波斯军决战于高加米拉①，彻底打败了由大流士三世亲自统帅的波斯大军。大流士同巴克特里亚与索格底亚那太守比苏斯及其他太守东走米底，继又逃到里海东南山中。比苏斯等劝其退位，不听。废黜之。亚力山大闻讯昼夜兼程追赶。比苏斯于公元前330年7月杀死大流士逃走，并自称是波斯皇帝阿塔薛西斯四世。支持他的人有阿拉霍西亚（Arachosia，今坎大哈地区）与德兰吉亚那（Drangiana，今锡斯坦）太守巴沙恩特斯（Barsaentes），阿列亚（今属阿富汗）太守萨提巴尔赞（Satbarzanes），索格底亚那贵族霍里恩（Choriene）、奥克夏特（Oxyartes）及斯皮达马等人。但是，比苏斯等打着的“恢复阿赫门王朝”的旗帜却是不得人心的。

大流士三世的被弑标志着历时220年的阿赫门王朝的灭亡。亚力山大宣布比苏斯为非法的篡位者，自己为阿赫门王朝的继承者。其下一步的任务是要消灭逃到了巴克特里亚的比苏斯势力。为了巩固后方，控制交通要道，亚力山大先征服东伊朗各地。公元前330年冬，亚力山大马不停蹄地北进，先取希尔克尼亚，当地太守塔普里亚（Tapuria）降。继下阿列亚，其太守萨提巴尔赞亦归附。之后，他准备向东北取捷径入巴克特里亚，但因阿列亚随即反叛，故又折回，南取德兰吉亚那，在路上建立亚力山大城（在今赫拉特）。在德兰吉亚那时，他的骑兵指挥斐罗塔斯（Philotas）因谋

① 高加米拉，在底格里斯河上尼内韦赫（尼尼微）东北约29公里，今伊拉克北境。

叛，同其父帕尔米尼乌（Parmenio）一起被处决。

亚力山大既取得今呼罗珊、俾路支与锡斯坦之地，便于公元前329年初开始进攻巴克特里亚。希腊大军溯赫尔曼德河而上，经过阿拉霍西亚，然后折向北沿商路到达喀布尔。他可能是取道恰里卡尔山隘翻越兴都库什山而进入巴克特里亚的（古代把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之间的地区称为巴克特里亚）。

亚力山大进入巴克特里亚以后到达的第一个城镇是德拉普沙卡（Drapsaca，即今安德拉布）。当时比苏斯同奥克夏特、斯皮达马等在奥尔诺斯（Aornos，即塔希库尔甘，在马扎里歇里夫的东面）。亚力山大在德拉普沙卡停留数天，即率大军2.5万人经过奥尔诺斯。比苏斯闻风而逃。他在离开巴克特里亚以前，烧毁当地储存的粮秣，破坏道路、桥梁，并焚烧渡船，然后过阿姆河遁入索格底亚那的脑塔卡（Nautaca，即渴石Shahrisabz）。亚力山大遂兵不血刃地取得了巴克特里亚，进入首府巴克特拉·扎里亚斯普（Bactra~Zariaspa），并指派波斯人阿尔塔巴祖斯（Artabazus）担任太守。

但是，比苏斯的坚壁清野办法并不能阻止亚力山大大军渡过阿姆河。亚力山大的军队用皮筏子等工具，完成抢渡宽阔的阿姆河的任务。跟随比苏斯的索格底亚那的贵族斯皮达马见形势不好，便叛卖比苏斯，将其囚禁，遣人到亚力山大处送信，要后者派军队去取比苏斯。亚力山大派手下将军托勒密前去，发现比苏斯被囚禁在一个村子中，而斯皮达马则已逃去。托勒密将比苏斯解回后，亚力山大下令将其鞭打，割鼻去耳，然后送到厄克巴坦纳处死。阿赫门皇族的余孽至此被彻底消灭。

亚力山大继夺得脑塔卡之后，进一步向索格底亚那的首府玛拉坎达（撒马儿罕）进攻，于公元前329年夏季克之。亚力山大在该城进行了修整，留兵戍守，然后向锡尔河进发。

在从玛拉坎达循东北方向朝锡尔河前进的过程中，要经过苏



对沙那(Usrusana)地区[1]。该地区的索格底亚那人对希腊军进行了坚决的反抗，他们消灭了许多派去征粮的希腊兵。亚力山大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许多战斗是在险峻的山岩峡谷中进行的。有的地方的居民抵抗到底，有的人不愿投降而跳岩自杀。被亚力山大杀死的当地人达2.2万之多。

锡尔河是中亚北部草原游牧地区同南部农业地区的分界线。其北岸住着萨喀诸部落。南岸有大小不等的一些城镇。亚力山大在镇压了苏对沙那地区的反抗而来到锡尔河岸时，这里诸城镇的人民也举起了反抗的旗帜。河对岸的萨喀人也聚集军队随时准备渡过河来支援他们的斗争。特别是居鲁士城，乃起义的中心。该城居民战斗得最为顽强。亚力山大本人亲自参加攻城，带领军队冲进城去，在街巷展开白刃战。结果有8000居民被杀。亚力山大也受了重伤。[2]

经过极为残酷的战斗，希腊人一共夺得七个城镇。这七个城镇参加抵抗的居民，被屠戮无遗，幸存者也被转为奴隶。最后，亚力山大在那里建了一个新城，名亚力山大·厄什哈特(Alexandri-aEschate)[3]，以之作为防御锡尔河以北萨喀游牧人进犯的据点。

这时有消息说，萨喀人在锡尔河的东面集结军队将要来犯，同时斯皮达马率领游牧人包围了玛拉坎达的希腊军。为了应付这种局面，亚力山大派了一支部队去玛拉坎达解围，自己则去进攻萨喀人。

亚力山大决定首先渡过河去惩罚萨喀人。他的军队不想过河作战，亚力山大断然下令部队制造兽皮筏子渡河。[4]这可能是在别哥瓦特地方进行的。亚力山大大军过河后，用弹弓发射石弹将

① 此地位于忽毡与撒马儿罕之间，即乌腊提尤別地区。

② 阿里安：《亚力山大远征记》，第122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③ 亚力山大·厄什哈特，意为最远的亚力山大城，约在后来的忽毡。

④ 阿里安：《亚力山大远征记》，第123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萨喀人击退。萨喀人阵亡者上千人，被俘者150名。希腊军在荒漠中追击，天气炎热，没有水喝。部队只有喝脏水，发生痢疾。亚力山大因此腹泻病倒，只得回师。希腊历史学家阿里安说：“如果不是因为亚力山大病倒，我相信萨喀人是会全军覆没的。”①

亚力山大派遣前往玛拉坎达解围的由发那科斯（Pharnuches）所率领的部队，在波里提默特河（Polytimetus）②谷地被斯皮达马所消灭。亚力山大得到这个消息后，便留下一部分军队在亚力山大·厄什哈特城戍守，自己则率军朝玛拉坎达疾进，三天急行1500斯台地（300公里）赶到那里。斯皮达马没有抵抗就率部逃跑。亚力山大紧紧追击。在逃跑中，斯皮达马有时利用机会突然转回袭击希腊人。有一次希腊军竟被萨喀人和斯皮达马的骑兵包围在泽拉夫善河的一个岛上。斯皮达马在当地居民的支持下，再次围攻玛拉坎达。当亚力山大大军临近时，他又撤走退人草原。斯皮达马就是采取这种打了就走的游击战术来困扰希腊人。亚力山大接受同萨喀人作战失败的教训，不再追人草原，而是对泽拉夫善河流域的和平居民进行残酷的屠杀。他把整个地区彻底破坏，把原先逃人堡垒躲着的人都杀了，因为听说这些人也曾参与攻打马其顿的部队。用阿里安的话说，亚力山大率部踏遍波里提默特河流域，直到河的尽头，再往前都是沙漠了。亚力山大焚烧村落，破坏田园。据文献记载，当地居民被杀者达12万人以上。③

亚力山大镇压了索格底亚那人民的反抗，再次控制了玛拉坎达。时已届冬季（公元前329年），便仍留一部分军队（3000步兵）驻在那里，自己则返回扎里亚斯普过冬。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当时保持独立的花剌子模国王法拉斯曼（Pharasmanes）带领1500骑兵来到巴克特里亚，要求同亚力山大友好并缔结同盟，还答应帮助

① 阿里安：《亚力山大远征记》，第124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② 即泽拉夫善河，中国史料称为那密水。

③ 阿里安：《亚力山大远征记》，第127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亚力山大平定里海沿岸各族。亚力山大因准备南征印度未能安排。另一方面，他的军队又补充了1.9万名希腊雇佣兵，欧洲的斯基泰人也遣使来献重礼，故力量大增。亚力山大承袭阿赫门王朝的郡制，任命太守，起初用波斯人，以后则用马其顿人以充之。在各郡另派都督以统军队，财政亦有特定的人管理。这样初步建立了希腊人的统治机构。

尽管在去年索格底亚那人遭到亚力山大的残酷镇压，但他们仍然没有屈服，也无意于服从亚力山大所任命的太守。于是，亚力山大在公元前328年春再次向索格底亚那进发。当地人民都躲进设防的堡寨中或偏僻的山野。亚力山大渡过阿姆河再次来到索格底亚那时，斯皮达马一天也不让他安宁。在玛撒该塔伊人的支持下，斯皮达马不断来袭击，使希腊人遭到严重的打击。

亚力山大为了镇压起义，把自己的两万军队分成为五个支队，分派各地，横扫索格底亚那，杀死他们所遇见的每一个人，使其遍地荒废，满目丘墟。最后，亚力山大及各路军在玛拉坎达会师。为了恢复与重建当地的经济，亚力山大下令在索格底亚那筑城，并迁移希腊人以实之。斯特拉波说亚力山大曾在索格底亚那与巴克特里亚建立了八个城，查士丁尼则说建立了十二城。具体说，在玛尔吉亚那（谋夫）以南建立了两个城堡，相当于谢腊赫斯（Sarakhs）与马鲁察叶可（Maruchak，即今巴拉·木尔加布）；在巴克特里亚建立四个城堡，其所在地相当于现在的迈马纳、安德胡伊、希巴尔甘与萨里·普耳。许多希腊人、马其顿人、伊朗人等就在这个时期迁移到中亚，使当地居民中增加了新的成分。

亚力山大听说斯皮达马隐藏在玛撒该塔伊人当中，便派了两个将军前去征剿。但是斯皮达马却率领六百玛撒该塔伊骑兵袭击亚力山大的后方，即进攻巴克特里亚的一座堡垒。该堡驻军全部被斯皮达马消灭。接着，斯皮达马又进攻那里的首府扎里亚斯普。当马其顿军前来征剿时，斯皮达马又逃到沙漠中去了。公元前328

年秋，斯皮达马又率领三千萨喀骑兵进攻索格底亚那与玛撒该塔伊人之间的要塞巴噶。经过激烈的战斗，斯皮达马被击溃，损失八百骑兵后退回草原。

这时，亚力山大征服中亚的政策有了转变。其主要点在从单纯的镇压变为拉拢利用当地的贵族上层，并采用当地的制度和风俗习惯，以争取当地民族的归附。例如实行跪拜，穿米底龙袍等。甚至亚力山大本人对中亚的服饰、制度与习惯也身体力行之。如在中亚时他就穿波斯服装。亚力山大本人娶了巴克特里亚首领奥克夏特的女儿罗克珊娜（Roxana）为妻。他手下的将领塞琉古（Seleucus）奉亚历山大之命于公元前324年娶了斯皮达马（粟特太守）之女阿帕密（Apame）为妻。

亚力山大的这种政策，当然引起马其顿贵族中一些保守派人物的反对。[①]公元前328年在扎里亚斯普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就曾辩论过，是否应当按照波斯的制度在国王面前行跪拜礼。氏族公社解体不久而过惯军事民主制生活的马其顿人极力表示反对。因此只好决定，其他人一律应行跪拜礼，只有马其顿人可以例外。据说，有些马其顿贵族在密谋害死亚力山大。[②]在玛拉坎达举行的一次重要宴会中，亚力山大亲手杀死了一个曾经在战场上救过他命的亲信、军事将领克雷托斯（Cleitus the Black），原因据说是后者酒醉胡言，但实质上是上述斗争的反映。[③]

由于亚力山大采取拉拢利用中亚贵族上层的政策，使中亚的贵族上层开始转到希腊人一边。有的说斯皮达马的妻子曾劝他投降亚力山大，遭到拒绝，因此他的妻子就将他杀死，亲自把其首级送到亚力山大处。阿里安则说，玛撒该塔伊人跟随斯皮达马逃往沙漠。后来他们了解到亚力山大已率大军朝沙漠开来，于是就把

① 阿里安：《亚力山大远征记》，第128页，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② 阿里安：《亚力山大远征记》，第136页，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③ 阿里安：《亚力山大远征记》，第129-130页，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斯皮达马的头割下来送给亚力山大，为的是转移亚力山大进军的方向，不再进攻他们。无论事实真相如何，看来斯皮达马的死与亚力山大的政策所引起的当地贵族上层的分裂是有关系的。

亚力山大在消灭了斯皮达马的起义以后，留在脑塔卡过冬（前328~前327年）。余下的只有索格底亚那诸岩寨未平。自公元前329年以来，许多索格底亚那人为了逃避灾难，纷纷退守于这些岩寨之中，其中包括奥克夏特及其家属（奥克夏特已背叛亚力山大，把妻子和女儿偷偷送到那里）。据斯特拉波、阿里安、库尔齐[1]等作者讲，有四个岩寨，即索格底岩寨，西济密特岩寨，阿利马扎岩寨，何尔门岩寨，但主要的是索格底岩寨。索格底寨位于脑塔卡附近某地的陡峭悬崖上，异常险峻，冬天雪深难行。有的书说这个岩寨是在马什哈德东北之卡拉特·伊·纳第里（Kalat-i-Nadiri），亦称Petra Oxiana。[2]其次是何尔门寨，在帕列塔克（确切地不明），陡岩峻峭，林木丛生，其中隐藏了许多王公贵族，包括何尔门。

公元前327年的春天，亚力山大前往攻打岩寨。他派人去叫岩寨中的人下来谈判，并约许，如果把阵地交出来，就允许他们安全地返回家乡。岩寨中的人听了之后，狂笑着叫亚力山大去找长翅膀的兵来替他夺取这个高地，因为他们对不长翅膀的人是不怕的。亚力山大闻之大怒，向部队悬赏，组织了一支300人的突击队，用铁钎钉在岩缝中，攀缘而上，终于迫使索格底岩寨投降。同样，何尔门寨也被马其顿人在短时间攻下。[3]隐藏在索格底寨中的奥克夏特及其女儿罗克珊娜，其他岩寨中的索格底亚那贵族何尔门、西济密特等，均向亚力山大投降。亚力山大根据其拉拢当地贵

① 库尔齐（Curtius Rufus, Q.），生卒年代不详，是塔西陀以后的拉丁作者。他写过一本《亚力山大传》。

② 斯克兰、罗思：《亚洲的心脏》，第8页，伦敦1898年英文版。

③ 阿里安：《亚力山大远征记》，第143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族的政策，对他们一概加以宽恕，并归还他们的财产，对未参加起义和反抗的贵族还奖以金钱。

为了巩固与当地贵族的联盟，亚力山大任命一个名叫奥罗皮亚的人为索格底亚那王，他自己还娶了奥克夏特的女儿罗克珊娜为妻。因此，这些贵族都忠心支持亚力山大。如西济密特就以军队和2000峰骆驼支援亚力山大去征剿萨喀人。霍里恩为亚力山大军队提供了两个月的粮秣。奥克夏特也帮助征服者奴役自己的人民。如在公元前325年的春天，驻守巴克特里亚的希腊军队哗变，奥克夏特就立即报告当时在印度的亚力山大。亚力山大立即采取措施镇压叛军；并任命奥克夏特为帕洛帕密萨代（Paropamisadae，今喀布尔河谷地）省的太守。当这个地区发生反对占领者的起义时，奥克夏特就亲自镇压并残酷处置起义者。

所以，近代作者塔恩（Tarn）也指出，亚力山大娶罗克珊娜，乃是一种政策行为。其目的是为了使马其顿人同伊朗各族、巴克特里亚人、索格底亚那人及萨喀人和解，保证马其顿人得到在伊朗的盟友，特别是为了在其即将进行的印度远征中得到骑兵的补充。这一婚姻以及其他政策和措施，也确实达到了目的。亚力山大既然征服了索格底亚那，就渡阿姆河南返，留下1万步兵和3万骑兵驻守巴克特里亚，于公元前327年夏出征印度。

公元前第一千年的前半期，印度十六国分立，印度西北部印度河流域的旁遮普地区曾经被阿赫门王朝所征服，成为波斯帝国的郡。在列国争霸的长期斗争中，摩揭陀国日益强大起来，统一了恒河流域，其领土包括了整个东北印度和中印度。但印度河流域在摆脱了阿赫门王朝的统治后，仍然处在诸小国土邦的分裂状态中。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就是咀叉始罗王与波鲁斯王的国家。当亚力山大率领大军（包括巴克特里亚人、索格底亚那人、阿拉霍西亚人、腓尼基人以及埃及人的士兵）越兴都库什山，沿着喀布尔河向西北印度进军时，健陀罗部落即来归附。公元前326年2月，亚力山

大军渡印度河，咀叉始罗王因与波鲁斯王为敌，故给亚力山大献牛三千头、羊万只，表示归降，以求得到支持。而波鲁斯王则与克什米尔地方的邦君阿比萨（Abisares）联合进行抵抗。马其顿军取道咀叉始罗向印度河的支流赫达斯庇河（即杰卢姆河）前进（波鲁斯国位于杰卢姆河与契纳布河之间）。在河畔大败波鲁斯，继续南进到希发息斯河（即萨特累季河），准备渡过希发息斯河进攻摩揭陀国。因部队疲惫，拒绝渡河，亚力山大不得已于10月班师，取道格多罗西亚（Gedrosia，今莫克兰与俾路支）与克尔曼，于公元前324年回到波斯之苏萨城（今伊朗西南部之伊兰）。

亚力山大东征，使大量的希腊人、马其顿人迁移到东方。这些人通过推行殖民政策在中亚各地定居下来，在希腊官员的统治下生活，且同当地民族通婚。他们在中亚修筑城镇，实行军事屯垦，实施马其顿的制度等，也带来了希腊的文化和习惯。特别是希腊的艺术对中亚各族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希腊人、马其顿人也吸收本地的文化与风俗习惯，甚至信仰巴克特里亚的阿纳希特神（Anahid）。[1]希腊人兴建的城镇多半在商道附近。城镇的兴起进一步促进了中亚商业活动与国际贸易，从而打破了边远地区与世隔绝的状态。这对于推动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无疑是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节　塞琉古王朝统治下的中亚

亚力山大从印度远征回到苏萨，停留一些时候，即返回巴比伦。他由于战伤损体、鞍马劳顿，以致在经过幼发拉底河下游沼泽地带时患病发烧，又因纵酒享乐病情加重。这位世界历史上著名的人物终于公元前323年6月13日在尼布甲尼撒皇帝的故宫死去，

① 罗灵逊：《巴克特里亚史》，第54页，纽约1969年英文版。

年仅32岁。

亚力山大死后，他的庞大的帝国立即陷入混乱之中。被征服地区人民群众的起义，各地的希腊军队哗变，亚力山大手下诸将领的争权和混战，亚力山大帝位的继承问题，所有这些导致了帝国的分裂。

在欧洲，亚力山大的继承人是他的同父异母兄弟阿里戴奥斯（Arrhidaeos）。亚洲部分在罗克珊娜的儿子生下以前暂由迫迪卡斯（Perdiccas）摄政。至于各郡则落入诸将领的统治之下。例如：埃及为托勒密，米底为佩松（Peithon），帕洛帕密萨代为奥克夏特，波斯为剽塞斯塔斯（Peucestas），帕尔提亚为弗拉塔费涅斯（Phrataphernes），阿列亚与德兰吉亚那为斯塔萨诺尔（Stasanor），阿拉霍西亚为西比尔秋斯（Sibyrtius），索格底亚那与巴克特里亚为阿明塔斯（Amintas）。所有这些大小将领和地方官，都是各自为政，互不服属。

亚力山大手下的将领都是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士兵的大部分也都是。他们远离故土，转战万里，羁留异域，日夜思乡，因此经常哗变。早在公元前327年亚力山大前去征服旁遮普时，留在后面的戍军就发生动乱，而在前锋的则拒绝渡过萨特累季河。次年，又有三千希腊移民戍守者在巴克特里亚与索格底亚那叛变，并企图长征返回欧洲，但被镇压。亚力山大死后，关于他死去的消息迅速传开，也引起各地的动乱。如在索格底亚那与巴克特里亚又有二万步兵和三千骑兵自动啸聚起来，企图返回希腊。当时的摄政王迫迪卡斯大为震惊，认为这将危及希腊人对中亚的统治，便派遣佩松带领大军前去阻止他们前进。佩松曾想使这支人马为自己所用，但未成功。于是就按照迫迪卡斯的严格命令，将他们解除武装，全部杀害。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分配给自己的士兵。为此，索格底亚那与巴克特里亚的太守阿明塔斯被撤职，另外一个名叫腓力普的马其顿人被任命来取代他。腓力普任职一年，又被调往帕尔

提亚，由斯塔萨诺尔继其任。

亚力山大在世时，为了拉拢地方统治阶层，也曾任命当地人为太守。当然，各地太守绝大部分仍然是希腊人和马其顿人。但在公元前315年以后，原来由亚力山大任命的出身于地方贵族的太守大都被撤职，只有巴克特里亚人奥克夏特与伊朗人阿特罗帕塔是例外，因为前者是亚力山大的岳父，而后者则是追迪卡斯的岳父。佩松曾命其弟攸达模斯（Eudamus）去取代帕尔提亚太守弗拉塔费涅斯，引起中亚各地太守们的联合抵抗。在这一反佩松的联盟中，奥克夏特是主要人物。参加这个联盟的还有斯塔萨诺尔与西比尔秋斯等人。他们经过一场战争，终于保持了自己在东方各郡的统治权。

追迪卡斯想维持各征服地区的统一，但是却在公元前321年进攻埃及时被托勒密打败，他本人也被部下刺杀。佩松在谋杀追迪卡斯中起了主要作用。由于摄政者死去，各将领便于公元前321年在叙利亚的特里帕拉狄索斯（Triparadisus）召开会议，讨论重新划分各郡的问题。在这以后诸将领的纷争逐鹿当中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巴比伦太守塞琉古，另一个是西里西亚（今土耳其南部）太守安提戈努斯（Antigonus）。起初，安提戈努斯占了上风，佩松为其所杀，塞琉古惧而逃奔埃及。但安提戈努斯却在公元前312年败于托勒密，使塞琉古得以从埃及返回巴比伦。公元前301年夏，安提戈努斯与塞琉古在伊普索斯（今土耳其阿克谢希尔西北）会战，大败阵亡。于是，塞琉古就在原亚历山大帝国亚洲领土上建立塞琉古王朝，以底格里斯河上巴比伦附近为首都，以后又于公元前300年迁都于安提俄克。

塞琉古建立的王朝史称塞琉古王朝，一般从塞琉古自埃及返回巴比伦的公元前312年算起。从公元前312年到公元前250年这段时期中，中亚是属于塞琉古王朝统治的范围。

在塞琉古王朝初期，斯塔萨诺尔统治着巴克特里亚，奥克夏

特统治着从兴都库什山到印度河之地。奥克夏特曾经出兵帮助塞琉古作战，后来因为女儿罗克珊娜和外孙（亚力山大之子）被杀，才不再参加近东的纷争。公元前306年，塞琉古东来，要求巴克特里亚臣服，没有遇到抵抗。正因为有一个安全的后方作为补充兵员粮秣之基地，塞琉古才能打败自己的劲敌安提戈努斯。

塞琉古在公元前301年打败安提戈努斯之前，不但将权力扩展到了巴克特里亚，而且同印度的孔雀王朝达成了谅解。这里略述一下印度的情况。

希腊作者曾经谈到，在亚力山大大帝进攻印度时，有一个名叫山德罗可士司（Sandrocottus）的人前来求见，表示予亚力山大以支持。近代的考证者一般都肯定这个人就是印度史上的月护大王（旃陀罗笈多）。据说，月护是摩揭陀人，出身于低贱的首陀罗种姓，母亲是个养孔雀的。由于被难陀驱逐，故从摩揭陀逃出，同一个名叫阇那伽的婆罗门到旁遮普来谒见亚力山大。亚历山大将印度河沿岸之地让给了他。他向马其顿人学习了骑兵战术。在亚力山大死后，他同阇那伽返回摩揭陀，号召人民起义，驱逐希腊人。公元前320年，月护又联合印度西北各邦，在婆罗门的支持下推翻了难陀王朝，在华氏城自立为王，创立了印度历史上著名的孔雀王朝。

亚力山大死后，旁遮普与喀布尔地区曾宣布脱离希腊的统治而独立。为此，塞琉古就率兵前来，企图重新征服和统一从兴都库什山到印度河流域之地。但是，在这里却遇到了新兴的孔雀王朝。公元前305~前304年，月护打败了塞琉古，最后双方缔结和约。塞琉古承约将旁遮普、格多罗西亚、阿拉霍西亚及帕洛帕密萨代等地区让给孔雀王朝，换回大象500只作为代价。由是孔雀王朝的版图，北至于兴都库什山、克什米尔，南至于迈索尔，强盛空前。曾担任塞琉古王朝驻月护处大使的著名希腊作者美伽斯蒂尼（Megasthenes），曾在华氏城生活数年之久，返国后著文记述了印度的情

况。近代在阿富汗至少发现三个阿育王（月护之孙）的铭文，说明孔雀王朝的确对上述各地行使了有效的管辖。塞琉古同月护的和约不仅保证了双方的和平关系，而且便利了印度同中亚、西亚的交通，使这条路线上的商业贸易更加发达起来。

塞琉古娶斯皮达马之女阿帕密为妻，生子安提俄克（Antiochus）。公元前293年，安提俄克代表父亲统治着东伊朗，其任务是防御草原地区萨喀人的入侵，并加强塞琉古王朝对阿列亚与巴克特里亚的控制。在安提俄克统治时期，谋夫被命名为安提俄克城（Antiochia）。在巴克特里亚铸造的钱币上，把塞琉古与安提俄克二名并列，可见当时东伊朗和中亚实际上是由他统治的。

公元前280年，塞琉古被属下官员所杀，安提俄克即位，是为安提俄克一世（前280~前260年）。由于史料失载，关于安提俄克一世时期巴克特里亚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他的儿子安提俄克二世在公元前260年即位，在位15年（公元前261~前246年）。正是在他统治时期，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统治者摆脱了对塞琉古王朝的臣属关系，宣布独立。

塞琉古王朝时期，像亚力山大时期一样，希腊人在中亚实行殖民统治，设立希腊人定居的村庄和城镇，以保卫帝国的东北边境。王朝诸帝都以自己的名字来为诸城镇命名，如塞琉古城、安提俄克城等。相传塞琉古王朝建立了75座城，并移希腊人以实之。这些城镇多在边远境界上，以防萨喀人的入侵。如所谓的“药杀水以外的安提俄克城”，普林尼说，该城为米利都人德谟达木将军所建，其具体地址不详，有的说是在今塔什干或费尔干纳谷地。斯特拉波说，安提俄克曾在玛尔吉亚那的木尔加布河上建安提俄克城，位于故亚力山大城旧址。为了保卫谋夫绿洲，安提俄克为该城修了235公里长的围墙。该城后被游牧人所毁，其废墟在今土库曼的拜拉母·阿里城附近。

塞琉古王朝的政策同马其顿亚力山大的政策相比，是更加积

极推行希腊化，而不像亚力山大那样重视地方民族的传统。如果说亚力山大企图把希腊文化同中亚的地方文化融合起来，那么塞琉古王朝则企图通过努力尽力保持希腊文化的纯洁。当然，希腊人的这种藐视地方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观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塞琉古王朝在中亚新建的城镇中，建有希腊神庙，但其中也发现有当地民族崇拜的神。如阿纳喜特神（相当于希腊的阿芙罗狄蒂）、奥尔穆兹德神（相当于希腊的宙斯）、米特拉神（火神，相当于希腊的阿波罗）等等。亚力山大还采用波斯国王按朝代纪事之法，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新的纪年法。塞琉古王朝即以公元前312年10月1日为始计年。

塞琉古王朝作为当时最强大的一个希腊化国家，它的经济是颇为发达的，所以对同东方的商业贸易也是极力维护的。塞琉古王朝的希腊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更是需要东方出产的各种物品，如中国的丝绸，印度的香料等。当时的商路，从爱琴海沿岸起，经过两河流域、米底、波斯，到巴克特里亚，又从巴克特里亚往南通印度，往东通中国，往北则可通中亚和西伯利亚。这些商路就控制在塞琉古王朝的手中。塞琉古王朝的统治者从中得到巨大的利益。各民族的商人来往于这些道路，贩运东西方的货物，络绎不绝，给塞琉古王国带来了繁荣，同时也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正如德拉颇曾经说过的："如果说，欧洲的思想是通过巴克特里亚而传到远东，那么，亚洲的观念也是通过这里和经过同样的渠道传到欧洲的。"[①]这种情况，可以说主要是从亚力山大东征及其后继者的希腊化时期开始的。

塞琉古王朝虽然在中亚建城、屯垦、殖民和戍兵，但中亚草原地区的游牧人还不是这个王朝所能控制的。游牧部落的入侵，仍然是塞琉古国家经常受到的威胁。如公元前280年，来自北方的游

① 德拉颇：《欧洲理智的发展》（Draper,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Europe, Ⅰ, ii.）。

牧人曾深人到塞琉古王朝，到了帖尔密兹和赫拉特。安提俄克一世将他们逐回去，恢复了被破坏的城镇。当时，花剌子模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也支持游牧部落对希腊人的斗争。在这些游牧人中，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所谓的达赫人。有的认为达赫人即巴尔奈人，或即希罗多德《历史》中提到的达欧伊人。一般认为他们是玛撒该塔伊人的一支，理由是伊朗农民那时称呼玛撒该塔伊人为“达赫”，意为“敌人”、“盗匪”。达赫人分布于里海以东今土库曼的南部，与呼罗珊地区为近邻。后来推翻希腊人在帕尔提亚的统治并建立伊朗历史上的安息王朝的也就是他们。

除达赫人以外，其他的萨喀部落以及索格底亚那人、巴克特里亚人等也不断进行着反抗塞琉古王朝的斗争。据说，达赫人甚至南侵到了今阿富汗的北部。他们破坏城镇，摧毁堡垒，蹂躏农村，使希腊人受到很大的威胁。中亚各族人民的斗争一直继续到公元前2世纪40年代希腊统治者的最后垮台。

第三节　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王国与帕尔提亚的安息王朝

自亚力山大征服以后到塞琉古王朝时期，巴克特里亚是帝国东部的一个郡。公元前3世纪中叶，塞琉古王朝由于外与埃及进行战争，内部安提俄克二世诸子争国，领土扩大，财政不支，加以在叙利亚丧失许多城镇，中亚方面有游牧人侵犯边境，国力逐渐衰弱，对地方势力无力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巴克特里亚太守狄奥多托斯在公元前250年宣布独立，脱离塞琉古王朝。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大夏的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从公元前250年（即中国秦始皇称帝前五年）到公元前135年（中国汉武帝建元六年），这个独立的巴克特里亚国享国近一个半世纪之久。

大约在巴克特里亚独立的同时，帕尔提亚与希尔克尼亚的太守安德拉戈拉斯（Andragoras）也宣布脱离塞琉古王朝而独立。但这时分布于今土库曼南部属于萨喀种族的达赫人（中国史料中译为“大益”），在其首领阿尔撒西斯（Arsaces）的率领下，侵入帕尔提亚。安德拉戈拉斯在对达赫人的战争中被杀。希腊人的统治被推翻。阿尔撒西斯大约在公元前248年（或247年）建立起一个以尼萨为中心的独立王国（尼萨在阿什哈巴德附近），是为阿尔撒西斯王朝。[①]这个王国自公元前3世纪中叶起延续了近五百年（前248年~224年）。近代人金斯米尔（Kingmill）考证，认为中国史料中提到的安息就是Arsaces的译音。此说现已成为定论。[②]

安息王朝与巴克特里亚王国不同，它是由伊朗语族建立的王朝。安息国的领土后来从帕尔提亚扩展到整个伊朗，其势力发展到两河流域。安息王朝是伊朗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王朝。

据史料记载，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似曾统治索格底亚那。因斯特拉波曾经说：“当希腊人统治了巴克特里亚之后，便将其分为若干州。他们也占领了索格底。”[③]所以在这里叙述公元前3世纪中叶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中亚的历史时，即以叙述巴克特里亚的历史为主，同时对于与之关系密切的伊朗（安息）与印度的情况也约略及之。

关于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历史资料甚少。除了希腊古典作者的零星记载和中国史籍以外，主要根据巴克特里亚希腊统治者所铸造发行的钱币来进行分析研究，还有一些近代人的研究著作可供参考。

原来作为希腊化国家塞琉古王国的一个省的巴克特里亚，其统治者都是希腊人。公元前250年宣布独立的狄奥多托斯

① 沃尔斯基（Wolskii）认为安息王朝建于公元前238年。

② 夏德：《大秦国全录》（F.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第141页。

③ 斯特拉波：《地理》（Strabo），Xi，11，2.

（Diodotus）也是希腊人。此后，巴克特里亚虽然脱离了塞琉古王朝，但名义上仍然承认自己是隶属于该王朝的。

巴克特里亚同安息，由于壤地相接，关系是很密切的。比较起来，在早期，当时巴克特里亚富庶而强大，安息则国力贫弱。所以安息对大夏是恐惧的。安息王朝的创建者阿尔撒西斯一世可能是死在同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的战争中。其后，他的兄弟提里塔特（Tiridates，或称为阿尔撒西斯二世）继立。有的书上说，安息国的第一个国王不是阿尔撒西斯，而是提里塔特。他是在公元前247年正式称王的。在他称王之后二年（前245年），巴克特里亚希腊王狄奥多托斯死去，继之者为狄奥多托斯二世（前245~前230年）。

提里塔特为了扩大自己的领土和增强自己的实力，出兵前往吞并希尔克尼亚。塞琉古王朝对东面事态的发展甚为关注，便出兵前来镇压安息，同时，还在公元前247年派遣托勒密攸尔盖特（PtolemyEuergetes）率大军到达巴克特里亚边境。在这种情况下，安息王提里塔特与巴克特里亚的狄奥多托斯二世都感到顶不住叙利亚方面的压力，便互相达成谅解，缔结盟约，合力抵抗塞琉古王朝。塞琉古王朝军队因内部不稳而退去，结果安息得以兼并希尔克尼亚。

安息在同巴克特里亚联盟的条件下，继续向西进行扩张。随后，安息的首都也向西迁移。先从尼萨迁到赫卡托姆皮洛斯（Hecatompylos）[①]，以后又迁到厄克巴坦纳。到公元前90年时，又迁到幼发拉底河上的泰西封。安息由于战胜塞琉古王朝国力大振，成为巴克特里亚的劲敌。伊朗历史上的安息时代也就从此开始（前247年4月14日）。狄奥多托斯二世后来对于他同安息的联

① 赫卡托姆皮洛斯，希腊语意为“百门之城”。其废址在今伊朗东北侯腊散省达姆甘（Damghan）西南附近，地当厄尔布尔士山脉东段南坡，扼古道之中心，应即中国史料中的和椟城。冯承钧《西域地名》以为和椟城即Akbatana（今哈马丹），恐非是。

盟似乎感到后悔。

达赫人起初从中亚草原攻入帕尔提亚，可能是向往希腊人的生活水平，想在新的地方建立王国。他们古怪地采取攻打来自草原的亲族部落的政策。安息统治者在早期竟宣称自己是“希腊迷”，仰慕希腊文化，采用希腊的语言和艺术。但随着政治逐渐趋于稳定，征服者的民族意识也逐渐增强。到公元1世纪时，安息统治者便抛弃希腊化的政策，提倡帕尔提亚（即伊朗）民族主义。这种新的政策导致排斥希腊的语言和艺术，而代之以波斯的语言和艺术，并采用阿拉米亚文字。[①]他们还想抛弃以前的宗教而改宗琐罗亚斯特为国教。1948年在旧尼萨发现大量旧瓶碎片，其上有铭文。据研究，铭文的语言是公元前2~前1世纪用阿拉米亚文字书写的帕尔提亚语。这是迄今发现的最古的帕尔提亚文献。这种文字也称为巴列维文。

阿尔撒西斯兄弟把自己说成是波斯阿赫门王朝阿塔薛西斯二世之孙，以便使安息王朝成为这个古老的波斯王朝的合法的继承者。安息统治者赐给随同他们来到帕尔提亚的萨喀游牧人以大量的地产，由萨喀人组成国王的议会。这个议会可以决定王位的继承人。萨喀游牧人也是安息骑兵的主要成分，步兵则大多由奴隶组成。但帕尔提亚的萨喀游牧人以后逐渐同伊朗的农民混合了，他们信奉琐罗亚斯特教，采用伊朗的语言文字（实即萨喀语与米底语的混合），成为地道的伊朗人。

巴克特里亚的国王狄奥多托斯二世，因为与安息联盟，软弱，无所作为，引起本国希腊统治集团内部的不满，终于在公元前230年发生政变。狄奥多托斯二世被索格底亚那总督攸提德谟斯（前230~前187年）所杀（攸提德谟斯为塞琉古二世寡后之女婿）。这时，有一个名叫安提马库斯（Antimachus “Theos”）的人，可能是

① 弗鲁姆金：《苏联中亚考古》，新疆博物馆1981年印本。

狄奥多托斯二世的儿子或近亲，被宣布为继承人而即位为王，但此人在很短的时间内也被攸提德谟斯所杀。公元前225年左右，巴克特里亚的王位便掌握在这位马格尼西亚人（Magnesian）[1]之手，是为攸提德谟斯王朝之始。

公元前214年，阿尔塔班努斯一世（Artabanus Ⅰ）继提里塔特一世为安息王。他利用米底太守阿海攸斯（Achaeus）叛变塞琉古王朝的机会，前去攻取其地，一度夺得厄克巴坦纳。塞琉古王安提俄克三世率领十万步兵和两万骑兵前来镇压。安息王被打败，仓皇后退，放弃首都，躲入山寨。安提俄克三世率领的叙利亚军队蹂躏其境，直达希尔克尼亚。因安息进行顽强抵抗，安提俄克三世只好同意议和，承认安息的独立，双方结成同盟。阿尔塔班努斯一世劝安提俄克三世去进攻巴克特里亚，安息愿出兵相助。理由是巴克特里亚在攸提德谟斯的统治下，和平安定，日益强盛，对叙利亚与安息都是威胁。安提俄克听从这种意见，于公元前209年出兵，开始进攻巴克特里亚。

安提俄克三世选择从南方进攻的路线，沿阿列亚河前进。在到达一个渡口时，他趁巴克特里亚的主力军在夜间离开的机会，亲自率领骑兵在前，强行渡河。随后即与巴克特里亚的骑兵遭遇，进行激战，虽然击溃了敌军，但安提俄克三世本人也受了伤。嘴上挨了一刀，五颗牙齿被砍掉。等塞琉古王朝的大部队到来后，他即直取巴克特里亚的都城扎里亚斯普。由于该城防卫坚固，围攻两年不能攻下，最后只好进行谈判。代表巴克特里亚方面到塞琉古朝军营去同安提俄克三世进行谈判的是希腊人特里亚斯和攸提德谟斯的儿子德米特里。他们向塞琉古国王指出：先王狄奥多托斯二世与安息联盟的政策，不能由今王负责。又指出：锡尔河以北的萨喀游牧人正在活动，威胁着边境的安全。巴克特里亚是希腊

[1] 马格尼西亚（Magnesia）是希腊的一个地名。

文明的前哨，塞琉古帝国的安全有赖于巴克特里亚的统一。如果削弱巴克特里亚国，这对希腊人将是致命的打击。“希腊将会要沦于野蛮”（意即将会要招致野蛮人的入侵）。

安提俄克三世考虑上述意见后，也认为巴克特里亚国保卫着通往印度和通往北方的商路，保持这个边境大国的统一也是自己的利益所在。加之，他率领大军久离国都，其后方亦有发生变乱之虞。因此，塞琉古王朝在公元前206年与巴克特里亚议和结盟，承认攸提德谟斯的国王称号，条件是后者应当负责保卫北部边境，免遭萨喀游牧人的进攻。

德米特里在谈判中表现出才华出众，安提俄克三世十分赏识，答应把公主许配给德米特里，以固盟好。

前面已经讲到，塞琉古一世曾将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喀布尔地区割让给印度孔雀王朝国王月护。月护于公元前297年去世，其子宾头沙罗继立（前297~前273年）。宾头沙罗死后阿育王继之（前273~前232年）。[①]阿育王死后孔雀王朝遂衰落。到公元前230年巴克特里亚王攸提德谟斯篡立时，喀布尔地区的统治者名叫苏布哈伽色纳（Subhegasena，或作Sophagasena）。有的人认为此人即阿育王的儿子加劳卡，苏布哈伽色纳是其称号。巴克特里亚王攸提德谟斯在同塞琉古国王安提俄克三世订立了和约以后，安提俄克三世便往征喀布尔，苏布哈伽色纳不战而降，给塞琉古王国交纳大象和赔款。安提俄克三世取道坎大哈回国。这次出征喀布尔，实际上是反映了攸提德谟斯的巴克特里亚王国想兼并兴都库什山以南诸地的愿望。

攸提德谟斯在位时间颇长，达40年之久（前230~前190年）。他在位期间，不仅企图吞并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地区，而且向北进

① 有的认为阿育王即位的年代为公元前271年，或认为是公元前268年。阿育王（前273~前232年）与中国的秦始皇（前246年~前210年）大致为同时代人。在阿育王以前，佛教尚未传到印度西北地区。

行扩张。据阿波罗多鲁斯（Apollodorus of Artemita Trogus）等的记载，攸提德谟斯在公元前206年以后数年，曾东征占据了费尔干纳等地。斯特拉波引用其话说："他们成了阿列亚（今赫拉特一带）和印度的主人。他们不仅占领了帕塔勒尼（Pattalene），而且占领了沿海的萨老斯托斯（Saraostos）王国和西格底斯（Sgerdis）王国。他们把巴克特里亚帝国的领土扩张到了赛里斯国（Seres）和弗里诺伊（Phrynoi）国。"

经过后人考证，这里说的帕塔勒尼是指信德（今巴基斯坦印度河三角洲），萨老斯托斯即今印度卡提阿瓦尔半岛的南部。西格底斯王国在信德与萨老斯托斯之间的沿海地区。至于赛里斯，则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指中国，有的说是指疏勒。李约瑟则说："是指做中间买卖的西伯利亚各部落。赛里斯直接指中国应是在凯撒和奥古斯都的时代。"[1]弗里诺伊，有的说是指匈奴。杨宪益说是指距疏勒不远的蒲犁。《巴克特里亚史》一书的作者罗灵逊，不相信巴克特里亚国当时控制的地方达到了中国边境以外。他认为，斯特拉波的意思是说巴克特里亚的影响达到了中国西部边境塔什库尔干以外而已。

巴克特里亚当时以控制商业贸易作为重要的政策之一。它派出军队去保护塔什库尔干中国境外地区免受萨喀人和其他游牧人的侵犯，就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2]同时，它要寻求出海口，也是为了通商贸易。所以，巴克特里亚王国将领土扩张到了沿海地区。

攸提德谟斯在位时国力强盛，领土广大，经济文化繁荣。其领土不仅扩展到了费尔干纳、阿列亚和阿拉霍西亚（原坎大哈一带），而且到了印度西北以至于海边。他所发行的钱币在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帕洛帕密萨代、阿列亚、阿拉霍西亚、德兰吉亚那

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第2册，第363~367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② 罗灵逊：《巴克特里亚史》，第77页，纽约1969年英文版。

和玛尔吉亚那等地区都有发现。

攸提德谟斯的长期统治约于公元前190年结束，其子德米特里即位（前190~前160年）。这时，在西方发生了重大的事件。新兴的罗马奴隶主强国在德米特里即位的这一年（前190年）同塞琉古王国开战，大败安提俄克三世。塞琉古王朝从此永远丧失了小亚细亚。巴克特里亚国王德米特里趁这个机会南侵印度，大大扩张了领土。他征服了喀布尔、健陀罗、旁遮普、信德等地。旁遮普的攸提德谟城（Euthydemia）就是他建筑的。该城后名奢羯罗（Sagala，或Sakala，即今巴基斯坦的锡亚耳科特城）。攸提德谟城当时是巴克特里亚所属兴都库什山以南印度河以东地区的首府，繁荣富庶，甲于西印度。

德米特里在征服了印度西北部的大片土地以后，就长期驻在那里，不返回巴克特里亚，奢羯罗成了政治中心。他把新征服的地区分成许多小领地，派遣自己家族的成员去管治，却没有解决对巴克特里亚本土和相距遥远的南方领土进行统一管理的问题。当他长期滞留在印度时，巴克特里亚本土就发生了变乱。

大约在公元前174年，有一个名叫攸克拉提德斯（Eucratides）的人，宣布自己为巴克特里亚的国王。此人似与塞琉古皇室有亲族关系，故完全亲附于塞琉古王朝。当时德米特里由于忙于印度事务，无力返回进行镇压，故攸克拉提德斯的夺权取得成功，但是却受到外敌的威胁。这一威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安息。安息王米斯拉提德斯一世（Mithratides Ⅰ）在公元前170年即位以后，以抵制巴克特里亚的势力作为他的主要任务。他出兵夺去了原属于巴克特里亚的两个省。另一方面，边境地区则存在游牧人的威胁。来自锡尔河以北的萨喀游牧人使攸克拉提德斯不得不两面作战，以致没有能力去收复被安息夺走的土地。据查士丁说："以前曾是巴克特里亚一部分的索格底亚那这时很可能已在野蛮人的手中。"有的书说索格底亚那此时并入了花剌子模。后来他同德米特

里之间也发生了战争。只是到最后才转败为胜，夺得德米特里在印度的一部分领土。德米特里大约在公元前160年被杀或被废。

攸提德谟斯是一个地道的希腊人，常以其希腊血统而自傲，轻视巴克特里亚本地民族的传统，比其前人更加积极推行希腊化政策。而在安息的威胁面前，他则表现软弱无能，因此引起巴克特里亚统治集团内部的不满。公元前156年他从印度返回之后，便被其子所弑。这位弑君者的名字不见于史书的记载，有的作者推断是阿波洛多托斯（Apollodotus）。此人在位为时甚短，他的兄弟赫里奥克里斯（Heliocles）为父报仇，杀死他而即位为王。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的国祚，也就在赫里奥克里斯的手里走向终结。

巴克特里亚国在攸提德谟斯和德米特里当政的时期是极盛时期。其政治之昌盛、经济文化之繁荣达于顶点，以致人们几乎忘记了它的建国者狄奥多托斯。斯特拉波甚至说："头一个建立了巴克特里亚独立的乃是攸提德谟斯家族。"

据史料记载，巴克特里亚国实行一种郡县制度，郡称为Eparchy，县称为Hypachy。县又分为若干驿亭（Stathmos），亭各有长。这种制度与汉朝的制度完全相同。近人杨宪益认为，此等政治措施都是向中国汉朝学来的。又攸提德谟斯东征后，始封其子为王，这是古代西方从来未有的。攸提德谟斯为西方第一个实行分土封建的国王。以后，安息国王也实行此种制度。又据杨宪益的研究，汉代的孝的观念，在皇帝谥号之前加孝字的做法，也在那时传到了西亚各国以至于埃及。这说明，早在张骞通西域以前，中国同西方已经有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和互相间的影响。

巴克特里亚的地理条件很好，其土地肥沃，对发展农牧业都极为有利。又因其处在东西南北交通要道的会合处，故商业也很兴盛。无论来自中国的丝绸，来自中亚、西伯利亚的黄金，来自印度的香料、象牙及从海上转运来的中国南方各地的特产，都要从这里转运到西方去。商队络绎，不绝于途。沿途城镇，不可胜计。所

以，查士丁尼称巴克特里亚为“千城之国”。[①]当然，他所说的巴克特里亚国是包括索格底亚那在内的。在这众多的城镇中，也有一些是波斯和希腊征服者为殖民屯垦而兴建起来的，如居鲁士城、亚力山大城、阿姆河北的安提俄克城、德米特里城（今帖尔美兹）等。至于著名的玛拉坎达城、扎里亚斯普城等，则是更加古老的城。

巴克特里亚的矿藏较少，需要从东面的巴达赫善输入青金




亚历山大大帝钱币（前336~前323年）　安提俄克一世钱币（前280~前262年）





攸提德谟斯钱币（前235~前200年）　德米特里钱币（前200~前185年）

① 查士丁尼书（Justin），Xli，4。

石，从花剌子模输入绿松石，从西伯利亚输入黄金，从中国输入铅，故通往西伯利亚的商路被称为“黄金路”。当时西伯利亚有金矿，勒拿河出产黄金闻于远近。这些地方出产的黄金输往中亚、印度和伊朗。匈奴兴起以后，西伯利亚及通往那里的商路为其所控制，故黄金之输入巴克特里亚者渐稀。巴克特里亚王不得不以白银代替黄金来铸造钱币，后来又用铅铸造钱币。[①]李约瑟说：“略早于公元前200年，巴克特里亚的国王攸提德谟斯缺少从西伯利亚输入的黄金，曾派一些探险队，要他们设法到达中国，可是一直没有成功。他的探险队所遇到的蓝眼红发的种族，据说即是中国人。”[②]这里所说的中国人显然非汉族人。

在波斯阿赫门王朝统治时期，由于兴建灌溉工程，农业相当发达。当时人称巴克特里亚为“真正的天堂”。的确，巴克特里亚的农业在中亚是比较先进的。农产品除粮食作物外，还以出产葡萄著名。希腊史料就提到过玛尔吉亚那的葡萄种植业。这里一般的生活也较好。从考古发现的城村遗址看，人们住着土砖砌的房屋。一家通常总有几间住房和许多储藏室。手工业也很发达，制陶都用陶轮，陶器的纹饰多为几何形，或有表示豹与山羊的动物纹。前苏联考古学者还在塔吉克南部的一个古城镇里发现一所保存完好的教堂。教堂高达6米，其大厅有4根圆柱，中有祭坛，走廊长30米。教堂内保存着7000多件物品，包括武器、金银装饰品、宝石、手工制品、象牙刻画、石头和银制的小雕像，包括亚力山大的象牙雕像、希腊诸神的雕像和居民的画像等，由此可见当时巴克特里亚的文化艺术水平。

亚力山大曾经在今喀布尔以北约60公里处建一座城，亦称为亚力山大城（Alexandria-Kapisu）[③]，作为喀布尔河谷地的首府。

① 罗侯罗：《中亚史》，第89-90页，加尔各答新时代出版社1963年版。

②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第2分册，第380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③ 赖斯：《中亚古代艺术》，第127页，纽约1965年英文版。

其地扼通往印度的商路。从印度恒河流域来的商队，从华氏城（Patna）出发，经过马土腊，咀叉始罗（拉瓦尔品第），度开伯尔山口，到喀布尔，在此与通往各方面的道路相接。如西去，则越兴都库什山到厄克巴坦纳（哈马丹）。从厄克巴坦纳，既可通大马士革与腓尼基，也可通安条克。然后从安条克取道托罗斯山与小亚细亚，去爱奥尼亚，与希腊相通。如从巴克特里亚往东，则经过瓦赫什河谷，越喀尔提锦与阿赖岭，而到达喀什噶尔。1936年对巴格兰故城进行了发掘，发现大量古物保存在城堡中的一间房子里。在这些古物中有许多中国的纺织品，有富于地方风格的雕刻、塑像，也有产于叙利亚的希腊罗马物品。这说明当时该城是一个国际性的商业城市。

为了商业流通的需要，巴克特里亚的国王都铸造和发行了钱币。这种钱币基本上是银的，正面铸国王像，反面铸其保护神之像。钱币上有希腊文的铭文，都是国王的名字和称号。从德米特里时期起，这种铭文始用两种文字——希腊文和佉卢文。这主要是为了便于当地群众的辨认和使用。巴克特里亚钱采用希腊量制——德拉赫姆（drachm，一德拉赫姆相当于4.36克）。后期则采用本地的量制。巴克特里亚钱流通的地域很广。在当时的索格底亚那各地，如沙赫里夏勃兹（渴石）、布哈拉、泽拉夫善河谷地、花剌子模、帖尔美兹与费尔干纳，都曾发现过攸提德谟斯、狄奥多托斯、德米特里、赫里奥克里斯等国王的钱币。这既反映了当时索格底亚那之隶属于巴克特里亚，也反映了货币流通的范围。

巴克特里亚的文化也是很发达的，这与商业贸易促成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影响是有关系的。例如文字，巴克特里亚官方用的都是希腊文；希腊语也是商业上和上层社会中通用的语言。甚至在安息，那里的统治者虽属于伊朗民族，但在商业上和政府公文上也使用希腊语文，所以，在巴克特里亚就有用希腊字母来拼写语言而形成的文字。另外一种便是用阿拉米亚字母拼写

的文字。20世纪60年代，法国考古队在阿富汗发现用上述巴克特里亚文刻写的铭文和文书。这种古巴克特里亚文是世界上从未知道的。

早在希腊人以前的阿赫门王朝统治时期，古波斯文和阿拉米亚文就已流行于巴克特里亚及印度西北各地。当地人也像波斯人一样，采用阿拉米亚字母来创造自己的文字。如粟特文就是来源于阿拉米亚字母。布赫洛（Buhler）以为，流行于旁遮普和帕洛帕密萨代等地的佉卢文也是从阿拉米亚字母创造出来的。佉卢文是波斯官员同当地政府、印度官吏、乡镇首长和群众交往的结果。当时波斯人要这些乡镇首长掌握赋税，正如同亚力山大在入侵旁遮普时的做法一样。印度人起初是用阿拉米亚字母来拼写地方音，以后才发展成为文字。佉卢文之发展完成，是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即巴克特里亚独立之时。佉卢文是世俗人士所用的文字，而非宗教人士（Pandit）所用的文字。我们现在不但看到佉卢文被用来作钱币上的铭文，而且见到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用来写敕令。随着巴克特里亚希腊统治王朝的灭亡，希腊文便被本地区的文字（如巴克特里亚文、粟特文、古波斯文等）所代替。但在印度，希腊文则仍存在了一个时期。那里的佉卢文则使用到公元4~5世纪。

巴克特里亚的宗教信仰受到各方面的影响。最早的是对日、月、水、火的崇拜，对阿纳喜特神、米特拉神的崇拜。希腊人侵入以后，一方面他们接受了本地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也有希腊人崇拜的神传入中亚。如在巴克特里亚希腊国王所铸的钱币上，也有铸阿纳喜特神像的。希腊人把中亚的地方神同希腊的古典神如宙斯、雅典娜、阿波罗、海格立斯、波赛顿等混而为一。同时，波斯阿赫门王朝所信仰的阿胡拉·马兹达神以及其他的神，在群众中仍然是有人信仰的。巴克特里亚本地产生的琐罗亚斯特教，更是信仰者众。这种宗教对当地的艺术也有影响。巴克特里亚发现的许多拜火教的物品，同索格底亚那发现的同类物品很类似。到巴克

特里亚独立的时期，印度的宗教也传了进来，如《吠陀》经赞词中的神和佛的学说。

在公元前6世纪产生的佛教，到孔雀王朝时期在印度已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这个王朝的第三代君主阿育王，可以说是佛教的保护者和发展者。阿育王在早年大举吞并邻近的国家，残酷地镇压人民。据说，他在征服羯陵伽国的过程中，曾屠杀数以万计的人民。到了晚年，他为了欺骗群众，便选择佛教作为国教，设置“正法大官”，巡行各地，宣传佛法。在他的支持下，佛教从印度的恒河流域向外传播，及于整个次大陆、希腊、埃及、叙利亚、马其顿，乃至缅甸、柬埔寨和斯里兰卡。又据说，他在公元前253年曾召集佛教僧侣在华氏城举行第三次“结集”①，结果编辑了一部《论事》。《善见律毗婆娑》中还说，有18位高僧被派到9个地方去，其中包括印度西北部的耶伐那人（即希腊人）的地区，克什米尔和健陀罗诸地。当时佛教的传播不但到了耶伐那人居住的喀布尔河流域，好像也传到了巴克特里亚。阿育王所处的时代正是巴克特里亚独立的时代。当时孔雀王朝的领土由于塞琉古王朝的割让而达到了兴都库什山，佛教就是随着政治势力所及而达到了今阿富汗、克什米尔与健陀罗等地。

在阿富汗的坎大哈旧城曾经发现一件用希腊文和阿拉米亚文两种文字刻的铭文，谈及阿育王皈依佛教之事。这也说明佛教传到了该地。此外，在孔雀王朝管辖的地区还发现大量的窣堵波（佛塔），独立的石柱和石窟等。不过，当时还没有雕塑佛像的风气。阿育王纪念佛的方法，是建立刻有经文的石柱和佛塔，相传阿育王曾建立数十个这种石塔，玄奘去印度时还得见有30个。又传

① 所谓佛教的结集，意思就是集体会诵经典。第一次结集，传说是在佛灭后不久于王舍城外的七叶窟召集的。主持人是迦叶，参加的人是佛的大弟子等五百人。方式是会诵，即指定一人背诵佛经，大家审定。第二次结集，是在佛陀逝世后100~200多年于吠舍离召集的，称为“七百人结集”。在此次结集后，佛教分裂。

说他曾修建8.4万塔（寺），这当然只是传说，不可征信。[①]所有这类早期的佛经文物，都已有发现。当时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肯定有许多是佛教的信徒，甚至有的还信仰印度教。奢羯罗的巴克特里亚王德米特里也可能是佛教徒。

巴克特里亚的艺术以中亚和伊朗的艺术为基础，同时也吸收了希腊、印度和中国的影响。如金银錾花制品、象牙小雕像、镶嵌有象牙雕刻的家具、石雕壁缘、银碗银碟、泥塑像、钱币等，制作都极为精美。特别是历任巴克特里亚国王的钱币，其上铸造的国王像，线条逼真，形象生动，充分表现了造像者的匠心。加以铸造技术高超，使每一枚钱币都成为一个精妙绝伦的艺术品，令人想起了最美的希腊雕刻。巴克特里亚有许多金属制品，过去人们认为是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东西，现在看来是属于这个时期的。这些东西也像铸币一样的好，有的运到了遥远的地方，其中有许多甚至在俄国西部被发现。有些当地宝石手工艺者的作品发现于阿姆河流域。

巴克特里亚人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有成就。他们曾采用塞琉古王朝的历法。在文化上兼收并蓄，产生了本地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看来，医学也是高明的。佛经中曾讲到阿育王的一个儿子得了盲病，是被健陀罗的巴克特里亚医生治好的。据报道，前苏联考古者曾在天山地区发现有明显做过头骨外科手术的古代人类头骨。这种在公元5世纪或公元6世纪的坟墩中所发现的头颅骨，曾经被用金属工具开了一个洞。李约瑟认为穿颅治盲这种外科手术是经由印度传入中国的，而这种传播是要经过巴克特里亚的。巴克特里亚的地理位置显然有利于它的经济文化的发展。

②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1卷，第5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四章
中国同中亚建立直接联系

第一节　匈奴的崛起与月氏的西迁

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中期，巴克特里亚希腊国家脱离塞琉古王朝而独立的同时，中国则经历了一个历史大变革的时期。自公元前5~前4世纪以来，黄河流域各地逐步地由奴隶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到公元前3世纪中，中国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朝。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充满着各诸侯小国的混战、兼并和各民族间的斗争、融合与发展。如历史上著名的匈奴族，就一直参与着这种斗争，最后，趁秦朝亡后楚汉相争无暇顾及边疆的机会发展壮大起来。匈奴的崛起，无论对中国、中亚乃至世界的历史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匈奴，西文作Hun，俄文作 Гун 。先秦史籍或称为昆夷、混夷、獯鬻、荤粥、淳维，王莽称匈奴为恭奴。H与Г二音可通。以上诸名，本为同音意译。匈奴原为中国的一个民族，自殷周以来即见于汉文史料的记载。到战国后期，匈奴始露头角。他们起初分布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阴山山脉一带，以后逐渐扩展至外蒙古。近代的中外研究者，有的认为匈奴是突厥语族，有的认为是蒙古语族，也有的认为匈奴有伊兰成分。[①]目前看来，似以前者

① 杨宪益说："汉初的匈奴大部似为伊兰种族。当时安息人多晓希腊语，匈奴或亦然。故匈奴若鞮，如不是中文"孝"的转化，亦得为希腊文Eupator的对音。"（《译余偶拾》，第155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

说占优势。因为，后来的蒙古族无论从起源的地域和语言看，都同东胡、室韦、契丹比较有渊源的关系。

匈奴从事畜牧业，经营游牧经济，“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①]为了取得“絮、缯、酒、米、食物”，匈奴与黄河流域的中原农业地区有密切的联系，而汉朝则欲得匈奴的马匹以为耕战之用。匈奴欲得汉朝的丝绢还不仅是为了满足其统治者的需要，他们似乎充当了中西丝绸贸易的中介。如前章所述，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及中亚等地发现的中国丝绸及丝织品，是经过匈奴贩运去的。西伯利亚各地所受到的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显然也是通过匈奴传播的。

匈奴社会的发展水平比黄河流域地区要落后。当中原地区进入了封建社会时，匈奴中还保存着很多氏族社会的残余，奴隶制并不发达。故有许多中原农民经常逃入匈奴，以避封建主的严重压迫。所谓“匈奴中乐”，就是意味着游牧部落中的劳役和压迫都较轻。不但农民如此，而且封建主及其知识分子也有人因不得意而降附于匈奴。他们为匈奴首领出谋划策，对匈奴社会的发展是有帮助的。匈奴的文化发展以及匈奴的强盛都离不开中原王朝的影响。

匈奴崛起时，左右都有强邻。直到秦朝时，还是“东胡强而月氏盛”。东胡，分布于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月氏[②]则为匈奴西边大国，地处于河西走廊。近人研究，月氏人的分布范围可能西起阿尔泰山，东达甘肃、宁夏，以至河套。又有乌孙部，分布于敦煌一带，为匈奴西边小国。匈奴之北贝加尔湖以西以南则为丁零部，丁零之西叶尼塞河上游为坚昆部。乌孙西北为呼揭部。巴尔喀什湖

① 《史记·匈奴列传》。

② 月氏的月字，本即肉字，古音读作gneu，与禺（gov）、牛（nv）音皆相近。故《管子》“揆度篇”、“轻重篇甲”、“轻重篇乙”写作“禺氏”，“地数篇”写作“牛氏”。《周书·王会篇》亦写作“禺氏”，“伊尹朝献篇”写作“月氏”，《穆天子传》写作“禺知”，汉代以后写作“月氏”或“月支”，皆为月氏之异译。俗写作月者，误。外国作者根据误写译为Yue-chi，已习用，难以纠正。

以南的伊犁河流域则为塞人(萨喀人)[1]的游牧部落。所有这些部落,都与匈奴不相统属。匈奴在强大起来以前,甚至是屈服于月氏的。匈奴单于冒顿在即位以前还曾被送往月氏做人质。匈奴之强大,即自冒顿即位后始。

冒顿大约于公元前209年杀父自立为单于。[2]随即出兵击溃东胡。之后,又向西击走月氏。这不过是把月氏打败,尚未将其消灭。故其西边仍与月氏、氐、羌相接。北边则征服了丁零、坚昆等部,而东与汉朝为敌。匈奴之完全击破月氏,是在公元前176年左右。这一年(《通鉴》系之汉文帝前六年),匈奴单于给汉朝写信说:“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3]这表明,匈奴的势力已经达到了塔里木盆地。

不久,冒顿单于死,其子稽粥继立,号为老上单于(前174~前161年)。《史记·大宛列传》讲:“(冒顿)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4]则是月氏之灭亡,还在老上单于时,也即是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德米特里在位的时期。

经过上述一系列的打击以后,月氏完全崩溃。其部落便向西迁徙,第一站是迁到伊犁河流域。这些狼狈如丧家之犬的亡命者,虽然被匈奴打得溃不成军,但其拼命争取生存的心情,却使得他们在伊犁河流域的塞人面前表现得势不可挡。后者竟被月氏驱逐。史书上讲:“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

① 萨喀人,在《史记》、《汉书》中译为“塞”,这是张骞根据伊朗语译过来的。至于希腊人之所谓“斯基泰”,则非张骞之所知。

②《史记·匈奴列传》。

③《史记·匈奴列传》。

④ 前已提到,斯基泰人当中也有这种习俗。西诺尔教授说斯基泰人当中的这些习俗,可以同欧亚草原许多游牧部落一直保存至近代的习俗相比较,具有有趣的学术价值。中国的这类习俗很可能是由欧亚草原传入的。

氏居其地。”[1]“（乌孙国）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悬度，大月氏居其地”。[2]这部分西迁的月氏人，史称大月氏。而其余的一小部分不能远迁者，退处南山，与羌人杂居，被称为小月氏。大月氏西迁伊犁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174年至公元前160年，即匈奴老上单于在位的时期。

关于塞人南迁的情况，汉文史料语焉而不详。斯特拉波著作中提到的萨喀劳卡伊人，一般认为即指这些南迁的塞人。[3]他们南迁时先入罽宾（克什米尔谷地）。然后从那里渐渐扩展到健陀罗地区，最后定居于旁遮普的各小邦之内，如呾叉始罗与马土腊。他们取代了那些地方的邦君。另一些塞人甚至渡过信德沙漠而到了萨老斯托斯（即卡提阿瓦尔）半岛，并且同早已定居于印度西北隅的希腊入侵者一起开辟了一个时代。[4]

原来与月氏人同在敦煌、祁连间的小国乌孙，其首领难兜靡为大月氏所杀。乌孙人失去了自己的牧地，逃奔匈奴。难兜靡之子昆莫，由匈奴单于收养，长大成人。单于仍令昆莫统率乌孙部众。当时大月氏已西迁伊犁河之地，昆莫前往报父仇，击破之。大月氏被逼西走。乌孙便据有伊犁河流域及伊塞克湖周围地区，由一个小部发展成为西域大国。

大月氏被从伊犁河流域驱逐出来的时间大约在匈奴老上单于之末年，即公元前161~前160年。其西徙的路线，史书上只是说他们“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沩水北，为王庭”[5]。这表明，他们是取道费尔干纳盆地而进入索格底亚那的。当时，该地已称为大夏了。月氏人在征服大夏以后，其王庭和根据地仍在阿姆河（沩

①《史记·张骞传》。

②《汉书·西域传》。

③ 见斯毂·柯诺夫《佉卢文铭刻》一书的“历史背景介绍”。

④ 罗旻逊：《巴克特里亚史》，第96页，纽约1969年英文版。

⑤《史记·大宛列传》。

水）以北的索格底亚那地区。

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在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称其国为大夏，这仍然是一个不十分清楚的问题。《大唐西域记》中曾说，塔里木盆地南缘于阗与且末之间的地区为睹货逻故国。据此，王国维提出："大夏一国，明非远夷……故国在且末、于阗间。……大夏之国，自西逾葱岭后，即以音行。……其西徙葱岭以西，盖秦汉间之事"。[①]王国维的意思是说大夏即睹货逻，其西迁的时间在秦汉之间月氏西迁之前，即公元前3世纪中叶，也即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立国的那个时期。而世界各国的学者大多数认为，吐火罗是月氏的族名。

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之遭受游牧人侵袭，并不始于月氏人。早在攸提德谟斯的时代，锡尔河以北的塞种人就经常是王国的威胁。在巴克特里亚强盛的时候，这种威胁还不是致命的。但在其衰弱时，月氏的入侵就导致了这个希腊王国的灭亡。

西诺尔教授认为，在月氏人攻入巴克特里亚时，当地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一是月氏人在这里遇到的可能是一个希腊人统治的王国，即亚力山大帝国的遗留。斯特拉波和其他的希腊史料曾经记载，在公元前141年和公元前128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巴克特里亚的最后一个希腊王赫里奥克里斯亡于一次游牧人的入侵。阿波罗多鲁斯说征服巴克特里亚的是如下的四个部落：亚细部（Asioi），帕西安部（Pasianoi），吐火罗部（Tokharoi）与萨喀劳卡伊部 （Sakaraukai）。如要把希腊的史料同中国的史料进行对比研究，则此四部中必有一部（如吐火罗部）或几部是月氏人。二是当月氏人到达大夏时，他们在那里遇到的可能是萨喀人。这些萨喀人（中国史料称之为塞人）是被月氏人驱逐西走，先于月氏人来到大夏的。最后，西诺尔教授相信，月氏人就是吐火罗人。[②]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三，《西胡考下》。

② 西诺尔：《内亚》，第90页，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1年英文版。

另外，彭佩乌斯·特罗果斯（PompeiusTrogus）说："塞种萨喀劳卡伊部与亚细部夺得了巴克特里亚与索格底亚那。""亚细人成了吐火罗的国王，而萨喀劳卡伊人则败亡了。"这里讲的亚细人也可能是指月氏人，而萨喀劳卡伊人则是指被月氏人驱逐出来的塞人。1949年，伦伯尔受江布尔博物馆的委派，到江布尔北部塔拉斯河两岸进行考察。他特别注意考察了提克—土尔玛斯古址。据说这块地方乃是古代亚细人、阿帕夏克人（Apasiak）和吐火等汇集之地。这些人在公元前2世纪侵入希腊巴克特里亚，终于将其灭亡。①

从这报道似乎可以说，除了南走罽宾人印度的"塞王"部众以外，还有一部分塞人同月氏人先后攻入巴克特里亚。最后，月氏人占了上风，而失败的塞人则又向南走入赫尔曼德湖地区。以后该地就不再称为德兰吉亚那，而改称为萨喀斯坦，即今锡斯坦。以至到中世纪，该地的农民仍被称为塞格人（Sagzi），说明他们是塞人的后裔。

月氏人离开伊犁河流域到达索格底亚那。在那里大约经过二十多年才攻入阿姆河以南的巴克特里亚（大夏）本土。受到月氏人逼迫的巴克特里亚希腊王赫里奥克里斯及其家族，因不愿接受野蛮的游牧人的统治，约于公元前135年撤出巴克特里亚，退到兴都库什山以南。那里有他的同族人在做国王。这时，安息就趁机夺回去一部分巴克特里亚的领土。

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希腊统治者可能是德米特里的一个儿子，也叫攸提德谟斯，可称为攸提德谟斯二世。他统治的地区大约是喀布尔河谷地，在位时间甚短。他可能把一部分领土让给了赫里奥克里斯。赫里奥克里斯在喀布尔地区的统治情况不详，但他的钱币在该地有所发现。他的继承人名叫安提阿勒西达斯

① 弗鲁姆金：《苏联中亚考古》，新疆博物馆1981年印本。

(Antialcidas,其在位年代约为前130~前100年)。此人之后继者则为阿舍比乌斯(Archebius)。

德米特里的另一个儿子是潘特里昂(Panteleon),曾经统治着健陀罗地区。他的即位者可能是阿伽托克里斯(Agathocles)。

德米特里曾派其手下大将和近亲弥兰(Menander)去统治北部印度(包括阿富汗中部,旁遮普、信德、拉其普特那及西北印度诸地)。与前述诸王的情况只能凭钱币来推知不同,弥兰是攸克拉提德斯以后见诸于史料记载的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在印度的史料中称他为密林达(Milinda)。其在位的年代有公元前115~前90年,前155~前130年,前165~前130年诸说。当时印度的希腊人、塞人、安息人及本地各土邦,互相争斗不息,弥兰王把他们统一了起来。弥兰征服了从今卡拉奇到卡奇湾的海岸和卡提阿瓦尔海岸的塞人居地。为了控制通中国的商路他还兼并了罽宾,势力达和阗境外。

弥兰原来不信佛教,后来向那先比丘(Nagasena)询问佛教义理,始皈依了佛法。汉译佛经《那先比丘经》和巴厘文的《弥兰王问经》,就记载了弥兰王问经信佛的故事。此外,在这部经书当中也谈到了当时的奢羯罗(今巴基斯坦西北的锡亚耳科特)的情况:"其国中外安稳,人民皆善。其城四方,皆复道行。诸城门皆雕文刻镂。宫中妇女,各有处所。诸街市里,罗列成行。官道广大,列肆成行。象、马、车、步,男女炽盛。乘门、道人(指佛教僧侣)、亲戚、工师、细民及诸小国,皆多高明(罗灵逊的英译文作:街道上充满了大象、马、车辆与步行的过路者,各色人等拥挤于其中——包括婆罗门、贵族、手艺人、仆役等)。人民被服,五色焜煌,妇女傅白,皆著珠环。国土高燥,珍宝众多,四方贾客,买卖皆以金钱。五谷丰贱,家有储蓄。市边罗卖诸美羹饭,饥即得食。渴饮葡萄杂酒,乐不可言。"[①]从这段描写可以看到,当时奢羯罗市场繁荣,商

① 《大藏经》,频伽精舍本,杂部,藏八。

业兴盛。商人们来自四面八方，他们贩来中国、中亚、西亚以及印度的各种物品，以做交易。

罗灵逊根据《那先比丘经》的巴厘文译本译作："这里的商店里出卖贝拿勒斯的布匹和各种各样的衣服。市场上摆着各种花卉与香料，芬芳扑鼻。"又说："奢羯罗坐落在一个美好的地区，这里水利丰富，多山，有很多的花园、果树以及小树林与湖泊。有人工修造的大储水池。是一个多水多山多树木的天堂。"所有这些都说明，在弥兰的统治时期，印度希腊王国的经济文化得到很大的发展。弥兰不但见于印度的史料，就是希腊罗马的历史家也提到了他。

弥兰王不仅自己虔信佛教，晚年成了罗汉，而且在他统治的境内支持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在弥兰王即位之前二十年（前185年），印度孔雀王朝最后一个国王被其部将普沙密多罗·巽加（约前185~前151年）所推翻。在摩揭陀建立了巽加王朝。新王是一个婆罗门，他为了恢复其祖先的婆罗门教，便大破佛教，使他的王国（恒河中、下游）成为恢复婆罗门教的一个中心。据《毗婆沙论》的记载，他毁佛灭法，从鸡园寺开始，经摩偷罗，直到迦湿弥罗。他一到迦湿弥罗，就毁佛寺五百余所，佛教经典亦遭焚毁。大批佛教徒被赶出中印度。这可以说是婆罗门的反动。由于巽加王朝的以上宗教政策，遂使佛教和佛教徒向旁遮普和印度西北部其他地区发展。这里的佛教势力大增。佛教竭力发展希腊人信教。又因弥兰王的保护和提倡，故当地信仰佛教的人越来越多。旁遮普及健陀罗等地遂成为当时佛教的中心。

弥兰王死后，其王国陷于分裂。旁遮普地区各小邦各自为政。希腊人的政权转到了安息人的手中。巴克特里亚本土则落入到月氏人的统治之下。印度的传说把他们称为吐火罗人。他们信仰了佛教，把自己的国家建立成为佛教国。希腊人的政治影响很快就消失了。

第二节 张骞通西域与李广利伐大宛

匈奴既东破东胡，西逐月氏，南联诸羌，北服丁零、坚昆，而且还统治了西域，所以势力强大，一时为盛。作为中国北部的一个游牧民族，匈奴的经济文化是与黄河流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匈奴人"尚乐关市"，"好汉缯絮食物"。为了取得这些东西，一般是通过关市的交易。如不得交易，就通过掠夺和战争。总之，是为了解决游牧民的生活需要。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著作中所说的："对野蛮的征服民族说来，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在原始生产方式下，人口的增长需要有愈来愈多的生产资料，因而这种形式（指战争）也就愈来愈广泛地利用着。"[①]在汉朝的时候，只要允许匈奴"通关梁，交有无"，则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内附，往来长城下"。[②]否则，匈奴就要抢劫边郡，杀掠吏民，给汉朝造成严重的威胁。

汉朝初看的败个皇帝，如市、惠、文、景帝，由于政治经济实力不足，对于匈奴的侵扰威胁是无法进行反击的。只有到汉武帝的时候，国家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生产得到发展，财富有了大量积累以后，才决定对匈奴进行战争。然而即使在这时，汉朝也很想找一个同盟者来共同对付匈奴。当时汉朝从投降的匈奴人了解到以前匈奴破月氏和月氏西迁等情况，又风闻月氏怨根，想与人联合共击匈奴。因此，汉武帝就招募自愿出使月氏的人。汉中人张骞应募，于公元前138年（即月氏征服巴克特里亚前三年）带领堂邑氏胡奴甘父等一百多人，取道陇西前往。但在经过匈奴地区时被拘留，送往单于处。单于说："月氏在吾北（应是西），汉何以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② 《盐铁论》"和亲"卷四八。

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并赐予张骞一女为妻，后生子。看起来，匈奴单于并不知道他出使月氏的使命——灭胡。否则，是决不会轻饶他的。匈奴之不让张骞通使月氏，也许是为了垄断中国同中亚、西亚的丝绸贸易，防止双方直接交通。

张骞滞留匈奴达十多年之久，最后才找到一个机会逃走。他仍带着自己的一帮人向西走了数十日才到达大宛（费尔干纳）。[①]大宛人早就听说汉朝地方富有，想同汉朝建立直接联系，未达目的。现在见到了汉朝的使者张骞非常高兴。他们问张骞要到哪里去。张骞说：“我本来是奉汉朝的命令出使月氏，但中途被匈奴拘留。后来找个机会才逃了出来。我希望大宛王能派人送我去。我如果能到达月氏，回到汉朝，汉朝一定会以大量的财宝赠送给大宛国王。”大宛王同意，便派了向导和翻译人员把张骞送到康居。然后，康居把他送到了大月氏。当时大月氏的首领已为匈奴所杀，其太子继立为王。[②]原来大月氏被乌孙驱逐西走后，本居于阿姆河以北的索格底亚那。张骞来时他们已征服了阿姆河以南的巴克特里亚（大夏）。该地肥饶富庶，社会安定。月氏人来此后，可能渐渐从游牧转为定居，从事农业，乐得其所，已无意再东返向匈奴报复。因此，张骞没有达到他出使的目的。

其实，在张骞于公元前138年离开汉朝时，月氏人还没有攻入大夏。只是在那之后三年（前135年）月氏人才灭掉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王国。如果张骞在那以前来到月氏处，汉与月氏的联盟是完全可能实现的。但张骞被匈奴拘留耽误了十多年的时间，这时月

① 在阿赫门王朝及马其顿亚力山大的势力发展到中亚的时期，历史上都不大提及费尔干纳。中国史书中关于大宛的记载，是费尔干纳历史的最早的史料。巴尔托里德认为，尽管费尔干纳与希腊人征服的地方为近邻，但并未接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所以费尔干纳的金银器和铁器皆自中国输入。设若费尔干纳原属希腊统治，则这未必是可能的（《巴尔托里德文集》，第3卷，第2分册，第455页以后）。

② 《汉书·张骞传》作“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夫人为王”。但其所根据的《史记·大宛列传》作“立其太子为王”。今从《史记》。

氏人不但已安于新地，而且觉得汉朝太远，对匈奴的仇恨也已淡漠了，致使张骞不得要领而归。

张骞经历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地，并就近了解了其周围五六个国家的情况，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然后沿着南山（昆仑山），穿过羌族地区返回。在路上他又被匈奴拘捕。一年多以后乘匈奴内乱之机，张骞才同胡妻及堂邑父一起逃回汉朝。这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情况。

汉朝既联合月氏不成，又想联合乌孙。张骞建议说，乌孙已强大，不愿再服从匈奴。现在河西走廊原匈奴浑邪王之地已为汉有，空旷无人。如以财帛招引乌孙东返居之，则是断匈奴右臂。既联乌孙，则其西的大夏之属都可招徕为外臣。汉武帝听从他的意见，就于公元前119年拜张骞为中郎将，率领三百人的使团，每人备马二匹，带牛羊数万以及价值数千万的币帛，前往乌孙。张骞劝乌孙王东返，但乌孙因内乱分裂未能满足汉朝的要求，仅派使者数十人、马数十匹随张骞来汉朝表示答谢，并了解汉朝的情况。这次张骞在乌孙时还派了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印度）等国。在张骞回汉一年多以后，那些国家都派了自己的人与副使们一起来到汉朝报聘。从此，中亚等地就同中国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和交通。

张骞两次出使虽然都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其意义却是重大的。直到今天，“张骞通西域”仍然是人所熟知的千古佳话。从中亚史的角度看，它的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

首先，它是中国同中亚以至同西方的交通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的标志。在这以前，中国同西方的交通和贸易显然是存在的。中国的丝绸也早已行销到了中亚、西亚、西伯利亚和印度。但这种贸易都是转手贸易，由许多民族与国家辗转贩运才得以实现。其所以如此，是由于中国尚未统一，由于匈奴、月氏等民族的割据阻隔。自汉武帝击破匈奴，打通河西走廊，才开通了与西域的商路。

这也就为中国同西方开展直接的交通创造了条件。张骞通西域，后来被人们说成是初次开辟了丝绸之路，或者说是“发展丝绸贸易的开端”①，或说成是打开了中西交通。但实际上丝绸之路或中西交通是早就存在的。这条商路得以畅通是汉武帝实现了全国的统一而促成的。张骞通西域只是一个历史标志而已，但这一标志已经彪炳于史册了。

其次，张骞通西域显然也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发展到了新水平的标志。在这以前，中国对中亚和西方是几乎不了解的，或者说了解是很模糊的。同样，西方（包括希腊、罗马）对帕米尔以东的中国也是不了解的。张骞通西域是内地人亲自了解西域和中亚之始。随后又有中亚各国使者来汉朝报聘，具体地了解了中国。张骞通西域，带回了苜蓿、葡萄等农作物，增加了内地的农作物品种。虽然不能说其他许多原产于西域的作物都是张骞带回的，但张骞的确是一个开端。还有西域的文字、宗教、科学、艺术也逐渐传到中国。中国的文化也进一步西传。

第三，张骞到中亚后调查了解了各地的情况，回来后给汉朝的报告，至今还是关于这个时期中亚历史的重要史料。又由于其他方面（如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缺乏关于这个时期中亚的资料，张骞的报道就显得更为珍贵。《史记·大宛列传》称：“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后来班固又把《史记》中采录的张骞的报告编入《汉书·西域传》。下面就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以及其他方面的材料来看看当时中亚各国的情况。

大宛（即费尔干纳②）：在波斯帝国、亚力山大帝国和希腊巴克特里亚国（大夏）时期，大宛都未被征服，而是一个独立的国

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第2分册，第379~380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② 近人 E.Pulleybland 对于大宛即费尔干纳之说提出异议，认为大宛应指 Sughd（粟特）。方豪说：“西域人称希腊为yavan，大宛犹言大希腊也。”

家。据《汉书·西域传》讲，大宛约有户六万，人口三十万，兵员六万。首都为贵山城，此据《汉书·西域传》。《史记·大宛列传》未提此城。《乌兹别克共和国通史》以为贵山城即郁成，非是。因《史记》提到："贰师将军与哆、始成等计：'至郁成尚不能举，况至其王都乎？'"由此可见，郁成与大宛王都，明非一城。其他小城七十多座。大宛的人民，定居，从事农业。种植的粮食作物有稻、麦。特别是盛产葡萄、苜蓿。当地人好喝酒，用葡萄酿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至数十岁不败"。而马则喜吃苜蓿。这里的马，品种优良，而且数量多。《史记·乐书》云："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前苏联考古工作者在费尔干纳距奥什八公里的艾里马奇山，发现许多岩画，多属马的素描。另外在阿拉湾也发现绘马的岩画。那些马凿刻在岩壁上，身上密布小圆点，使人想起传说中的大宛"汗血马"。大宛的城镇很多，说明它是商道经过之地。早在阿赫门王朝时期，这里就已有通波斯的大道。大宛人从事各种手工业，以其生产的产品交换中国的丝绸及其他货物。所有这些都得到了考古资料的证明。

花剌子模：前苏联考古学家托尔斯托夫认为汉文史料中的康居即指花剌子模。其理由是：古典作者（指希腊、罗马的历史家）与古波斯传说都只提到花剌子模，而不知有康居；中国史料则只知有康居而未提花剌子模；而本地传说（例如《阿维斯塔》）则既知有康居，又知有花剌子模。故前苏联考古学界一贯把花剌子模的物质文化称为康居文化。但这种看法后来又被大多数学者所否定。事实上，托尔斯托夫的这种论点，是不能成立的。首先，中国古代史料并非没有提到花剌子模。如《史记·大宛列传》中提到的驩潜，其实就是花剌子模的译音。[1]康居，位于锡尔河中、下游的迤北地区，古典作者由于相距遥远，不了解，故对该地区未之提及。

[1] 参看：冯承钧《西域地名》第52页；白鸟库吉《康居粟特考》，绪言（第5页）；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考》第300页，《中亚古国花剌子模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

至于《阿维斯塔》，则整理成书甚晚，安知没有加入后人的知识？

处在阿姆河下游及咸海沿岸地带的花剌子模，有最古老的文化。该地的考古发掘工作是从1937年开始的，自始至终主其事者就是托尔斯托夫，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一度中辍。在花剌子模，曾发掘出大量的古代灌溉系统遗迹（可能是公元前第一千纪中期的），表明当年这里有过一个中央集权的强大政权，因此灌溉发达，管理良好。由于铁的使用和大量利用奴隶劳动，使用了新的技术，遂给灌溉工程以有力的推动。后来发生政治动乱，削弱了中央政权，使灌溉系统遭到破坏。

托尔斯托夫认为，花剌子模在阿赫门王朝后期和前贵霜帝国时期，城市、灌溉、艺术、工艺都很发达。花剌子模的城市，典型的有1938~1939年发掘的詹巴斯·卡拉城，城呈长方形，面积为200×170米，有双层围墙，墙高10~11米，每层厚1~1.3米。外墙有一排密布的箭孔，三孔一组。入城门后，要迂回曲折五次始能入城。内层城墙亦有箭孔。城内有一条大街，将城分隔为二区，每区约有二百个房间。[①]又发现一城，名为死羊城，城内发现许多文物，属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世纪。花剌子模发现的钱币，未铸国王之名。据研究，当地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已开始铸币。早期的花剌子模钱币，甚至在乌拉尔地区也有发现，说明同那里有贸易联系。花剌子模铸币的技术已很高，接受了大夏的影响。

康居：《史记·大宛列传》说：“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大月氏同俗。”按照这里所说的方位，康居应当是在锡尔河中、下游迤北的草原地带。前苏联的一些学者认为，康居乃是一个庞大的游牧帝国。另一些学者则说，康居只是锡尔河中游地区游牧民的松散联邦。与花剌子模的定居农业居民不同，康居是行国。康居人是游牧者，与月氏人同俗。康居首领有冬夏牧场。《汉书·西

① 蒙盖特：《苏联考古学》，第237~238页，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

域传》讲其冬居乐越匿地，夏居蕃内。《史记》说康居“控弦者八九万人”。《汉书》材料的时间较《史记》晚，故说康居有户十二万，人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康居可能与匈奴有亲族关系。他们“东羁事匈奴”，不过其势力也可能达到了锡尔河以南的一些地区。

大益：丁谦说大益指阿拉伯人，张星烺则说是指巴达赫善之大夏(Tajiks)民族，皆不可信。我意应即希罗多德《历史》中提到的达欧伊人，或《阿维斯塔》经提到的达赫人。他们分布于里海以东，与花剌子模接近。故在《史记》中，大益与驩潜并提。该部首领阿尔撒西斯曾攻入帕尔提亚，建立安息王朝。这时，大约还存在一个独立的达赫部，故称小国。

安息：实际上统治了当时整个伊朗、两河流域与亚美尼亚。张骞的报告说，安息人定居，从事农业，种植稻麦，以葡萄酿酒。安息城内大小城邑数百座，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安息地方的人经商用车及船，到邻国贩卖，达数千里。史书上讲，其钱币为白银铸就，一面铸国王头像。这与考古发现的安息钱一样。张骞提到安息的书写工具“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塞克斯说这是指用羊皮纸(Parchment)写字。这种羊皮纸产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帕加马，后传入欧洲，在中世纪普遍使用。这时，安息的国王是密斯拉德提斯二世(Mithradates Ⅱ，前124~前88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乌孙时，曾派遣副使去安息，是这位国王接待了汉朝的使者。据张骞的报告说：“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距其都城数千里，中间经过数十座城才到。在汉朝使者返回时，安息也派了使者随同来汉朝观光，并且以大鸟卵和犁轩善眩人献于汉朝。这里的所谓大鸟卵，即鸵鸟蛋，可能是从阿拉伯沙漠中得到的。[①]善眩人就是会耍魔术的人。这也是关于中国同伊朗最早发生直接关系的历

① 塞克斯：《波斯史》，第1卷，第339页，伦敦1951年英文版。

史记载。

大月氏：张骞到西域时，大月氏人虽然已经征服了大夏（巴克特里亚），但仍有一部分居于沩水（阿姆河）之北。其首府为监氏城，似在巴里黑，即古代的扎里亚斯普。杨宪益以为即昆都士。[①]史书上讲其有户十万，人口四十万，胜兵十万人。其地出产独峰骆驼，风俗习惯与安息同。张骞在大夏的时候，见到邛竹杖、蜀布。问他们是从哪里得到的，大夏国人说是他们的商人从印度贩卖来的。这说明大夏同印度有密切的经济贸易关系。上述那类四川货运到印度的途径，当时人估计是从陆路，但也可能是从海路运去的。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看，当时中国同印度的海上交通很有可能已经开通。[②]后来左思在《蜀都赋》里也说："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但夏鼐认为，张骞在大夏所看到的由身毒运购来的"邛竹杖、黍布"，是否是从四川运来，是颇成问题的。[③]印度河三角洲以及卡提瓦尔半岛，都曾经是大夏人掌握的出海口，海上的贸易也很频繁。张骞的报告也说："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由于汉朝取西边的道路通大夏有羌胡的阻隔，所以以后花了很大的力量去开辟西南的通路，但始终没有成功。

乌孙：一般认为分布于伊塞克湖周围到伊犁河流域之地。乌孙是中国的一个部族，但其据有的地域则达到了今新疆以外的中亚地区。乌孙与月氏原来都居于河西走廊，而伊塞克湖与伊犁河之地则原为塞种（萨喀人）所据。在塞种与月氏被驱逐以后，其地

① 监氏城，我以为即巴里黑。法国人沙畹说其地位应在巴达赫善地域中寻之，但又没有说明具体地点（见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所收沙畹：《大月氏都城考》）。兹不取。

② 参看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夏德与柔克义在其合著的《赵汝适〈诸蕃志〉译注》一书的绪论中说："中国同印度与西方到公元初年时还没有海上关系。"这种说法是有疑问的。（见赵汝适《诸蕃志》英译本，第5页，圣彼得堡1912年版）并参看贺昌群译羽溪了谛著《西域之佛教》，第31–32页。

③ 《考古》1965年，第7期。

遂由乌孙占据。

前苏联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历来不承认中国史料的记载，认为月氏与乌孙都是中亚原有的部族，不是从甘肃河西走廊迁去的。他们在伊塞克湖地区和七河流域进行过广泛的考古工作，发掘了大量据说是属于乌孙的墓葬。他们往往将乌孙同萨喀不加区分，称为“萨喀—乌孙文化的墓葬”、“萨喀—乌孙文化”。他们研究认为，乌孙人是属于欧罗巴型的人种，乌孙同康居可能是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支的民族。国外有许多学者也同他们一样，把伊赛多涅斯人看成是乌孙的前身。前苏联考古学家伯恩施坦即认为，天山是萨喀人和乌孙人的摇篮。天山地区的萨喀人主要是伊赛多涅斯人（乌孙人的前身）。斯特拉波和托勒密所谓的亚克萨尔特河（锡尔河）的萨喀人相当于波斯贝希斯顿石刻铭文中的豪玛瓦尔格·萨喀人（牧地塞人），即包括天山萨喀，费尔干纳萨喀和真正的亚克萨尔特萨喀人。亚克萨尔特萨喀联盟解体以后，便产生了乌孙、贵霜·吐火罗、康居。故乌孙人保存了较多的萨喀人联盟的传统。伯恩施坦还认为，伊犁河流域、土尔根、伊塞克湖、塔尔加尔和额尔齐斯河一带，曾经是伊赛多涅斯人即乌孙人的中心，康居的中心则在锡尔河。总之，他们认为，萨喀文化和乌孙文化是一种统一的萨喀—乌孙文化的两个相续阶段。乌孙文化是萨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但是，就发掘出来的大量墓葬看，要区分哪些是属于乌孙的，哪些是属于萨喀的，这是很困难的。实际的情况是，不同民族的和不同时期的墓葬往往混淆不清。前苏联的学者们并没有用来确定乌孙墓葬的确凿证据，特别是缺乏确认其为乌孙墓的铭文材料。近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新疆也对乌孙墓进行了发掘，已经发表了一些发掘报告。至今仍不能否认乌孙是从河西走廊迁到中亚的一个民族。

奄蔡：在康居西北，也是游牧民族。西方作者认为即是古典著作中的奥尔西人（Aorsi），又认为即后来的阿兰聊。巴尔托里德说

奄蔡人是分布在咸海与里海一带。由于该部僻处西北太远，汉朝与之似无直接的接触，故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

另外，《汉书·西域传》中还提到有中亚的几个地区，不见于《史记·大宛列传》所采录的张骞的报告，是根据后来的材料编写的。它们是：

罽宾：一般认为是克什米尔，也有的认为是指健陀罗一带。据记载："罽宾地平温和。"其人从事农业，种植五谷、葡萄和各种果树，且生长苜蓿和各种草木、珍贵的木材（如檀、槐、梓）以及竹漆等。手工业也很发达，能织罽、刺绣、雕刻、建筑，冶炼金、银、铜、锡，铸造器物。人民也经商，有商业城镇和市场。货币有金币和银币。币上正面铸有人像，另一面则为骑马形，为巴克特里亚希腊王攸克拉提德斯的钱币。罽宾出产的牲畜有封牛、水牛、大象、大狗、沐猴等。还出产珠玑、琥珀、琉璃等。据说塞种被月氏驱逐后，南迁到罽宾。其首领夺得当地政权自立为国王。此外，塞种还迁到休循、捐毒等地，分为许多小国。据希腊、罗马和印度方面的记载，塞种还进一步迁到了印度。罽宾地区在公元前2~前1世纪间，为安息、塞种所共有。根据近代发现的当地的钱币，我们已能考知当时罽宾诸王之名号。如曾经统治过罽宾的安息小王名Orthagna，即《汉书》提到的乌头劳。其后的王为Gondophar。杨宪益说此人即阴末处。

无雷：在今帕米尔地区。户五千，人口三万一千，胜兵八千人。西与大月氏（大夏）相接。人民穿的衣服与乌孙相似。

《史记》、《汉书》所记帕米尔地区诸国居民多为塞种。前苏联考古家们也认为塞种是帕米尔部族形成中的一个基本成分。

难兜：户五千，人口一万三千，胜兵八千人。在罽宾东北，印度河上游，属于罽宾。人民种植五谷、葡萄诸果。有银、铜、铁，制造兵器。

其他不太主要的就不再一一列举了。所有中亚各地的种族、

语言、文化都多相近。"其人皆深眼,多须髯","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①]

汉武帝对匈奴的大规模反击,是在公元前134年(即大月氏灭大夏之次年)以后开始的。在这过程中,一方面派张骞出使月氏和乌孙,另一方面多次出兵攻打匈奴。经过30年的时间先后打通了河西走廊,占领浑邪王故地,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移民实边,修驿站,置亭障,立烽火台,通渠开垦,加强警备,以保卫中西商道。而匈奴则愈益向西北退却,迁到外蒙,对内地的侵犯逐渐减少。

公元前117年霍去病去世以后,汉朝很久未再北击匈奴。张骞的出使乌孙,使汉朝同中亚的交通完全打通,同大夏、安息也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在这以后,汉朝和中亚各地相互间的使节往来更加频繁。汉朝不但派使者到了中亚,而且也到了黎轩[②]、条枝[③]、身毒等国。当时,"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意为一批)数百人,少者百余人"。[④]一般一年中出使的多者十多批,少者五六批。走得远的要八九年才能返回,走得近的也要几年才能回。而中亚及其以西各国的来使也很多。史称:"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天马多(指西域马),外国使来众。"这些人来中国主要为了经商,他们"善市贾,争分铢"。而打着出使的旗号从中国去西域的人,也并不都是由政府正式派遣的外交人员。或者说主要是商人

① 《史记·大宛列传》。

② 《史记·大宛列传》讲,安息之"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塞克斯著的《波斯史》所谓黎轩指希尔克尼亚(即里海东南的阿斯特拉巴德),就是根据这一句话,因其地在帕尔提亚(安息)之北。另一标点法,以黎轩下属为句,则其地与条枝都在安息之西数千里。冯承钧《西域地名》以为或是"泛指希腊人抑罗马人,殖民诸地",或为"今亚力山大城名之对音"。而法国学者鲍梯(Pauthier)则以为指塞琉古王国;爱德京斯(J.Edkins)谓指罗马帝国或东罗马帝国,则只是时间先后的不同,但都在西亚叙利亚之地。

③ 冯承钧《西域地名》以条枝为Irak或Syria,另参看吴其昱《条枝新考》载于Acteadu X X IXe Congres International les Orientalistes(1973)section Chine Ancienne,Paris1977.)

④ 《史记·大宛列传》。

和企图效法张骞而致富贵的人。

张骞因出使有功，带回关于中亚、西亚情况的报告而使汉武帝惊奇，被封为博望侯而富贵以后，许多官员士卒都争着上书，讲外国的珍奇异闻，要求出使。汉武帝当时想，西域遥远，一般人都不愿意去。现在既然有人愿去，也就一概予以批准。凡是应募前去的人，都不考察他们的出身经历，一概发给证书，配备人员，令其前往。汉朝时，商人社会地位低，被贱视，所以这种人也多有去的。再就是贫苦农民。他们利用国家配给的货物，到中亚各地去出卖以求发财。来回于这条漫长的丝绸之路上，贸易致富的人当然不乏其人。这就更加吸引了众多的人从事这种活动。同时政府也以抽取关税、罚款、赎罪金等方式得到巨大收入。

以后，有曾经出使过中亚的人报告汉武帝，说大宛有好马，藏在贰师城（应即今奥什，或作鄂什），不让汉朝使者看。汉武帝本来就喜爱收集、饲养良种马匹。他在听到这个报告后，就派遣一个名叫车令的人携带黄金千两和金马一只，去交换贰师城的好马。但大宛拒绝了汉朝的要求。车令感到回去难以交代，就出言不逊，最后毁掉所带的金马返回。大宛在车令走后，下令其东边的郁成[1]王，将车令拦阻杀害，并夺其财物。本来，如不杀死汉使，可能没有事。现在汉朝的正式使臣被杀的消息传来，汉武帝大怒，决心出兵伐大宛。

被任命为讨伐大宛的军队统帅是李广利，其任务是到贰师城取马，故其称号为“贰师将军”。他率领的军队一部分是从属国征集的六千骑兵，另外还从内地征集了数万人从军。以赵始成为军正，王恢为导军，李哆为校尉，于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出发。

汉朝军队向西域前进，由于沿路多戈壁沙漠，而且遥远，粮食供应不上，经过许多困难才到达大宛东边的郁成。但这时只剩下

① 郁成，应为Uzkend的对音，即今乌兹根，在奥什的东北。

不到数千人了，而且都饥饿疲惫，难以为战，故在郁成被击败。李广利与李哆、赵始成等研究，决定班师。从出发时起，经过了两年的时间，才回到敦煌。汉武帝得知后大为震怒，下令不准东返，"敢进玉门关者斩"。又重新征集大军六万人，并备办牛十万，马三万多匹及驴、骡、骆驼数万，多带粮食、兵器、弓弩，再度伐大宛。

这次因为兵多、粮足，比较顺利地到达了大宛。大宛军前来抵抗，被汉军击败。李广利率军围其首都，攻之四十余日。破其外城，内城的大宛贵族们共同商议，杀死国王毋寡（moga），将其首级献给汉军，表示只要汉军停止攻城，就将好马献出听汉朝挑选。这时，李广利得知城内储备的粮食还很多，而且有汉族人教他们打井汲水，一时不易攻破，又有康居随时出兵来救大宛。鉴于这些情况，汉军就答应了大宛的要求。汉朝立大宛的贵族昧蔡为国王，大宛让汉军挑选几十匹好马和一般的牝马三千匹，结盟罢兵。汉军班师返回。

两次伐大宛，共花了四年的时间。

在汉军撤回一年多以后，汉朝立的宛王昧蔡又被该国贵族所杀。前王毋寡的兄弟蝉封被拥立为宛王，仍派其子为质于汉。汉朝派使者赂赐之。同时，还派出使者十多批到大宛以西各国，宣传汉朝伐宛之事，并求取珍奇异物。在轮台、渠犁等地兴屯田，经常驻有屯田兵数百人，置使者护田积粟，以供给出使外国人员的粮食。

对于李广利伐大宛这一历史事件，无论在当时和后代，持批评态度的人不少。有的认为汉武帝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仅获骏马三十匹，劳民伤财，天下扰乱，实为得不偿失。另一种看法以为，这一事件对于开通西域，服外国，困匈奴和保护中西交通有好处。清朝学者徐松即以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为汉通西域之年。[①]因为它对西域的影响是"西域震惧，多遣使来

① 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

贡献”。[1]另一方面，“大宛既破，外国振恐，上欲遂困匈奴”[2]。汉朝对西域的统治便渐渐巩固起来，终于导致西域都护的建立。随着汉朝大一统局面的巩固和发展，中亚的历史就不再仅仅是来自西方的征服者的历史了。由于中西交通的畅通，丝绸之路沿线贸易的频繁和发展，中亚同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中亚的历史此后也就更多地同中国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了。

第三节　汉朝西域都护的建立

汉武帝伐大宛、通西域的时期，也是汉朝的声威达于极盛的时期。这时，匈奴已受到多次的打击，退处外蒙古。史称："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但匈奴单于仍经常信用一些汉族人为他们出谋划策，发展自己的国家和决定对汉朝的政策。如汉族人赵信，就出谋让匈奴派使者来汉朝请求改善关系并和亲。另一方面，则“远徙北方，休养士马，习射猎”，不断招引汉族人投附匈奴，以发展自己的实力。汉朝在伐大宛之后，威震西域。匈奴单于害怕，就把其所拘留的路充国等不愿降附匈奴的汉朝使者通通送回，并说："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也。”而那些降附了匈奴的人则仍然在那里为匈奴效力。例如，有一个名叫卫律的人，其父为长水地方的匈奴族，他本人生长汉地，已经汉化。他同协律都尉李延年是好朋友。李延年曾推荐他出使于匈奴。卫律出使回来时，李延年得罪被处死。卫律害怕株连自己，就逃降匈奴。匈奴很信任他，同他商量国家大事，并任命他为丁零王。

丁零，在匈奴之北，大约分布于贝加尔湖以西到叶尼塞河之地。南至色楞格河，北至于萨彦岭以北的米努辛斯克盆地。这一带

---

① 班固：《汉书·西域传》。

② 荀悦：《前汉纪》卷一四。

地方有古老的物质文化遗存。从卡拉苏克文化时期起，就受到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已见前述。以后在12世纪时，这里是斡亦剌惕人（即卫拉特人）的发源地。为此，岑仲勉曾经提出一个假说："卫拉特即卫律。"[①]卫律自称在匈奴"拥众数万，马畜弥山"。[②]岑仲勉说其中一部分乃是中国降俘。这些被俘的汉族人被匈奴当成奴隶使用，对传播汉地文化，发展匈奴的生产，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③]所以说，匈奴同汉族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在匈奴送回汉朝使者路充国等以后，汉朝便采取相应的行动，于公元前100年派苏武等将以前汉朝拘留的匈奴使者也送回去。苏武等到匈奴后，匈奴单于想方设法要使苏武投降，并派卫律前来劝诱，但苏武誓死不屈。单于没有办法，就把苏武送到北海（贝加尔湖）无人处，让其放牧羝羊（公羊），说如羝羊能产羊羔，就让他返回汉朝。苏武亦不为所动。他在北海掘老鼠和草实充饥。五六年后虽得单于弟于靬王救济衣食，但以后于靬王死，其部落迁走，苏武的牛羊被丁零人盗去，重又陷入穷困之中。

公元前99年，汉军出击匈奴。汉将李陵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至浚稽山，被三万匈奴骑兵包围。李陵军寡不敌众，力战南行，未至鞮汗山，弓矢用尽，无法得脱，遂降匈奴。匈奴单于对李陵十分重视，以一女嫁之，并任命他为右校王。

1940年在前苏联阿巴干城以南八公里处，曾发现中国式的瓦顶房屋。瓦当上有隶书铭文"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房屋的中央大厅有七道门，其青铜铺首，呈兽耳、牛角、人面的形状。屋内的一切器物，都是中国或匈奴制造的。前苏联考古者们认为，该屋是李陵的宫殿，因为李陵曾任匈奴叶尼塞地区长

① 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上册，第58–66页。

②《汉书·苏武传》。

③《汉书·匈奴传》。

官。[1]这是不大可靠的说法。岑仲勉认为不如说是卫律。前面提到,卫律是丁零王。李陵管辖的则是坚昆。坚昆在丁零西的叶尼塞河流域。后来坚昆人,传说自己是李陵的后裔。如唐朝安西都护盖嘉运[2]作的《西域记》中就说:“坚昆国人皆赤发绿睛,其有黑发黑睛者,则李陵之后,故其人称是都尉苗裔。”[3]这种传说反映了当地民族与汉族人混血的基本事实。这种混血的过程在很早的古代就开始了。

公元前90年,汉朝派李广利等出击匈奴。李广利率军七万,从五原出塞,击溃前来抵抗的匈奴军于范夫人城。继续追击至郅居水(色楞格河)。渡河以后,与匈奴左贤王、左大将率领的二万骑兵遭遇。合战一日,杀死左大将及大量匈奴军,便还至燕然山。但由于李广利卷入汉朝内部的政争,其妻子均被逮捕,故恐惧不安。而匈奴单于又亲率五万骑兵前来阻击,汉军大乱。李广利便投降了匈奴。单于素来闻知李广利系汉朝大将,便以女嫁其为妻,对他的尊宠超过了卫律。留在汉朝的李广利宗族全被诛灭。

由于汉朝对匈奴的战争几次失利,而匈奴又有很多汉族人的帮助,所以匈奴一时又呈兴盛之状,中亚地区各国也似乎被匈奴威力所慑服。史书上说:“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待之过于汉使。”便是这种表现。

公元前87年,汉武帝死。大将军霍光辅佐他的后继者昭帝和宣帝,保持了国家的强盛。匈奴则在这以后逐渐衰落下去。导致匈奴衰败的因素总起来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内争,二是天灾,三是属部的反抗,四是汉朝的攻击。

贰师将军李广利在投降匈奴后,受到匈奴单于的信任,给以

① 蒙盖特:《苏联考古学》,第150页,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② 法国学者伯希和疑盖嘉运应为汤嘉惠,岑仲勉从其说。

③ 《唐会要》,卷一〇〇。

尊贵的地位，这引起卫律的嫉妒。一年多后，卫律就设计要把李广利除掉。刚好单于的母亲阏氏病了，卫律利用匈奴人崇信祠社的迷信观念，令巫师建议以李广利来祭天。于是匈奴便杀李广利以祠。这件事表面上看起来是卫律同李广利二人的矛盾所引起的，但卫律与阏氏显然是同党，其中可能有着更深的背景，反映了匈奴上层内部的权力斗争。李广利在被杀时骂道："我死必灭匈奴。"随后匈奴各地连降雨雪达数月之久，牲畜冻死饿死，人民中疫病流行，庄稼不熟。匈奴人都以为是李广利作祟。单于恐惧，为李广利建祠庙祭祀。畜牧经济最怕雪灾。大的雪灾不仅会使畜群因吃不到草而饿死，使幼畜无法生长，而且连部落也难于生存。可想而知，这次雪灾对匈奴打击是很大的，对匈奴的兴衰命运也影响很大。

这时，匈奴内部又因单于的继承问题而发生分裂。经过是：狐鹿姑单于有异母弟，为左大都尉，受到匈奴人的拥护。单于母阏氏恐怕此人以后继承单于位，便私自派人将其杀死。左大都尉的胞兄愤怒，不再服从单于。公元前85年，单于病重，遗命立自己的弟弟右谷蠡王为单于。但单于死后，在单于掌权的卫律等与颛渠阏氏合谋，秘不发丧，假托单于的命令，立单于之子左谷蠡王为壶衍鞮单于。这又引起了左贤王、右谷蠡王的不满。二王也不再服从单于。匈奴于是分裂，开始衰落。

这时汉朝实力雄厚，国防巩固，"边郡烽火候望精明"。[1]匈奴无隙可乘，不能相抗。汉朝与匈奴的斗争就转移到西北天山地区。匈奴派日逐王管领西方，并力图占据车师，制服乌孙，统治塔里木盆地。但是，汉朝已经通过和亲关系同乌孙结成了联盟，成为匈奴向西方发展的障碍。匈奴东边的属部乌桓也开始强盛起来，不服从匈奴的统治，还发掘了先单于的坟墓。匈奴无可奈何。

① 《汉书·匈奴传》。

汉昭帝末年（公元前74年），匈奴进攻乌孙，占据车延、恶师。乌孙向汉朝求救。公元前71年，汉朝派五将军，率骑兵十余万出塞，乌孙昆弥则率骑兵五万余从西方入，两方面共二十多万兵夹击匈奴。匈奴闻讯，老弱奔走，赶着牲畜逃遁远方。汉朝五将军少所得。乌孙兵进至右谷蠡王驻地，"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长、将以下三万九千余级，虏马牛羊驴骡橐驼七十余万"。"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于是匈奴遂衰耗"。①

同年冬天，匈奴单于亲自率领数万骑兵进攻乌孙，少有虏获。准备返回，正好遇上大雨大雪，一日雪深数丈，匈奴的士兵、牲畜冻死，能回到匈奴境内的还不到十分之一。于是丁零乘其衰弱从北面进攻，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三国合力杀死匈奴数万人，获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加以饥饿而死者，匈奴民众死去十分之三，牲畜损失一半。匈奴元气大伤。原来统属于匈奴的部落都反叛瓦解，对匈奴进行攻掠抢劫，匈奴无法控制。

公元前68年，匈奴又发生饥荒，人口、牲畜死去十分之六七。从公元前63年起，丁零又连续三年抢掠匈奴，杀略数千人，匈奴也毫无办法。经过这一系列的打击，匈奴遂一蹶不振。

同时，汉朝在西域的势力则日益得到发展。如公元前65年，汉朝派冯奉世持节送大宛诸国客返回西域。正在这时，莎车的呼屠征与旁国共杀其王万年和汉朝的使者奚充国，自立为王，并攻击南道，与那里的小国结盟反叛汉朝。冯奉世告谕诸国国王，征诸国兵五千人，进攻莎车，拔其城，莎车王呼屠征自杀。冯奉世另立一人为莎车王。随后，冯奉世到了大宛。大宛因听到莎车的事，对他特别恭敬。冯奉世得大宛名马象龙而回。

在西域，汉朝同匈奴的斗争也取得了胜利。前面提过的壶衍

①《汉书·匈奴传》。

鞮单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贤王虚闾权渠于公元前68年立为单于。公元前60年，匈奴虚闾权渠单于死，握衍朐鞮单于继立。虚闾权渠单于的儿子稽侯珊因不得继承单于之位，就逃到他的岳父乌禅幕那里。乌禅幕本是乌孙、康居间的小部酋长，是在狐鹿姑单于时期投附于匈奴的。乌禅幕曾娶日逐王先贤掸之姊，居于右地。而日逐王也因单于的继承权问题与握衍朐鞮单于有矛盾，[①]害怕自己被害，便于公元前60年率部降汉。先派人到渠犁报告西域骑都尉郑吉。郑吉征发渠犁、龟兹等地五万人前去把日逐王及其所属1.2万人、小王将十二人迎回，受其降。

汉朝既在与匈奴争夺车师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又降服了匈奴西边日逐王，其在西域的影响占了绝对的优势，于是就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作为中央派出的太守级的官员以统辖西域各地。《汉书·郑吉传》说："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②]这几句话对自张骞以来汉朝政权在西域建立的经过作了一个总结，最主要的是，从此时起汉朝的政令推行到了西域。西域列入了统一的中国版图之内。

关于都护的职责，史书上说是并护南道北道，屯田驻守，推行汉朝的政令，同时督察乌孙、康居诸国动静，向中央报告情况。"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③]

都护管辖的范围，《汉书·西域传》记载得尤其明确。该书不仅综述了当时汉朝了解到的整个西域（包括中亚、西亚）的情况，

① 匈奴狐鹿姑单于在公元前96年继其父且鞮侯单于之位。且鞮侯本来有两子，长子为左贤王，即狐鹿姑单于；次子为左大将。且鞮侯死时，因狐鹿姑不在，左大将立为单于。后来左大将把单于之位让给狐鹿姑，约言死后传位于左大将。狐鹿姑为单于后，以左大将为左贤王，但在后者死后并未让其子先贤掸为左贤王，而是任命他为日逐王。狐鹿姑以自己的儿子为左贤王。日逐王的地位较左贤王的地位为低。

② 《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

③ 《汉书·西域传》。



而且对于各地区之属不属都护管辖，也记载得很明确。据统计，当时西域各地“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配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①]这些属于都护管辖的小国或地区，现在绝大部分在新疆。但也有一部分在中亚。如大宛，从李广利伐其地，立其王以来，已归属于汉朝。都护建立后，即属都护管辖。此外属都护管辖的中亚地区有：无雷（在帕米尔地区），桃槐（葱岭西小国），休循（今外阿赖山脉北克孜耳河谷地，在吉尔吉斯共和国南部）。乌孙也是属都护管辖的，其领地一部分今属新疆，一部分（如巴尔喀什湖以南、伊塞克湖周围）今属中亚。对那些不属都护的国家，《汉书·西域传》也作了说明：“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

汉朝西域都护管辖所及，既然包括了今中亚的一些地区在内，那么西域都护的建立也可以说是中亚史上的重大事件。如果说，张骞通西域，使自古以来中国同中亚、西亚的交通直接开通，并为人民所了解和记入史册，那么，西域都护的建立就使这条交通线更加畅达并得到保护。这当然有利于东西方的丝绸贸易和经济文化交流。《汉书·西域传》曾具体描写当时的交通路线分南北两路。自玉门、阳关出西域，“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这条路看来是在越帕米尔后顺阿姆河而下，经过今阿富汗北部的巴达赫善、巴克特拉（Bactra），然后到安息。另一条路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这条路在过了帕米尔后，先至费尔干纳，然后顺锡尔河而下，走锡尔河以北草原地区的康居、奄蔡（不经过索格底亚那与伊朗），往前是走咸海、里海以北的草原，直去黑海以北的南俄，而达希

③《汉书·西域传》。

腊、罗马。[1]这就使东、西方进一步联系起来了。

巴尔喀什湖以南和西南的伊犁河、楚河、塔拉斯河诸河流域、伊塞克湖周围地带（这时为乌孙所据）以及费尔干纳盆地（大宛），是波斯阿赫门王朝和亚力山大帝国的势力未曾达到过的。这是由历史的和地理的各种因素所决定的。同样也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这个地区在古代曾长期属于中国版图之内。汉朝西域都护建立的意义还在于，在中国政权的管辖下，这些地方同中国内地在政治上和经济、文化上紧密地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正是这些地区统一于中国的基础。

① 康居、奄蔡在锡尔河以北的草原地区，北道去其地不经过索格底亚那与伊朗（安息），明甚。历来的研究者认为南、北路会合后，都经过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与史书记载不符。

第五章
北匈奴与贵霜帝国

第一节　北匈在中亚及其西迁

自日逐王先贤掸降汉，汉朝设立西域都护以后，匈奴握衍朐鞮单于又任命薄胥堂为日逐王，企图与汉朝再争夺西域。但匈奴的内争却使其没有这个力量。

前已提到，故虚闾权渠单于之子稽侯珊因自己不得立为单于而不满，逃归其岳父乌禅幕处。公元前58年，乌桓进攻匈奴东边的姑夕王，掳去许多人。姑夕王就与乌禅幕共立稽侯珊为呼韩邪单于（前58~前31年），并发兵进攻握衍朐鞮单于，至姑且水北。后者求助于其弟右贤王遭拒绝，自杀而死，其部众尽降于呼韩邪单于。

握衍朐鞮单于死后，其手下亲信左大且渠都隆奇逃到右贤王处。呼韩邪单于派人通知右贤贵人，令其杀死右贤王。右贤王不得已，便于同年冬天与都隆奇共拥立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前58~前56年），发兵数万东袭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败走。屠耆单于还，居于单于庭（今乌兰巴托附近）。

明年，乌揭王向屠耆单于诬告说右贤王阴谋自立为乌揭单于。屠耆单于怒杀右贤王父子，后发觉是冤枉。乌揭王恐惧，就反叛屠耆单于，于公元前57年自立为乌揭单于。

右奥鞬王听到乌揭王自立为单于（前57~前56年），也自立为车犁单于。

原来屠耆单于任命先贤掸之兄奥鞬王与乌藉都尉二人各率领骑兵二万屯于东方，以防御呼韩邪单于。这时乌藉都尉也于公元前57年自立为乌藉单于。

以上凡五单于，史称五单于争国。

屠耆单于亲自率兵东击车犁单于，又派都隆奇率兵进攻乌藉单于。车犁、乌藉二单于都被击败，便向西北逃走，与乌揭单于会合，共四万人。乌藉与乌揭放弃单于称号，共同拥戴车犁单于。屠耆单于闻知后，一方面派军四万驻扎在东边防备呼韩邪单于，另一方面亲自率兵四万西向进击车犁单于。车犁单于败，向西北方向逃走。

公元前56年，呼韩邪单于向西进攻屠耆单于。屠耆单于兵败自杀。车犁单于也向呼韩邪单于投降。呼韩邪单于进驻于单于庭。这年冬天，屠耆单于之族弟休旬自立为闰振单于（前56~前54年）。呼韩邪单于之兄左贤王呼屠吾斯亦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

公元前54年，闰振单于率兵进攻郅支单于，兵败，被郅支所杀。郅支单于乘胜进攻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兵败逃走。郅支单于夺占单于庭，以为大本营。

呼韩邪被驱逐后，南迁到内蒙古。其部下劝他归附汉朝。呼韩邪让大臣们进行讨论，也有许多人反对。力主附汉的左伊秩訾王认为，现在汉朝正当强盛之时，乌孙和城郭诸国都已属于汉朝。而匈奴自且鞮侯单于以来，日益削弱，不能复兴。即使勉力维持，也一日不得安宁。现在只有归附汉朝才能安存，否则就有危亡。呼韩邪听从了他的意见，率领部众南迁近塞附汉，并送其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到汉朝为质。同时，郅支单于也以其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到汉朝为质。

至此，呼韩邪部落的一部分南迁附汉，郅支单于的一部分则向西北远徙。同中亚史比较密切的是郅支单于的那一部分。但呼韩邪之率部降汉，影响是很大的。史书上讲，在这以前，“自乌孙以西至安息诸国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轻汉；及呼韩邪朝汉后，咸尊汉矣。”①

呼韩邪单于入居内蒙古以后，漠北之地遂为郅支所据。郅支单于看到呼韩邪单于无力再返回外蒙，就企图向西发展自己的势力。他首先打败了乌孙，随后向北进攻额尔齐斯河上游流域的乌揭部。乌揭投降。他便征集乌揭的军队破降坚昆和丁零。由于乌揭、坚昆、丁零（叶尼塞河流域到贝加尔湖）三部都被郅支所吞并，其势力大增。郅支便以坚昆之地为其驻地。

郅支单于对于汉朝支持呼韩邪单于很不满意，现在既北迁到叶尼塞河流域，觉得离汉朝很远，无所畏惧，就在公元前45年派使者去汉朝要求归还质子。汉朝派遣卫司马谷吉送其质子回。谷吉到郅支单于那里后被杀。

郅支单于杀了汉使谷吉以后自知有罪，又听说呼韩邪单于已逐渐强大起来，恐怕遭到袭击，就打算远走中亚。这时，康居王受困于乌孙，想与郅支单于联合，合兵以制乌孙，于是就派遣使者到坚昆与郅支单于通话。郅支单于这时正处在惶惶不可终日之中，又恨乌孙，现在听说康居要与他联合，就喜出望外，欣然领兵西进。康居也派遣贵人，带着骆驼及驴、马数千匹来迎接郅支单于。由于天气严寒，郅支的人在路上死去很多，当到达康居时，只剩下三千人了。康居王很尊敬他，想依靠其威望来胁迫中亚诸国，便以女嫁郅支，郅支也以女嫁康居王，互相依靠。

在康居王的支持下，郅支单于几次借其兵进攻乌孙，深入到其首府赤谷城，杀人抢劫。乌孙无可奈何，只有放弃西边楚河、塔

①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88页。

拉斯河流域的地区给郅支单于。郅支单于既得到土地，又抢掠大量人畜，强大起来，骄傲自大，不再尊重康居王。康居王之女及贵人、贫民数百人，被郅支杀死，肢解，投弃于都赖水（塔拉斯河）中。他又强迫人民为他筑城，每天役使五百人，筑了两年。他还派人到阖苏（奄蔡）、大宛等国令每年交纳贡赋。郅支单于在中亚作威作福，引起当地统治者和贫民的极大不满。

汉朝连续派遣使者三批到康居索要谷吉的尸体，郅支单于不但不理，而且侮辱汉朝的使者。公元前36年，汉朝派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与副校尉陈汤出西域。陈汤对甘延寿说："今郅支单于常侵略乌孙、大宛。如果让他征服这两国，他就会北击伊列（在伊犁河以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指贵霜帝国）、山离乌弋（应为乌弋山离，即阿拉霍西亚）。几年之内，天山南路就受到威胁了。我们如发动屯田官兵，并征发乌孙兵，直攻其城下，郅支单于将会走投无路，又不能守住城池，一定要被我们消灭。"甘延寿虽表同意，但说要请示朝廷，经批准后再行事。陈汤说："让那些官僚去议论，最后一定不会同意。"甘延寿仍然犹豫不决。陈汤就独自假传朝廷的命令，征发城郭诸国的军队以及车师戊己校尉手下的屯田官兵，共四万多人，讨伐郅支单于。甘延寿不得已，只好听从。

汉朝军队即日出发。分为六个支队。三个支队从南道，度葱岭，经大宛前进。另外三个支队从温宿出发，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到阗池（伊塞克湖）西，进人康居东界。陈汤下令士兵不得进行抢劫。一直前进到距郅支单于的都城（后来的江布尔）大约六十里的地方扎营。汉军又捕得康居贵人贝色之子开牟以为向导，了解到郅支的情况。明日继续进至距城三十里处。又明日，到达郅支都城所在的都赖水上，离城三里，扎营布阵。郅支单于派了步骑兵在城门守备，汉军射之，郅支兵都躲进城内。汉军四面围攻。该城内为土城，外围为木城。郅支兵从木城内往外射箭，汉兵放火烧毁木城。夜晚，有数百骑兵突围出来，被汉军射死。

起初郅支单于听说汉军来攻，本打算逃走，但由于怕康居为汉朝内应，又有消息说乌孙诸国已出兵助汉，觉得无处可逃，所以在出发了以后又返回。他以为汉军远来，不能久攻，不如坚守，于是亲自登上城楼指挥保卫城池的战斗。汉军猛攻，射郅支中其鼻，其诸夫人被射死。单于下楼骑马接战。夜半，木城被汉军夺得，郅支的军队退入土城。

郅支军几次突围都被击退。天明时，四面火起，汉军官兵大呼冲击，钲鼓声震天动地，攻进土城。郅支单于和男女百余人退入内室。汉兵纵火，冲进内室，单于受伤死。军候假丞杜勋斩其首。从其处缴获汉朝使者带的节传两件和谷吉等所带的帛书。郅支单于及其亲信、党羽至此被彻底消灭。

近人考证，当时有罗马的士兵来支援郅支单于，参加对汉军的作战。据说参战的罗马军团是由中亚的一个王子统帅的。[①]法国学者格鲁赛说："在此以后，跟随郅支单于西来的匈奴人就再也不见了。这些西匈奴人没有历史，因为他们绝未同任何文明国家有所接触。只有那种文明国家才能保存关于他们的一些报导，如中国保存了东匈奴的历史那样。一直到公元4世纪末，约公元370~375年，当他们的后裔渡过伏尔加河与顿河而入侵欧洲时，这些匈奴人才再次以巴拉米尔（Balamir）与阿提拉之名而见于古典历史。"[②]

郅支单于被消灭以后，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于公元前33年春朝汉。汉朝以宫女王嫱（即王昭君）嫁单于。王昭君后生一子，名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在其后的二三十年中，匈奴部落看来又大批返回漠北，从外蒙古到准噶尔盆地的广大地区又复为匈奴占

① 冯承钧：《西力东渐记》，第1页；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第2分册，第407页，注2，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② 格鲁赛：《草原帝国》，第38页，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麦高文说："夏德氏等主张后世侵入欧洲的匈奴人领袖阿提拉是郅支的直系苗裔，此虽犹未证实，但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见《中亚古国史》，第137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据，西与乌孙相接。证据是：史书上提到，公元前5年，乌孙曾侵入匈奴西界被匈奴击败，被迫给匈奴提供人质。匈奴将此事报告汉朝。汉朝责备匈奴，说匈奴、乌孙都是汉臣，匈奴无权接受乌孙的人质。匈奴单于服从汉朝的命令，将质子送还乌孙。公元前1年春，匈奴单于和乌孙大昆弥都到汉朝来朝拜，汉朝以此为荣。

1922年，前苏联考古学家柯兹洛夫领导的“蒙古、西藏考察团”，在乌兰巴托以北哈拉河畔的诺颜山发现一些匈奴墓。其中一墓最为富丽，文物甚多，包括丰富的丝、毛织物、绒毡、青铜器与铁器、漆器和玉器，还有中国华盖、各种服饰、马具等。其中的丝绢，按其纹样及织法看，显系中国内地制品。绣和刺绣都是彩色的，呈锦云、鸟兽和神仙骑鹿在云中飞奔之状。有的织上了“新神灵广成寿万年”的词句。有一个漆杯的底面镌着“建平五年”（即元寿元年）和“上林”的汉文铭文。墓中为椁、棺、榼三重的所谓“国君三重”的棺材。马长寿认为，此墓应是当时匈奴的执政者乌珠留若鞮单于（名囊知牙师，公元前8~13年在位）之墓。[①]1928年和1929年考古人员在恰克图附近发现的匈奴墓中，也有许多中国的丝织品、漆器、铜镜、玉器等。所有这些中国物品，都是中国皇帝赐给匈奴单于的。

但是，近来西诺尔教授却提出一个目前尚不为了解的意见。他认为，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诺颜山的墓葬确是一个匈奴墓地。从墓中发现的铜镜、箸（筷子）、漆器（其中一件漆杯镌明，制于新莽始建国五年）看，中国的影响占着优势，但当地的产品表明也有希腊巴克特里亚的影响。这清楚地说明匈奴的物质文化属于合成的性质。[②]但是，公元前后的蒙古草原为匈奴所占据，还很难否认在诺颜山当时有匈奴的墓地。

王莽时期，匈奴趁汉朝发生内乱之际侵入西域、中亚地区又

① 马长寿：《北狄与匈奴》，第69~74页，三联书店1962年版。

② 西诺尔《内亚》，第93页，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1年英文版。



成为匈奴的势力范围。从那以后起，匈奴又与汉朝争夺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到了东汉光武帝时，由于汉朝无力西顾，西域诸国再附于匈奴。

公元46年，匈奴单于乌达鞮侯死，其弟左贤王蒲奴立为单于。匈奴日逐王比不愿服从蒲奴单于，就率领部众四五万南迁，向汉朝表示愿仿效以前的呼韩邪单于，为汉朝守卫北边，永为藩臣。公元48年冬10月，比自立为南单于（公元48~56年）。匈奴从此分裂为南、北两部。

当时，北匈奴中连年发生旱灾蝗灾，赤地数千里。人口牲畜因饥荒疫病而死亡者大半。加以乌桓乘其衰弱从东面、南单于派左贤王从南面向其进攻，北匈奴被逼北徙数千里。看来，北匈奴是向北退到南西伯利亚，向西退到中亚北部草原地带去了。所以，公元52年，北匈奴在遣使来汉朝要求和亲时，曾率领西域诸国的所谓“胡客”一起向汉朝贡献马匹、皮毛等物。

东汉为了重新统一西域，控制东西商路，于公元73年2月遣将从平城、高阙、酒泉、居延出塞，分四道进击北匈奴，主要的战场在外蒙古。但其中窦固、耿忠率领的那一路则到了天山，夺得伊吾庐地，并派其部下假司马班超平定南道，次年又平定北道，恢复了中断65年的统一，重新派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

公元85年左右，北匈奴遭到重大打击。史书记载：“时北虏衰耗，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①]关于鲜卑进攻北匈奴的情况，据说在“章和元年（公元87年），鲜卑入左地，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取其匈奴皮而还。北庭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口二十万，胜兵八千人，诣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降。”他们带着自己的一切用的东西前来请求投降，竟“毾㲪氍毹，帐幔毡裘，积如山丘”。[②]这样经过近二十年的时间，北匈奴基本上被打垮。

①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② 《太平御览》卷七〇八，引杜笃《边论》。

当然，也有一部分向西逃走，远引而去了。不过，以后仍然有一些北匈奴的势力盘踞西域，与汉朝争夺天山南路，直到公元2世纪中期才被鲜卑所灭。近人认为，北匈奴在公元91年就被完全击溃，远走康居了，这是不确实的。

在北匈奴被东汉打垮的情况下，南匈奴曾请求允许他们迁回漠北。当时东汉朝廷里多数人认为不能答应这一要求。[①]于是，南匈奴单于就上书汉朝，提出"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伐，破北成南，并为一国"，要求东汉政府派兵助讨。东汉就派窦宪、耿秉等出征。从公元89年起，连续三年，不断给予北匈奴以严重的打击。公元91年2月，窦宪又遣耿夔与任尚率军出居延塞，围北单于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破之。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以后，其地便为鲜卑所占据，留下来的匈奴人达十余万，都自称为鲜卑。从此鲜卑渐强。

关于北匈奴单于的去向，史书上只是说："单于震慑屏气，蒙毡遁走于乌孙之地"；[②]又说："北单于为耿夔所破，遁走乌孙，塞北地空，余部不知所属"。[③]总之，都是说遁走于乌孙之地。这显然是指巴尔喀什湖以南和西南的楚河、塔拉斯河流域以及锡尔河以北的草原地带，也就是郅支单于败亡之地。他们大约来此同先来的匈奴人会合，从此走上了漫长的西迁道路。

北单于败逃后，其弟于除鞬自立为单于，盘踞于天山东段，后叛汉被杀。公元2世纪前半期，北匈奴之在西域者仍经常侵扰天山南路。最后于2世纪中期在新兴的鲜卑的威逼下，或沦为鲜卑的臣民，或进一步西迁，从而退出了中亚的历史舞台。业师齐思和先生认为，正是在鲜卑"这样一个强大的新兴势力的威逼下，北匈奴单

① 袁宏：《后汉纪》，卷一二；《后汉书·宋意传》。

②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③ 《后汉书·袁安传》。

于在乌孙邻近住不下去了，遂决定率部西迁到康居”。[1]

第二节 贵霜帝国的建立

在叙述了北匈奴在中亚北部草原地区的活动以后，现在来看大月氏人在中亚南部（索格底亚那和巴克特里亚）的情况。

大月氏西迁的经过，在前面已经讲过了。从《史记》、《汉书》的记载看，大月氏在征服了大夏（巴克特里亚）以后，仍然占据着阿姆河以北的索格底亚那地区，不但初期如此，即在后期亦如此。所以，这个时期大月氏的历史仍然包括了索格底亚那等地的历史在内。[2]

《后汉书·西域传》在谈到大月氏国的一条中说，在丘就却自立为王以后，“国号贵霜”。“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目前，中外史学著作也都是采用贵霜这个称号。但在中国的古代史料中，却是使用贵霜的“故号”，称为大月氏。

贵霜帝国这样一个重要的存在，在200年前，欧洲的学者甚至根本无所了解。欧洲人之知道贵霜帝国，主要是通过俄国学者比丘林（雅金甫）翻译的有关中亚的汉文史料汇编。但汉文史料的记载也不很清楚。后来，在中亚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各地进行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贵霜的钱币和艺术品（主要是雕刻，这种雕刻是希腊、罗马艺术同印度佛教艺术的结合，被称为健陀罗艺术）。学者们通过对这些钱币和艺术品的研究，并将其与文献史料结合起来，才能初步勾画出贵霜帝国政治史的轮廓。

所谓政治史的轮廓，即考知了贵霜历史上的几个主要阶段，有哪几个主要的国王，这些国王在位的大致年代以及贵霜帝国同

① 《历史研究》，1977年第3期，第131页。

② 《剑桥伊朗史》认为，大夏国不能统治河中的全部，只能统治但密及其附近一带，即阿姆河北面沿岸不远之地，至于中亚深处，则力不能及了。

毗邻国家关系的主要事实。然而所有这些事实，特别是贵霜诸王的年代，至今仍然是不清楚的。现在只能根据汉文史料的记载，结合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讲一下贵霜史的主要事实和问题。

大月氏原系游牧民族，其社会制度与乌孙、康居等有许多相似之处。如把高级的部落首领称为翎侯，月氏、乌孙、康居三族皆同。[①]而月氏之有翎侯为最著。近代学者们的研究，有的以为这一称号是来源于伊朗语，有的则认为就是突厥语的“叶护”。大月氏在处于游牧状态和攻入大夏之初期，显然是以翎侯的制度来管治各个部落的。

史书上讲：“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大夏本无大君长，城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故月氏徙来，皆臣畜之。”并说：“有五翎侯：一曰休密翎侯，治和墨城。二曰双靡翎侯治双靡城。三曰贵霜翎侯，治护澡城。四曰肸顿翎侯，治薄茅城。五曰高附翎侯，治高附城。凡五翎侯，皆属大月氏。”[②]但《后汉书》则说：“初，月氏为匈奴所破，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都密，凡五部翎侯。”该传将高附国单为立传，称其为“大国”，“在大月氏西南”，“未尝属月氏”。并说：“《汉书》以为五翎侯数，非其实也。”[③]范晔书晚出，搜集了较多的资料，而且对班固的讲法进行了审查，故其说法当较为合乎实际。

关于五翎侯所在的确切地点，近人进行了许多考证，仍然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印度学者A.K.纳拉因认为，在五翎侯的时期，月氏人占据的地区大体上包括阿姆河以北的苏尔汗河，卡菲尔尼

① 《汉书·张骞传》颜师古注曰：“翎侯，乌孙大臣官号，其数非一，亦犹汉之将军耳。……翎与翕同。”又《汉书·张骞传》：“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其时间约在公元前177年以前不久。《汉书·段会宗传》：“（乌孙）小昆弥为国民所杀，诸翎侯大乱。”这是关于乌孙有翎侯的记载。《汉书·匈奴传》：“康居与诸翕侯计。”这是关于康居有翎侯的记载。这些都证明大月氏、乌孙、康居制度相同。

② 《汉书·西域传·大月氏国》。

③ 《后汉书·西域传·大月氏国》。

甘河，瓦赫什河，克孜勒苏河等河流域和阿姆河以南的科克恰河流域；阿姆河流域在其中部，往南没有越过兴都库什山。[①]具体说，普利布兰认为都密即帖尔美兹（Termez）。纳拉因以为休密、贵霜和肸顿三翎侯应分别在今法扎巴德、喀拉查延（Khalachayan）等地周围。而双靡则应靠近休密，也许在瓦罕的门户伊什卡施姆周围。当然，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这里只能介绍一种比较新的说法供参考。总的看，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进一步作研究的。故张星烺说："五翎侯地点，多不可考。丁谦《后汉书大月氏国五翎侯考》全皆武断臆说。"[②]前苏联学界也说："关于贵霜翎侯的最初位置不详。"[③]

中国史料中所说的大月氏五部翎侯，大约就是指五个酋长的领地。因原作为游牧部落首领的翎侯，在他们的部落转为定居和从事农业以后，也就变成地区的统治者。中外史料和考古资料证明，五部翎侯虽有竞争，但基本上和睦相处了一百多年。这使月氏人保持了团结，月氏人新占据的地区维持了安定，经济相当繁荣。所以，月氏人无意于响应汉朝的建议，东返向匈奴报复。游牧人在一个新的地区转为定居以后，往往像农民一样，变得安土重迁。这可以说是一个规律。在以后的历史中可以见到类似的例子。[④]

五部翎侯统治的时期，可以说是大月氏历史的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延续了一百多年。如果说，这一时期是始于大月氏人征服大夏的初期，则其结束当在公元后一世纪的前期了。而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朝以后和大月氏人征服以前的大夏，却尚不清楚。英国研究巴克特里亚史的学者塔恩认为，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大约是亡于公元前141年和公元前128年之间；本书前文中说是公元前

① 纳拉因：《月氏五翎侯》，载《中外关系史译丛》，第1期。

②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4册，第31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③ 苏联科学院编《世界通史》第2卷，第940页，三联书店1959年版。

④ 参看《辽史》中关于回鹘的记载。

135年，前苏联的学者们认为是公元前128年。各种不同的说法，相差不过十年。总的都可以说五部翎侯的时间延续到了公元1世纪前期。

第一个见于汉文记载的大月氏王是丘就却。如史书上讲："（大月氏分其国为五部翎侯）后百余岁，贵霜翎侯丘就却攻灭四翎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①]这段话告诉我们，是丘就却结束了五部翎侯分立的局面，统一为贵霜国，其时间在五部翎侯分立之后百余年。汤用彤先生认为："此王在位，要在西汉之末，或东汉之初。"[②]从上述五部翎侯分立的时间看，汤先生的这一考订是比较正确的。

据考证，丘就却也就是钱币上的Kujula Kadphises。他原是贵霜翎侯，故在他统一诸翎侯以后，他的国家就被称为贵霜国。丘就却信奉佛教，他发行的钱币上刻有佛像，且有佉卢文的铭文。钱币铭文称他为"正法之保护者"，其称号则为Yavugasa（相当于突厥的叶护）。他统一诸翎侯，大约就在公元24~25年间。而在这以后，他所发行的钱币就不再称为翎侯（叶护），而是称为大王（Maharaja）了。带有大王称号的丘就却币，见于公元38年。

丘就却既"自立为王，国号贵霜"，就首先"侵安息，取高附地"。[③]这句话表明，当时高附（今喀布尔地区）是隶属于安息王朝的。这个地方，是中亚、西亚通往印度的交通要冲，原来是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的领地。公元前135年前后，巴克特里亚希腊国遭到游牧人的入侵时，国王赫里奥克里斯退往兴都库什山以南，以喀布尔地区作为自己的统治中心。此王的后继者安提阿勒西达斯将其统治中心从喀布尔转移到呾叉始罗。其即位者阿舍比乌斯（Archebius）已不能再保持对喀布尔地区的统治，其地被南迁塞

① 《汉书·西域传》。

②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第3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③ 《后汉书·西域传》。

王毛伊斯（Maues）所据。他是从罽宾方面侵入该地的。不久，天竺的希腊王赫尔马攸斯（Hermaeus）又取代塞王而统治高附。赫尔马攸斯以后，其地又归于安息小王Gondophames[①]。总之，先后曾经占领和统治过高附地区的有天竺（指希腊巴克特里亚王的余孽）、罽宾（指塞王）和安息。故史称其地"所属无常。天竺、罽宾、安息三国，强则得之，弱则失之。……后属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②]

公元1世纪前半期，安息国内的形势是内乱频仍，叛变不断。戈塔尔兹与瓦尔丹尼斯一世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双方都求助于大月氏。大月氏乘安息内乱的机会，将Gondophames赶出高附。据说，丘就却在进攻高附时曾得到希腊王赫尔马攸斯的支持。这位希腊也想通过与丘就却的联盟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和摆脱对安息人的依附。他曾在一个短时期内同丘就却共同统治高附，因当地曾发现一种钱币，其一面铸赫尔马攸斯之名，另一面铸丘就却之名。但丘就却在取得高附以后不久就将希腊王排除，取而代之。[③]

丘就却在取得高附以后，"又灭濮达（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帕洛帕密萨代）、罽宾，悉有其国"。[④]但罽宾似未完全征服，因为在公元44年时，安息王朝仍然统治着咀叉始罗。当时，咀叉始罗是隶属于罽宾的。直到公元52年，咀叉始罗才被征服。丘就却从此又进一步采用"诸王之王"的称号，贵霜帝国也就建立起来了。

根据对丘就却发行的钱币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位贵霜王的活动主要是在公元1世纪的50~60年代。

---

① 公元前1世纪中叶，安息人Vonones曾在德兰吉亚那（今锡斯坦）、阿拉霍西亚（今坎大哈）独立称王。Gondophames即此王所建立的王朝派到阿拉霍西亚的总督。杨宪益说Gondophames在即位以前是阿拉霍西亚地方的太守或小王，此王后来逐步扩展自己的势力，终于在公元19年即位，独立称王。他夺得了高附地区，故《后汉书》说高附"后属安息"。

② 《后汉书·西域传》。

③ 斯敦·柯诺夫：《佉卢文铭刻》，第64页。

④ 《后汉书·西域传》。

丘就却钱币发行的范围遍及于西北印度，特别是健陀罗地区，仅在咀叉始罗就发现2.5余枚。这种钱的铸造，受当时罗马钱的影响很大，不仅版式、大小相仿，甚至其重量也大致相等。钱的背面铸的圆像，是模仿罗马皇帝克劳丢（公元41~54年）的钱币制造的，而钱上有佉卢文的铭文则说明印度文化对贵霜帝国的影响。

丘就却活到80多岁的高龄，约于公元75年左右去世。据近人研究，在他死后，他的儿子阎膏珍年纪尚幼，故贵霜有一段时间处于无王的状态，由自称为“伟大救世主”（Soter Megas）的权臣把持国政（64~78年）。理由是，此时的中国史料绝未提到贵霜王的具体名字，仅提到所谓的“月氏王”。另外的说法则认为阎膏珍是直接继承丘就却而为贵霜王的，而且说阎膏珍是丘就却的儿子。由于丘就却活到高龄，故阎膏珍即位时肯定已不年轻。上述“伟大救世主”发行的铜币，是仿效汉朝的铜钱，有8.5克和2.1克两种。这说明其受到中国的影响很大。

见于中国史料记载的贵霜王阎膏珍，在贵霜钱币上称为Wema Kadphises。他在位的时间约有二十多年。关于他的作为，史书上仅说他“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1]又说：“月氏杀其（天竺）王而置将，令统其人”。[2]有的认为，这表明丘就却开创的帝国的统一过程似乎没有完成。罽宾、天竺诸地，附而复叛，故阎膏珍再度平定其地，从而将贵霜帝国的统治范围扩展到旁遮普、印度河流域以至贝拿勒斯。正如《三国志》所说的：“罽宾国，大夏国，高附国，天竺国，皆并属大月氏。”[3]这些事件大约发生在公元1世纪的后期。当时贵霜帝国任命管治天竺的将领称为西郡太守

① 《后汉书·西域传》。

② 《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条。

③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

（Western Kshatrapas）。[①]

在《厄里特里亚海周航记》[②]这部书中，说巴克特里亚人是处在贵霜王的直接统治之下。《乌兹别克共和国通史》（第一版）说丘就却与阎膏珍的首府是在索格底亚那。阎膏珍的钱币在中亚、喀布尔、旁遮普及中印度的阿拉哈巴德与贾耳巴普尔各地都有发现。这说明，公元1世纪后期贵霜的势力和统治范围已及于原巴克特里亚帝国的全境。故史称："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③]

阎膏珍在位的时间，约相当于罗马皇帝图拉真与哈德连时期（98~138年）。阎膏珍实行币制改革，他除继续发行铜币以外，还在贵霜历史上第一个发行了金币。其铸币所用的黄金，主要从罗马输入。阎膏珍发行的金币，比罗马金币大一倍，而与提图斯（78~81年）以后发行的罗马币相当。阎膏珍的活动及其币制改革表明，他曾努力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统一而强盛的帝国。

丘就却与阎膏珍二人在贵霜的历史上属于Kadphises王系。当这个王朝结束时，代之而起的是Kaniska王系。迦腻色迦在时间上与阎膏珍紧密相连，阎膏珍是迦腻色迦的前任。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在此二王之间有一短暂的间隔，迦腻色迦并非从阎膏珍直接继承了贵霜的王位。有的还认为，迦腻色迦乃是一个小月氏人，因其汉译王名前有"真檀"二字，真檀即于阗的别名，可见其原居于于阗，与前二代国王不是一个系统。[④]

迦腻色迦与Kadphises系诸王不同，他创制了自己的纪年（贵

① 拉普逊的《剑桥印度史》说，这里的天竺是指印度西北部。这个地区在此时为南迁的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所统治。但斯教柯诺夫却说阎膏珍灭掉的是安息人，因为在《厄里特里亚海周航记》这部书中，西北印度是处在安息的统治之下，尽管也有其他的统治者。

② 《厄里特里亚海周航记》一书原稿已佚，我们只通过哈德连（Hadrian）皇帝时的阿里安（Arrian）的著作才知道这部书。此书中关于远东的记载，对中国在公元1世纪末左右同邻国及西方的贸易关系作了比较准确的记述。此书的价值在于向我们提供了某些（已经失佚的）游记曾记述过的内容。那些游记还曾是推罗人马利努斯和托勒密著作所根据的材料。

③ 《后汉书》。

④ 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霜纪年，或称迦腻色迦纪年）。这一纪年继续使用了98年。曾经用过这一纪年的有：迦腻色迦（亦称迦腻色迦一世，纪年1~23年），瓦西希迦（纪年24~28年），胡韦斯迦（纪年28~60年，杨宪益说此人即伊存），迦腻色迦二世（纪年60~74年），韦苏特婆（纪年74~94年，即汉文史料中的波调，亦译作世天）。

贵霜国最繁荣的时期也正是迦腻色迦在位的时期。然而这位著名的贵霜王却不见于中国正史的记载，仅在佛经和《法显传》、《大唐西域记》等书中提到。

迦腻色迦是在阎膏珍去世后，拥兵自立，最后成为贵霜帝国的新主的。在他统治时期，贵霜帝国的领土扩展到了极大的规模。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当时索格底亚那、花剌子模、大宛都曾属其统治。在印度方面，他的领土扩展到了旁遮普、信德、马土腊和恒河河谷，就连现在的比哈尔邦也被看作是贵霜帝国的组成部分。迦腻色迦将首都迁到白沙瓦，使贵霜帝国具有了巨大的规模和世界意义。在马土腊曾发现迦腻色迦的雕像，其上刻有他的名字，身穿游牧人的服装，手执宝剑，可惜上身已毁，但仍可看出其英武的气概。[①]

迦腻色迦原先不信佛教。他早期发行的钱币，铸造的都是希腊神、波斯神、印度神等图像，说明他对各种宗教都采取鼓励和扶植的政策。他皈依佛教是在晚年。佛像只见于他晚年发行的钱币。佛经上记其"前后征伐，杀三亿余人。自知将来罪重，必死无疑，心生恐惧，便即忏悔，修檀持戒，建立浮屠，供养众生，四事不乏，修诸功德，精勤不倦"。[②]迦腻色迦提倡佛教，或许是受到阿育王的启示。相传他效法阿育王，利用佛教以实现他的侵略野心。他曾侵入摩揭陀。现在中、东印度都发现了他的钱币。当印度不能抵挡他时，即同他媾和。迦腻色迦索款三亿金币。

① 赖斯：《中亚古代艺术》，第147页，纽约1965年英文版。

② 《杂宝藏经》卷七。

最后达成的条件是：（1）佛钵；（2）辩才比丘（指马鸣，身后名切胜，死于公元100年）；（3）金币一亿。迦腻色迦之所以要佛钵与马鸣，就是想利用佛教和马鸣来进行号召。

迦腻色迦后来定居于健陀罗，在那里建立了有名的大庙和大塔。从发掘的遗物中，还发现有收藏舍利的容器和佛像，上面刻有迦腻色迦的年号、铭记等等。大塔的名称叫“雀离”，号称百丈浮屠。我国北魏时宋云至印度时尚见此塔。[1]唐代玄奘去印度，也曾见到此塔。据说中国的塔式就是模仿它的（印度原来的塔式是覆钵形）。

国外不少学者认为，在东汉末年贵霜国曾一度征服于阗、鄯善等地，这是没有根据的。与此相反，贵霜王国到了迦腻色迦一世末年，国内发生内乱。据说迦腻色迦就是在他准备发动一次北征的时候被其部下杀死的。以后在胡韦斯迦时期贵霜王国形式上虽还保持着统一的局面，但国内似有僭位者或割据者。到公元3世纪时，贵霜国即开始衰落，沦于波斯萨珊王朝的控制之下。公元4世纪后半期，贵霜复兴，称为寄多罗，延续至公元5世纪中期，为哌哒所灭。

贵霜帝国的对外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讲：一是同东方国家的关系，再是同西方国家的关系。

东方主要是同中国汉朝的关系。贵霜帝国的领土，北面包括了索格底亚那，所以北与康居相接。从《后汉书·班超传》看，贵霜同康居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就在公元84年以前不久，贵霜还与康居联姻、结盟。另一方面，其东境则与塔里木盆地紧相毗邻。贵霜统治者同天山南路诸绿洲的邦君也有密切的关系，并积极参与了他们之间的斗争。

公元1世纪的前半期，中国由于发生王莽篡汉，匈奴、西域及

①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范祥雍校注本，第3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各少数民族的反叛，加以东汉初年因长期战争造成的破坏未得恢复，故中央政权无力顾及西北边疆。在这种情况下，西域各地互相战争、兼并，如“小宛、精绝、戎庐、且末，为鄯善所并。渠勒、皮山，为于阗所统”。[①]在中亚，则“罽宾国、大夏国、高附国、天竺国皆并属大月氏”。[②]而北匈奴也就乘机骚扰天山南路，企图控制东西商路。东汉政府于公元73年派军北伐匈奴，重新统一了西域，于公元74年再设都护。西域各地的少数民族，许多都参加了东汉领导的对匈奴的战争。西域假司马班超在给东汉政府写的请兵报告中就曾说：“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指贵霜）、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③]所以，在班超于公元78年平定姑墨、石城的战争中，就有康居的军队参加。

公元84年，疏勒王忠反叛，班超前去镇压，康居派兵来援救疏勒王。班超考虑到不久前康居曾与贵霜结亲，贵霜对康居有一定的影响，便派人给贵霜王送去许多丝绸锦缎，要求贵霜王劝说康居王退兵。康居王果然听从贵霜王的劝告，不但退兵，而且把疏勒王忠逮捕而去。

公元87年，西域长史班超击破莎车，贵霜国遣使者向东汉贡献扶拔（这是一种形状像麟但头上无角的动物）、狮子。[④]

贵霜王国不但曾帮助班超平定疏勒，而且还曾帮助东汉击莎车有功。所以，贵霜国在遣使向东汉贡奉珍宝、扶拔、狮子的同时，还要求东汉以公主嫁贵霜，结亲以固盟好。但是，班超不但没有答应贵霜的要求，而且“拒还其使”。[⑤]因此，贵霜对东汉怨恨不满，便于公元90年派其副王谢（Sahi）率兵七万进攻班超。当时班

① 《后汉书·西域传》。

② 《魏略·西戎传》。

③ 《后汉书·班超列传》。

④ 据《后汉书·章帝纪》。钱大昕说，可能是指安息。因为《后汉书·西域传》谈到安息时提及此事，而在谈到月氏时则无此事。

⑤ 《后汉书·班超列传》。

超的部队很少，便对军士说："贵霜国的军队虽然很多，但从数千里之外度越葱岭前来，又没有运输工具，有何可惧？我们只需要收谷坚守，贵霜军就会饥饿穷困投降。不过数十日就可决定胜负。"贵霜副王谢向班超进攻，一时攻不下，就四处抢劫，亦无所得。班超估计贵霜军队的粮食快要吃完了，一定会去向龟兹求援，便派了数百名士兵拦截东去的道路。贵霜人果然派了使者带上金银珠玉到龟兹去，被班超埋伏的士兵阻击杀死。班超以使者的首级给其副王谢看。贵霜人大惊，便向班超请罪，请求能让他们活着回国去。班超放了他们。[①]从此以后，贵霜国大为震动，每年都向东汉贡献。

当时从中国去西方，到罗马帝国，中间隔着贵霜与安息两个大国。安息，像后来的伊朗萨珊王朝一样，也控制着丝绸贸易的通道，阻挠罗马同中国的直接往来。所以，"（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②]由于安息的垄断，迫使当时产丝的中国与消费丝绸量最大的罗马，不得不努力去开辟海上的交通。

公元97年，当时担任都护职务的班超，派遣其属员甘英出使于大秦，就是为了摆脱安息的控制，探寻与罗马直接进行丝绸贸易的可能性。据记载，这一年甘英逾葱岭，过大夏、安息，到了条枝。"皆前世所不至，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甘英一直到了安息的西界，临大海（今波斯湾）。他想渡大海，但安息的船人却对甘英说："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月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甘英听了这些话，只得停止前进。安息人当然了解甘英出使罗马的目的，因而危言耸听，故意吓唬他，使他望而却步，以便阻止中国同罗马的直接交通。但安息的这种垄断，却促使罗马去

① 《后汉书·班超列传》。

② 《后汉书·大秦传》。

另辟海路，不需再经过安息而与中国通商。汉文史料就曾记载，在甘英出使后，“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甘英出使，虽未达到目的，却使中国对西方的了解比张骞时代又前进了一步，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也有所增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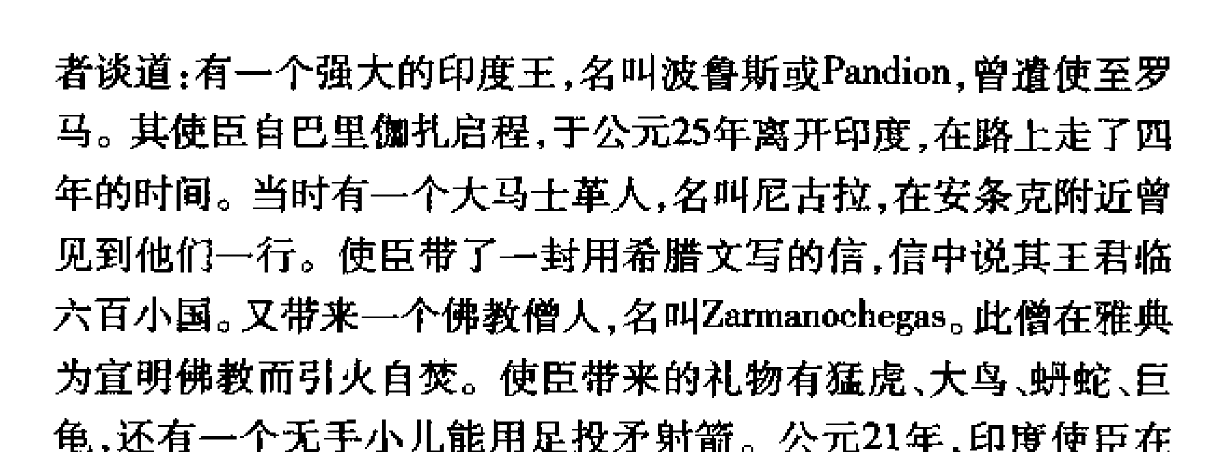
贵霜帝国同中国的关系的另一个内容是佛教的东传，同时有大量中亚的佛教徒来到中国。贵霜的统治者极力向外传播佛教，使该教的影响远及四方。

史料上谈道：“昔健陀罗国迦腻色迦王威逼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葱岭东，河西蕃维，畏威送质。”[1]现在一些外国的史学著作都讲迦腻色迦的统治曾及于葱岭以东，这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承认贵霜国在宗教上对新疆等地有相当的影响。例如，当时的疏勒王臣磐就是一个曾经为质于月氏的佛教徒。安帝元初中（公元114~120年），疏勒王安国之舅臣磐，因为有罪被送到月氏（即贵霜国）去当质子。贵霜王很爱护他。后来安国死了，无子继承王位，由其母摄政。她与疏勒人共扶立臣磐的胞弟之子遗腹为疏勒王。臣磐在贵霜国听到这个消息，便向贵霜王请求说：“疏勒王安国没有儿子，而他的族人又微弱。如果立其母家族中的人为王，那我是遗腹的叔父，应当由我即位为王。”于是，贵霜国就派兵把臣磐送回疏勒。疏勒人以前尊敬臣磐，又畏惮贵霜国，便共同夺回遗腹的印绶（应为汉朝所授的印绶），迎接臣磐，立他为疏勒王。[2]公元130年，疏勒王也向东汉送质子，与大宛、莎车王一起来贡献。公元132年，敦煌太守徐由还派臣磐率领疏勒兵去攻打于阗。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当时中国新疆的塔里木盆地没有处在贵霜国的统治之下。

贵霜同罗马帝国也有关系。据罗马方面的记载，在奥古斯都皇帝即位时，有许多印度藩王遣使前去祝贺。斯特拉波及其他作

① 《大唐西域记》卷三，季羡林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 《后汉书·西域传》。



者谈道：有一个强大的印度王，名叫波鲁斯或Pandion，曾遣使至罗马。其使臣自巴里伽扎启程，于公元25年离开印度，在路上走了四年的时间。当时有一个大马士革人，名叫尼古拉，在安条克附近曾见到他们一行。使臣带了一封用希腊文写的信，信中说其王君临六百小国。又带来一个佛教僧人，名叫Zarmanochegas。此僧在雅典为宣明佛教而引火自焚。使臣带来的礼物有猛虎、大鸟、蚺蛇、巨龟，还有一个无手小儿能用足投矛射箭。公元21年，印度使臣在Samos会见了奥古斯都，带来的猛虎在Marcellus戏院开幕时当众展览。

又据罗马史家Dion Cassius记载，公元99年，罗马皇帝图拉真（98~117年）征服美索不达米亚，使罗马的疆界距印度边境只有600公里。这时，有一个来自北印度的使团到了罗马。图拉真极为铺张豪华地接待了这个印度使团，甚至让使团的成员坐在元老院的座位上。

上述几个所谓的印度使团，实际上都是贵霜帝国的使团。说明在阎膏珍时期，贵霜帝国同罗马帝国有较多的外交关系。图拉真皇帝时罗马宫廷的廊柱上都雕有贵霜人的像。公元3~4世纪时的罗马人所讲到的巴克特里亚人，也是指贵霜的使者。罗马皇帝安东尼也曾遣使到贵霜。贵霜境内，甚至北至中亚的苏尔汗河地区，也都发现了罗马皇帝尼禄的钱币。

迦腻色迦在位共23年（128~151年）。继之为贵霜王的是瓦西什迦。他于迦腻色迦纪元24年出现于马土腊的一块铭文上。在马土腊曾发现胡韦斯迦的（172年）两块铭文，他的称号是Maharaja devaputra。到公元179年，胡韦斯迦的称号就升为Maharaja rajatiraja devaputra，这是贵霜国最高的称号。到迦腻色迦纪元60年时，在西旁遮普的一块铭文上，又出现一个名叫迦腻色迦的贵霜王。此人应是迦腻色迦二世。在他之后，知名的贵霜王是韦苏特婆。据中国史料的记载，太和三年（229年）十二月癸卯，“大月氏王波调

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氏王”。[1]学术界研究以为，这个波调就是韦苏特婆（希腊文作Bazaho）。他是迦腻色迦王系中最后的一位贵霜王。

贵霜帝国在迦腻色迦死后走向衰落。花剌子模脱离贵霜帝国而独立。阿姆河以北的索格底亚那也分裂出去，以贵霜尼亚（今撒马儿罕西北泽拉夫善河上的卡塔·库尔干）为中心另立一国。玛尔吉亚那被伊朗夺去。在印度的领地也逐渐缩小。最后，贵霜的政权仅在喀布尔地区得以保持。这时的大月氏人，特别是他们的统治者已在很大的程度上与本地居民混血，进而逐渐被同化了。贵霜帝国的末期，波斯的萨珊王朝崛起，成为贵霜国西边的一大威胁。

第三节　贵霜帝国的经济与文化

关于贵霜帝国社会经济制度的材料是极少的。贵霜国是由大月氏人建立的。从汉文史料讲到的情况看，大月氏人在征服巴克特里亚以后，就逐步地从游牧生活转为定居并从事农业。其社会制度与文化生活也渐为伊朗语民族所同化。西方史料称巴克特里亚为“千城之国”。中国史书称大月氏国地方：“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2]又说大月氏“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3]所以，当张骞去联系，要求其返回东方共击匈奴时，他们没有答应，其原因即在于他们已经在那里定居下来了。

贵霜国农业的情况，由于近几十年大量的考古发掘取得了较多的材料。巴克特里亚地区，在波斯阿赫门王朝、马其顿亚力山大及其后继者统治的时期，农业及灌溉事业本来就较发达。而贵霜

① 《三国志·魏书》。

② 《汉书·西域传》。

③ 《史记·大宛列传》。

统治者则对农业采取鼓励和保护的政策。贵霜的农业多分布于河谷与绿洲地带。在贵霜时期，绿洲农业较以前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①

当时，贵霜是一个强大的集权国家，也是一个奴隶主国家。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的主体大月氏贵族，出身于游牧部落，所以在这个奴隶制的国家里也保存了许多氏族制的残余。在这个国家，大量的奴隶从事于农业生产，兴建灌溉工程。考古发掘证明，在贵霜时期，花剌子模、索格底亚那、帖尔美兹、费尔干纳等地的人工灌溉工程，如地下水渠、运河等，都较前一个时期在规模上和数量上有所发展，而这只有使用大规模的奴隶劳动才能完成。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②当时在贵霜帝国统治下的印度，也是这种情况。

贵霜帝国处在东西方的商路上，其统治阶级因贸易而得到很大的利益，这种贸易是带有国际性的。公元2世纪时的希腊地理家托勒密，曾根据推罗人马利努斯的叙述说道：在公元1世纪时，有一个马其顿的商人，名叫马厄斯·梯家奴斯，曾派人去了解丝绸之路及其沿途的情况。据称，这条商路从叙利亚之首府安条克城出发，在海俄拉城渡过幼发拉底斯河，然后进入安息帝国，经过厄克巴坦纳（哈马丹）、剌夷（今德黑兰）附近、和椟城、木鹿，再继续前行到巴克特拉（格鲁赛认为此城可能是贵霜的首府）。丝绸之路就是从巴克特拉去帕米尔的。托勒密说，在帕米尔谷地的"拘谜陀山（Komedai）山麓"有一石塔。地中海东岸各地来的商人和"赛里斯"的商人就在这个石塔附近交换他们的货物。看来，这条

① 罗耆云：《考古中所见之大夏农业》，载《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2年，第3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路是经过瓦赫什河谷、喀尔提锦，到阿赖山谷，然后去叶尔羌。

通过贵霜国地境的商路，不但有去中国的，而且也有南去印度的，还有往北经过花剌子模、阿兰（奄蔡）去东欧的商路。当时的贵霜国充当了东西贸易的中介。同时，索格底亚那人（粟特人）自古以来就是东西贸易中最活跃的商人。他们的足迹遍于中亚、西亚各地。

商人们贩运的东西方的货物是丰富多样的。除中国的丝绸以外，据史书记载，印度的货物有“细布、好毾㲪、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而印度出的“象、犀、玳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①]这里所说的“大秦珍物”，主要是指金银奇货，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金缕罽，杂色绫，黄金涂，火浣布，细布（或叫水羊毳，野蚕茧所作）等等。[②]阿拉伯半岛的产品也加入到这种国际贸易中来，如狮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即鸵鸟）等。还有严国（在奄蔡北）的鼠皮，也有输出。从事贩运贸易的不仅有粟特人，而且有安息人、高附人和大秦人。史称大秦“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有利十倍。其人质直，市无二价。谷食常贱，国用富饶。……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高附人“善贾贩，内富于财”。[③]

为了适应商业贸易的需要，差不多每一个贵霜王都发行了钱币。早期的贵霜钱是仿照希腊巴克特里亚的钱铸造的，并且在其上铸希腊文的铭文。有的钱币铸有希腊、印度和波斯的神像，但不铸佛像。丘就却发行的钱币始以佉卢文铸铭文并铸佛像。有的丘就却币上铸有“正法之保护者”字样，表明其信奉了佛教。阎膏珍即位初发行铜币，后来又铸金币。阎币上铸有印度湿婆神像，表明

① 《后汉书·西域传》。

② 《后汉书·西域传》。

③ 《后汉书·西域传》。



他不信佛教。迦腻色迦最初也发行铸有希腊、波斯、印度神像之钱币，只是到晚年才在钱币上铸释迦牟尼像。贵霜诸王的钱币，发现于中亚和印度的广大地区。钱币上的宗教神像和文字当然是为了适应各地群众的宗教信仰和语言的需要，也反映了当时商业贸易和货币经济的发展。

商业贸易的活跃促进了文化的传播，语言、文字的互相影响和移民迁徙。以语言而论，从帕米尔往西到安息的广大地区，大约都是说的东伊朗语。至于文字，则以希腊文、阿拉米亚文为最重要。在公元1世纪以前希腊文一直通用，直到公元2世纪时才逐渐废弃。在阿富汗的苏尔赫·科塔耳地方曾发现二十五行铭文，其语言为东伊朗语，而字母则是希腊字母。贵霜王的钱币上也见过这种文字。现在人们认为是以希腊文写的巴克特里亚地方的方言，被称为贵霜文。另外，这时也在阿拉米亚文的基础上创造出了粟特文和佉卢文。粟特文通行于贵霜国北部的中亚地区，而佉卢文则通行于旁遮普与西北印度的其他地方。随着商业范围的扩展和佛教的向东传播，这些文字也同时东传。如粟特文传到了中亚北部草原地区的游牧人当中，而佉卢文则传到了塔里木盆地。其时间，当是在公元2世纪以后，而不会更早。这些文字在东传后，或是被当做商业文字使用，或是在宗教上使用，或是其字母被采用来创造那里本地民族的文字，而不可能原样地使用这种外来的语言和文字。从贵霜帝国境内通行的语言、文字多种多样看，可知其民族是众多的，文化也是很发达的。

贵霜帝国境内的宗教信仰是多种多样的，除佛教以外，印度教、祆教和希腊的宗教在社会上也很流行。这些宗教与佛教互相影响。例如在中亚发现属于这个时期的泥像，带赭红色，是表现阿纳喜特神的，但这种波斯神像却穿着贵霜式的衣服。还有泥塑的骑士像。在撒马儿罕附近及其他地方发现的泥像，可能是新年节日用的，每年更换一次。在花剌子模的托普拉克·卡拉城，则发现

有祆祠。迦腻色迦的钱币，有的刻有穿希腊服装的释迦牟尼像，其周围的“佛”字是用希腊字母拼成的。

佛教，在贵霜国占有首要的地位。大月氏人信仰佛教可能是最早的。汤用彤先生说，大月氏人之始信佛教，可能在西汉中叶，也即公元前2世纪末与公元前1世纪初年。因为在这以前，佛教早已传到印度西北与巴克特里亚境内。“阿育王弘法，见于石刻；弥兰信佛，刻于泉币。”月氏人灭大夏，入其境，便逐渐接受其宗教。见于史料记载的第一代贵霜名王丘就却曾皈依佛教，这已毫无疑问。但他的后继者阎膏珍，则被认为是不大信佛的。他的钱币上往往铸印度的湿婆神像。在阎膏珍统治的时期，贵霜国的佛教可能一度不太兴旺。

贵霜帝国佛教最发达的时期，是在迦腻色迦在位的时期。此王与丘就却一样，都支持佛教的说一切有部（the school of all beings）。由于两代贵霜王的保护和提倡，有部势力得到极大的发展。一时健陀罗一带成了佛教的中心。迦腻色迦由于振兴佛教有功，许多佛经与僧徒的撰述都谈到他，把他同阿育王相提并论，倍加歌颂。人们认为，在佛教的历史上迦腻色迦是阿育王以后最伟大的人物。玄奘在讲到佛教史上第四次结集（迦湿弥罗结集）时说，迦腻色迦因感到当时佛教“诸异议部执不同”，便“宣令远近，召集圣哲。于是四方辐辏，万里星驰，英贤毕萃，睿圣咸集”。“于是得四百九十九人”。“是五百贤圣，先造十万颂《邬波第铄论》，释《素呾缆藏》。次造十万颂《毗奈耶毗婆沙论》，释《毗奈耶藏》。后造十万颂《阿毗达磨毗婆沙论》，释《阿毗达磨藏》。凡三十万颂，九百六万言”。“迦腻色迦王遂以赤铜为堞，镂写论文，石函缄封，建窣堵波，藏于其中”。[1]所有这些，大约都是用梵文写成的，但现在只有汉文译本。迦腻色

① 《大唐西域记》卷三，季羡林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迦所召集的这第四次结集乃是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他为振兴佛教所建的一大功德。

迦腻色迦扶植佛教的其他措施是到处修建窣堵波、佛寺（伽蓝）和雕塑佛像。他究竟修建了多少伽蓝是没有数的。相传健陀罗首府布路沙布逻城东南石砌的大窣堵波，就是迦腻色迦所建。“大窣堵波东面石阶南镂作二窣堵波，一高三尺，一高五尺，规模形状如大窣堵波。又作两躯佛像，一高四尺，一高六尺，拟菩提树下加趺坐像，日光照烛，金色晃耀，阴影渐移，石文青绀。”又“大窣堵波石阶南面有画佛像，高一丈六尺，自胸以上，分现两身，从胸以下，合为一体”。为专门的画工所画。又“大窣堵波西南百余步，有白石佛像，高一丈八尺，北面而立。”“大窣堵波左右，小窣堵波鱼鳞百数。佛像庄严，务穷工思”。又大窣堵波西有故伽蓝，也为迦腻色迦所造。据说：“重阁累榭层台洞户……虽则圮毁，尚曰奇工。”[①]迦腻色迦还于四方建造四大伽蓝，以供养三万大小乘之比丘众。玄奘在迦毕试国见有伽蓝百余所。其大城东北有一大伽蓝，据说是迦腻色迦建给质子居住的。这些质子“冬居印度诸国，夏还迦毕试国，春、秋止健陀罗国”。在巴克特里亚，迦腻色迦也修建了规模宏大的佛寺。

在大月氏进入大夏的时期，印度佛教还不许雕刻佛像。健陀罗等地受希腊文化影响较深，及佛教传入，希腊人在信仰佛教时，开始雕刻佛像。到公元1世纪以后，印度也开始出现佛的造像。贵霜帝国在迦腻色迦时期，刻像之风，渐为普遍，开始大量雕刻佛像。如巴米扬的大佛像，就是最有名的。该地位于兴都库什山西部的一个山谷，在今喀布尔西北偏北约97公里。从白沙瓦去巴里黑的大道经过这里。大佛像就雕凿在这个通道上。[②]玄奘经过这里

① 《大唐西域记》卷三，季羡林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 巴米扬大佛像于2001年被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完全摧毁。

时，据说："王城东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近代测量是53公尺，约合159尺），金色晃耀，宝饰焕烂（这个大佛像是在沙岩质的峭壁上凿成的）。东有伽蓝，此国先王之所建也。伽蓝东有鍮石释迦佛立像，高百余尺（近代测量是35公尺），分身别铸，总合成立。城东二三里伽蓝中有佛入涅槃卧像，长千余尺。"[①]贵霜国之雕造佛像一般认为是在大乘佛教创始之后，即公元2世纪后期。

佛教艺术是用艺术的形式来宣传佛教的教义。阿育王把佛经刻在石柱上是一种宣传，高僧说法也是一种宣传。但是，看来仅用文字宣传和口头宣传是不够的。特别是文字宣传，效果并不一定那么好，因为在奴隶社会知书识字的人不是太多。因此，统治阶级和宗教人士就采用艺术的形式来进行宣传，主要有两种：一是雕塑，一是绘画。当然还有音乐。艺术的水平越高，感染力越强，其宣传的效果就越好。

最早的佛教雕刻并不是雕造大佛像，而是用来装饰窣堵波等建筑物。中国的佛塔就是一种窣堵波，但其形式与印度的不同。窣堵波本来是为了保存佛舍利，但后来即成为纪念物和拜佛的场所。窣堵波的基座用石头制成，其周围雕了佛传故事。例如，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河谷的一个窣堵波即如此。以后就雕刻佛像。这种雕刻表现着人世生活的各种图景，形象逼真，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在佛教雕刻中，以健陀罗雕刻最为有名，它被称为健陀罗艺术。健陀罗这个地方，在今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西至昆都士河，东到印度河。在亚力山大时期和塞琉古帝国与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时期，这个地方是希腊人移居之地和希腊文化传往印度的起点。阿育王时期，印度僧人曾来健陀罗传教，当地居民和希腊人信仰佛教的很多。在健陀罗地方雕刻佛像的人可能是信仰了佛教

① 《大唐西域记》卷三，季羡林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的希腊艺术家，或者是佛教徒请来的希腊雕刻家。大月氏人征服大夏后，健陀罗地方成为贵霜王统治的中心地区。由于贵霜王大力提倡佛教，遂使希腊化的艺术更与佛教相结合。据认为这时还有大批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迁来健陀罗。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又有许多西方的雕塑家利用交通的方便从大秦（罗马帝国东边各省）来东方谋生，到了健陀罗。所以，健陀罗佛教艺术的特点被认为是用希腊的雕刻艺术来雕刻佛像与佛传故事。但也有不同的看法。赖斯说："健陀罗在佛教雕刻的发展中，从而也在贵霜文化的发展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它不是从巴克特里亚艺术中派生出来的，而是本地的创造，但可能是在亚力山大里亚的刺激下自然地发展起来的。那种影响是随着商业的开展而传到这个东部地区来的。"

当然，看待任何民族的科学文化的创造，都应当首先强调其本民族固有因素的决定作用，但也有民族之间的互相影响。因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这种长处可能影响到别的民族或被别的民族模仿和吸收。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由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互相之间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否认卓绝的希腊雕刻艺术对于健陀罗艺术的影响，同时也不能说它就是希腊的艺术。

健陀罗地方雕刻的佛像，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当地人以前雕刻的希腊大夏女神像和印度的湿婆神像。这说明健陀罗人信仰佛教的已占优势。如果说，贵霜国健陀罗地方的佛教雕刻表现出受过强烈的希腊影响，如佛像的头发呈波纹状，眉毛线与鼻相连，笑容有所克制，那么，南方马土腊地方的佛像就以印度特点为主，如头发不作波纹形，眉毛呈弧形，嘴唇作微笑状。这种区别又说明了各地的艺术有其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特点。

健陀罗艺术产生于公元前2世纪，延续到公元5~6世纪。其最繁荣的时期是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2世纪。它对今新疆乃至其以东的佛教雕塑也是有影响的。

除雕塑以外，还有壁画与泥塑。健陀罗地方由于气候的关系，

壁画是不能长久保存的，因此只有石雕至今为人所知。但是，在喀布尔和品治肯特（在塔吉克斯坦杜尚别地区）等中亚的一些地方却发现有壁画存留下来。这类壁画主要画在佛洞中，看来现存壁画所属的时间要比雕刻为晚，大多数在贵霜国衰落时期。从《大唐西域记》的记述看，当时有专门从事画佛教画的画工。许多壁画上的佛像和菩萨像，虽然没有某些酷似阿波罗像的雕刻佛像那样希腊化，但也是受到希腊的影响的。泥塑像是用草、木做骨架，用泥土和上马鬃、羊毛等制坯塑成人像，然后施以彩色颜料而成。有的佛像还镶了金，或立或坐，其态非一，以供信徒绕行膜拜。这种格局从敦煌的佛洞可以看到一些，但是其形式各有差别。较晚的佛教壁画，可以明显地看到有萨珊王朝的影响。

佛教之东传进入中国，应当首先是传到新疆，这主要是指龟兹与和阗地区。于阗之立国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该地的佛教是从迦湿弥罗传入的，其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瞿萨旦那国（和阗）时，讲到毗卢折那自迦湿弥罗国至其地传教的故事，而这应是佛教传入内地的先驱。佛教之传入疏勒大约也在这个时期。

中国汉文史料记载，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①]近人解释，自张骞通西域以后有汉朝的使者到贵霜国。西域各国，特别是后来崇信佛教的贵霜帝国也有使者来汉朝，而伊存就是贵霜国派到汉朝来的使者。他在中国以口授的方式将佛经传给博士弟子景卢。这说明从那个时候起（即两汉之际）佛教已开始传到中国内地。传教的正是贵霜国的佛教徒。

王莽及东汉初年，中国不设西域都护，但中国内地同西域之间的交通联系并未断绝，也许经济文化的交往更频繁。在这六七

①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景卢，《魏书·释老志》作秦景宪。

十年中，贵霜帝国繁荣昌盛，其佛教必定继续东传。所以到汉明帝永平年间便有派使者去西域求经之举。另一方面，也有西域的僧人来中国内地传教。由于在希腊巴克特里亚和贵霜时期，佛教也传到了伊朗、中亚，如安息、康居等地，故这些来华的佛教僧徒中有不少是这些地方的人。其中，凡姓安的多是安息人，姓支的一般都是大月氏人，也即贵霜国的人。姓竺的是天竺（印度）人。近人马雍著文《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详述这些人物的事迹。据其所述，最著名的应数安世高。安世高本名安清，原是安息的一个王子。他在父王死后曾游历诸国，至东汉桓帝初年来华，在中国生活了40年左右，从事佛教经论的翻译工作达20多年。安世高来华不久，即通晓汉文，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很深。其来华时，在中国的中亚侨民已为数不少，所以《高僧传》说："西域宾旅，皆呼为安侯。"

来华的支姓人，则有支娄迦谶、支曜、支亮、支谦等。支娄迦谶，原是贵霜国的沙门，于东汉灵帝时来华。他精通梵文，曾为天竺沙门竺朔佛将《般舟三昧》从梵文译成汉文。支曜，也是在汉灵帝时来华的贵霜沙门。支亮从支谶学佛学，与其同时。支谦，原为贵霜国的居士。他虽精通佛典，从事译经，但并非专治佛学，而是一位博学多才、兼通六国语言的学者。他来华的时间约在（190年）献帝即位以后，从事译经工作，在孙权黄武元年（222年）至孙亮建兴年间（252~253年）。其辞世则在公元253年以后，在中国生活了近60年之久。《支谦传》讲，他"妙善方言，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语"。可见他是参照各种文字（包括中亚文字）的佛经来进行翻译的。而支亮、支谦等人都是来中国以后才学习佛经的。此外，还有康居人康巨、康孟详，天竺人竺法兰、竺朔佛等，都是当时佛教界的著名人物。

所有这些中亚僧人在到达中国内地以后，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将许多佛经译成汉文。直到今天，这些佛经在印度已经失传，在中国却能找到其译本。同时，西域的佛教艺术，如雕刻、塑

造、壁画，以及文字（如佉卢文、粟特文等），也随着佛教的东传而传到中国的新疆和内地，不过在同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以后就完全变成中国的东西了。

第六章
贵霜帝国的衰落与哌哒的代兴

第一节　公元3~5世纪中亚的内外形势

曾经盛极一时的贵霜帝国，在公元3世纪以后就逐渐衰落了。这与当时中亚的内外形势是有关系的。因为无论在贵霜帝国的东面、北面、西面和南面，都出现了一些新兴的政治势力。

先看东面。北匈奴在东汉政府的攻击下向西北方面迁徙，其在外蒙古的根据地逐渐被鲜卑所占据。正如汉末学者蔡邕所说的："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指鲜卑）有。……兵利马疾，过于匈奴。"因此，鲜卑部大大地强盛起来。当时鲜卑部的著名首领是檀石槐（141~186年）。史书上说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兵马甚盛，南钞汉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①]可见当时鲜卑占据的地区达到了南西伯利亚、天山北路和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乌孙故地。

法国学者格鲁赛说，中国史料对檀石槐势力的描写是夸大其

①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37页。

词，认为鲜卑的据地不会超过外蒙古原土谢图汗与三音诺颜汗之地。[①]这是不对的。王国维认为，鲜卑既西接乌孙，就至少统治了天山东段的车师后部之地。[②]史书还记载晋武帝咸宁元年和二年（275~276年）鲜卑进攻西域戊己校尉被讨平之事。[③]戊己校尉马循讨斩鲜卑四千余级，生俘九千多人，说明在西域鲜卑部的人数不少。

至于西迁的北匈奴，则史料记载比较模糊。《北史·西域传》说，窦宪北伐匈奴时北匈奴单于西走康居。这一部分匈奴人应当就是史书上提到的悦般部。而另一部分羸弱走不动的匈奴人则留在龟兹以北。康居原分布于锡尔河中、下游迤北的草原地带，是游牧部落，史称其"迁徙无常，不恒故地"。可能是在北匈奴西迁浪潮的冲击下，康居被迫南迁到索格底亚那地区。所以在以后的汉文史料中，往往康居、粟特（索格底亚那）并称，并说康国（即撒马儿罕）为"康居之后"。看来，在康居南迁时也有一部分匈奴人随着南来。没有南迁的匈奴人，后来则循着咸海、里海以北欧亚草原的通路西迁到了欧洲。

檀石槐死后，鲜卑势力渐衰。直到该族的拓跋部再度强盛，兼并诸部，在中国北部建立代国。其首领拓跋郁律在割据今晋北一带的同时，向草原上发展，以至"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百万"。[④]到拓跋珪时，于公元 386 年正式建立北魏王朝，并逐步把中国北部统一起来。

北魏的北面有柔然部，也是一个游牧部落国，"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经常威胁北魏边境。北魏多次征伐之，不能解决问题。柔然在其首领社仑时"远遁漠北，侵高车，深入其地，遂并

① 格鲁赛：《草原帝国》，第53页，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

②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七，《尼雅城北古城所出晋简跋》。

③ 《晋书·武帝纪》。

④ 《北史》卷一。

诸部”，势力大增。这时，柔然在西北方面同“匈奴余种”相接。可见，柔然已经接近今准噶尔盆地。据说，当时匈奴余种的首领名叫拔也稽，他率领军队进攻社仑。社仑在頞根河（鄂尔浑河）大破之，兼并其部。于是，柔然的领土西到焉耆，东达朝鲜，北过沙漠瀚海，南临大碛。而其大本营则在敦煌、张掖之北。但据其他的记载，则柔然的势力已达到了中亚的北部。如中国史料说，大月氏“北与蠕蠕（柔然）接，数为所侵”。[①]又说悦般“与蠕蠕结好”。中亚北部草原地区，游牧部落先后相继，强邻迭起。他们对贵霜国的攻击显然是使其逐渐衰弱下去的原因之一。

在西面，伊朗的安息王朝这时被新兴的萨珊王朝所代替。萨珊是这个王朝皇族的始祖。此人又被宣传说是阿赫门王朝皇族的后裔。这样，萨珊王朝就被说成是阿赫门王朝的直接继承者了。

萨珊其人，大约是波斯波利斯一个阿纳喜特神庙的祭司，也就是阿赫门王朝发源地的人。萨珊之子帕巴克做了赫尔[②]侯。帕巴克的儿子阿尔达希尔[③]是达腊布镇[④]的要塞司令。当时，安息王的势力已在同罗马的战争中大为削弱，其内部分崩离析，各地区均各自为政。据《卡尔纳玛》[⑤]及费多西的《列王纪》等书讲，伊朗分成240个小邦。帕巴克所占据的地区只是其中之一。安息国王阿尔达万（希腊作者写作Artabanus）不过徒有其名而已。

尽管安息王朝的首领也属伊朗语族，并自称是起源于阿赫门王朝，但波斯人（指今伊朗西南部的萨珊家族）并不承认，波斯的历史学家也不承认。他们都把安息王族说成是外来的统治者。波

① 《魏书·西域传》。

② 赫尔，是今设拉子东南的一个小镇。

③ 据《卡尔纳玛》、《列王纪》及公元6世纪拜占庭作者Agathias等说，萨珊娶帕巴克之女，生子阿尔达希尔。以后，帕巴克就被传说为阿尔达希尔之父。此说与后来阿拉伯文与新波斯文的说法相同。

④ 达腊布镇，在今设拉子东南约209公里处。

⑤ 《卡尔纳玛》（Karnamag），即《帕巴克之子阿尔达希尔的事迹》（Book of Deads of Ardashir, Son of Papak），是一部中世纪的波斯文著作。

斯人一直准备推翻安息王朝的统治和重建阿赫门王朝，统一全伊朗。因此，阿尔达希尔继承王位当了邦君以后，就立即开始对外进行扩张。他首先向东征服和吞并了克尔曼，杀其王沃洛格斯（Vologeses），以自己的儿子代之为王。克尔曼的首府被称为阿尔达希尔城。接着打败了苏西亚那（今库齐斯坦）、伊斯法罕等地的王公，兼并其土地。为此，安息王阿尔达万（阿尔塔班努斯）率领大军前来进攻阿尔达希尔的老巢法尔斯，但被打败，安息王损失惨重。公元224年，在阿瓦士东面的霍尔木兹平原上的会战中，安息国王兵败阵亡。两年后（226年）阿尔达希尔又夺得安息的首府泰西封（Ctesiphon），建立伊朗历史上的新王朝——萨珊王朝。这个王朝统治了四个世纪之久，直到阿拉伯帝国的兴起。

在伊朗的萨珊王朝取代安息王朝的同时，西方的罗马帝国则逐步地走向没落和崩溃。这时罗马的奴隶制已走到了它的穷途末路，经济发生危机，政治上日益腐败，内乱频仍。康茂德皇帝于公元192年被杀。塞维鲁皇帝即位后情况仍无好转，不但内部混乱，而且外部遭到日耳曼人的入侵，烽火遍地，日夜不宁。军事政变，层出不穷，帝国政权濒临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新兴而稳固的萨珊王朝就时刻准备着对罗马进行复仇战争。后来多次打败了罗马。公元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巴尔干半岛东部的拜占廷建都，称为君士坦丁堡。到公元4世纪末，罗马帝国终于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一为东帝，一为西帝。

萨珊王朝建立后，贵霜王韦苏特婆（即中国史料中的波调）曾同亚美尼亚结成反对该王朝的同盟。据Moise de Knorene所著《亚美尼亚史》（第2卷第72章）记载，在萨珊帝国创建者阿尔达希尔一世（226~240年）即位后，亚美尼亚王霍斯洛一世组织了一个反萨珊王朝的同盟。一个名叫Vehsadjan的贵霜王[1]参加了这个

① 法国学者基尔什曼认为这个贵霜王就是韦苏特婆。

同盟，但两年后又退出了。

又据阿拉伯历史学家塔巴里说，阿尔达希尔曾进攻萨喀斯坦，随后又进军古尔干、木鹿、缚喝和花剌子模地区，一直打到呼罗珊国土边境，再回师木鹿。他杀死了许多人，把人头奉献给火神庙。以后又从木鹿回到法西尔斯卡，驻军于科尔。这时，贵霜王、土兰国王、莫克兰国王的使者都来向他归顺。塔巴里的这段记载可能有些夸大。

公元240年，阿尔达希尔去世，亚美尼亚的哈特拉（Hatra）地区立即反叛。沙普尔一世即位后即西征平叛。接着他又乘当时罗马亚力山大皇帝（222~235年）被人刺杀后的混乱局面，于公元241年率军侵入罗马所属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攻陷安条克城，挑起了在位时期的第一次萨珊—罗马战争。

沙普尔在西线作战时，任命其第三子瓦拉兰（Varahran）到东面指挥作战。这已得到沙普尔铭文①的证实。因这篇铭文中提到了“贵霜国”，并列举了公元260年左右萨珊帝国各省区的名称，包括“直到白沙瓦的贵霜帝国”。从上下文看，此时贵霜国似已被沙普尔一世所吞并。该铭文也提到古粟特国，说它也被沙普尔一世征服了。故有的书上说沙普尔一世越过阿姆河到了中亚（Transoxiana）。②

另据塔巴里说，沙普尔一世在即位11年后便攻打奈西本。奈西本驻有罗马军队。他围困奈西本有一段时间，后闻呼罗珊有情况，乃立即转向该地区。这段记载表明，东部地区一直有战事。基尔什曼认为，沙普尔一世在西线亲自指挥作战，而他的儿子瓦拉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不久，芝加哥东方研究院考察团在波斯波利斯附近的纳黑希鲁斯塔姆发现了沙普尔一世时代（241~272年）用三种文字（希腊文、帕尔提亚文和巴列维文）刻写的一篇铭文。此铭文可能写成于262~263年左右。国王把这篇铭文称为“帝国铭文”，其内容主要是介绍沙普尔一世战胜罗马的功绩。沙普尔一世被称为King of Kings of Iranand Non-Iran。

② 见《剑桥伊朗史》，第258页。

兰则没有参加对罗马的战争。他可能是东部战场的指挥官。有的说，东部作战的原因是：沙普尔一世在向罗马开战之前，为解除后顾之忧，才首先出兵击垮贵霜。其时间在公元241~242年。巴格兰（Begram）即毁于此时。

从公元253~254年开始，沙普尔一世侵占叙利亚。当时他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对付罗马。以后，萨珊王朝在沙普尔二世时（310~370年）对东方进行了战争，于公元369年取得对巴克特里亚的胜利。公元374年（或375年）贵霜与嚈哒合作打败了沙普尔二世。这两次战争，可由卡拉·特佩石窟寺发现的属于公元639年的萨珊王朝铭文得到证明。

对于波斯萨珊王朝的进攻，贵霜国尽管进行了抵抗，但还是衰落下去了。这时，南面的印度在公元3世纪时分裂成许多小国。这些小国在贵霜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而贵霜国则退处于一隅之地了。

到公元4世纪前半期，在摩揭陀又兴起了一个新的王朝——笈多王朝。这个王朝像波斯萨珊王朝一样，自称是代表本国的民族传统，以驱逐外来的占领者为其使命。所以，笈多王朝反对贵霜，但它的实力不如萨珊王朝的强大。经过同贵霜的多次战争，笈多王朝取得了印度西部的一些地区，却未能完全将贵霜势力驱逐。笈多王朝在4世纪后期与5世纪前期最为强盛。中国高僧法显就是在这时去印度游历的。

至于今中亚地区，也分裂为许多小国。公元436年，中国北魏王朝曾派遣使者董琬、高明等至西域，到了乌孙、费尔干纳、塔什干等地。董琬回国后的报告把西域分为四个地区，即葱岭以东、流沙以西为一个地区；葱岭以西、海曲以东为一个地区；者舌（塔什干）以南、月氏以北为一个地区；两海之间（应指里海与咸海之间）、水泽以南为一个地区。据说在这些地区“诸小渠长盖以百数”。这里所要叙述的主要是后三个地区。这些地区的居民，基本

上仍然是操东伊朗语，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民族迁人，如月氏、乌孙、匈奴等。前面已经讲到，阿姆河以北的索格底亚那曾被大月氏人占据。后来大月氏人虽越阿姆河征服南面的大夏（巴克特里亚），但他们并没有放弃索格底亚那之地。河北的许多地方仍然由大月氏人所统治。如汉文史料中提到的所谓昭武九姓，其实就是指的大月氏人。史书上说："康国，……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国。枝庶各分王，故康居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①这就是指月氏人被从河西走廊驱逐出来的事实。康国又称悉万斤，即撒马儿罕，处于索格底亚那的中心地区，在阿姆河以北，与前面叙述的大月氏历史完全一致。

现参照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叙述中亚地区各小国的状况。

首先是索格底亚那，中国史料称为粟特。该地区北接克孜耳沙漠，南界喜萨尔山与泽拉夫善山，东邻费尔干纳，西至阿姆河下游。主要城镇为撒马儿罕与布哈拉。从考古资料看，在公元5~6世纪时，弥秣贺（Maimargh）是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在汉文史料中称为米国，距那色波不远，都城在那密水（泽拉夫善河）之西、卡什卡河之北，在撒马儿罕以南约七公里。其国王亦姓昭武，与康国王同族。米国地区发现人工灌溉设施，灌溉着泽拉夫善河以南的土地。那色波国，即那黑沙不，称为小史，今称卡尔施。史国，在都莫水（卡什卡河）之南，南距吐火罗（即巴克特里亚）五百里，相当于今沙赫里夏勃兹之地。其国王亦姓昭武，与康国王同族。何国，又称屈霜你迦（贵霜尼亚），即今卡塔·库尔干，在那密水南数里。何国"东去曹国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国三百里"。国王姓昭武，与康国王同族。安国，即今布哈拉地区，曾一度被安息占据，都城在那密水之南，"城有五重，环以流水，宫殿皆平头"。其国王亦姓

①《北史·西域传》。

昭武，与康国王同族。

者舌，亦称石国，即今塔什干地区。“在破洛那西北”，“居于药杀水（锡尔河）”。曾被康居所占据。其中心为宾刻特城，其南则为安格连河流域。东为破洛那国，又称钹汗国，即大宛。据中国史料的记载，公元285年，晋武帝司马炎曾派杨颢为使者，越葱岭，拜大宛首领兰庾为大宛王。其国“西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西北去石国五百里”。其国王也姓昭武。苏对沙那国，即乌什鲁沙那，又称东曹，在今乌腊·提尤别（吉扎克与忽占之间的河谷地带）。而曹国则属康国管辖，“东南去康国百里，西去何国百五十里”，首府在那密水南数里。

花剌子模国，在公元1~3世纪时一直受贵霜帝国的控制。在这个时期，花剌子模的城市大有发展。灌溉工程在贵霜时期最为发达。当地的艺术品明显地表现出受到健陀罗和古希腊、印度的影响。从公元3世纪起，花剌子模有一个阿夫里格王朝，其中心为后来的柯提。

阿姆河下游地区还有乌那遏国，都于阿姆河之西，旧为安息属地。其王姓昭武，与康国王同族。又有穆国，即木鹿，都于阿姆河之西，亦安息故地，与乌那遏为邻。其王亦姓昭武，与康国王同族。这说明，昭武族分布之地到了阿姆河西南，并不限于河中之地。塞克斯说，汉文史书上把这些地区称为“安息之故地”，表明迟至公元6世纪时中国仍不知波斯有王朝更替之事。[①]但《北史》和《魏书》的《西域传》主要是根据董琬等人的报告而写的，并不能肯定在那以后还不知波斯的情况。《北史·西域传》中关于波斯的记载就是非常确切的，完全符合波斯的情况。这一点塞克斯已经指出了。

吐火罗国，即故大夏国的巴克特里亚，“都葱岭西五百里”。

① 塞克斯：《波斯史》，第1卷，第447页，伦敦1951年英文版。

其地南界兴都库什山，北界喜萨尔山与阿姆河，东至葱岭，西达木尔加布河。

伽色尼国，今加兹尼，在喀布尔西南，有的以为即漕国（漕矩吒）。[①]而《北史·西域传》则说，漕国的国王姓昭武，为康国王之宗族。

小月氏国，其王为大月氏王寄多罗之子。都富楼沙城（今白沙瓦）。中国史料说他们本居于西平（西宁）、张掖之间，“被服颇与羌同”。寄多罗为哌哒所逐，西迁，于公元420~438年间建国于中亚。史称“寄多罗南侵北天竺”，役属“乾陀罗以北五国”。可能在寄多罗迁至巴里黑不久，哌哒人即跟踪而至，故他们不得不放弃巴克特里亚，走保兴都库什山以南之地，称为小月氏国。

以上是主要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其他不著名或地点不明确的不尽录。总的来看，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大部分仍然是昭武族的大月氏人。只是由于贵霜帝国在公元3世纪以后逐渐衰落，才不能再维持这些地区的统一，各地便分裂为许多小国。史书上说“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②]近来有的说这里讲的匈奴是指哌哒。哌哒于公元357~367年间灭粟特，征服索格底亚那。[③]正是由于这个地区分裂不统一，遂又沦为哌哒的附庸。

附　萨珊王朝世系表：

阿尔达希尔（Ardashir）	224~240年
沙普尔一世（Shapur）	240~270年
霍尔穆兹一世（Hurmazd Ⅰ，Hurmazd-Ardashir）	270~271年
巴赫兰一世（Bahram Ⅰ）	271~274年
巴赫兰二世（Bahram Ⅱ）	274~293年

① 烈维、沙畹：《罽宾考》，载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59页。

② 《魏书·粟特国传》。

③ 余太山：《〈魏书·粟特国传〉辨考》，载《文史》第21集。

巴赫兰三世（Bahram Ⅲ）	293年
Narseh	293~302年
霍尔穆兹二世（Hhurmazd Ⅱ）	302~309年
沙普尔二世（Shapur Ⅱ）	309~379年
阿尔达希尔二世（Ardashir Ⅱ）	379~383年
沙普尔三世（Shapur Ⅲ）	383~388年
巴赫兰四世（Bahram Ⅳ）	388~399年
伊嗣俟（Yazdgird Ⅰ，耶斯提泽德）	399~420年
巴赫兰五世（Bahram Ⅴ）	420~438年
伊嗣俟二世（Yazdgird Ⅱ）	438~457年
霍尔穆兹三世（Hurmazd Ⅲ）	457~459（？）年
卑路斯（Peroz）	459~484年
巴拉斯（Balash）	484~488年
居和多一世（Kavad Ⅰ，第一次在位）	488~496年
Zamasp	496~498年
居和多一世（Kavad Ⅰ，第二次在位）	498~531年
胡斯老一世（Khusrau Ⅰ Anushirvan）	531~579年
霍尔穆兹四世（Hurmazd Ⅳ）	579~590年
胡斯老二世（Khusrau Ⅱ，第一次在位）Parvez，	590~628年
巴赫兰六世·处宾（Bahram Ⅵ Chobin）	590~591年
Bisam	590~596年
胡斯老二世（Khusrau Ⅱ，第二次在位）	591~628年
居和多二世（Kavad Ⅱ）	628年
阿尔达希尔三世（Ardashir Ⅲ）	628~629年
	（Shahrbaraz，929）
（Boran及其他王）	629~632年
伊嗣俟（耶斯提泽德）三世Yazdgird Ⅲ	632~651年



第二节　哌哒强国的代兴

哌哒人在侵入索格底亚那，初与波斯、印度接触时，曾经自称为匈奴人，有一些西方作者则称他们为白匈奴人。希腊和亚美尼亚的作者称他们为Aptolits或Ephtals。波斯与阿拉伯的作者称他们为Haytal人。拜占廷的史家Theophanes说该族得名于其王Ephthalanus之名。汉文之哌哒应即其王厌带夷栗陀（Ephthalites）一名之简称。

在汉文史书中，关于哌哒人的起源和族属问题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车师别种"；①另一种说是"大月氏之种类"。②似以前者为胜。③还有的认为哌哒是匈奴与月氏的混血种，故其肤色较白。汉文史料说，哌哒人最早称为滑，分布于阿尔泰山以南到天山东部的地区。公元126年，其首领八滑曾经参加班勇指挥的对北匈奴呼衍王的战争，有功，被封为后部亲汉侯。这里所说的后部，也表明哌哒人分布的所在。直到公元4世纪时，哌哒还是一个小部，隶属于柔然。④

柔然的压迫及其对西方各部的进攻，可能是促使哌哒人西迁的原因。他们大约是循着月氏西迁的路线来到索格底亚那。考古者已经在布哈拉附近发现了哌哒故都的废墟。在阿姆河三角洲发现的属于公元5~8世纪的城堡库由克—卡拉，据研究也是属于哌哒人的。这些都说明，哌哒人是先占据了索格底亚那，然后才南侵到今阿富汗的北部。当时他们的主要中心还不是在瓦赫舒

---

①《梁书》。

②《魏书》。

③ 前苏联学者托尔斯托夫，不但把大月氏，而且把哌哒人也说成是玛撒该塔伊人，其理由是说哌哒的词根为getae。

④ 余太山认为哌哒不可能役属于柔然，见《哌哒史研究》，第62~63页，齐鲁书社1986年版。

（Vakhshu，即阿姆河上游）河谷。[1]弥南《希腊史》（残本）说，粟特人在臣服于突厥以前曾经是嚈哒的臣民，也证明这点。[2]格鲁赛则认为，嚈哒人西迁的时间晚在公元5世纪30~50年代，其统治之地从焉耆西北到巴尔喀什湖、楚河与塔拉斯河流域，以及从锡尔河到咸海。[3]

嚈哒人占据了索格底亚那以后，很快就南攻贵霜。大约在公元5世纪20年代占领其地。德国东方学家诺尔德克（Noeldek）认为，嚈哒人是在波斯王巴赫兰五世（Bahram V 420~438年）时期定居于巴克特里亚的。在这以后，嚈哒人便进一步征服了吐火罗、巴达赫善、克什米尔、喀布尔、健陀罗与旁遮普。向东则乘柔然衰败之机，占据塔里木盆地的许多地方。正如《梁书》所说的，嚈哒“后稍强大，征其旁国波斯、盘盘、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于阗、句盘等国，开地千余里”。[4]从此，嚈哒成了中亚强国。它是中国与波斯之间的居间国。由于嚈哒与波斯的关系密切，所以西方的罗马、拜占廷、叙利亚与亚美尼亚等国的历史学家为我们保存了一些关于嚈哒其与波斯关系的史料。

最早同嚈哒人发生了关系的波斯国王也就是上述的巴赫兰五世。据说嚈哒人由于听说波斯王及其宫廷生活奢侈豪华，很想去抢掠财物，便从索格底亚那南渡阿姆河，向呼罗珊地区进发。巴赫兰国王是一个多谋的人，他平常喜好猎取野驴，故又被称为巴赫兰·固尔（Gur，意为野驴）。当他得到嚈哒人来袭的消息时，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反而说要去打猎。他把波斯帝国的军队都

① 罗侯罗：《中亚史》，第114页，加尔各答新时代出版社1963年版。

② 亨利·玉尔编《中国古代闻见录》，第1卷，第205~207页，伦敦1866年英文版。

③ 格鲁赛：《草原帝国》，第67页，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

④ 藏文文献中说，在于阗第十四代君主Vijayakirti时代，其地遭到外来侵略者的蹂躏与统治，人民蒙受苦难。此后，Drug-gu之阿诺勺又率军侵入于阗。这里说的Drug-gu，指突厥。突厥之入侵于阗，在嚈哒之后。

召集起来，亲自率领着朝阿塞拜疆方向狩猎去了。巴赫兰及其大军迅速地消失在厄尔布尔士山中，以极快的速度向东前进，秘密地来到了东部边境。他在谋夫地区的库斯梅汗（Kusmehan）战役中大败哌哒人，杀其王，俘获其妻室与无数战利品。巴赫兰还派遣一名将领率军越过阿姆河，以镇压索格底亚那的哌哒人。哌哒人请和，双方缔结的和约，把边界定在塔里寒[①]，在该地建筑石塔以为标志。

巴赫兰又曾出征印度，夺得信德与马克兰之地。他在位的时期是波斯帝国极盛的时期。

巴赫兰五世于公元438年去世，其子伊嗣俟（耶斯提泽德）继承其位，史称伊嗣俟二世（438~457年）。据亚美尼亚史家埃里塞的记载，这位波斯国王曾多次同东边的"匈奴人"或"贵霜匈奴人"（实际上都是指哌哒人）作战，互有胜负。伊嗣俟二世有二子，长名卑路斯，次名霍尔穆兹（史称霍尔穆兹三世）。波斯王爱其次子，欲立之，便将长子卑路斯派到锡斯坦去任地方长官。及伊嗣俟二世于公元457年去世，霍尔穆兹三世得立为嗣君。卑路斯得知恐惧，乃弃官渡过阿姆河逃到哌哒人当中。卑路斯向哌哒王阿赫勋瓦尔（Akhshunwar）求援，后者派了一支三万人的军队帮助他返国，夺得波斯的王位。

卑路斯即位不久，由于耻居哌哒的保护之下和担心哌哒的扩张，便与哌哒发生了冲突。但波斯王屡次被哌哒打败。卑路斯既无力胜过哌哒，便向西面的拜占廷帝国求援。他像以前巴克特里亚的希腊国王攸提德谟斯说服塞琉古王朝一样，也对拜占廷皇帝说，哌哒游牧人对波斯的威胁就是对东罗马的威胁。拜占廷史学家普里斯库曾经提道："464年，卑路斯遣使去莱昂皇帝那里，要求罗马用资金支援波斯对寄多罗匈奴人（KideiraHunnen）的战争。"据余太山的研究，认为这里说的寄多罗匈奴人即指哌哒人。因此，

① 这里的塔里寒在巴里黑以西400公里。参看诺尔德克引塔巴里书。

拜占廷就给卑路斯提供了大量的黄金，以支持其对嚈哒的战争。卑路斯于公元465年进攻嚈哒时，拜占廷的使者也随同去了。有一个这样的传说，说卑路斯为了避免嚈哒人责备他越过边界，他便用大象拉着塔里寒城前移。但在这次战争中，卑路斯兵败被俘。有的史料说，卑路斯被迫答应给嚈哒缴纳用30头骡子驮满装上白银的口袋。他无能力征收到30头骡子驮的白银，就把自己年幼的儿子居和多（Kavadh）留下做人质。同时给嚈哒缴纳大量的贡赋。为此，他对波斯居民大肆进行了搜刮，人民承受了沉重的负担。

公元480年，卑路斯率军进攻巴克特里亚。当地的统治者为嚈哒王阿赫勋瓦尔之子。可是，卑路斯又失败被俘，最后交付了赎金才得以释放出来。这次他被迫将边境上的塔里寒城让给嚈哒，答应以后不得越过巴赫兰时所确定的边界。

公元484年，卑路斯又发动对嚈哒的战争。他以古儿甘城为大本营，在城郊建筑了抵御嚈哒人的围墙（其废墟至今犹存）。[①]波斯人以此处为基地向嚈哒进攻，一直打到谋夫。嚈哒人佯作败退，引诱卑路斯及其部队落入预先设置的陷阱，将其全部歼灭。卑路斯本人也在这次战役中丧命。普罗科庇斯曾谈到这次战役的情况。据说，白匈奴（即嚈哒）是在靠近边界处扎营，营前掘了一道又深又宽的壕沟，仅留一条狭窄的通道出入军营。壕沟挖成后，灌满水，覆上芦苇泥土，不露痕迹。当波斯军队临近时，白匈奴派一小支骑兵从通道冲出来和波斯军交战，随即迅速撤退，从狭窄的通道返回军营。波斯大军见对方败逃，尾随追之，纷纷陷进那由芦苇泥土掩盖起来的壕沟，顿时大乱。白匈奴乘机从军营中冲杀出来，围歼波斯军。卑路斯遂死于是役。[②]

---

① 古儿甘城在里海东南角，临古儿甘河，为与嚈哒接壤之波斯要塞。普罗科庇斯则说是在波斯边界对面的一座嚈哒城市，是这两个民族频繁冲突的中心。孔宁汉用其说。见沙畹《西突厥史料》第197页及注。

② 转引自麦高文：《中亚古国史》，第413页，纽约1939年英文版。



卑路斯死后，其弟沃洛格斯即位（484~488年）。拜占廷历史家称此人为巴拉斯（Balas）。沃洛格斯命锡斯坦总督负责同嚈哒谈判，结果波斯被迫向嚈哒纳贡三年，成了嚈哒的属国。派了代表驻在波斯专门索要贡赋。波斯财政枯竭，国库空虚，实在无力向其缴纳应缴的贡物。这时，波斯权臣扎尔密赫尔（Zarmihr，是此人拥戴沃洛格斯登位的）带领自己的军队，设计迫使嚈哒王阿赫勋瓦尔签订条约，同意不再征收贡赋并归还被俘人员。巴拉斯之子居和多因而被释归国。扎尔密赫尔便在公元488年废黜沃洛格斯，立居和多为波斯国王。居和多统治波斯达43年之久（488~531年）。

在居和多时期，波斯波利斯有一个名叫马兹达克的人（塔巴里则说是你沙不儿地方的人）宣传一种教义，说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所以应当废除社会上的特权，实行共产共妻，应当禁止杀牲为食。居和多认为马兹达克教是削弱贵族势力、加强王权的有利工具，便积极支持，而且自己也表示信仰该教。这就引起了贵族们的反对。他们废黜了居和多，另立其弟扎马斯普为波斯王。居和多被幽禁，后在其妻的帮助下逃往嚈哒。他在那里又娶了嚈哒公主为妻。这个公主是居和多的外甥女，即卑路斯的外孙女。卑路斯为质于嚈哒时，曾以其女嫁嚈哒王，生此女。扎马斯普不愿同得到嚈哒支持的居和多作战，便将王位归还给他。居和多得以复辟。嚈哒居和多在位时期，波斯继续向嚈哒纳贡。公元502年，居和多曾与嚈哒联盟进攻拜占廷帝国。嚈哒军队参加了对哈兰（Charran，在今土耳其东南的乌法地区）的围攻战。但在公元503~513年的十年中，波斯与嚈哒之间又不断有冲突和战争发生。在这以后，由于突厥对嚈哒的威胁，后者便逐渐衰落，不复为波斯患。

嚈哒人是在公元5世纪中叶开始侵入印度的。当时印度笈多王朝在位的皇帝是塞建陀笈多（Skand Gupta，455~467年）。此时代的比泰里石柱铭文及朱纳格尔石刻铭文都提到塞建陀笈多同

入侵的匈奴人(实即嚈哒人)作战,捍卫了自己的国家的事迹。这时,嚈哒人已经完全统治了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吐火罗斯坦地区,并屡次打败波斯,故能抽出兵力,南下进攻渐趋衰落的笈多王朝。

公元5世纪末或6世纪初,嚈哒人才灭掉兴都库什山以南、健陀罗及印度河流域的寄多罗王朝或寄多罗子孙统治的诸小国。中国僧人宋云于公元518年从洛阳出发去西域取经。[①]于次年(519年)路过嚈哒国。据称:"正光元年(520年)四月中旬,入健陀罗国,土地亦与乌苌国相似,本名业波罗国,为嚈哒所灭,遂立勑懃为王,治国以来,已经二世。"又云:(嚈哒)"受诸国贡献,南至牒罗,北尽勑懃(敕勒),东被于阗,西及波斯,四十余国皆来朝贡。王张大毡帐,方四十步,周回以氍毹为壁。王著锦衣,坐金床,以四金凤凰为床脚。见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诏书。……四夷之中,最为强大"。[②]但未写明嚈哒国王的名字。据印度发现的石刻及钱币(如侨赏弥印章,库腊石刻),一个嚈哒王名叫头罗曼(Tora-mana),曾侵入笈多朝的印度,他的部众被称为"匈奴人"。另一个嚈哒王是头罗曼的儿子,名叫米嘿剌库剌(Mihirakula),一般认为即《大唐西域记》上提到的摩醯罗矩罗。

头罗曼在位的时间与波斯王居和多同。他们所铸造的钱币完全是仿照笈多钱的模式,一面是国王的头像及其名字(用笈多字),另一面是孔雀图。国王像皆多须。头罗曼曾在瓜廖尔(Gwalior)建筑了一个太阳神庙,说明他不是佛教徒。

头罗曼的儿子摩醯罗矩罗,曾以奢羯罗为都城以统治印度的属地。据说他"有才智,性勇烈,邻境诸国莫不臣服"。曾毁灭佛法,斥逐僧徒,无复孑遗。另外,在公元530年到过印度西海岸的埃

① 《魏书·释老志》作熙平元年(516年)遣惠生等使西域。《嚈哒传》同。兹从《洛阳伽蓝记》、《释迦方志》及《资治通鉴》。

②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范祥雍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并参考沙畹笺注本,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六编》。

及旅行家科斯马思·印第科卜流斯提思，也谈到㖩哒国王带领着两千只象和无数骑兵出去作战的情况。

这时，摩揭陀的国王名叫婆罗阿迭多（Baladitya），他“崇敬佛法”，反对㖩哒王。㖩哒王率兵讨伐，反而兵败被俘，但随即获释。这时他的王位已被自己的弟弟占据，他便北投迦湿弥罗国，矫杀其国王而自立。“乘其战胜之威，西讨建驮逻国，潜兵伏甲，遂杀其王，国族大臣，诛锄殄灭。毁窣堵波，废僧伽蓝，凡一千六百所。”[①]诛戮僧徒，不遗噍类。不到一年，摩醯罗矩罗就突然于公元542年死去。㖩哒国不久也就一蹶不振。

在东方，㖩哒同中国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曾经作为柔然的属部，㖩哒首领同柔然贵族互通婚姻。如㖩哒王有三个妻子都是柔然首领婆罗门的姊妹，所以婆罗门在失势时便想叛北魏投靠㖩哒。[②]当时，柔然的属部还有高车。公元487年，柔然不顾高车副伏罗部首领阿伏至罗的反对而侵犯北魏边境。阿伏至罗便与其族弟穷奇率领部众叛离柔然，西迁到今乌鲁木齐一带，自立为王。阿伏至罗居北，穷奇居南，分部而立。这时西域的形势，可用冯承钧的一段话概括之。他说：“当时㖩哒之势正强，天山南路诸国多役属之。天山北路自龟兹以北，西抵伊犁河下游，似为悦般人居地。……悦般与蠕蠕为仇敌，故高车移其部众就之。……则当高车西徙之后，其新居地东有蠕蠕，西有悦般；悦般之西与天山之南，尽属㖩哒。”[③]可见当时㖩哒势力范围之大。

在上述的局面下，㖩哒开始同高车发生了利害冲突。为了争夺对中西商路的控制，特别是为了争夺对这条商路的要地高昌的控制，㖩哒向高车进攻。在战争中杀死了高车的首领穷奇，并将穷奇之子弥俄突俘虏而去。高车的另一首领阿伏至罗因残暴失众被

① 《大唐西域记》卷四，季羡林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 《北史·蠕蠕传》，《北史》，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262页。

③ 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第40~41页。

部下杀死，其族人跋利延被拥立为高车王。嚈哒为了控制高车，就派军队把弥俄突送回，一方面是为了立弥俄突为高车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镇压那些不愿服从弥俄突或反对嚈哒的人。在有嚈哒大军为后盾的弥俄突的威胁下，高车人杀死跋利延，拥戴弥俄突为王。弥俄突实际上不过是嚈哒的傀儡。当时，高昌王麴嘉处于高车的势力之下。嚈哒控制了高车，也就等于控制了高昌，而焉耆则已掌握在嚈哒手中。

嚈哒对待东面各部的策略是，利用高车来限制柔然的发展。公元516年，高车与柔然发生战争。高车首领弥俄突被柔然主丑奴打败擒获。丑奴将弥俄突之两脚系于驽马之上拖死，漆其头为饮器。弥俄突的部众遂全部并入嚈哒。这就增强了嚈哒的力量。几年以后，嚈哒把弥俄突之弟伊匐送回，立之为高车王。伊匐率军大破柔然，柔然可汗婆罗门逃到凉州，向北魏投降。

嚈哒既称霸于西域，又控制了商路，所以嚈哒的使者及商人来向中国中央王朝进贡和来中原经商是很频繁的。他们所走的商路都要经过高昌的。正如北魏的宣武皇帝元恪在给高车的诏书中所说的："蠕蠕、嚈哒、吐谷浑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

为了进一步说明嚈哒与中国中原地区的商贸关系，今据中国史书所载，列举嚈哒向中国朝贡的事实如下：

《魏书·高宗纪》：太安二年（公元465年）十一月，"嚈哒、普岚国并遣使朝贡"。

《魏书·世宗纪》：正始四年（公元507年）冬十月辛未，"嚈哒、波斯、渴盘陀……诸国并遣使朝贡"。

《魏书·世宗纪》：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正月壬辰，"嚈哒、薄知国遣使来朝，贡白象一"。

《魏书·世宗纪》：永平四年（公元511年）九月甲寅，"嚈哒、朱居　……等诸国并遣使朝献"。

《魏书·世宗纪》：延昌元年（公元512年）十月，"嚈哒、于阗、

高昌及库莫奚诸国并遣使朝献”。

《魏书·世宗纪》：延昌二年（公元513年）八月庚戌，“嚈哒、于阗、槃陀及契丹、库莫奚诸国并遣使朝献”。

《梁书·滑国传》：天监十五年（公元516年）嚈哒王“厌带夷栗陀始遣使献方物”。

《北史·元澄传》：“西域嚈哒、波斯诸国各因公使，并遗澄骏马一匹”。

《魏书·肃宗纪》：熙平二年（公元517年）四育甲午，“高丽、波斯、疏勒、嚈哒诸国并遣使朝献”。

《魏书·肃宗纪》：神龟元年（公元518年）二月戊申，“嚈哒、高丽、勿吉、吐谷浑、宕昌……诸国并遣使朝献”。

《魏书·肃宗纪》：神龟二年（公元519年）四月乙丑，“嚈哒国遣使朝贡”。

《梁书·滑国传》：普通元年（公元520年），“又遣使献黄狮子、白貂裘、波斯锦等物”。

《北史》四：正光五年（公元524年），“嚈哒遣使朝贡”。

《梁书·滑国传》：普通七年（公元526年），（滑国）“又奉表贡献”。

《魏书·孝庄纪》：永安三年（公元530年）六月戊午，“嚈哒国献狮子一”。

《北史》五：永熙元年（公元532年），“嚈哒遣使朝贡”。

《梁书·武帝纪》：大同元年（公元535年）三月辛未，“滑国王安乐萨丹王遣使献方物”。

《梁书·武帝纪》：大同七年（公元541年）三月乙亥，“高丽、百济、滑国各遣使献方物”。

《周书》五十：大统十二年（公元546年），（嚈哒）“遣使献其方物”。

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明帝二年（公元558年），（嚈哒）

并遣使来献。后为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职贡遂绝。[①]

当然，在史书中还有一些关于西域东夷各国遣使朝贡的笼统的记载，其中也可能包括哌哒。但哌哒朝贡的主要事实应当就在上面列举的这些年代里了。在这以前，由于柔然的阻隔，交通是不便的。所以，哌哒来中国通贡主要是在公元6世纪的前半期，也就是在柔然开始衰落之后。由于高车的叛离，柔然的势力退出塔里木盆地和天山东部，哌哒的势力左右高车，遂得以控制中西商路，这使哌哒能与中国中原地区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从而也加强了中国同中亚的经济文化交流。只是到了公元6世纪中叶哌哒衰亡时，才不再见于中国史书的记载。

在公元5世纪到公元6世纪中这个时期，哌哒是中亚大国。它不但曾威震波斯，君临印度，而且遏阻了柔然的扩张。但它也像历史上其他由游牧部落建立的强国一样，迅速地崛起，迅速地消逝了。

第三节　公元3~6世纪中亚的经济与文化

在贵霜帝国时期中亚地区的奴隶制度曾经发展到繁荣阶段，到公元3世纪以后走上了衰落阶段，并逐步地向封建社会过渡。关于这一社会经济的变化过程，主要是从一些考古发掘的资料看到的。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工作，以在花剌子模地区进行得较多。其结果总起来是说明封建关系在逐步产生。例如：城市相对地衰落了。自然经济的加强表现在出现了一个一个的庄园，而这种庄园的周围又都建筑了设防的围墙，并发展成为城堡，农民渐渐失去自由，固着在土地上。这种庄园主，即土地所有者贵族，称为德赫干[②]。

① 《周书》卷四、卷五〇及《北史》卷九，明帝二年朝贡在六月癸亥。

② 德赫干（Dihkan，或写作Dihakan。dih，意为村庄），即村庄之首领的意思。前苏联学者斯米尔诺娃说德赫干是伊朗语，汉语为"昭武"。

德赫干住在城堡中，享有一切经济、政治的特权，俨如邦君。每个庄园中心都有高高的塔楼，有士兵守卫。围墙外是田地、果园，广阔达二三十公里。城堡外还有市场，并有广大的人工灌溉网，由庄园主掌握。在市场的基础上发展为城镇。每个庄园及其周围形成的城镇，等于是一个独立国家。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它自足自给，这就促成了这个时期中亚地区在政治上的分散性和许多小国的各自为政。无论是贵霜或𠯋哒的统治者，都只是高高在上，满足于征收赋税，而不干预基层的行政管理。

这里的居民基本上从事农业。农民种植的作物有稻、小麦、黍、大麦、豆类、苜蓿、葡萄诸果，可能还种植棉花。中国史书上讲，诺色波罗国与伽不单国，“土平，宜稻、麦，多五果”。石国“有粟、麦，多良马。”康国“宜五谷，勤修园蔬，树木滋茂”。乌苌国“土多林果，引水灌田，丰稻、麦”。漕国“多稻、粟、豆麦”。罽宾国“种五谷，粪园。田地下湿，生稻”。但畜牧业仍占有一定的分量。𠯋哒人原系游牧人，虽然这时有的已经转上了定居和农业，但仍然保持很大分量的畜牧业。宋云见到此时的情况就是：“居无城郭，游军而治，以毡为屋，随逐水草，夏则随凉，冬则就温。”𠯋哒人一部分已由游牧转为定居：其王已进入城市，“都拔底延城，盖王舍城也。其城方十余里”。[①]

另外，公元568年突厥初次遣使至东罗马时，查士丁尼二世皇帝曾向使者问及𠯋哒人的情况：“（他们）是住在城镇里呢？还是住在乡村中？”突厥使者回答说：“他们是城镇部落。”当然，在中亚地区游牧民族不止𠯋哒一个，经营畜牧业的地区也遍及各处。如波洛那出名马，称为“汗血马”。吐火罗“山穴中有神马，每岁牧马于穴所，必产名驹”。故其地产“好马、驼、骡”。康国“出马、驼、驴、封牛”。安国“有粟、麦，多良马”。这说明了当时农牧业的一般情况。

① 《北史·𠯋哒传》。

中亚各地的矿产也是很丰富的。著名的如:者至拔国出“美铁”。迷密国“出金、玉,亦多铁”。伽色尼出“赤盐”。呼似密“出银”。罽宾国产“金、银、铜、锡”。康国出“黄金、硇沙”。钹汗出“朱沙、金、铁”。漕国产“金、银、镔铁”。根据发掘的资料,还知道忽毡附近山中出产银与铜,巴达赫善产青金石与红宝石。因此,炼铁、冶铜,制造各种金属工具和兵器,以及纺织、刺绣、雕刻等手工业,这时在中亚都有所发展。史书上提到罽宾地方“其人工巧,雕文刻镂,织罽。有金、银、铜、锡,以为器物”。考古发掘证明,忽毡地方有制造金器与珠宝的手工业。特别是,这时中亚已经掌握了最早由埃及人发明的制玻璃之法,也掌握了制琉璃之法。中国史料记载,在北魏太武皇帝拓跋焘时(公元424~439年),大月氏人“商贩至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①]从这段记载可知,中国之学会制造琉璃,还是由中亚人介绍的。[②]又通常认为,中国的造纸法是在公元8世纪中传入中亚的。但近代在中亚发现的古代纸张和文书,证明中国的造纸法可能在这时已西传至中亚。

中亚的粟特人历来是以经商著名的。史称其“善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他们的主要作用是充当中西商路上丝绸贸易的中介人。他们辗转贩卖,足迹遍于西亚、中亚、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直到长安、洛阳的丝绸之路沿线各地。有许多粟特人还在这些地方定居、殖民,建立自己的居民点。敦煌发现的唐光启元年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就提到石城(汉楼兰地)、鄯善新城、蒲桃城、萨毗城等地的康国人(粟特人)居民点。《北史》讲,粟特国

① 《北史·西域传》。这里的“国中琉璃遂贱”,《魏书·大月氏传》作“中国琉璃遂贱”。沈福伟谓“中国”是“中原”,仅指黄河流域的中下游,见所著《中西文化交流史》第100页。

② 埃及制造琉璃方法之传到中国南方可能早在公元以前。

"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魏）克姑臧，悉见虏"。前面提到的传授制琉璃方法的大月氏人，也是商人。根据中、西史料的记载看，当时丝绸之路上贩运的货物，除中国的丝绸以外，就是玻璃、香料、宝石、颜料等。又有史书上记载的：大秦的明珠、夜光璧、璆琳、琅玕，波斯的颇梨、琉璃、水晶、绫、锦、郁金、苏合、胡椒、石蜜、珊瑚、玛瑙、琥珀、珍珠和画眉的颜料。还有巴比伦的地毯、埃及的织物、天竺的白真檀和摩尼珠等。

无论在贵霜国时期和哌哒时期，其统治者显然都从控制这条商路获得巨大利益。里海沿岸的贸易港口都掌握在哌哒的手中。他们操纵着同伊朗、拜占廷、印度以及中国的贸易。同样，萨珊王朝也起着贸易中介的作用。丝绸之路经过伊朗的一段，便是控制在萨珊王朝手中。哌哒统治者像以前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王和贵霜诸王一样，也发行了钱币，来满足国内流通和国际贸易的需要。考古者已发现了哌哒的银币。这种银币上有一种尚不认识的铭文，据信是哌哒文。萨珊王朝的银币，不但大量流通到哌哒所属的中亚境内，而且流通到中国。这种银币现已有大量发现。据夏鼐的统计，在中国发现的波斯银币达1174枚之多。因当时中国通过阿富汗同波斯有交通贸易。中国发现的萨珊王朝银币以沙普尔二世（310~379年）及其两个嗣王的为最早。后来，波斯王卑路斯由于受制于哌哒，向其称臣纳贡，割地赔款，故哌哒能以其得自波斯的赔款，对中国进行贸易，遂使卑路斯及其以前的银币大量流通于中国。夏鼐又指出：公元5世纪后半期至6世纪初，中国与波斯来往频繁，仅公元455~521年这66年间，波斯遣使至中国就达十次之多，有几次还和哌哒的使者一起来中国。在定县塔基所发现的银币中有一枚伊嗣俟（耶斯提泽德）二世（438~457年）的银币，边缘压印一行哌哒文字的铭文，这反映了波斯、哌哒及中国三者的关系。[①]此外，中亚本地诸小国也有自己铸造钱币的，如布哈拉地方

① 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载《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的统治者仿照波斯巴赫兰五世（421~438年）的钱铸造一种钱币，称为“布哈拉·胡达特钱”。研究者认为，这种钱是公元5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在布哈拉铸造的。再有花剌子模也铸造了自己的钱币。这些，都反映了当时商品交易的需要。

在中亚同中国中原地区之间经济关系日益密切，丝绸贸易更加活跃的同时，它们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也空前发展起来。以佛教的传播为例，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从中原地区去西域求经的僧人接踵而至，而西域的僧人来中原地区传教的也是络绎不绝。这时中国处在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局面下，广大劳动人民在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下，苦难深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茫茫人世，何处是乐土？人们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来世与天国。这就为佛教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温床。中国的佛教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从中国中原地区去西域求经的僧人，最早的如颍川朱士行，于公元260年去西域求经，但仅到于阗。以后到晋末宋初时期，这种西行求经的活动达到了高潮。据汤用彤的统计，共有十多批，其中以法显最为知名。在南北朝时期，以北魏的宋云、惠生等为最著。法显于公元399年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从长安出发，于公元402年翻度葱岭到北天竺，其间，经陀历（Daril）[1]，渡印度河，历乌苌国[2]，至斯瓦特（Swat）、健陀罗[3]、弗楼沙（白沙瓦）。然后南去中天竺，循恒河至海口，乘船经狮子国而还。宋云于公元518年从洛阳出发，于公元519年冬西行至嚈哒国，继入天竺，于公元521年返回。他们的西行不仅是佛教史上的壮举，而且他们的游记为中亚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如《魏书·嚈哒传》就是根据宋云的行记写成的。据法显所记，陀历国“有众僧，皆小乘学”。

---

① 今克什米尔西北部印度河北岸的达丽尔。

② 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河流域。

③ 健陀罗，为斯瓦特河流入喀布尔河的附近一带。

有木刻大佛像。乌苌国“佛法甚盛。名众僧止住处为僧伽蓝，凡有五百僧伽蓝，皆小乘学”。健陀罗国“其处亦起大塔，金银校饰。此国人多小乘学”。弗楼沙国“凡所经见，塔庙壮丽，威严都无此比”。从《宋云行记》所述，知道嚈哒人是不信佛和反对佛教的。他说：“四夷之中，（嚈哒）最为强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杀生血食。”而其所经历的乌场国（即乌苌国）则仍信佛。健陀罗人民“崇奉佛教”，“为嚈哒所灭，遂立敕勤为王。治国以来，已经二世。立性凶暴，多行杀戮，不信佛法，好祀鬼神”。看起来，嚈哒的统治对中亚和印度佛教的发展是不利的。

自孔雀王朝亡后，印度的佛教中心地区本已从恒河流域转移到印度的西北部，佛教也很快传到中亚各地。如康国即“奉佛为胡书”。吐火罗国“俗奉佛”。故这个时期到中国传播佛教的僧人，中亚各地人反而多于天竺人。嚈哒的统治也可能是促使大批中亚僧徒前往中国的原因之一。将佛经译成汉文的也多是中亚人，并且有许多是从西域胡语转译的，而非直接译自梵文。中亚各族对于佛教之东传起了很大的作用。

除佛教外，祆教也得到了复兴、发展和传播。产生于公元前7世纪的祆教（琐罗亚斯特教），在安息王朝初期由于希腊文化的影响曾经一度消沉，到安息王朝后期才逐渐复活。萨珊王朝取代安息王朝以后，大力振兴伊朗的民族文化，复兴祆教是其注意的重点。祆教的经典《阿维斯塔》就是在萨珊王朝的建立者阿尔达希尔时期下令收集整理、编撰成书的。现存的《阿维斯塔》，不但包括琐罗亚斯特传教时期口传的教义，而且包括后来编成的赞美诗和繁琐的礼仪规则。从此，祆教成了波斯的国教。随着萨珊王朝影响之所及，祆教也通行于中亚各地。史书记载，康国“有胡律，置于祆祠，将决罚，则取而断之”。可见其与佛教并存。《梁书》说滑国“事天神火神”，说明嚈哒人也是信仰祆教的。祆教之传入中国，是在北魏时期，到唐代仍然流

行。①

另一种重要的宗教是摩尼教，也产生于波斯。据阿勒·比鲁尼说，摩尼生于公元215年或216年。摩尼自己说是巴比伦库特哈河（Nahr–Kutha）地区马尔狄奴（Mardinu）村的人。他是一个跛子，一只腿坏了。摩尼创教后，于公元241年25岁时被允许在波斯王沙普尔一世的加冕典礼上宣布自己的宗教。他所宣传的教义是一种禁欲主义。他认为，由光明与黑暗的混合而产生的物质世界本质上是罪恶的，所以应尽一切努力来逃避这个罪恶的世界。因之，结婚和人类种族的繁衍都是罪恶。他也主张素食。摩尼教像祆教一样也宣传二元学说。布朗（Brown）说它是一种基督教化了的祆教。摩尼宣传的宗教，起初对波斯国王及其宫廷有很大的影响，但后来他失宠，被流放。摩尼到处游荡，据说到过印度、克什米尔等一些地方。他于公元272年沙普尔一世死后返回波斯。沙普尔一世的嗣君霍尔穆兹一世很尊敬摩尼，允许他自由传教，使摩尼教获得许多信徒。但霍尔穆兹仅在位一年，他的后继者巴赫兰一世改变了对摩尼的态度，将其逮捕。巴赫兰国王说："这个人是要号召人们毁灭这个世界，必须在他的计划实现以前消灭他。"比鲁尼说："巴赫兰杀了摩尼，将其剥皮，以草实之，挂于贡狄萨普尔城门之上，该城门至今仍被称为摩尼门。"

摩尼虽然被杀，他所创的宗教并没有被消灭。恰恰相反，摩尼教在巴比伦、在中亚的撒马儿罕都得到广泛的传播。特别是在中亚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中传播得更广。在西方，则传入到欧洲的法国南部和北非的埃及、迦太基。

①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第141页。《长安志》卷七："城中有波斯寺二，胡天祠四。"方豪说：此二波斯寺指景教寺与摩尼寺。（方豪《唐代景教史稿》）而此四胡天祠则指祆教寺。宋敏求《长安记》也说唐贞观年间有祆祠四，在布政坊、醴泉坊、普宁坊与靖恭坊。宋姚宽《西溪丛语》卷上说，唐贞观五年（631年）有传法穆护（Magus）何禄将祆教诣阙闻奏，敕令长安崇化坊立祆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

据说摩尼写了许多书。他最早的一部书,为了献给沙普尔一世是用巴列维文写的,而其他的著作则是用叙利亚文写的。摩尼根据阿拉米亚字母发明了一种文字。他还是一个画家。他写的书都是图文并茂。阿拉伯作者说,摩尼流放期间在突厥人当中得到许多信徒。当时突厥人既有信佛教的,也有信摩尼教的。后来发现许多用突厥文和粟特文书写的摩尼教文书。

再是聂思托里派的基督教(景教)。这个教派产生于公元5世纪前半期。[①]其创始人聂思托里乌斯(?~451年)是叙利亚人,于公元428~431年期间任君士坦丁堡教务大总管。他的主张于公元453年被斥为异端邪说,其本人被放逐。当时,波斯萨珊王朝同东罗马帝国处于敌对的状态,故凡在东罗马遭到迫害和斥逐的人,如来到波斯便受到宽容和保护。因此,聂思托里乌斯和他的追随者逃往波斯,在那里建立总教会。景教在波斯的传播一度得到相当的进展,甚至有许多波斯的高级官吏也信奉其教。波斯王虽曾对其加以限制,但到公元567年库思老一世同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订立五十年和约,竟在该条约中规定在波斯宽容基督教。以后,景教逐渐传播到呼罗珊、巴克特里亚及中亚地区。景教徒们将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著作译成波斯文或叙利亚文。后来古典著作的阿拉米亚文译本主要是根据他们的译本翻译的。法国学者俞阿尔特说,景教教徒之定居于波斯乃是其教传入亚洲的起点,从而把景教的影响带到伊朗帝国境外很远的地方,带到了大陆的北部和中国。而叙利亚文字也就随着他们的传教而传播开去了。如后来的回鹘人就采用了这种文字。[②]景教后来在唐朝时传入中国内地。明朝天启五年在西安发现的《大唐景教流行中国碑》,就是用

①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英文版,布里校注本,第5册,第110~121页。

② 俞阿尔特:《古代波斯与伊朗文明》,第127页,伦敦1927年英文版。

汉文和叙利亚文刻写的。

在古代和中世纪，各种文化都与宗教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为宗教服务。随着宗教的传播，文化交流也相应地得到发展。以文字为例，近代在中亚和丝绸之路沿线发现许多用粟特文书写的佛教、摩尼教文书，从此可以看到当时粟特文通用之广。这与粟特人的经商、传教活动是有关系的。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花剌子模也有自己的文字。哌哒文曾见于钱币。佉卢文仍通行于旁遮普及印度西北各地。笈多朝的印度文字亦见于吐火罗。故法显说，西域“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这同阿拉伯语之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而得到传播是一样的道理。



片吉肯特壁画局部：骑士（公元7世纪）

纳尔沙喜①曾经说布哈拉的瓦拉赫沙地方有建筑得很好的宫殿。1947~1952年曾经对布哈拉西北35公里的瓦拉赫沙故城进行了一系列的发掘，完全证实了这一点。这是一座贵霜帝国后期的故城，可能是当地统治者“布哈拉·胡达特”的驻地。城堡与

① 纳尔沙喜，公元10世纪前半期人。他曾在公元943年用阿拉伯文写过一部《布哈拉史》。

宫殿就在土丘的南端。城墙是用土砖砌成的，有塔楼。宫殿在中央，规模宏大，房间很多，其最早的部分属于公元3世纪，最后的部分则建于公元6世纪以后。令人感兴趣的是房间内面有壁画，极为精美。如宫殿中央大厅西墙上的一幅壁画描绘一个人骑在象背上与一个神话中想象的野兽搏斗，另一场面则画着一个人骑象与豹搏斗。这种壁画与片吉肯特发现的颇为相似。此外，壁画上还画了许多人、马、鱼、鸟、骑士、植物以及人头鸟身的怪物，都是用来装饰宫殿的。有的壁画上画着骑象的武士射带翅膀的野兽。研究者认为这些壁画是属于公元1~7世纪期间之物。瓦拉赫沙宫殿是粟特建筑艺术的最好标本。除壁画外，还出土有许多陶片、赤陶小像，许多男女像和动物像。所有这些，是研究伊斯兰教传入以前该地历史和文化的宝贵资料。另外，在阿姆河北岸的巴拉里克·特佩发掘了一个属于公元3~4世纪的设防堡垒，也发现壁画。



片吉肯特壁画局部：国王（公元7世纪）

片吉肯特壁画是索格底亚那地区保存得最好的和最重要的壁画。片吉肯特城废墟位于撒马儿罕西南65公里处，距布哈拉约35公里。该城建于公元4~5世纪，曾是嚈哒的首府，于公元722年首次被伊斯兰征服，部分毁于战火，其余部分残存至公元760年，最后全部摧

毁。片吉肯特城既有界市，又有僧院、城郊与墓场。建筑物内有大量的壁画，灰泥雕塑与木雕，大部分是中国唐朝时的作品，也有一些是唐朝以前的。有一幅壁画，画上的舞者是印度型。有的画了湿婆神像。有的壁画则描绘着费多西《列王纪》中的题材。弗鲁姆金称片吉肯特为“伟大的艺术中心，壮观的考古圣地”。

花剌子模的居民在公元3世纪时大部分是信仰袄教，同时也保存了许多更古老的宗教习惯。1938年曾对哈拉卡尔帕克境内的托普拉克·卡拉城堡进行发掘。据研究，该城从公元1世纪到6世纪是花剌子模的首府。发掘出来的除一个宫殿外，还至少有三个巨大的火神庙。其地有精巧的人工灌溉工程。城内有大的市场。宫殿建于一个高地上，可俯瞰全城。宫内有房间数百，分为三层，上层已毁。余下的房间亦有壁画，当初装饰是很美的。

从上所述，可以看到中亚的粟特文化是多种宗教并存，既有袄教、佛教，也有摩尼教与景教。考古发掘出来的建筑、绘画和造型艺术，都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同时，中亚的音乐也是颇为发达的，而且受到波斯、印度的影响不小。史书上说，康国“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宋云行记》说，乌苌国“击鼓吹贝，琵琶箜篌，笙箫备有”。这些乐器，有的后来传到中国内地，对隋唐音乐的发展具有影响。

第七章 突厥的起源与西突厥汗国

第一节　突厥的起源及其早期的发展

在哌哒逐渐衰弱的同时，中国的西北部又有一个强大的部族兴起，这就是后来在中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突厥。

关于突厥的起源，在中国的汉文史籍中曾经记载了各种各样的传说，如海右遗黎说（李延寿《北史》），漠北索国说（令狐德棻《周书》），平凉杂胡说（长孙无忌《隋书》）等。所有这些传说都认为，在公元5世纪的后半期时，突厥人已迁至高昌北山至阿尔泰山以南一带。当时，漠北的柔然汗国正处于强盛时期。突厥人擅长于冶铁锻铸的技术，"工于铁作"。他们起初是以向柔然输送铁制工具和兵器作为贡赋的。故史称其"为茹茹锻工"。而在柔然统治者的眼里，整个突厥人都是他们的奴隶。在那个民族压迫的时代，这是很自然的。

有压迫，就有反抗。中国西北地区的突厥语各族显然进行了长期的反抗柔然统治的斗争。如高车部，就是一个操突厥语的部族。在高车于公元487年反叛柔然的斗争中，可能就有突厥参加。但突厥之独立出现于历史记载，则是在公元6世纪的前半期。如高昌王麹宝茂、麹伯雅等就曾娶突厥可汗之女为妻，说明突厥当时同高昌的关系很密切。

突厥大约到公元6世纪中期开始强大起来。公元6世纪40年代，突厥于每年冬季河水结冰后寇掠绥州（今陕西东部的绥德）。[1]公元545年，西魏宇文泰曾遣酒泉胡人安诺盘陀通使于突厥。突厥人大喜，以为这是其国将兴的征兆。

汉文史料记载的突厥早期的首领，有阿谤步、伊质泥师都、纳都六设、阿贤设、大叶护等人，其事实皆语焉不详。然见于突厥文碑铭中的传说，则把土门可汗（突厥文作布民）和室点密可汗（突厥文作伊室点密）当做突厥的英雄祖先。汉文史料说，此二人是兄弟，为大叶护之子。突厥"至大叶护，种类渐强"。[2]

公元546年，铁勒诸部（回纥是其中之一部）准备进攻柔然，突厥可汗土门率其部众邀击之，大败铁勒，吞并其众五万余落。[3]突厥势力由此大振。土门恃其强盛，向柔然求婚。柔然首领阿那瑰大怒，使人辱骂土门说："你是我的锻奴，怎敢如此胡说！"土门受辱，怒杀柔然使者。公元552年，土门发兵进攻柔然，大破之，阿那瑰自杀。柔然汗国崩溃。土门开始自称为伊利可汗。一般讲突厥史的书都以此为突厥汗国建国之始。

突厥强大起来以后，也像其以前的匈奴、哌哒一样，尽力要控制中西商路，以便从中获得利益。为此，突厥首先灭掉了柔然。这使之与哌哒直接为邻。进一步灭掉中亚的大国哌哒，就成为达到上述目的的必要步骤。

这时候哌哒已经削弱了。印度的地方邦君把哌哒王摩醯逻矩罗一族的势力从旁遮普排挤了出去。在西方哌哒再也不能成为波斯的威胁，反而经常被波斯王居和多打败。向中亚方面发展的突厥势力，成为波斯的同盟者。公元554年，突厥的木杆可汗同波斯王库思老一世（公元531-579年，又名奴细尔汪）建立了关系。双

① 《周书·宇文测传》。
② 《隋书·突厥传》。
③ 《周书·突厥传》。

方配合，在公元553~558年间大举进攻哌哒。哌哒大败，其王被杀，其领土被突厥与波斯所瓜分。双方议定，以阿姆河为界。据阿拉伯史料的记载，波斯取得了巴里黑、谢飑（即阿拉霍西亚）、喀布尔、石汗那、吐火罗。突厥取得了塔什干、费尔干纳、撒马儿罕、布哈拉、渴石、那色波。阿姆河北之铁门为两国界址。[①]英国学者吉布说，从这个时候起，哌哒人也像贵霜人一样，渐渐为伊朗居民所同化。不过，在阿姆河以南的某些地方，仍然存在一些由突厥支持的哌哒小国。这些小国继续给波斯的东北边境造成麻烦。[②]

突厥木杆可汗为了巩固同波斯的盟好，以女嫁库思老一世为妻，后来生了霍尔穆兹四世。具体完成攻灭哌哒的，就是突厥的西面可汗室点密。但当时东西突厥尚未完全分裂，故史书上以为这是木杆可汗的业绩，说："木杆勇而多智，遂击蠕蠕灭之，西破挹怛（哌哒）。"[③]塔巴里《编年史》说，击败哌哒而杀其王的是突厥汗Sindjibu。弥南《希腊史》（残本）说，是Silzibul或Dizabulusl。法国学者沙畹考证，这些都是指的室点密，说这个名字的后半部就是西突厥首领的称号"叶护"，前半部才是其名字，应当称为Sinjabgu。[④]而《旧唐书·西突厥传》则说："室点密从单于统领十大首领，有兵十万众，往平西域诸胡国，自为可汗，号十姓部落，世统其众。"这也就是指灭哌哒之事。

突厥既征服了中亚，其领土便从蒙古草原一直达到了波斯帝国的边境。正如史书上所说的："（木杆可汗俟斤）西破哌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⑤]突厥对于这么

① 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02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② 吉布：《阿拉伯人在中亚的征服》，第3页，伦敦1923年英文版。

③ 《隋书》。

④ 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01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⑤ 《周书·突厥传》。这一段文字中的"契丹"，应为"契骨"；如为契骨，则又重复。

广阔的地区的统治，类似以前的匈奴，即分为东、西两部。其上有一可汗为最高首领，维系着名义上的统一，但实际上东、西两部的独立性是很大的。正如巴尔托里德所说的："公元6世纪的突厥国家同绝大部分游牧国家之区别，在它一开始就不处于个人的权力之下，而是处于一个王朝的统治之下。统治该国西部的诸汗一开始就是完全独立的，甚至接受外国的使节，与之签订条约，而不必像后来蒙古帝国时期金帐的最初几个汗那样，要把外国的使者送到东部来。"[①]了解了游牧帝国的这个特点以后，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西突厥同拜占廷的关系及其对中亚的统治了。

突厥占据中亚，将领土扩展到阿姆河，意味着它有可能同拜占廷建立直接的关系，并控制所谓的丝绸之路。这能使突厥获得重大的利益。

当时，来自中国的生丝，对波斯来说乃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原料，可能也是波斯对外贸易中最重要的货物。波斯以高价向拜占廷出卖生丝。另一方面，波斯也用中国的生丝作原料来织成波斯纺织品。这种波斯的丝织品大量出口到拜占廷，给波斯带来更大的利益。由于丝对拜占廷来说是必需的消费品，所以波斯尽量利用这点来营利。

自公元572年以来，波斯同拜占廷帝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战争延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只有一些间断。这种战争是同丝绸贸易有关的。新兴的突厥帝国如同拜占廷结盟，就能对波斯人起到一种牵制和夹击的作用。因为突厥人可以在丝绸之路沿线设立关卡，剥夺波斯人的收入来源。

当时从事丝绸贸易和东西方货物贩运买卖的主要是粟特人。他们尽力讨好突厥统治者，与之共同进行贸易，故与突厥贵族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但是，这条商路的更西一段即伊朗，却控制

① 巴尔托里德：《中亚突厥诸族史十二讲》，罗致平译，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在萨珊王朝的手中。粟特商人想要到波斯贸易或路过其地，必须得到萨珊王朝的许可才行。因此，粟特商人尽力说服突厥统治者派一个商业贸易代表团到波斯去，其目的是要得到同该国进行丝绸贸易的许可。突厥可汗同意了这个要求，派出一个由粟特商人马尼亚赫为首的使团前往波斯。

这时，突厥势力向中亚发展，使得突厥与波斯之间的矛盾逐渐突出起来。从经济利益上说，萨珊王朝也想独占中西商贸之利，决不可能让粟特商队自由过境。因此，当突厥方面派遣的由粟特人组成的使团到来，并提出自由过境的要求时，波斯王一再拖延不作答复。粟特人一再请求，纠缠不休，波斯王无法，就召开宫廷会议进行讨论。这时，波斯朝廷有一个降附的哌哒人，名叫卡士勒甫斯。他建议收购粟特商人贩运的丝绢以焚烧之，以示波斯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同突厥谈判。波斯王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大量丝绢便付之一炬。使团回报突厥可汗。突厥此时尚无意同波斯决裂，便又派了第二个使团前去。这次，波斯王竟下令将突厥使团的大部分人员毒死（只有三四人幸免），反而放出流言说："突厥的使者们是由于波斯气候干热被闷死的。因为突厥人的地方常常下雪，在天气太热的地方是无法生存的。"从此，波斯与突厥结仇。

经过伊朗的丝绢贸易既不可行，马尼亚赫便又向突厥可汗室点密建议直接与东罗马联系。于是突厥又派他率领使团去东罗马。使团带了突厥可汗的书信和大批丝绢作为礼物，于公元568年初到拜占廷谒见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二世，受到热情的接待。罗马皇帝向其了解突厥的情况。他们说，突厥有四个首领，其最高首领为室点密。并告知查士丁尼皇帝，突厥已打垮哌哒。但另有一个部族逃脱，跑到西方去了，这个部族名叫阿哇尔，其人数估计有2万。罗马皇帝则将在拜占廷已进行了培养的蚕种拿出来给突厥人看，目的是要使突厥人相信拜占廷不一定需要他们的货物。使者请求在突厥与拜占廷之间建立友好同盟的关系。东罗马方面同意了他

们的要求，并派遣以西里西亚人蔡马库斯为首的一个使团，于公元569年随同马尼亚赫等来突厥报聘。

蔡马库斯等在特克斯河谷地见到了西突厥可汗，双方结盟。时突厥可汗正要出兵去进攻波斯，便请蔡马库斯同行。[①]但这次突厥被波斯打败。突厥既不能用武力制服波斯，便又在公元571年再次遣使去东罗马，请求查士丁尼皇帝废除东罗马与波斯之间已缔结9年的和平条约。查士丁尼答应了突厥的要求。

蔡马库斯返回以后，东罗马还曾先后派遣攸提开俄斯、瓦伦丁、赫洛店、保罗等人出使于突厥。突厥力劝东罗马进攻波斯。以后东罗马与波斯攻战达10年之久。

以上中亚的外交活动，都与丝绸贸易的利益有关。这里，且附带说一下养蚕术西传的问题。

西方各国既很需求丝绸，而从中国贩运又路远多险，于是很早就有人想办法要把蚕丝生产之法传入欧洲。拜占廷历史家特奥发尼斯（750~817年）谈道："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有一个波斯人至拜占廷传授养蚕的方法，这是以前拜占廷人所不知道的。此波斯人曾居赛里斯国，归时将蚕子（藏于）竹杖中，携至拜占廷。春初，将蚕子放到桑叶上，育出幼蚕。后生蛾，有两翼，以后又继续变化。以后查士丁尼皇帝以养蚕生丝的方法告诉突厥人（已见前面所述），突厥人大为惊奇，因为此时突厥人已经从波斯人的手中夺得与赛里斯人通商的市埠了。"[②]另外，在普罗科庇斯的《哥特战记》中也谈到一个蚕丝传入拜占廷的故事。[③]总的说其时间是在突厥灭嚈哒之前（552年左右）。但养蚕缫丝和纺织技术的发展这时在拜占廷还谈不上。所以当时的丝绸贸易仍然是一个国际间

① 亨利·玉尔编《古代中国闻见录》，第1卷，第205~207页，伦敦1866年英文版，所辑弥南《希腊史》（残本）英译本。

② 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升译，第116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③ 普罗科庇斯：《哥特战记》，中译本。

题。齐思和先生说："养蚕缫丝需要复杂的技术，长期的经验。拜占廷养蚕业发展的很慢。但在很长久的时期，拜占廷在欧洲方面垄断着生产蚕丝与纺织蚕丝的技术。12世纪中叶，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南意大利西西里王罗哲儿二世（1127~1154）自拜占廷帝国虏劫织丝工人两千，将他们移往南意，从此意大利才渐能从事于丝绸的生产。至于西班牙、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等地，从事此项工业，已经是13世纪以后的事了。"[①]

继匈奴、鲜卑、柔然以后兴起的突厥，也像其先行者一样，引起了欧亚草原的民族迁徙。西迁的匈奴人曾以Huns之名威震欧洲。而突厥的兴起，也驱逐了一些游牧人西迁。如所谓的阿哇尔人，在到达欧洲以后为当地人所畏惧，并不逊于匈奴人。

东罗马史家普里斯库早就提到，东方有一个名叫阿哇尔的部族。公元461~465年间，阿哇尔人曾压迫Savirs族[②]西奔，而后者又驱逐着Saraguri、乌罗、浑三族西走，而阿哇尔人自己又亡于别的种族。上述Saraguri、乌罗、浑等三族西迁到伏尔加河流域及黑海北岸。这些部族在西迁中曾路过高加索。那里的人误以为他们是可怕的阿哇尔人，便以此名称呼他们，而他们也就以阿哇尔人自居。

公元6世纪中叶的历史家弥南在其所著的《希腊史》中说，公元557年时，阿哇尔人到了阿兰人的地区。阿兰人的国王萨罗秀斯尽力同他们搞好关系。他们派了一个名叫坎地赫的使者来到君士坦丁堡，向东罗马索要土地与贡金。查士丁尼皇帝接见了他，并派遣（曾经出使过突厥的）瓦伦丁到他们的可汗处，与他们结盟，怂恿他们去进攻保尔加人[③]的后方，以解除拜占廷所受到的威胁。这些假阿哇尔人打败了他们，也打败了分布于亚速夫海西北以及顿河河口附近阿提拉匈奴人的后裔，并兼并其部落。在北面，他们还

① 齐思和：《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载《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

② 杨宪益说此族即悦般。

③ 即匈奴人和Savirs人的后裔。

击溃了诸斯拉夫部落，向西则侵入日耳曼尼亚。公元565年左右，其王巴颜即位。两年后，占领匈牙利。至此，他们就统治了从伏尔加河到奥地利的广大地区。

这些西迁的部族，究竟是不是阿哇尔人？阿哇尔人究竟是不是中国史料中提到的柔然人？关于这些问题，现在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但6世纪末的拜占廷历史家塞俄非拉克土斯·西摩卡特斯已经指出：突厥的室点密可汗打败阿哇尔人以后，一部分阿哇尔人奔中国。定居于拜占廷北境的实际上是假阿哇尔人，他们同那些奔中国的阿哇尔人不是一回事。他们之所以要采用阿哇尔人这个名称，是为了吓唬他们的敌人。他认为，他们是乌罗、浑人。乌罗、浑人在公元562年时，已经驻扎在拜占廷的北部边境多布鲁加（Dobrudja）。他们冒用了阿哇尔之名。在两个半世纪中，假阿哇尔人是东欧的一个主要强国。[①]

东罗马帝国同假阿哇尔人的结盟，及后者在其支持下对欧洲的扩张，引起了突厥人的大为不满。特奥发尼斯说，有一个名叫赫尔密克俄尼斯的部族，其王阿思结（Askel）曾遣使至君士坦丁堡，请求查士丁尼皇帝不要以土地给予他们。岑仲勉说，Askel即西突厥右厢五弩失毕之阿悉结。[②]公元576年，拜占廷皇帝提比留二世派遣瓦伦丁再次出使突厥。他到达西突厥时，正值室点密去世不久。[③]这次瓦伦丁出使的目的是：将提比留二世登位之事通知突厥，把因奉使而留居于拜占廷的106个突厥人送回，建议重订以前由蔡马库斯同室点密所订的盟约，并要求突厥从东面进攻波斯。可是，由于拜占廷给乌罗、浑等部族提供避难之所和居留之

① 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升译，第104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② 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第945页，注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③ 沙畹说："瓦伦丁之《行纪》可定室点密可汗之殁年，不在575年之岁末，即在576年之岁初。此种年代与中国史文亦甚相符，盖中国史文始见室点密子达头之年为582年也。"（见《西突厥史料》，第216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地，并同他们结盟和帮助他们扩展势力，从而引起了突厥的愤怒，所以瓦伦丁的使团遭到了冷遇。因为突厥人认为，上述乌罗、浑等部族乃是自己的奴隶。瓦伦丁见到了突厥首领土尔汗。土尔汗对他很不礼貌，责备罗马人欺诈，不应与突厥之奴乌罗、浑缔约，说突厥即将前去灭掉他们。接着又强迫瓦伦丁按照突厥的习俗，为其父室点密之逝世剺面表哀。瓦伦丁只好照办。以后，瓦伦丁去龟兹北白山谒见土尔汗之兄、新即位的达头可汗。达头对东罗马进行了强烈的谴责。据弥南所述，达头说："让那些乌罗、浑人等待我的骑兵的到来吧，我们的马鞭一晃，就会把他们吓跑。我们不用刀剑就可以消灭那个奴隶的种族，我们要把他们像蚂蚁一样踏在战骑的铁蹄之下。"因此，瓦伦丁备受屈辱而回。

为了对东罗马与假阿哇尔人结盟进行惩罚，突厥达头可汗派波汗率领一支突厥骑兵进入南俄草原，袭击克里米亚的拜占廷移民区，并在匈奴人首领阿纳盖的协助下围攻博斯普鲁斯的拜占廷城市潘替卡配乌姆。[①]以后，在公元 581 年，突厥又曾围攻克里米亚半岛，直到公元590年才最后撤出。

在室点密可汗去世以后不久，波斯萨珊王朝的国王库思老一世也在公元579年死去。其子霍尔穆兹四世即位。此王为突厥公主（木杆可汗之女）所生，故被称为"突厥女之子（Turk Zade）"。他虽然与突厥汗族是亲戚，但与突厥为敌。这与突厥、波斯在丝绸贸易上的利害冲突是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也由于同样的原因，波斯与东罗马战争不断。北面的可萨人也进攻波斯。特别在阿拉伯人兴起后，萨珊王朝没有能继续存在多久就为其所灭。突厥也分裂、削弱而衰亡，最后统一于唐朝。

① 潘替卡配乌姆，在今克里米亚的刻赤附近，当亚速夫海的入口处。

第二节 突厥的分裂与西突厥汗国

前面已经讲到，统治广大地区的突厥，其东西两部分实际上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名义上却维持着统一。由于东西地区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的特点不同，最后这种名义上的统一也维持不住，终于分裂成为互相敌对的两个汗国。

突厥的这种分裂究竟在什么时候发生和形成的呢？国内外的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资治通鉴》以为其事系之公元585年。法国学者沙畹说是在公元582年左右。[①]岑仲勉则说是在公元611~612年间。[②]英国学者吉布说："在巨大的突厥汗国于公元582年分裂后成为独立的西突厥的弩失毕五部，统治着索格底亚那和阿姆河中游盆地。"[③]本书在叙述中尽量考虑上述诸家的意见，并注意他们提出的历史事实，而不以某一年作为截然的划分。因为，整个突厥的统一都仅是名义上的，而西突厥则是本书要叙述的主要方面。

在导致突厥分裂的原因中，主要应是其统治集团的内争，但外部的因素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时中国南北朝分裂的局面趋于结束，隋朝杨氏政权以统一中国（包括中国的少数民族突厥）为己任。隋朝为了臣服突厥而对之施行的分化瓦解策略，显然是促成其分裂的重要因素。突厥的发展、盛衰与分合，永远是同中国总的形势息息相关的。

从突厥方面看，每当中国内地分裂衰弱时，它就得到发展壮大。所以，突厥"自俟斤（即木杆可汗）以来，其国富强，有凌轹中

① 沙畹：《西突厥史料》，第193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王小甫说是在公元583年，见所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3页。

② 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108页。

③ 吉布：《阿拉伯人在中亚的征服》，第3页，伦敦1923年版。



夏志。朝廷既与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1]与木杆可汗同时的西突厥室点密可汗,也称强于西域,与波斯、东罗马争霸。在隋文帝杨坚即位之前九年(572年),木杆可汗死,不立其子大逻便而以其弟他钵可汗即位。他钵可汗在位十年,于公元581年死,大逻便又因母贱不得立,遂与他钵可汗之嗣君庵罗不睦。庵罗不能制服大逻便,就将汗位让给其堂兄摄图(即土门之孙,他钵兄科罗之子),是为沙钵略可汗。摄图以大逻便为阿波可汗。

在东突厥因汗位的继承问题闹得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时候,西部的达头可汗则继室点密而统领部众,颇为强盛。而受突厥统治的各少数民族都痛恨沙钵略可汗的残暴。故"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应为契骨)之徒,切齿磨牙,常伺其便"。[2]隋朝的统治者就利用这些弱点来分化瓦解突厥汗国。

隋朝分化突厥的策略,具体表述在这一策略的设计者长孙晟的如下议论中:"玷厥(即西面达头可汗)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奸多而势弱,曲取于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弥缝,实怀疑惧。又阿波(大逻便)首鼠,介在其间,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霫,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承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隋文帝完全采纳了长孙晟的意见,于公元581年派太仆元晖到西部达头可汗处,赐给他以狼头纛。达头的使者来到隋朝时,让其座位居于沙钵略使者之上。又派长孙晟去联络沙钵略之弟处罗侯。目的都是要引起他们之间互相

① 《周书·突厥传》。
② 《隋书·突厥传》。

猜疑，以为反间。

沙钵略之妻为北周宇文氏之千金公主。她日夜怂恿其夫发兵进攻隋朝，为北周复仇。因此突厥连年犯边，但累被隋朝击败。公元582年，突厥沙钵略可汗与达头可汗合军攻入石门、木硖两关（今固原县境），兵临武威、天水、金城、上郡、弘化、延安。沙钵略还要南进，达头不同意，径自引兵退去。沙钵略不得已，也只好“回兵出塞”。公元583年，隋军分八道出击突厥。其中窦荣定的一路出凉州，与大逻便在高越原（今武威以北阿拉善右旗地）遭遇，大逻便屡败。窦荣定手下偏将长孙晟遣使劝大逻便背沙钵略附隋，大逻便从之，亦遣使随晟入朝。沙钵略在白道被隋将李充击败，逃回之后得知大逻便附隋的消息，便去袭击大逻便的根据地——北牙，大破其部落，杀大逻便之母。大逻便无家可归，就西奔投附于达头。达头大怒，派大逻便率兵东返。原属于大逻便的部落都来归附，将近十万骑。大逻便率其部落兵众打败沙钵略，夺回故地。以后，大逻便的势力得到很大的发展。他与沙钵略之对立，终于导致了突厥分裂为东、西汗国。

历史编撰者们皆以大逻便为西突厥。如《隋书·西突厥传》与《旧唐书·西突厥传》皆作此说。司马光《资治通鉴》也说：“阿波浸强，东距都斤，西越金山，龟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胡悉附之，号西突厥。”[①]日本学者伊濑仙太郎以为，西突厥之起源应求之于木杆可汗之子大逻便受沙钵略可汗的压迫而出奔至西面达头可汗麾下之时。但大逻便（即阿波可汗）并非西突厥之一可汗。西突厥的统治者是出自室点密一系的后裔。这一点，沙畹和岑仲勉都已指明。[②]

沙钵略可汗既为隋所败，又与西突厥达头可汗及大逻便攻战，东面受到契丹的威胁，不得已乃降于隋。公元586年，隋朝给突

①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482页。

② 沙畹：《西突厥史料》，第1~2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120页。

厥颁发历书。[1]不久，沙钵略可汗死，其弟叶护处罗侯继为莫何可汗。隋遣长孙晟册拜之，并赐以旗鼓。公元587年，处罗侯打着隋朝赐予的旗号，西攻大逻便，将其生擒。公元588年，处罗侯又率兵30万进攻波斯。这一事实，在阿拉伯文作者的著作中留下了许多记载。当时波斯萨珊王朝国王霍尔穆兹四世在位。突厥可能是乘波斯忙于与东罗马作战而采取这一行动的。霍尔穆兹四世命其手下名将巴赫兰·处宾率军抗击突厥，在赫拉特附近将突厥击溃。据塔巴里的《编年史》说，突厥方面的战象与战狮，遭波斯军箭射后，掉转头骇窜奔逃。突厥可汗沙巴本人被箭射死。[2]波斯军进达距布哈拉不远的沛肯城，擒可汗之子也里特勤（或称巴尔穆达）。[3]“巴赫兰兵入要塞，启其宝藏，发现宝物兵仗什器甚伙。中有额弗拉昔雅卜与阿尔加斯普之宝藏，与同西雅武什之冠带耳环。巴赫兰乃遣亲信人以骆驼数千载送于波斯王。”[4]塔巴里说，用了256峰骆驼来驮运黄金与宝石。15世纪的历史家密尔宽德夸大到说用了25万峰骆驼来驮运战利品。

随后不久，巴赫兰叛变弑君，霍尔穆兹四世之子库萨和·巴尔维兹（590~628年）于公元590年被拥立为波斯王。岑仲勉认为，处罗侯西征这一事实说明突厥尚未完全分裂。他说：“处罗侯于开皇八年（588年）尚西征波斯，可见东、西突厥当日之关系，仍得比于蒙古宪宗之世。”

在公元590年新即位的波斯王库萨和，愤于其父霍尔穆兹四世之被弑，便借东罗马兵与巴赫兰作战。巴赫兰被击败逃到突厥人当中，后被杀。[5]波斯的内战被突厥所利用。突厥乘机征服兴都

① 参看《隋书·高祖纪》。

② 沙巴，据考证即处罗侯。参看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130页。

③ 参看巴尔托里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117页，伦敦1928年英文版。

④ 沙畹：《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⑤ 赛克斯：《波斯史》（Percy Sykes, A History of Persia），第1卷，第480页，伦敦1951年版。

库什山以北的吐火罗地区（巴克特里亚）。所以，此地遂不再属于波斯，而成了西突厥的属地。故玄奘说，吐火罗各地"总役属突厥"。[①]

在塞俄非拉克土斯·西摩卡特斯的著作中，曾经提到突厥可汗于公元598年写给东罗马皇帝毛里斯（Maurice）的一封信。在信中突厥可汗自称为"七姓大首领，世界七国之主人"。说他曾征服回纥等族，平定内乱。又告称"既平内乱以后，国家遂安。由是与桃花石订立条约，维持和平"。沙畹以为，这个写信的突厥可汗应是达头。但其所述武功不尽属于一人。就在这个时候，波斯王库萨和曾派军侵吐火罗等地，后者求救于突厥。说明当时吐火罗、巴里黑、赫拉特等地都臣服于突厥了。波斯的境界只到谋夫及梅尔维鲁德一带。[②]

前述之阿波可汗大逻便被处罗侯擒获后可能被杀。西突厥达头可汗继续统治所部，发展势力，支持沙钵略的后继者都兰可汗进攻附隋的东突厥部落。公元599年，都兰可汗被部下所杀，达头乘东突厥之乱，占据漠北，大有要统一东西突厥之势。公元600年，达头率兵南下，在大斤山（大青山）遇上隋军，达头不战退走。[③]长孙晟出谋在突厥饮水之上游下毒药，"达头人畜饮之多死"，遂趁夜遁逃。[④]公元 603 年，有铁勒（回纥是其主要的组成部分）、思结、伏利具、浑、斛萨、阿拔、仆骨等十余部，一齐举行反对达头可汗的起义。达头部众溃散，逃奔吐谷浑地，不知所终。

在阿波可汗大逻便被擒，达头进据漠北期间，西突厥曾立达头之孙为泥利可汗。公元601年，泥利与叶护也都被铁勒击败。不久，泥利死（可能在公元603年），其子达漫继立，是为泥橛处罗可

① 《大唐西域记》卷一；格鲁赛：《草原帝国》英译本，第85页。

② 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20~226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③ 《隋书·突厥传》。

④ 《隋书·长孙晟传》。

汗。处罗时期(603~611年)是西突厥衰乱的时期。

从全国的形势看,隋炀帝杨广在公元605年继其父为帝。杨广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帝王,更加积极地从事疆土的开拓。他派了黄门侍郎裴矩去掌管中西贸易,接待西域商人,了解西域情况,以为进一步统一西域的准备。史家评论说:"及隋炀帝规摹宏侈,掩吞秦、汉,裴矩方进《西域图记》,以荡其心,故万乘亲出玉门关,置伊吾、且末镇,而关右及于流沙,骚然无聊生矣。若使北狄无虞,东夷告捷,必将修轮台之戍,筑乌垒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条枝之鸟卵,往来传输,将何以堪其弊哉!"[①]可见,隋炀帝颇有统一西域之志。

为此,隋朝统治者就设计瓦解西突厥。在西突厥内部,当时处罗可汗"为政苛察多忌","抚御无道,其国多叛"。[②]公元605年,处罗可汗进攻铁勒诸部,对该部人民征收重税,并勒其财物。处罗对薛延陀部也猜忌不放心,恐其反叛,于是就将其首领数百人全部集合起来,斩尽杀绝。这就引起了各部落的反抗,举行起义,反对处罗可汗。他们拥立铁勒契弊部首领歌楞为莫何可汗。处罗被打败,莫何可汗就开始强大起来。[③]

据史料记载,处罗可汗之母向氏是一个汉人。在处罗之父泥利死后,向氏"更嫁泥利之弟婆实特勒。开皇末,婆实与向氏入朝,遇达头之乱,遂留长安"。[④]这时,驻在敦煌的隋朝官员裴矩听到了铁勒打败处罗的消息,又了解到处罗之母向氏现在隋朝,就请准隋炀帝派崔君肃前去对处罗可汗劝降。崔君肃初到西突厥时,处罗倨傲不礼。崔君肃说:"东突厥启民可汗请求与隋联兵灭处罗,隋已应允,不日将出兵。向夫人闻知,向隋谢罪,请发使来召可汗。可汗如

① 《北史·西域传论》。

② 《隋书·西突厥传》。

③ 《隋书·铁勒传》。

④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622页。

不应召，则向夫人将得罪受戮，可汗亦将被剿灭，死亡无日。”处罗听了后，流涕受命，因遣使者随崔君肃向隋贡献西域汗血马。

公元609年，隋炀帝到河西地区巡视，遣使召处罗可汗到大斗拔谷（今甘肃民乐县南甘青交界处）来朝见，因“国人不从”未到。隋炀帝大怒，但无如之何。后用裴矩计封西突厥酋长射匮为可汗，令其兴兵袭击处罗。处罗大败，弃妻子，率余部数千骑东逃至时罗漫山（天山东部）。炀帝派裴矩与向夫人亲要左右等于公元611年底将处罗迎至洛阳，朝于临朔宫，赐号曷娑那可汗，再未返回西突厥。

处罗可汗前往隋朝后，西突厥全部由射匮可汗统治。从其登位之公元611~630年，西突厥又经历了一个强盛的时期。史书上说：“射匮……既立后，始开土宇，东至金山，西至海，自玉门以西诸国皆役属之。遂与北突厥为敌，乃建庭于龟兹北三弥山。”[①]又说“西突厥射匮可汗强盛，延陀、契苾二部并去可汗之号以臣之”。[②]岑仲勉认为这里所说的“遂与北突厥为敌”，即“东西分裂，至此不复再合”。而西突厥之完全分立，就应当以射匮即位之时（611~612年）为准。沙畹则说公元611~630年这期间，是突厥复兴的时代。公元615年末或公元616初，射匮曾遣其侄率领西蕃诸胡到隋朝贡。[③]

射匮可汗在位的时间不长，大约在公元618年以前就死去了。其弟统叶护继立，为统叶护可汗（619~628年）。史称其“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又移庭于石国北之千泉。……西戎之盛，未之有也”。[④]

① 《旧唐书·西突厥传》。

② 《旧唐书·铁勒传》。

③ 《隋书·裴矩传》。

④ 《旧唐书·西突厥传》。王小甫说到统叶护可汗时，西突厥东以金山（阿尔泰山）为界与北突厥抗衡，西南抵末禄河（今阿富汗木尔加布河）上游与波斯为界，南至印度河上游喀布尔河流域。见所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3页。

统叶护可汗继立的时期，也是中国内地唐朝取代隋朝的时期。中国内地在隋唐之际发生农民大起义，群雄割据，四海纷扰，正是东、西突厥发展的大好机会。像汉朝时一样，内地汉人大量归附突厥，也有助于突厥的振兴。隋朝末年，东突厥始毕可汗（608~619年）统治之地，东自契丹，西至于吐谷浑、高昌之地。唐朝初期的处罗可汗（619~620年）和颉利可汗（620~630年）势力更大，成为对唐朝的严重威胁。

在上述情况下，唐朝就想联合西突厥来抑制东突厥。唐高祖李渊即位后的前几年，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就于公元618年"遣使内附"。公元619年，又与高昌并"遣使朝贡"。公元620年，来"贡条枝巨鸟"。[①]史书上说："时北突厥作患，高祖厚加抚结，与之并力以图北蕃。统叶护许以五年（622年）冬大军当发。颉利闻之，大惧，复许叶护通和，无相征伐。"[②]于是，西突厥连年遣使到唐朝进贡。例如：武德四年（621年）三月，统叶护可汗遣使到唐朝，唐高祖"宴西突厥之使，奏九部乐于庭，赐帛各有差"。[③]"武德五年（622年），西突厥叶护可汗遣使请婚"。[④]四月，"遣使献狮子皮。八月，遣使献名马"。[⑤]西突厥对唐朝的这一系列表示，都是根据唐朝有制御东突厥的必要而作出来的。同时，密切同唐朝的关系对于加强西突厥的地位和增强与东突厥抗衡的力量也是有重大的作用的。

唐朝实行远交近攻的政策，答应了统叶护与唐结亲的请求。统叶护派珍珠统俟斤献万钉钿金带和马五千匹以为约。但由于通西域的道路为东突厥所阻，暂未成亲。统叶护又因对其部属残酷

① 《旧唐书·高祖纪》。

② 《通典》卷一九九。

③ 《册府元龟》卷一〇九。

④ 《册府元龟》卷九七八。

⑤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暴虐，引起众叛亲离，葛逻禄部也进行反抗，终于公元628年被其伯父莫贺咄所杀。[①]莫贺咄立，是为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

就在统叶护被杀的前一年（贞观元年，即公元627年）[②]，唐朝高僧玄奘出发去印度求经，曾经路过西突厥地区。这一年的九月玄奘离开长安，经陕西、甘肃，过玉门关，渡莫贺延碛，又历经伊吾、高昌、焉耆、龟兹、拜城、阿克苏诸地，在别迭里山口（不走冰达坂）越过天山，到达伊塞克湖。该湖“周千四五百里，东西长，南北狭，望之淼然。无待激风而洪波数丈”。“四面负山，众流交湊，色带青黑，味兼咸苦，洪涛浩瀚，惊波汩濦。龙鱼杂处，灵怪间起。所以往来行旅，祷以祈福，水族虽多，莫敢渔捕。”玄奘沿着伊塞克湖向西北，走了500多里，便到达素叶城（即碎叶）[③]。他在这里遇着西突厥的统叶护可汗，正从事狩猎。“戎马甚盛。可汗身着绿绫袍，露发，以一丈许帛练裹额后垂。达官二百余人，皆锦袍辫发，围绕左右。自余军众，皆裘毼毳毛。槊纛端弓，驼马之骑，极目不知其表。”统叶护可汗热情地接待了玄奘，并派一懂得汉语和中亚各地语言的年轻人，送玄奘去迦毕试国。他们离开素叶城向西走四百多里，到一地，名屏聿（即千泉）[④]。这地方周围二百多里“既多池沼，又丰奇木”。“南面雪山，三垂平陆。水木沃润，林树扶疏。暮春之月，杂花若绮。泉池千所，故以名焉。”此地为西突厥可汗避暑度夏之处：“中有群鹿，多饰铃环，驯狎于人，不甚惊走。可汗爱赏，下命群属，敢加杀害，有诛无赦。故此群鹿，得终其寿。”

玄奘等从屏聿向西又走了一百五十里，到呾逻斯城（在江布尔附近）。此城周匝八九里，诸国商胡杂居。其土地、物产、气候，与素叶差不多。从呾逻斯城向南走十多里，有一孤零零的小城，住着

① 参看《旧唐书·铁勒传》。沙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为统叶护死于公元630年，误。

② 参考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的考证。

③ 古碎叶城故址在今楚河以南托克玛克城西南8公里处之阿克-贝西姆。

④ 屏聿，在托克玛克以西约130公里，今吉尔吉斯山之北。

三百多户汉人。他们是以前被突厥掳掠来此的，后来纠合在一起，建屋筑城而居，久而久之，衣着习惯渐与突厥同化，但其言语仪态，则仍继续保存原样。又从此小孤城向西南走二百多里，到一城，名白水城（今奇姆肯特以东约十五公里）。此城周围六七里，其物产气候比呾逻斯更好。从白水城向西南又行二百余里，至恭御城。此城"周五六里。原隰膏腴，树林蓊郁"。从此南行四五十里，至笯赤建国。[①]这大约是整个这个地区的总称，故《大唐西域记》说：其地"周千余里。地沃壤，备稼穑，草木郁茂，花果繁盛，多蒲萄"。"城邑百数，各别君长，进止往来，不相禀命。虽则画野区分，总称笯赤建国。"

玄奘从笯赤建国向西走二百多里，就到了赭时国（塔什干地区）。然后从赭时直接到飒秣建国（撒马儿罕）。在这过程中，他从当地人处了解到一些关于沛捍（费尔干纳）与窣堵利瑟那（今乌腊·提尤别）的情况，著之于书。又从飒秣建国到了羯霜那国（今沙赫里夏勃兹），沿路得之于传闻的有弥秣贺、劫布呾那、屈霜你迦、喝捍、捕喝、伐地、货利习弥（花剌子模）等七国。从羯霜那向西南走二百里，入山，到了铁门。[②]过了铁门以后，玄奘循东南方向，渡阿姆河，达到活国（昆都士）。在活国停了一个多月，其间，他曾去缚喝国（巴里黑）游历，然后再向印度进发。[③]

玄奘游历西域而留下的记载，是关于这个时期中亚史的宝贵资料。从中可以看到，当时西突厥不但统治了中亚，而且势力及于吐火罗与兴都库什山以南。沙畹说，其境界已达到了印度河。[④]

---

① 前苏联考古学著作以为其地相当于今塔什干地区的汗·阿巴德。

② 铁门，在北纬38°11′与东经66°54′处，为索格底亚那与吐火罗之分界点。

③ 以上据瓦特斯译的玄奘《大唐西域记》及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④ 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31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第三节　西突厥统治下的中亚

自哌哒灭亡之后，中亚即落于突厥的统治之下。西突厥的势力范围西面达到了咸海，东则与东突厥以阿尔泰山为界。史书上概括地说："其国即乌孙之故地。"这是指西突厥诸部游牧的草原地带而言。至于中亚及天山以南的绿洲地区，则被称为"西域诸胡国"，都是"归附"于西突厥的。[1]

西突厥本身分为十部。五部分布于楚河以东，称为咄陆；五部分布于楚河以西，称为弩失毕。每部有一首领，由汗授予一箭，故也称为十箭，或称为十姓部落。

西突厥本是与东突厥一体的，故其制度与东突厥基本一致。据史料记载，突厥的最高首领称为可汗，可汗之妻称为可贺敦。大官有叶护。西突厥的首领原来称为叶护，但后来他们也自称可汗，如统叶护可汗。除叶护外，还有设、特勤、俟利发、吐屯发等，共二十八个等级。叶护、特勤由可汗的子弟及宗族充任。西突厥又有乙斤屈利啜、阎洪达、颉利发、吐屯、俟斤等官。西突厥所设官职除"俟利发、阎洪达，以评议国事，自余与东国同"。[2]

突厥官制如此发达，说明其阶级对抗的程度。但其婚姻制度则表明氏族制度仍然保存。如史料记载："父兄伯叔死，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嫂。"这是氏族制度下典型的婚姻形式。西突厥从事游牧经济，也是以氏族为其社会组织的形式的。"其俗被发左衽，穹庐毡帐，随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务。""虽移徙无常，而各有地分。"即每个氏族各有自己的游牧路线和冬夏牧场。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游牧，以及一般地从一地到另一地的移徙，这

① 《旧唐书·突厥传（下）》。

② 《隋书·西突厥》。

便是当部落尚未在一定的地方定居而利用它所遇到的牧场放牧时所处生活方式的第一个形态，所以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集体，并非作为集体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出现，而是作为其前提而出现。"[①]一方面，是氏族制度的保存，另一方面是阶级对抗在氏族内部的发展。这两方面的结合，就构成了当时突厥宗法封建制度的特点。

可汗、叶护、特勤、设等都是封建主，他们严重剥削部民，贫富悬殊，尊卑严格。从东罗马使者蔡马库斯和玄奘所见到的西突厥可汗的生活情况，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东罗马历史家弥南说，蔡马库斯一行去可汗驻跸之地。[②]至其地时，他们见到室点密的宫帐扎在一个谷地，四周皆金山环抱。蔡马库斯一到就受到接见。他们见可汗坐在毡帐内一把金椅之上，椅有两个轮子，当要行动时，可由一匹马挽之。这个毡帐是用五颜六色的丝织帐幔装饰起来的，织工精巧。第二天，会于另一毡房，其四周也挂了各种富丽的丝织物，其上且绣有各种各样的人和物。室点密坐的床系全用黄金制成，毡房中间陈列的饮器，酒壶与坛子也全都是金制的。第三天，在一个毡房中举行另一次饮宴。这个毡房的木柱上都覆以金片，毡房内可汗的座位是安放在四个金制孔雀的上面。在这个集会地点的前面，有大量排列的车辆，内装着大量银制品，包括盘、碟以及无数银制的鸟兽等动物。雕镂之工，绝不亚于东罗马。突厥可汗之豪富奢侈，一致如此。[③]玄奘虽是在60多年以后来到西突厥可汗处，但其所见到的情况，同蔡马库斯所见到的也差不多，可以互相印证补充。据说，西突厥可汗"居一大帐，帐以金花装之，烂眩人目。诸达官于前列长筵两行侍坐，皆锦服赫然，余仗卫立于后。观

① 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第4页。

② 西突厥可汗的驻地在爱克塔山，意为白山。希腊人称之为金山。张星烺说指天山。沙畹说是指龟兹北的白山。

③ 亨利·玉尔编《古代中国闻见录》，第1卷，第209-210页，伦敦1866年英文版。

之，虽穹庐之君亦为尊美矣”。[1]西突厥统治阶级生活之豪华于此可见一斑。

反映突厥社会阶级对抗的另一个方面是法律。按其法律的规定：反叛、杀人及奸人之妇、盗马绊者皆死，奸人女者重责财物，即以其女妻之，斗伤人者随轻重输物，盗马及杂物者各十余倍征之。这完全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为了维护畜牧封建主的政权和封建化的氏族制度的。

西突厥起初是臣属于东突厥可汗的。它与东突厥一样，受到与之关系密切的中国中原地区的重大影响，也同时受到中亚、波斯和东罗马的影响。这种影响除表现在其社会经济、阶级与国家的发展外，还表现在文化上。在鄂尔浑河和叶尼塞河上游发现的碑刻，可以看到古代突厥文字的情况。其中叶尼塞河碑铭可能为时更早（属于公元7世纪）。这种古突厥文的字母，被认为是从阿拉米亚文字母借用来的。研究者们认为，西突厥统治地区曾有许多来自中亚的粟特人从事商业活动。正是这些粟特人把阿拉米亚文字母传到突厥人当中。如果相信这种说法，则阿拉米亚文之传入西突厥可能比其传入东突厥更早。但从实际的情况看，直到公元6世纪末期，突厥人仍然是直接使用粟特文，尚未用其字母来拼写突厥语。[2]古突厥文的字母有 38 个。丹麦学者汤姆森认为，古突厥文的字母中有 23 个来源于阿拉米亚文，此外的一些则是由突厥部落的氏族印记（tamgha）改造而成。这些都是为了适于表达突厥语的具有自己特点的语音和谐音规律。古突厥文正字法是很严格的。说明这种文字已经经过相当一段时期的发展，也说明突厥人的文化水平是相当高的。所有的突厥文碑铭都用十二属相来表示年代。这与《唐书》中所述的黠戛斯人有属相纪年之法是一致的。

① 慧立、彦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2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述略》，载《考古学参考资料》第3-4辑。

突厥人同历史上其他的游牧民族一样，最早也是萨满教的信仰者。据玄奘所见：“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①]拜占廷历史家塞俄非拉克土斯·西摩卡特斯著录的达头可汗在598年致东罗马皇帝毛里斯的信中称：“突厥崇拜火，尊敬空气和水，颂扬大地，但仅奉天地惟一造物主为神，用马牛羊祭祀它，并有祭司预言未来之事。”东罗马使者蔡马库斯在到达西突厥汗庭之前，曾遇到一些人，这些人宣称能驱魔。他们把使团的行李全部取下，置于当中，然后在行李上摇铃击鼓。同时，另一些人则手持香火围绕行李奔跑，喧嚣如狂，状如驱鬼。他们认为祛邪完毕之后，就让蔡马库斯本人也从火中走过。[②]凡此种种，与玄奘在中亚飒秣建所见者颇相类似。据称飒秣建“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有寺两所，迥无僧居，客僧投者，诸胡以火烧逐，不许停住”。[③]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认为，突厥“事火”是通过中亚昭武九姓向伊朗“学习”来的。[④]蔡鸿生先生则认为这是草原民族早就有的习俗。[⑤]这些都是萨满教的表现。

萨满教信仰也表现在突厥人的其他习俗之中。据记载，一个人死后，“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诸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祭之。绕帐走马七匝，一诣帐门，以刀剺面，且哭，血泪俱流，如是者七度，乃止。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春秋死者，候草木黄落，秋冬死者，候华叶荣茂，然始坎而瘗之。葬之日，亲属设祭，及走马剺面，如初死之仪。葬讫，于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杀人数”。[⑥]鄂尔浑河发现的突厥文碑铭充分地证明了以上记载。在那里，这种石标称

① 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2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亨利·玉尔编《古代中国闻见录》，第1卷，第208页。

③ 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 白鸟库吉：《康居粟特考》；王小甫也认为突厥事火乃传自伊朗的祆教崇拜。

⑤ 蔡鸿生：《论突厥事火》，载《中亚学刊》第1期。

⑥ 《周书·突厥传》。

为balbal。而在拜占廷的史料中，则说突厥可汗葬时要用俘虏的敌酋杀祭。

还有对日出、天地神祇和祖先的崇拜，如史书讲：可汗"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每岁率诸贵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于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无草树，谓其为'勃登凝黎'，夏言地神也"。[①]又相信占卜，如唐武德三年二月（公元620年），突厥处罗可汗将自窦建德处迎来隋齐王暕，"卜之，不吉，左右谏止"。[②]这些也都是萨满教的作法。

随着突厥人的向西扩张，袄教、摩尼教和景教等宗教也都传入突厥。唐段成式讲："突厥事袄神，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皮袋，行动之处，以脂苏涂之，或系之竿上，四时祀之。"[③]这是关于突厥人信袄教的记载。同时，东罗马的景教在公元561年时也已传播到到了索格底亚那的突厥人当中。[④]据叙利亚人的记载，约在公元411~415年间，撒马儿罕就建立了基督教的主教，而亨利玉尔则说是在公元503~520年间建立的。科斯马思（Cosmas）说在6世纪中期阿姆河畔有基督教徒。[⑤]摩尼教和景教都有自己的文字，即粟特字与叙利亚字。信仰摩尼教和景教的伊朗人和突厥人都使用这种字母，这对于他们创造自己的文字起了很大的作用。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前曾流行于中亚。尽管中国汉文史料[⑥]提到过，公元6世纪70年代时齐僧人惠琳曾向突厥佗钵可汗宣传佛教，佗钵可汗遣使向齐求经，以及刘世清奉命以突厥语译涅槃经以遗突厥陀钵可汗之事，但西突厥是否信仰佛教仍不

① 《周书·突厥传》。

② 《新唐书·突厥传（上）》。

③ 《酉阳杂俎》卷四。

④ 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19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⑤ 万伯里：《布哈拉史》，第16页，伦敦1873年版。

⑥ 《隋书·突厥传》、《北齐书·斛律羌举传》。

可确知。看来，在玄奘以前，佛教对西突厥的影响是很小的。至于在索格底亚那，正如巴尔托里德所说的："亦如在波斯一样，祆教乃是统治阶层的宗教。在波斯受到迫害的二元论教派在河中为自己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看来佛教徒和景教徒也享有同样的自由。唯有玄奘关于撒马儿罕的报道表明有祆教同佛教之间的斗争。[①]然而，这里玄奘的经历和说教的成功也表明佛教同祆教的斗争并不尖锐。[②]佛教的传播者在伊朗人和突厥人当中也传播了印度的文字。用印度文字书写的突厥佛教文书近代已有发现。[③]

主要从事游牧经济的突厥人也有自己的手工业，并且也经营商业。突厥人原为柔然锻工，他们很早就掌握了冶铁技术。前述东罗马使者在抵达索格底亚那时，就有突厥人携铁前来求售，并表示其国产铁。突厥人同波斯、东罗马的外交，都是由其从事丝绸贸易的经济利害所制约的。从突厥可汗生活用品的奢侈豪华，也可看到其商业联系之广。其大部分服饰用具及丝绸锦缎，都应来自中国或西亚、南亚各国。而其所处中亚的地理位置，又决定它在东西文化交流上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亚农业地区的社会情况，与突厥人游牧社会有所不同。那里的居民绝大部分是伊朗语族。农村中的地主贵族称为德赫干。巴尔托里德曾经说过，在阿拉伯人入侵之前，中亚居民生活的主要特点就是土地贵族（即德赫干）的统治。一般的地主可以称为德赫干，一个地区的统治者也可以称为德赫干。有的小国，如布哈

① 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30页的如下报道："飒秣建国，王及百姓不信佛教，以事火为道。……法师初至，王接犹慢。经宿之后，为说人、天因果，赞佛功德，恭敬福利。王欢喜请受斋戒，遂致殷重。所从二小师往寺礼拜，诸胡还以火烧逐。沙弥还以告王，王闻令捕烧者，得已，集百姓令截其手。法师将欲劝善，不忍毁其肢体，救之。王乃重笞之，逐出都外。自是上下肃然，咸求信事，遂设大会，度人居寺。其革变邪心，诱开矇俗，所到如此。"

② 巴尔托里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180页，伦敦1928年英文版。

③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5卷，第27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拉，其首领带有波斯的称号"胡达特"，叫做"布哈拉·胡达特"。安·奈沙布里（An Naysahuri）在谈到突厥人征服布哈拉时，把布哈拉·胡达特也说成是突厥管治下的一个主要的德赫干。德赫干占有大量的土地，住在设防的庄园和堡坞中，统治着依附于他们的农民。

各地方的统治者都有个人的亲卫兵，称为沙基尔（恰基尔），意为仆从，或即汉文史料中提到的柘羯。他们由年轻的贵族代表组成，被轮流派到国王宫廷中去担任宿卫，如同欧洲封建时代的骑士。在他们当中流行着一种尚武精神。例如：在撒马儿罕每年设宴席，摆擂比赛。挑战者如能杀死自己的对手，即被认为是国内最勇敢的英雄。到明年，他又要接受别人的挑战。

各小国相互之间是敌对的。由德赫干组成的沙基尔阶层，勇武好斗，但完全没有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各小国之间总是不团结的，这就有利于外族的入侵。

再是商人。他们在中亚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地处东西商业交通要冲，中亚人习于经商。中国史料谈到："康国人并善贾，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①粟特商人主要经营丝绸贸易，贩运转徙，经行旁国。他们在丝绸之路沿线建立居民点，也建筑城镇。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就曾谈到原是游牧地区的楚河、塔拉斯河、锡尔河等河流域，出现了商人居住的城镇，如素叶水城与呾逻斯城，都是"诸国商胡杂居"。粟特商人不但操纵着同中国的丝绸贸易，而且也操纵着农、牧区之间的贸易。他们因经商而发财致富。巴尔托里德引述纳尔沙喜的话说，布哈拉的商人占有大量的不动产，住在堡坞中，按其地位说与德赫干甚少区别。而塔巴里则常把商人与一个地区的统治者（称为muluk）相提并论。丝绸贸易使粟特商人同突厥统治者的利

① 《通典》引韦节《西蕃记》。

益结合起来。突厥统治者甚至利用粟特商人作为自己的代表出使于东罗马。而粟特商人在中亚各地的贸易活动也需要依靠突厥统治者的保护。他们之间是相互支持的。所以，商业贸易也是联系中亚各小国的纽带。

粟特商人到中国内地贸易，常以朝贡的名义出现，这有利于他们的商队行路的安全，当然也有的是政府使节。中国史料曾记载：公元564年，粟特等国遣使到北周朝贡。①他们一般要经过高昌或伊吾。当时高昌北贪汗山之北，为铁勒部境界。铁勒经常派大官驻在高昌，如有西域商人路过就对他们征税。西突厥继起之后，这种权利就为其所得。②

隋炀帝大业年间，中亚各国如康国、安国、石国、钹汗、吐火罗、挹怛、米国、史国、曹国、何国、乌那曷、穆国、漕国等，都曾遣使朝贡。③唐代隋之后，他们在武德年间也来朝贡。当时中亚地区是四通八达之所，同东西南北各方面都是有经济文化联系的。据记载：在唐朝时，贵霜匿城“城左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突厥、婆罗门，西波斯、拂菻等诸王，其君旦诣拜则退”。④这就证明了它同各方面的联系，但看来同中国的联系还是主要的。英国学者吉布曾经讲过：“不可忘记，粟特人同东方的商业贸易联系，要比同西方的联系强得多，这也就促使他们在不得不进行选择的时候努

① 《北史》，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51页。

② 《隋书·西域传》。又《隋书·裴矩传》曾说：“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裴矩掌其事。……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渡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③ 《隋书·西域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847、1848页。

④ 《新唐书·西域传》。

力培植同突厥人和中国人的关系，而不是去同阿拉伯人拉关系。”[①] 这一见解，强调了中亚同中国从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而这种联系又是政治上相结合的客观基础和利益上的需要。后来中亚之列入唐朝的版图，一度成为中国一部分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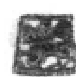
中亚商人住在城镇中，这种城镇一般由城堡、内城（沙赫里斯坦）和外城（拉巴特）组成。内城有设防的堡垒，当地邦君及德赫干们住在里面。拉巴特是由商队客栈发展而成，为了防御游牧人的进攻，也修筑堡垒。1933年在塔吉克斯坦发掘的吉瓦什契恰堡，证明内城有发达的手工业。手工业者从事纺织、制陶、制革等行业。内城城墙之外分布着许多简陋的住房，便是他们和奴隶们栖身之所。片吉肯特的规格，也与此相似。

一般说，大的城镇就是其所在地区的政治中心。该地区的统治者居住在内，以行使对一个小国的统治。中亚最大和最有名的城邦就是撒马儿罕，当时称为康国。康国王为昭武人，其周围的一些小国多与之同族。[②]如安国、曹国、石国、米国、何国、火寻、戊地（伐地）、史国与康国总称为昭武九姓。实际上，从《北史·西域传》的记载看，昭武人所统治的地区不止这么多。西突厥统治中亚以后，中亚各小国君主都成了它的附庸。史书上讲西突厥的处罗可汗曾“立二小可汗，分统所部，一在石国北，以制诸胡国。一居龟兹北，其地名应娑”。看来，西突厥总管中亚各国的官员就是住在塔什干以北的那一个。其居于龟兹北者，则负责总管塔里木盆地诸地区。

西突厥对中亚诸城镇和绿洲地区的宗主权是通过征税赋税来实现的。作为游牧部落的首领，他们很难说参与了本地的行政管理。直接统治者仍然是那些德赫干们。这些地方贵族同突厥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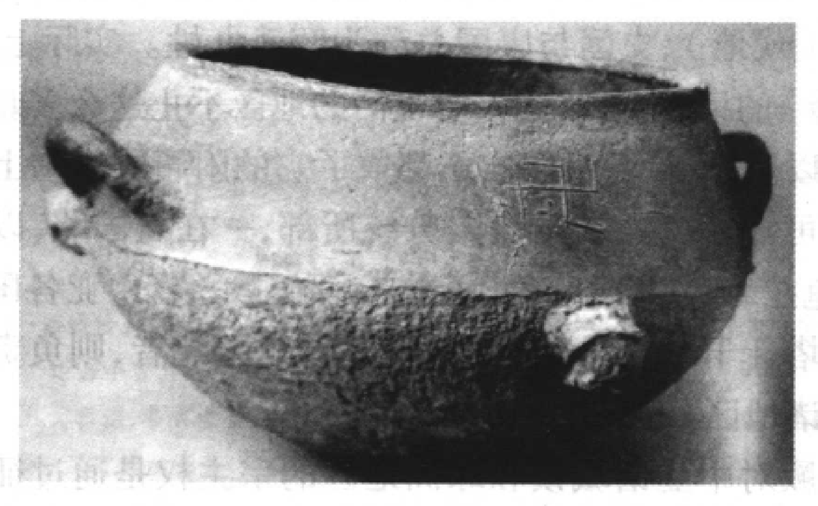
① 吉布：《阿拉伯人在中亚的征服》，第11页，伦敦1923年版。

② 前苏联学者斯米尔诺娃说所谓Шубу，即汉语的昭武，粟特语（伊朗语）则为德赫干。



族通婚，拉拢在一起，互为支持。如康国国王代失毕，其妻为突厥达度（应即达头）可汗之女。隋炀帝时，其王屈术支又娶西突厥女。[①]康国在中亚既为主要的一国，其王与突厥联姻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而国境北面驻有西突厥小可汗的石国，在"隋大业初，西突厥杀其王，以特勤匐职统其国"。[②]费尔干纳地区的统治者契苾，也在贞观年间为西突厥瞰莫贺咄所杀。[③]通过联姻而进行拉拢，通过镇压而加以慑服，最终达到统治其地，赋役其人的目的，这就是西突厥同中亚各小国的关系的基本内容。

从地理上划分，当时统属于西突厥的主要是三个地区：一是索格底亚那，以康国为主，包括昭武九姓诸国。一是花剌子模，保持较大的独立，当地原有的阿夫里格王朝在西突厥时期仍然存在，封建关系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一是吐火罗，据玄奘的记载，分为二十七个小国，"虽画野区分，总役属突厥"。至于锡尔河以北及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则主要是西突厥部落的游牧地区。具体地说，就是弩失毕五部的游牧地区。这五部每部设一俟斤为首



塔拉斯发掘的公元3~5世纪萨克斯人的铁锅

① 《隋书·突厥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848页。

② 《新唐书·西域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246页。

③ 《新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250页。

领，故称五俟斤。公元7世纪中叶，有阿悉结阙俟斤，哥舒阙俟斤，拔塞干敦沙钵俟斤，阿悉结泥孰俟斤，哥舒处半俟斤。“各有所部，胜兵数十万……西域诸国，亦多附隶焉。”[①]

在公元7世纪前期，随着西突厥游牧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城镇的产生，突厥游牧部落中的贫苦牧民也逐步有走向定居的。而游牧人之定居，就必然促使他们渐渐同本地农业居民相融合。这是中亚伊朗语族中有突厥成分加入的开始。无论是农业区的农奴、奴隶，公社农民和牧业区的部落成员、贫苦牧民，都受着突厥贵族、部落首领、德赫干和各地统治者的压迫，因而引起人民的反抗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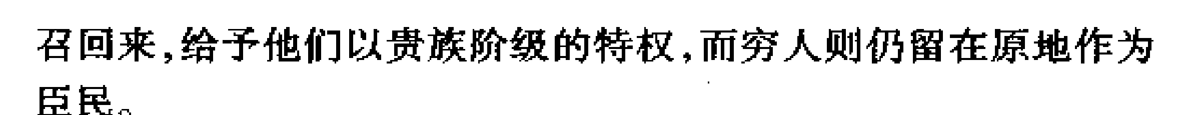
11世纪时，阿布勒·哈桑·阿布都拉赫曼·穆罕默德·尼舒布里在《科学宝库》一书里谈到一个人民反抗贵族的故事。万伯里写的《布哈拉史》中引述了这个故事。据说，那时有许多突厥斯坦地方（突厥人的游牧区）的人来到了布哈拉，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系列的村落，并推举他们当中一个名叫阿伯兹（Aberzi，俄文写作Абруй）的人[②]为首领，驻在沛肯城。阿伯兹由于权力日益增大而变得越来越专横暴虐。因此，布哈拉地方的富有者就逃到突厥国家的北部（突厥斯坦、塔拉斯）去避难，在那里建筑了奇姆肯特城（按那时的话说，意思是“美好的城”）。而贫穷的人由于无力抵抗他，就向邻近的突厥王哈拉朱林（Karadjurin）[③]求援。哈拉朱林命其子希尔基什维尔（Shirkishver）率领一支军队去救援。阿伯兹被抓起来，放到一个装满了钉子的口袋中，然后将其丢在地上滚动致死。把这个暴君处死以后，希尔基什维尔就把被流放的富人

---

① 《旧唐书·西突厥传》。

② 前苏联学者托尔斯托夫说，此人即是汉文史料中提到的突厥阿波可汗。苏联科学院编的《世界通史》第3卷完全采用了这个说法。这是难于肯定的。

③ 马迦特以为哈拉朱林即室点密，而托尔斯托夫以为他是西突厥的处罗可汗（600~618年），或是东突厥可汗处罗（619~620年）。



召回来，给予他们以贵族阶级的特权，而穷人则仍留在原地作为臣民。

希尔基什维尔在位大约30年，继其位者为色克吉刻特（Sekedjket），他被认为是拉姆坦城和法拉克沙城（Farakhsha）的兴建者。他以后还娶了中国公主为妻。

以上是万伯里转述的主要内容。[①]但前苏联著作中讲的内容又有所不同。其主要点在于强调阿伯兹是代表穷人，故富人躲避他。向突厥人求援的不是穷人，而是富人。不管怎样，突厥王子率军来布哈拉后，是扶助了富人、德赫干及其代表胡达特，同时也镇压了穷人。据认为，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581~586年间。并说明西突厥的统治者同中亚各地的贵族、胡达特、德赫干等是勾结在一起的。但由于《科学宝库》一书只有片断遗留，表述不明，而万伯里的转述又多矛盾，历史上的这一事件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前苏联书籍中的一些说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① 万伯里：《布哈拉史》，第1~2页，伦敦1873年英文版。

第八章
中亚列入唐朝的版图

第一节 公元7世纪前期的形势

公元7世纪前期中亚的形势可从两方面叙述：一方面是它所处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是它的内部情况。而前者又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波斯，一是中国。

在西突厥射匮可汗正当强盛的时候，波斯的萨珊王朝却日益衰落下去。东罗马皇帝毛里斯在位时，拜占廷同波斯的关系是比较好的。公元602年，毛里斯皇帝被弑，波斯王库萨和便借口为其复仇而进攻东罗马帝国所属的美索不达米亚与亚美尼亚。在几年之内即攻下伊德萨（Edessa，在今土耳其东南）、安提俄克和大马士革。最后在公元614年6月攻下耶路撒冷，然后又占领埃及。这时，东罗马皇帝是希拉克略（Heraclius），他对波斯进行反击，取得了胜利，于公元624年夺回了小亚细亚与亚美尼亚。库萨和患病，打算传位于其子麦尔丹·沙（Merdan-Shah）。麦尔丹·沙为叙利亚女希玲（Shirin）所生，不为波斯贵族所拥戴，故库萨和之另一子施利（Siroes，或写作Shiroe）将麦尔丹·沙杀死，禁锢其父而夺得波斯王位。库萨和终于公元628年在禁锢中被杀。施利又称为居和多二世（Kavadh Ⅱ）。这时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泛滥成灾，瘟疫流行。疫病夺去了施利的生命，他在位仅6个月而亡。

中国史书说：波斯“东与吐火罗、康接，北邻突厥可萨部，西南皆濒海，西北赢四千里拂林（即拜占廷）也”。[①]施利在死前曾与拜占廷达成了和平。他死后，继之为王的阿尔达希尔三世（628~629年）还是一个幼儿，内乱与外患接踵而来。他刚一登位就有可萨人进攻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向外扩张的阿拉伯人进攻到了约旦河以东。阿尔达希尔三世手下将领沙赫尔·巴拉兹（Shahr Baraz）篡其位。但仅一个半月以后，篡位者又被杀。库萨和之妹普兰（Puran）被加冕为波斯王。[②]普兰在位17个月退位，由她的一个姊妹阿扎尔米·杜赫特（Azarmi-dukht）即位，但在位的时间也很短。这个时期，波斯完全陷入混乱，甚至是无政府的状态。俞阿尔特（Huart）说：“自库萨和于公元628年逝世到伊嗣俟于公元632年6月16日即位，四年间被加冕为波斯王者不下十二人。”[③]塞克斯说：“这两姊妹，被拥立登位，但又迅速消失，以后就陷人无政府状态。觊位者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又立即消逝。”他认为，这些人既不知名，又不值得一提。[④]

这个时期，库萨和之孙霍尔穆兹五世自立于尼西比斯（Nisibis），[⑤]在那里做波斯王一直到公元632年，为自己的士兵所弑。即位的伊嗣俟（即耶斯提泽德三世，公元632~651年），是波斯萨珊王朝最后的一个国王。[⑥]

总之，这个时期的波斯萨珊王朝，在同东罗马的长期战争中弄得精疲力竭，而可萨突厥人又凭陵于北，阿拉伯人崛起于南。萨珊王朝内部四分五裂，部帅纷拿，君主被弑，国几不国。穆罕默德（570~632年）以其创立的伊斯兰教把阿拉伯人统一起来，成为一

① 《新唐书·波斯传》。

② 《新唐书·波斯传》与塞克斯著《波斯史》都说普兰是库萨和之女，法国学者俞阿尔特则说是其妹。

③ 俞阿尔特：《古代波斯与伊朗文明》，第135页，伦敦1927年英文版。

④ 塞克斯：《波斯史》，第1卷，第489页，伦敦1951年英文版。

⑤ 尼西比斯，即努赛宾（Nusaybin），在土耳其东南部与叙利亚交界处。

⑥ 以上西方史料关于这个时期波斯历史的报道，同《新唐书·波斯传》的记载大有出入。

个新兴的强大势力。他的后继者终于埋葬了这个已经彻底腐败、无力再生存下去的、古老的王朝——萨珊王朝。

萨珊王朝的衰败和走向灭亡，对西突厥的发展强盛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东突厥汗国的败亡则为西突厥和中亚合并于唐朝开辟了道路。

正如匈奴崛起于秦汉之际一样，东突厥亦强盛于隋唐更代之时。当时，"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无数，遂大强盛，势陵中夏。……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皆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①]就是初创唐朝的李渊，也曾向突厥称臣。因此，东突厥首领经常发兵到汉人农业地区掳掠粮食、财帛、金宝、人口，认为理所当然，而唐高祖以力量不足，也无可如何，只有优容之。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以后，唐朝对突厥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历史上被称为有作为的君主唐太宗，抱着统一全国的雄心壮志，是不愿意国内存在一个威胁自己政权的突厥汗国的。而这时的东突厥，在颉利可汗的统治下已处在崩溃的边缘。颉利变更旧俗，政令烦苛，信任诸胡，数兴兵革，结果引起人民的不满，属部反叛。薛延陀、回纥、拔野古诸部兴兵击破颉利手下的四设，颉利不能制。加以天寒大雪，羊马多死，发生饥荒。而颉利又与东面突利可汗有矛盾，突利表请入朝。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就开始策划平定东突厥，主要的是联合西突厥及东突厥统治下的其他部族，然后出兵平定之。公元629年，唐朝派游击将军乔师望从间道去薛延陀册拜其俟斤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并赐旗鼓，以联合他夹击东突厥。同年，唐朝以李靖为统帅，分六道出兵，进击东突厥。颉利可汗大败，逃往灵州西北之苏尼失处，被后者所执。公元630年，颉利被生俘至京。东突厥至此灭亡，其部落成为唐朝的臣民。

① 《隋书·突厥传》。



东突厥汗国的败亡，为西突厥和中亚合并于唐开辟了道路。唐朝向西域发展势力的第一个要地是伊吾。最早隋炀帝时，曾派薛世雄率军击伊吾，筑城。隋末，其地内属，置伊吾郡。隋乱，臣于突厥。颉利败亡之后，伊吾城主石万年率七城内附，唐朝于其地置西伊州。①

伊吾城因扼东西商路，故商胡杂居。伊吾城主之附唐，也与“伊吾群胡慕化”，要求保障商路的安全有关。唐朝既控制了伊吾，也就掌握了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要站，同时也与西突厥及其控制下的天山南路诸国密迩相接。统一西突厥及高昌以西诸国便成为唐朝下一步的主要目标。

导致唐朝迅速出兵平定高昌的直接动因，也与丝绸贸易有关。史书上讲：“自隋乱，碛路闭，故西域朝贡皆道高昌”。②而高昌王麹“文泰与西突厥通，凡西域朝贡道其国，咸见壅掠”。③“又与（西突厥）叶护连结，将击伊吾”。④故高昌周围各民族都极为不满。如曾经遭到高昌攻掠的焉耆王龙突骑支倾心向唐，北方的薛延陀于公元639年遣使上书，请求出兵助唐讨伐高昌。⑤

对于高昌王麹文泰联合西突厥进攻伊吾之事，唐太宗曾下诏切责。颉利可汗败亡后，唐朝要求高昌送回以前逃到高昌避难的汉人。高昌王不但不理，且又与西突厥共同进攻焉耆。麹文泰还对唐朝的使者说：“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并遣使要薛延陀不要尊敬唐朝。为此，唐太宗于公元639年末派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军讨高昌。高昌王麹文泰以重金联络西突厥，约其互相支援。西突厥

① 《沙州图经》，《元和郡县志》卷四〇。公元632年去西字，称为伊州。

② 《新唐书·焉耆传》。

③ 《新唐书·高昌传》。

④ 《旧唐书·高昌传》。

⑤ 《册府元龟》卷九七三。

派叶护阿史那贺鲁屯兵于可汗浮图城以观动静。

侯君集的大军于公元640年秋临近高昌，麴文泰忧惧发疾卒，即位的高昌王麴智盛投降。阿史那贺鲁则在其先降。唐朝以高昌地为西州。同年九月，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留兵镇守。[1]又以可汗浮图城之地为庭州，并置蒲类县，每年调内地千人轮流镇守其地。[2]

以上就是在西突厥及其控制下的西域各国合并于唐以前唐朝政权向西扩展的程度。

在东突厥的颉利可汗败亡以后，西突厥也发生了内乱，走向衰败。其先，统叶护可汗于公元628年被其伯父莫贺咄所杀，莫贺咄自立为可汗。他本来不过是西突厥属下一个部落的小可汗，现自称大可汗，西突厥各部都不拥护他。如弩失毕就推举泥孰莫贺设为可汗，而泥孰却不愿即位。这时统叶护可汗的儿子咥力特勤因逃避莫贺咄的迫害而逃亡在康居（索格底亚那）。泥孰就把他请回来作可汗，这就是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这样，西突厥汗国就一分为二。看来是莫贺咄统治东厢的咄陆五部，肆叶护可汗统治西厢的弩失毕五部。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都遣使向唐朝进贡，承认唐朝的宗主地位，并请求与唐朝通婚。由于西突厥内部分裂，互相战争，连兵不息，唐朝没有答应其请婚的要求。而原先归西突厥统治的西域各国及铁勒部落也都反叛，西突厥由是衰弱。

肆叶护可汗由于是统叶护可汗之子，被认为即位比较合法。他出兵击溃莫贺咄可汗，成为整个西突厥的大可汗。但其性格"猜狠性谗，无统驭之略"，引起部属的反对。肆叶护可汗被设卑达干与弩失毕二部首领击败，无法再作大可汗，便又逃往康居，忧郁不得志，后死于缚喝（巴里黑）。玄奘谈到一个关于他的故事："近突厥叶护可汗子肆叶护可汗，倾其部落，率其戎旅，奄袭伽蓝，欲图

① 《旧唐书·高昌传》。

② 《通典》卷一九一，《新唐书·地理志》。

珍宝，去此不远，屯军野次。其夜梦见毗沙门天曰：‘汝有何力，敢坏伽蓝？’因以长戟，贯彻胸背。可汗惊寤，便苦心痛，遂告群属所梦咎征，驰请众僧，方伸忏悔，未及返命，已从殒殁。”[①]其事发生的时间既与玄奘西游的时间相近，则上述传说的事实大约是可信的。

肆叶护可汗死后，西突厥诸部就又拥护泥孰即位，是为咄陆可汗。泥孰在武德年间（618~626年）曾到过长安，与当时尚未做皇帝的李世民结为兄弟，所以在即位为可汗后便遣使来表示归附于唐朝。唐太宗于公元633年派鸿胪少卿刘善因去册立他为可汗，“赐以鼓纛，彩万段”。[②]但只过了一年，泥孰即死去。其弟同俄设即位。唐朝又派刘善因前去册立他为沙钵罗咥利失可汗。与刘善因同去的还有左千牛胄曹韦弘机。[③]当时盘踞在可汗浮图城一带的阿史那社尔乘西突厥内乱，夺取西突厥的土地和部落几达一半，自称都布可汗。[④]刘善因等在路上曾遇见阿史那社尔。据说，在他们到达西突厥后，石国反叛，交通被阻绝，他们三年不得返回唐朝。韦弘机“裂裳录所经诸国风俗物产，名为《西征记》”。[⑤]公元635年，咥利失可汗上表唐朝，请求通婚，并献马五百匹。唐朝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咥利失可汗分其国为十部，或称为十箭。咄陆五部居碎叶以东，弩失毕五部居碎叶以西，统称为十姓。这时弩失毕部有一首领名叫欲谷设，被其部下阿悉吉阙俟斤等拥立为乙毗咄陆可汗。而咥利失可汗则“不为众所归，部众携贰”。欲谷设与之斗争，双方大战，各有损失。公元638年，二人分西突厥领土，自伊犁河以西属

① 《大唐西域记》卷一，季羡林校注本，第117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 《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③ 《旧唐书·韦机传》。韦弘机，因避讳省为韦机。

④ 《旧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289页。

⑤ 《旧唐书·韦机传》。

欲谷设，以东属咥利失。乙毗咄陆可汗欲谷设建汗庭于镞曷山（今吉尔吉斯山）西，称为北庭。厥越失、拔悉密、驳马、结骨、炽、触木昆诸部都归其统治。

公元639年，咥利失可汗遭到其部下吐屯俟利发与欲谷设合谋反对，穷蹙逃奔费尔干纳，并死在那里。弩失毕的部落首领们就拥立其弟伽那之子薄布特勤，是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他建庭于睢合水（锡尔河）之北，称为南庭，东北以伊犁河为界，统辖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国、史国、何国、穆国、康国等地区。唐太宗也在公元641年派张大师前去给他授职，并赐鼓纛。

总之，乙毗咄陆可汗与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这两个人是敌对的，经常互相攻击。而前者的兵力较强，故后者不久被其攻杀，土地被其吞并。但弩失毕诸部并不服从乙毗咄陆可汗，都进行反叛。咄陆又率兵进攻吐火罗，破之。自恃强盛，专擅西域。

公元642年咄陆可汗派兵寇掠伊州，安西都护郭孝恪率轻骑两千自乌骨邀击，将其打败。咄陆又派处月、处密等部去围攻天山县，也被郭孝恪击退。同年，咄陆可汗的军队打败米国（弥秣贺），掳掠到许多财物和人口，但咄陆不给其部下分配，其手下将领泥孰啜因擅自取了一部分战利品而被咄陆可汗所杀。故泥孰啜之部将胡禄屋举兵袭击咄陆，其国大乱。咄陆败走白水胡城（今奇姆肯特）。弩失毕等部及屋利啜等派使者到唐朝请求废黜咄陆可汗。唐太宗遣使立莫贺咄乙毗可汗之子，是为乙毗射匮可汗。乙毗射匮可汗发弩失毕兵进剿保据白水胡城之咄陆可汗，被其打败。咄陆可汗派人去招集旧部，但遭到拒绝。咄陆可汗自知不得群众拥护，无法立足，便逃奔吐火罗，后死于公元653年。

公元644年，与西突厥关系密切并受其影响的焉耆王龙突骑支反唐，唐派安西都护郭孝恪击之，擒突骑支，以其弟栗婆准主管焉耆事务。但等郭孝恪退军后，西突厥又另立薛婆阿那支为焉耆王。



乙毗射匮可汗既驱逐了咄陆可汗，就把被其拘留的唐朝使者送回长安，并请求与唐朝通婚。唐太宗答应了他的要求，令其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等五国为聘礼。公元647年，唐朝派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郭孝恪、杨弘礼、李海岸等五将讨伐勾结西突厥并帮助焉耆反唐的龟兹王。同时顺道讨伐焉耆。阿史那社尔等先至焉耆，逮捕焉耆王阿那支，立故王之弟那准为王，于其地置焉耆都督府。接着于公元648年攻龟兹，擒其王诃黎布失毕，以旧王之弟叶护为王。龟兹遂平。

阿史那社尔又派副将薛万备前去招降于阗。于阗王伏阇信随使者来表示归顺唐朝。于是，唐朝将安西都护府从高昌迁到龟兹。

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西突厥叶护阿史那贺鲁，原驻扎于多逻斯川（喀拉额尔齐斯河），他统辖下的西突厥部落有处月、处密、姑苏、葛逻禄、弩失毕等。在咄陆可汗逃往吐火罗后，他曾受到乙毗射匮可汗的迫害，其部落四处流散，居无定处。后与执舍地、处木昆、婆鼻三部内属，受到唐太宗的优待，居于庭州。正当唐朝准备要讨伐龟兹的时候，阿史那贺鲁请求为唐军做先行向导，被任命为昆丘道行军总管，受命招讨西突厥之未服者。在龟兹平定以后，贺鲁被任命为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其部落被安置在庭州之莫贺城。瑶池都督隶属于安西都护。[①]阿史那贺鲁成为西突厥内部与乙毗射匮可汗相对抗的一派。双方都承认以唐朝为宗主。乙毗射匮为唐朝所册立，而贺鲁则简直为唐朝的官员，但这时还没有发展到唐朝对西突厥地区的直接统治。

以上是公元7世纪前半期，即唐太宗逝世（649年）以前时期中亚的形势。这时，唐朝政府已统一了塔里木盆地各邦国。西突厥汗国仍然处于半独立的状态。西突厥及其统治下的中亚之完全合并于唐朝并列入中国的版图，是在唐高宗即位平定阿史那贺鲁的

① 《新唐书·地理志》。

叛乱以后实现的。

第二节 西突厥与中亚合并于唐

唐太宗李世民在其在位的最后一年设置瑶池都督府，以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充任其职，目的是想通过他来影响并逐步统一西突厥地区。而阿史那贺鲁则利用唐朝的名义来发展自己的势力。他首先是把那些在西突厥内乱时受到乙毗射匮攻击驱散的部落收集拢来，以扩大自己的部众。由于他打着唐朝的旗号并有瑶池都督的身分，势力迅速发展。正如史书上讲的："招携离散，庐帐渐多。"[1]他在力量壮大起来后，就进一步同乙毗射匮可汗争夺对整个西突厥的统治。

唐太宗当时在西域各族中的威望是很高的。作为一个曾经降附于唐并受封官职的部落首领阿史那贺鲁，在李世民在世时是不敢有所举动的。但在唐朝这位强有力的君主于公元649年逝世以后，他就立即进行叛乱，企图占领西、庭二州。庭州刺史骆弘义把这个情况向新即位的唐高宗李治报告，唐高宗派通事舍人乔宝明迅速赶去安抚，并令阿史那贺鲁把自己的儿子咥运送到唐朝充当宿卫，也就是做人质的意思。咥运不得已去了，不久被遣还。他回来后，阿史那贺鲁在其建议下率领部众西走，击溃乙毗射匮可汗，兼并他的部落，建牙于千泉，自称沙钵罗可汗。[2]于是西突厥的咄陆、弩失毕十姓部落以及西域诸国全归其统治。咄陆有五啜，弩失毕有五俟斤。其中的阿悉吉阙俟斤最为强盛。贺鲁任命其子咥运为莫贺咄叶护，以统部落。他自己成了整个西突厥的统治者，胜兵达数十万人。

① 《册府元龟》卷九九八。

② 《新唐书·西突厥传》。

阿史那贺鲁的力量既壮大，便与处月、处密、姑苏、葛逻禄、弩失毕等部一起叛唐，于公元651年的秋天进攻庭州，陷金岭城及蒲类县，[①]杀掠数千人。[②]"贺鲁独据一城，深沟高垒，用以自固"，[③]威胁到当时在西域统治的重镇西州高昌以及东西商路的安全。同时，周围各部族也受到贺鲁的侵袭。同年年末（高宗永徽二年十二月），处月部的首领朱邪孤注杀害唐朝派至该部的招慰使单道惠，叛附于阿史那贺鲁，并据牢山[④]以守。所以，回纥部的首领婆闰及其他诸部属都请求唐朝派军讨伐阿史那贺鲁。[⑤]唐高宗任命左武卫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高德逸、右武卫将军萨孤吴仁为副，发秦、成、岐、雍府兵三万，以及回纥骑兵五万前往讨伐。庭州刺史骆弘义向唐高宗建议，趁寒冬积雪，集中力量剿灭叛乱的总头目阿史那贺鲁，对胁从叛乱的处月、处密等部则宽恕不问，以免迁延时日，贺鲁遁逃。唐高宗同意了骆弘义的这个建议，命其与梁建方等相知经略之。但是，梁建方并没有按照这个建议作，而是先去进攻处月、处密部。

公元652年，梁建方、契苾何力等与处月部首领朱邪孤注大战于牢山。其山险绝，唐军分为几路，数道并进，攀缘鼓噪而上，从四面急攻之。处月部大溃，朱邪孤注携其亲信眷属乘夜遁逃。梁建方派副总管高德逸以轻骑兵跟踪追击之，行五百余里。孤注据险拒战，唐兵在对阵中将其生擒斩首，并擒获了处密部的首领时建俟斤、合支贺等。总计战果："斩首九千级，虏渠帅六十，俘生口万余，

① 《旧唐书·高宗本纪（上）》。是年，因贺鲁叛乱，唐朝将安西都府由交河迁至高昌故都，命高昌王后裔麴智湛往抚。

② 《新唐书·西突厥传》。

③ 《册府元龟》卷三六六。

④ 牢山，即今焉耆、托克逊交界处之阿拉癸山。岑仲勉说处月、处密等犯天山县，系自空格斯河取道阿拉癸山。

⑤ 《册府元龟》卷九七三。

获马牛杂畜七万。”[①]

处月、处密既平，唐朝就在第二年（公元653年）撤销了瑶池都督府，而在处月、处密部地区设置金满、沙陀二州[②]，皆领都督，统其部落。[③]唐朝又派左屯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率领诸将，继续进剿阿史那贺鲁及其党羽，但都“不克而还”。[④]

公元653年，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死，其子颉苾达度设（亦号真珠叶护）与阿史那贺鲁发生内讧。真珠叶护与弩失毕五部之众一起向贺鲁发动进攻，将其打败，斩首千余级，贺鲁后方动摇。接着，真珠叶护几次派遣使者请求唐朝发兵讨伐阿史那贺鲁。公元655年，唐朝派丰州都督元礼臣前往册拜真珠叶护为可汗。元礼臣走到碎叶城时，阿史那贺鲁派兵前来阻挡，使唐朝使臣不能前进。[⑤]元礼臣终于不得完成其册拜真珠叶护的使命，中道返回。而真珠叶护的部落后来也多为阿史那贺鲁所吞并，其所余剩的部落则人少力弱，不能成为一支足与贺鲁相抗衡的力量。

公元656年，葱山道行军总管程知节再度进讨西突厥，与葛逻禄、处月二部在榆慕谷大战。二部大败，唐军斩敌千余级。副总管周智度进攻突骑施、处木昆二部，攻陷咽城（在今塔城境），斩首三万级。同年冬，程知节指挥大军前进到鹰娑川（裕勒都斯河），与之同去的将领还有前军总管苏定方，左武卫将军舍利叱利，右武卫将军王文度，伊州都督苏海政等。唐军在这里遇上了前来抵抗的西突厥二万骑兵。苏海政与之作战，不分胜负。接着又有突厥别部鼠尼施等率领二万多骑兵来到。当时苏定方正在一个小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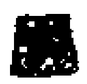
① 《旧唐书》卷四。沙畹说，这时处月部分布于北庭，处密部分布于玛纳斯。

② 公元654年，闰五月，以处月部落置金满州，隶轮台县。

③ 《旧五代史·后唐太祖纪》：“永徽中，以拔野为都督（即沙陀府都督）”；又《新唐书·沙陀传》：“贺鲁反，……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从，高宗以贺鲁所部授之。”

④ 《册府元龟》卷九七三。

⑤ 有的人根据这一事实认为，在这个时期碎叶城是控制在阿史那贺鲁的手中。



另一边休息，其处距程知节驻地约十里左右。苏定方望见鼠尼施部行走所扬起的尘土，便立即亲率五百骑兵驰往击之，敌部大溃，追杀二十里，斩一千五百余人，缴获马匹二千。死马及其所丢弃的铠甲武器，漫山遍野，不计其数。[①]

这时，唐军的副统帅王文度对苏定方的这一战功心怀嫉妒，便对程知节说："这一战役虽然击溃敌军，但自己也有死伤，何必干这种事。现在应当安营结阵，将辎重放在中间，四面布置军队保护起来。只要自己安全就行了，不要轻敌冒进，以致有所死伤。"他又假说另外接到圣旨：程知节恃勇轻敌，军队由王文度指挥。这样，唐军就停下来不再向敌人进攻，整日骑着马守住阵脚。马多瘦死，士卒疲劳，无有战志。苏定方建议程知节把王文度逮捕起来，未被采纳。在他们班师回来后，王文度因假传圣旨，程知节因"逗留追贼不及"，都犯死罪，从宽处理，王除名，程免官。

公元657年春6月，唐朝政府以葛逻禄部置阴山、大漠、玄池三都督府。又升任左屯卫将军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率领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左骁卫大将军瀚海都督回纥部首领婆闰等，穷讨阿史那贺鲁。同时，派早已投顺唐朝并在长安做官的原西突厥首领阿史那弥射与阿史那步真二人为流沙安抚大使，前往招降西突厥旧部。以苏定方为统帅的唐朝大军由北道出阿尔泰山，弥射与步真二人则率军由南道出西州，两路合击阿史那贺鲁。为了争取西突厥部落脱离贺鲁，唐高宗还采纳了薛仁贵的建议，将受到阿史那贺鲁迫害而为唐军所虏获的西突厥头目泥孰的家属送回。因此，泥孰等请求随军效死，讨伐贺鲁。[②]

当唐朝的北路大军在苏定方的指挥下到达阿尔泰山以北的时候，西突厥部落的俟斤懒独禄等率领部落一万多帐户前来归

① 《旧唐书·苏定方传》。

② 《旧唐书·薛仁贵传》。

降。苏定方接受了他们的投降，并从该部中挑选一千骑兵一同继续前进，到了额尔齐斯河以西，遇着西突厥处木昆部落前来抵抗，唐军与之交战，大破之。[1]

以后，阿史那贺鲁就亲自率领十姓部落的十万军队前来拒战。而苏定方率领与之对阵的汉兵及回纥兵仅有万余人。贺鲁见唐军兵少，颇有轻视之意，他指挥骑兵把苏定方包围起来。苏令步兵据守南原，都手执长矛聚拢，朝着外面准备杀敌，他自己则率领骑兵列阵于北原。贺鲁先对南原的步兵发起攻击，三次冲上来，步兵都坚守屹立，不为所动。就在贺鲁军冲不动步兵的当儿，苏定方指挥骑兵对其猛攻，贺鲁军大溃，败逃而走。唐兵跟踪追击30里，俘斩三万人，并杀其大头目都搭达干等200人。

明日，继续追击阿史那贺鲁军，于是，胡禄屋等五弩失毕部落全部向苏定方投降。

在南路军方面，五咄陆部落听说阿史那贺鲁被击败，就都来向阿史那步真投降。

苏定方便命令萧嗣业与回纥首领婆闰二人率领胡兵赶往邪罗斯川（塔拉斯河）追击阿史那贺鲁，任雅相率领新投降的西突厥兵继其后。这时，天降大雪，平地深二尺，部队都请求等天晴后再追。苏定方说："现在雪深、风大、天暗，贺鲁以为我们不敢进军，一定会休息士马。我们可出其不意急攻之，定会将其消灭。如果迟缓不进，他们就会远远遁逃，再也追不上了。省日兼功，就在这时了。"遵照苏的命令，唐军踏雪昼夜兼行，在所经过的地方收其部众牲畜，一直追到双河（博罗塔拉），与南路的弥射、步真会师，士气大振，距阿史那贺鲁的居地只有200里了。于是布阵长驱而进，抵达贺鲁牙帐所在的金牙山。时贺鲁的部众正在行猎，苏定方乘

① 据《新唐书·西突厥传》，《册府元龟》卷九七三、九八六，但《新唐书·苏定方传》、《旧唐书·苏定方传》及《资治通鉴》都以破处木昆部在受懒独禄之降以前。

其不备，纵兵击之，斩获数万人，并缴获其鼓纛器械。贺鲁与其子咥运、婿阎啜等跳渡伊犁河，逃往石国。唐军一直追到碎叶水，尽夺其部众。萧嗣业继续追剿，苏定方引军返回。

阿史那贺鲁逃到石国西北的苏咄城，人马饥乏，不能再行，便派人带着金银财物进城买马。苏咄城主诈以酒食迎接贺鲁，将其诱入城内，然后关闭城门，将其逮捕，送往石国。萧嗣业与阿史那弥射之子元爽率领追兵来到石国，石国人把阿史那贺鲁交给了唐军。西突厥汗国至此被摧毁，其部落与中亚领土并入了唐朝的版图。

唐朝在平定阿史那贺鲁以后，立即遣散突厥诸部之从军者，令其返回各自的居住地区。并开辟道路，设置驿站，掩埋尸体。又划定疆界，恢复农牧业生产。凡是被阿史那贺鲁掠夺奴役的部众，都清查出来，放回原部落，使十姓部落各安生业。

在阿史那贺鲁发动叛乱时，唐高宗曾于公元651年一度将安西都护府迁回高昌。现在贺鲁既已平定，唐朝于公元657年置龟兹都督府，公元658年将安西都护府置于龟兹，以故安西为西州都督府，镇高昌故地。次年（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疏勒置州。于是，龟兹、碎叶[1]、疏勒、于阗正式称为安西四镇。

对于西突厥部落的管辖，是设立濛池、昆陵二都护府。濛池都护府居楚河以西，即相当于弩失毕五部之地。昆陵都护府居楚河以东，即原咄陆五部之地。唐朝任命阿史那弥射为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管辖五咄陆部落；阿史那步真为右卫大将军、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管辖五弩失毕部落。唐高宗派光禄卿卢承庆捧诏书前往册命。诏书说："贺鲁父子既已擒获，诸头部落须有统领。卿早归阙庭，久参宿卫，深感恩义，甚知法式，所以册立卿等各为一部可汗。但诸姓从贺鲁，非其本情，卿等才至即降，亦

① 原来被阿史那贺鲁盘踞的碎叶，现在已经处在唐朝的管辖之下了。

是赤心向国。卿宜与卢承庆等准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节级,授刺史以下官。"从此,西突厥的部落首领都成了唐朝的大小官员,西突厥的人民都是唐朝的百姓。至公元659年春,阿史那弥射在双河与真珠叶护战,将真珠叶护杀死,唐朝统一西突厥的大业就完全实现了。西突厥统治下的中亚地区,也就合并于唐。

第三节 唐朝管辖下的中亚地区

巴尔托里德曾经说过:"对于各个突厥部族之间的战争以及游牧国家的兴亡与更代,阿拉伯人没有什么兴趣。如果没有中国的记载(部分地还有希腊的史料),则我们或将没有关于这些事件进程的任何材料。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所以在蒙古和新疆境内所发生的事件,比在西部中亚地区所发生的事件,对我们说来,就比较清楚些。"[①]这从前面的叙述也可以看到。

中亚地区同中国西北各族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有些时期在政治的隶属关系上也不可分。历史上民族的迁徙与融合,更是异常频繁。中亚的许多民族都来自中国。所以,如不述及中国西北部的民族史,则中亚史是根本讲不清的。为此,采取由东到西的顺序来叙述各民族各地区的情况,尽量做到东部从简,西部中亚地区从详。

在唐朝于公元630年灭东突厥以后,漠北地区以薛延陀部和回纥部为盛。薛延陀首领真珠可汗夷男,建牙于郁督军山下,独逻水南。其势力东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呼伦池)。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固、霫诸部,都归其统治。公元630年,各少数族的首领上书唐太宗,请求尊称他为"天可汗"。此后,薛延陀与回纥二部控制今外蒙达十五年之久(630~645年)。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5卷,第50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版。

公元645年，真珠可汗卒，其子拔灼自立为多弥可汗。多弥无道，大失民心。唐与回纥合力进攻多弥，多弥败走，被回纥攻杀，薛延陀亡。李世勣率领的唐军进至郁督军山。于是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解薛等十一姓，各遣使向唐朝贡。

这里的回纥部，以前是高车，以后又是铁勒的一部分，曾处在东突厥汗国的统治之下。其分布地区起初在郁督军山，后迁至色楞格河流域。东突厥汗国强盛时期，回纥部对其缴纳赋税、提供人力、物力和兵员。故史称："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东突厥亡后，回纥部的首领为菩萨。公元646年薛延陀灭后，漠北之地尽入唐朝版图。唐在各部族设立州府，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当时回纥部为瀚海府，其首领俟利发吐迷度被册拜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统属于燕然都督府。正如唐太宗在诏书中所说的，当时分布于今蒙古地区的各族"远遣使人，委身内属，请同编列，并为州郡"。他们奏称："臣等既为唐民，往来于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回纥部既为唐之编户，也就为唐所"资用"了。如在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乱时，回纥首领婆闰曾请求唐朝进行讨伐，并出骑兵五万从征，一直到平叛战争的结束。

漠北地区另一个重要的部族是结骨[1]（黠戛斯族）。该族古称坚昆，分布于萨彦岭以北的叶尼塞河流域，在回纥之北。黠戛斯人也曾一度隶属于突厥汗国。其地"有金、铁、锡，每雨，俗必得铁，号迦沙，为兵绝犀利，常以输突厥"。[2]而贵族阶级所服用的丝绸锦绫，都是从中国贩运来的。他们通过商业贸易接受到中国文化的

① 此时称为结骨。黠戛斯之译名始于贾耽（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第729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新唐书·黠戛斯传》注）。

② 《新唐书·黠戛斯传》；《新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147页。

巨大影响。甚至其官吏也采用中国的宰相、都督、职使（刺史）、长史、将军等称号。东突厥汗国亡后，黠戛斯属薛延陀，接受其所派的颉利发一人为监国。公元632年，唐太宗曾派王义宏出使于黠戛斯。公元643年，黠戛斯向唐朝贡貂裘及貂皮。公元648年，其酋长俟利发失钵屈阿栈朝唐，要求唐太宗给他封官，表示愿臣服于唐。唐授之以左屯卫大将军、坚昆都督的职务，以其地为坚昆都督府，隶属于燕然都护。在唐朝的时候，一般认为黠戛斯人是与汉人的混血种。他们当中长黑头发的人被认为是汉朝李陵的后裔，他们自己也这样认为，故自称是都尉苗裔。公元653年到唐朝来朝贡的黠戛斯使者报告说他们那里汉人很多。这说明，从古以来以至于唐朝，汉族同黠戛斯地区的关系是密切的，交往是频繁的。故迁入该地区的汉人甚多。

再是葛逻禄部。该部原来是隶属于西突厥汗国的一个部族。分布于阿尔泰山以西的喀拉额尔齐斯河流域，在黠戛斯的西南，东与东突厥别部车鼻相接。在薛延陀统治漠北时期，车鼻建牙于金山之北，自称乙注车鼻可汗。葛逻禄部曾受车鼻的统治。薛延陀亡后，车鼻的势力更加强盛。贞观末年（649年），车鼻部叛唐，唐朝派高侃发回纥、仆骨等部兵击之。葛逻禄背车鼻降唐。高侃率精骑追车鼻至金山，将其生擒。车鼻灭，葛逻禄三部谋落、炽俟、踏实力都到长安朝见。唐太宗死后，有一部分葛逻禄部跟随阿史那贺鲁叛乱。公元656年，程知节击败之。次年，以谋落部为阴山都督府，炽俟部为大漠都督府，踏实力部为玄池都督府，用其酋长为都督。后又从炽俟部分出一部分置金附州，都属于北庭都护府统辖。

至于西突厥十姓部落，除前述设立的昆陵、濛池二都护府以外，在各部亦设都督府。如处木昆部为匐延都督府，突骑施索葛莫贺部为嗢鹿都督府，突骑施阿利施部为絜山都督府（地当谢米列契境），胡禄屋阙部为盐泊都督府，摄舍提暾部为双河都督府，鼠尼施部为鹰娑都督府。弩失毕五部的中心地区在楚河、塔拉斯河



流域,各该部所设的都督府不详,都统属于昆陵、濛池二都护府。楚河附近之碎叶城被列为安西四镇之一,有保大军吞于其地,是唐朝的驻兵重地。在都护、都督之下,还按部落置有州县,其名亦不详。

关于唐朝对原属西突厥的中亚地区的行政管辖,史料记载: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九月,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挹怛、疏勒、朱驹半等国置州县府百二十七"。[①]

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六月,癸未,以吐火罗、哒哒、罽宾、波斯等十六国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并隶安西都护府"。[②]是年,设安西四镇。

这说明中亚地区完全列入了中国唐朝的版图。今据汉文官方史料的记载及外文资料,分地区说明之。

塔什干地区,当时称为石国,或译为柘支、柘析、赭时,都是Shash的译音。西突厥十姓部落在其东北,南距俱战提(亦译为忽毡)二百里,西南五百里即撒马儿罕。西南临锡尔河,在汉文史料中称为药杀水,人中国谓之真珠河,亦称质河。阿拉伯人则称为锡洪河,或色洪河。这里说的真珠河应即纳伦河。当时塔什干地方的国王姓石,其都城为柘析城。据伊斯兰地理家的叙述,塔什干地区的城镇是很多的。伊斯塔赫里说有二十七城,马克狄西说有三十四城。乞尔乞克河(锡尔河支流)岸有一城名为叶护城,这反映了以前西突厥对塔什干地区的统治。唐朝平定阿史那贺鲁以后,于公元658年在瞰羯城设大宛都督府,任命其王瞰土屯摄舍提于屈昭穆为都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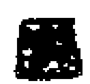
① 按:是年十一月左右,贺鲁部将都曼反,攻于阗,似欲"南结吐蕃",唐朝派苏定方讨平之。

②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317、6324~6325页。又《新唐书·地理志》:"龙朔元年,以陇州南由令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以其王都为都督府,以其属部为州县。凡州八十八,县百一十,府百二十六。"又《旧唐书·地理志》:"龙朔元年,西域诸国,遣使来内属,乃分置十六都督府,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皆隶安西都护府,仍于吐火罗国立碑以纪之。"

费尔干纳地区，即以前的拔汗那（钹汗，破洛那），这时称为宁远。费尔干纳是一个盆地，北为科卡尔（Cotkal）山脉，南为阿赖山。其地历来建有独立的王朝，除曾经臣属于汉朝以外，无论是阿赫门王朝、亚力山大、安息与萨珊王朝都未统治其地。后来显然受到西突厥的控制。费尔干纳地区有大城六，小城上百。西犍城和奥什城是其与突厥人的分界处。奥什在东，西犍在锡尔河之北。汉朝以后，费尔干纳的王统"自魏晋相承不绝"。唐朝贞观年间，其王名契苾，被西突厥瞰莫贺咄所杀。王城被阿瑟那鼠匿所夺据。鼠匿死后，其子遏波之拥立契苾兄子阿了参为王，以呼闷城为首府。而遏波之则据卡散城。卡散城在西犍城以北50公里。俱战提地方也有一个国王，附属于费尔干纳的国王。公元656年，遏波之曾遣使者到唐朝进贡。公元658年，唐朝在卡散城设休循州都督府，任命阿了参为刺史。费尔干纳地区同唐朝的关系更为密切，其国王对唐朝也最忠诚。

撒马儿罕地区，总称为"康"，或译作萨末犍、飒秣建、悉万斤。这个地区跨泽拉夫善河（那密水）两岸，首府在河以南，共有大城三十，小堡三百。巴尔托里德说："就其幅员与居民的数量而言，撒马儿罕历来是河中的第一城。……此城如此重要，首先可用其地理位置来加以解释，它处在来自印度、波斯和突厥的各条主要商路的会合处；此城周围物产异常丰富，也使它有可能在一个地方汇集大量的人口。"库尔齐（Curtius）说，此城之外墙周匝有七十斯塔第（约12.8公里）。而玄奘则说，只有二十多里。撒马儿罕的内城有东西南北四门：东门称为中国门，在一个高地上，从此高地有多级台阶下至于泽拉夫善河；西门称为瑙巴哈尔门或铁门；南门称为佉沙门；北门称为布哈拉门或奥斯鲁沙纳门。[①]撒马儿罕地区的国王为昭武族的月氏人。其周围诸小国的国王都与之同

①《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134~136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族，称为昭武九姓（指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①] 1965年，前苏联考古家在此地区的额弗拉昔雅卜故城的古屋废墟中，发现属于公元7世纪的壁画。画的是一位公主出嫁。公主身骑白象，上有华盖，自石汗那地区前来撒马儿罕，与其统治者婚配。壁画规模宏伟，仅残存的下部就达两米高，色彩鲜艳，场面豪华，说明当时的文化繁荣。

据汉文史料的记载，康国在隋朝时臣属于突厥汗国。公元627年，康国王遣使到唐朝贡献。东突厥汗国亡后，康国于公元631年向唐朝请求作中国的臣属。阿史那贺鲁的叛乱被平定以后，唐朝在撒马儿罕地区设康居都督府，任命其王拂呼缦为都督。

米国，即弥秣贺，或弥末。撒马儿罕地区有十二个乡，六个在泽拉夫善河以南，六个在河以北，米国是河以南的六个乡之一。它在阿拉伯人入侵之前是单独的小国，其境内的古堡特别多。米国国王名昭武开拙，居于钵息德城。公元658年，唐朝以弥秣贺地为南谧州，任命昭武开拙为该州刺史。从此对唐朝朝贡不绝。

何国，即屈霜你迦，或贵霜匿，相当于现在的卡塔·库尔干，在撒马儿罕的西北。贵霜匿被认为是索格底亚那仅次于撒马儿罕的繁荣的城镇。伊斯塔赫里说，贵霜匿为索格底的“文化最高之城，索格底诸城之心脏”。在阿拉伯人入侵之前，该地也是一个单独的小国。阿拉伯作者塔巴里称其国王为贵霜沙。康居小王所居之附墨城据说即在贵霜你迦。该城左边有二层的城楼，内有壁画。其北面画的是中国帝王像，东面画突厥、婆罗门像，西面画波斯、拂菻（东罗马）的帝王像。何国国王每日早晨对之膜拜。公元641年，即唐太宗平定高昌后一年，何国遣使者来唐朝贡。阿史那贺鲁叛乱，唐朝出兵讨伐时，何国派人向唐朝表示：“闻唐出师西讨，愿输粮于军。”以后，唐朝以何国为贵霜州，任命其国王昭武婆达地为刺

① 参看前苏联学者斯米尔诺娃著的《粟特史纲要》（1970年）、《品治肯特钱币目录》、《粟特钱币综合目录》、《粟特经济文书》第3卷。

史，婆达地遣使者钵底失向唐朝致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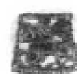
东曹，本名有四种译法：率都沙那、苏对沙那、劫布呾那与苏都识匿（也称为乌什鲁沙那），相当于现在的乌腊提尤别。大致可以说，撒马儿罕与俱战提之间的地区就是东曹之地。阿拉伯地理家雅库特说，在乌什鲁沙那，设防的堡垒达400个之多。这些可能就是德赫干们居住的地方。巴尔托里德则说，此地后来受阿拉伯文化的影响比其他地区为少，保存古代雅利安贵族制度特点的时间较长。欧阳修等编撰的《新唐书》认为，东曹为"汉贰师城地"。[1]如果相信这一说法，则在汉代时东曹一度属于大宛国的范围。《新唐书·西域传》说：其地"东北距俱战提二百里，北至石，西至康，东北宁远，皆四百里许，南至吐火罗五百里"。这里说的方位，是很精确的。唐朝武德年间（618~626年），东曹与康国一起遣使者人朝。该使者说："本国以臣为健儿，闻秦王（李世民未即位以前的称号）神武，欲隶麾下。"

西曹，隋朝时称为曹国，以瑟底痕城为首府。瑟底痕与贵霜匿接近（相距仅32公里），都在撒马儿罕的西北。阿拉伯地理家的著作中讲，瑟底痕有一个阿法林卡特镇（今弗林肯特镇），是公元7世纪时撒马儿罕王乌勒伽的兄弟阿法仑所建。瑟底痕东北的越于底城，城内有得悉神祠。祠内有金制的供器，器上刻有款题："汉时天子所赐"。这说明该地区很早就与中国有关系。武德年间，西曹来唐朝贡。

中曹，在西曹之东，康国之北。其王居于伽底真城。

史国，即佉沙，或羯霜那，相当于现在的沙赫里夏勃兹。雅库特说佉沙曾一度被认为是粟特最重要的城。汉文史料说：其为"康居小王苏薤城故地。西百五十里距那色波，北二百里属米，南四百里吐火罗"。隋大业年间（605~617年）其国强盛，与中国发生了关

① 王治来以为，汉贰师城地，相当于今之奥什。



系。国王逖遮,筑乞史城。公元642年,史国国王沙瑟毕向唐献方物。西突厥合并于唐后,在其地置佉沙州,任命其国王昭武失阿喝为刺史。其西面的那色波,称为小史,统属于史国。从佉沙到那色波约有三天的路程。

布哈拉地区[①],这时称为布豁,或捕喝(汉文史书称为安国)。在阿姆河以东,首府为阿滥谧城。"大城四十,小堡千余"。它与撒马儿罕是河中的两个最主要的城镇,二者之间有道路可



片吉肯特壁画:反映唐朝对中亚影响的唐朝服装

① 据认为,布哈拉一名,系源于梵文的Vihara(毗诃罗),意为僧房、精舍、精庐、僧游履处,这说明它是佛教影响下出现的名称(见舒勒《突厥斯坦》第2卷,第89页,注1,纽约1876年英文版)。在较早的时期,如在《魏书》中作"忸密(Numijket)",《隋书》《新唐书》作安国。以后《西域记》的捕喝、元代史料中的蒲华、卜哈儿、不合儿、不花剌等,才是不哈剌一名的译音。

通，称为“沙·拉赫（Shah-rah）”，意为御道。布哈拉的统治者称为“布哈拉·胡达特”。据阿拉伯史料的记载，公元7世纪时有一个布哈拉·胡达特，名叫比顿[①]。是他重建了布哈拉的城堡，并将自己的名字铸于铁券，该铁券挂在城门之上。汉文史料说，布哈拉有骑士阶层，这些骑士是由招募的勇士组成，称为柘羯。布哈拉有一城堡，传说是突厥统治者苏巴什特勤（Subashitegin）所建。武德年间，安国派使者入朝于唐。贞观年间，向唐朝献方物。唐太宗对其使者说：“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西域各族都很高兴。可见东西丝绢贸易同唐朝统一西突厥的关系。当时安国国王诃陵伽向唐朝献名马，自称其家族世袭为安国王已有二十二代。阿史那贺鲁平定以后，唐朝以阿滥为安息州，任命其王昭武杀为刺史。

东安国，在安国东北，首府为喝汗城，亦名籛斤。显庆年间（658年），以其地置木鹿州。任命其王昭武闭息为刺史。

花剌子模地区，译为火寻，或货利习弥。首府为急多飔遮城。唐朝的行政管辖看来没有达到花剌子模地区。

龙朔元年（661年），王名远所置都督府及州县，主要在阿姆河中、上游流域以及该河以南今阿富汗境内。它们是乌飞州都督府[②]，在阿姆河的上游，相当于现在阿富汗的瓦罕地区，原为护蜜国。这肯定是一个雅利安人的山国，因为直到现在当地居民还说着东伊朗语。国王名沙钵罗颉利发，被任命为刺史。首府为塞迦审城。乌飞州都督府下辖钵和州，在喷赤河上源瓦罕达里亚（瓦罕河）流域的萨尔哈德（Sarhad）。在古代，有一条商路经过瓦罕通往印度河上游地区。从四镇去吐火罗的通路亦经过其地。

至拔州都督府，在今塔吉克斯坦的达尔瓦兹地区。[③]其地原

---

① 比顿（Bidun），或写作Bandun，Baydun，Naydun，Bendun，传说此人在位的年代为回历纪元初年。

② 《新唐书·西域传》说，乌飞州置于显庆时。

③ 沙畹说至拔州在今喀尔提锦，兹采用日本人藤田说。



为俱蜜国。俱蜜即Komedai之译音。阿姆河流过瓦罕走廊，转向北，经鲁珊，再到加尔夫，即至达尔瓦兹南境。前面已经提出，托勒密所描写的古丝绸之路，即经过俱蜜。一般认为俱蜜即玄奘提到过的拘谜陀。这也是一个塞种古国，受突厥统治。其首府为褚瑟城（《旧唐书》作措瑟城）。

天马都督府，相当于今塔吉克斯坦的卡菲尔尼汗河（阿姆河的支流）盆地，或该河上游地区。原为解苏国，首府为数瞒城，即《大唐西域记》中的愉漫国，是一个突厥统治的小国。数瞒城所在地即今杜尚别。《新唐书·地理志》说天马都督府下领洛那、束离二州，而《旧唐书·地理志》则说“分其部置三州”。

悦般州都督府，原来是石汗那国。阿拉伯史料说石汗那（Saghaniyan）是在苏尔汗河谷地，其地方统治者称为恰千·胡达特。巴尔托里德说石汗那的首府距帖尔美兹四日程，即现在的迭脑（Denau）。近年学术界的意见认为，公元6~7世纪时的石汗那相当于迭脑以南30公里处之达里维尔津·特佩城。而中世纪的石汗那即克兹勒苏河注入苏尔汗河处之别德拉契城，该城在迭脑东南6公里。[①]

高附都督府，原为骨咄，是瓦赫什河与喷赤河之间的一个山区。《新唐书·西域传》说：“循缚刍水北有呾蜜种（帖尔美兹）……又东逾四种。有镬沙（瓦赫什）……东界骨咄，接葱岭十八种”骨咄大致就是今阿富汗的东北角到塔吉克境内瓦赫什河之地。巴达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3卷，第558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岑仲勉说，置为悦般州都督府之石汗那与阿拉伯史料中的石汗那不是一回事。因《新唐书·西域传》说：“石汗那，或曰斫汗那。自缚底野南入雪山，行四百里得帆延，南临乌浒河。”冯承钧说：“其国应在帆延北四百里，乌浒河左岸，古双靡翎侯治地。即《宋云行记》之赊弥，《西域记》之商弥，今之契特腊耳。俱兰或曰俱罗弩，又曰屈浪拿，即Kuran古地之对音。州治应在其地。”（见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66页）以上巴尔托里德的说法可能较确，即石汗那应在乌兹别克共和国东南部的迭脑附近。因为《新唐书·西域传》关于石汗那的那段话讲得不着边际，怎样从石汗那，又“自缚底野南入雪山”呢？这很难说明石汗那的位置。

赫善的法扎巴德也是骨咄的一部分。骨咄王的驻地胡勒布克大约在今库里亚布以南某地。汉文史料说，高附都督府治在沃沙城，下领五翎、休密二州。

王庭州都督府，原为九越得犍国。岑仲勉说即《大唐西域记》之鞠和衍那。地介于卡菲尔尼汗河与瓦赫什河两河之间，当北纬37°21′分，东经68°9′，也即塔吉克共和国的西南角。首府为步师城。

姑墨州都督府，原为咀没国，即帖尔美兹，在阿姆河北岸，与苏尔汗河相汇之处。今属乌兹别克共和国。《新唐书·西域传》写作咀蜜，称"咀蜜种，亦自国，东西六百里所"。因其地扼交通要道，在中亚史上最为有名。首府为咀没城，下领栗弋州。

月支都督府，即吐火罗，相当于今阿富汗之北部。其首府为阿缓城（昆都士）。吐火罗"居葱岭西，乌浒河之南，古大夏地。与挹咀杂处。胜兵十万，国土著，多女少男。……其王号叶护。"武德、贞观年间，都向唐朝贡献。公元650年，吐火罗给唐朝"献大鸟，高七尺，色黑，足类橐驼，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啖铁，俗谓鸵鸟"。西突厥平定后，以其地为月支都督府，任命其王阿史那为都督。并分其小城为二十五州（《西域传》作二十四州）：蓝氏州（Bavabid）、大夏州、汉楼州、弗敌州（Gurganj）、沙律州、沩水州、盘越州、忸密州、伽倍州、粟特州（Andarab）、钵罗州（巴格兰）、双泉州（伊什卡米希，在巴格兰东北）、祀惟州（Khulm）、迟散州（Haibak）、富楼州、丁零州、薄知州、桃槐州、大檀州、伏卢州、身毒州、西戎州、篾颉州、叠仗州、苑汤州（巴达赫善）。

大汗都督府，原为哌哒人所据之活路城，下领十五个州：附墨州、奄蔡州、依耐州、犁州、榆令州、安屋州、罽馥州、碣石州、波知州、乌丹州、诺色州、迷蜜州、肸顿州、宿利州、贺那州。

旅獒都督府，原为乌拉喝国。沙畹说乌拉喝国即《隋书》之乌拉曷国，"都乌浒水西，……北去安国四百里，西北去穆国二百余



里”。如果相信此说，则旅獒州都督府应是在土库曼共和国东南角与阿富汗西北之安德胡伊地区。

奇沙州都督府，原为护时犍国。即《大唐西域记》之胡实健。在今阿富汗西北部的希巴甘一带，首府为遏蜜城。伊斯塔赫里说，胡实健的首府为安巴尔城。奇沙州都督府下领沛隶、大秦二州。

昆墟州都督府，原为多勒建国，即前述波斯东部边境之塔里寒（非昆都士东之塔里寒），在今土库曼共和国东南部木尔加布河流域。其首府为低宝那城。

修鲜都督府，原为罽宾国。首府为修鲜城，在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东。其国人传说国王之始祖名叫馨孽，传到当时的曷撷支已有十二代。公元619年，罽宾国曾遣使向唐朝进贡宝带、金锁、水晶盏、颇黎。贞观年间，又来献名马。公元642年，又献褥特鼠。西突厥平定后，唐朝于公元658年以其地为修鲜都督府。龙朔元年（661年），王名远奉命册拜其王为修鲜都督，其下领州十：毗舍州、阴米州、波路州、龙池州、乌弋州、罗罗州、檀特州、乌利州、漠州、悬度州。

写凤都督府，原为帆延国，即巴米扬地区，在喀布尔西北，胡实健之东南。首府为罗烂城。贞观初年（627年）遣使者朝于唐。公元658年，唐朝以罗烂城为写凤都督府，任命其王詹为写凤州都督，管内五州诸军事。除罗烂城外，下领四州：解谷州、冷沧州、悉万州、钳敦州。

条支都督府，原为诃达罗支国，即希腊史料中的阿拉霍西亚，相当于阿富汗的南部。阿拉伯人称为扎布里斯坦（Zabulistan），汉文史料译为谢飓。《新唐书·西域传》说：“谢飓，居吐火罗西南，本曰漕矩吒，或曰漕矩。显庆时谓诃达罗支，武后改今号。东距罽宾，东北帆延，皆四百里。南婆罗门，西波斯，北护时犍。其王居鹤悉那城，……国中有突厥、罽宾、吐火罗种人杂居。”条支都督府下领九个州：细柳州、虞泉州、犁靳州、崦嵫州、巨雀州、遗州、西海州、镇西

州、乾陀州。

波斯都督府，设于疾陵城。波斯萨珊王朝末王伊嗣俟被阿拉伯人驱逐，已于公元651年在谋夫被人所杀。伊嗣俟之子"卑路斯入吐火罗以免。遣使者告难，高宗以远不可师，谢遣"。公元661年，王名远奉使往中亚设置州县，便拜卑路斯为波斯都督，府治设于疾陵城。当时伊朗本土已被阿拉伯人占据，卑路斯不可能再返回故地。所以这个波斯都督府不在伊朗。疾陵城乃波斯东境锡斯坦的首府Zaranj。[①]次年（662年）春，唐朝又立卑路斯为波斯王，当然只是名义上的。

以上就是唐朝在中亚设置行政管辖机构的情况，其中包括锡尔河以北的西突厥十姓游牧地区，锡尔河流域的塔什干与费尔干纳地区，泽拉夫善河流域的撒马儿罕与布哈拉地区，阿姆河中上游及其以南今阿富汗直到波斯东境。唐朝对这些地区的统辖主要是通过本地统治者而实现的（如任命其王为都督、刺史等），并不直接参与当地的行政。但各地的统治者或国王都向唐朝称臣纳贡，有的还送质子，以表示其对唐朝的服属关系。

中亚地区，处在中西交通和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带，经常来往的商人很多。唐朝即用向各国商贾征取的贡赋来供安西四镇的行政和军饷开支。《新唐书·西域传》讲："唐兴，（西域各国）以次修贡，盖百余，皆冒万里而至，亦已勤矣！然中国有报赠、册吊、程粮、传驿之费，东至高丽，南至真腊，西至波斯、吐蕃、坚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谓之'八蕃'，其外谓之'绝域'，视地远近而给费。开元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地广则费倍，此盛王之鉴也。"

总之，从公元658年起，中亚地区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已经列入了中国唐朝的版图。因此，西域各国同中国内地的经济

① 亨利·玉尔编：《古代中国闻见录》，第1卷，第99页，注，伦敦1866年英文版。



文化关系，就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密切，中国文化对中亚的影响也比以前更大。甚至在唐亡以后，中亚各族的心目中仍然只知有唐，把中国称为唐，把自己称为唐家子。突厥的统治者以自称“唐家子汗”为荣。

第九章
阿拉伯入侵中亚与伊斯兰教东传

第一节 阿拉伯灭波斯及其入侵中亚

在西方，伊朗萨珊王朝的失国同阿史那贺鲁的败亡差不多是同时的事件。在中亚地区合并于中国唐朝以后，继之而起的阿拉伯势力日益成为中亚的严重威胁。

阿拉伯的崛起，是同穆罕默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这位伊斯兰教的创始者约在公元7世纪初开始他的活动，到他创教时已经40岁了。穆罕默德从麦加转移到麦地那的时间就是回历纪年的开始——公元622年7月16日。直到公元632年6月8日穆罕默德逝世，他的活动没有越出阿拉伯半岛以外。阿拉伯的对外扩张，是在他的继承人艾卜·伯克尔（公元632~634年）以后。

阿拉伯哈里发们对外进行征服的有两个对象：一是拜占廷帝国的属地，再就是萨珊王朝统治下的领土。从第一任哈里发艾卜·伯克尔时开始进攻叙利亚、约旦、巴勒斯坦等地，到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634~644年）时，就完全征服了叙利亚，并扩展到了伊拉克、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等地。接着就东攻波斯。

这时波斯萨珊王朝的国王是伊嗣俟（即耶斯提泽德三世）。

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他领导波斯对阿拉伯人进行了长期殊死的斗争。决定命运的一战是公元637年在今伊拉克境内进行的卡的西亚之战。[①]在这次战役中，阿拉伯方面的指挥官是赛德·伊本·阿里，波斯军的统帅是鲁斯塔姆。战斗结果波斯军大败，鲁斯塔姆阵亡。这样，通往波斯首都的道路就打通了。次年，萨珊首都泰西封[②]陷落，伊嗣俟东逃。

尽管波斯的将领们继续进行抵抗，但伊朗的城堡还是一个一个地陷落。公元641年尼哈文[③]一战，伊嗣俟手下的波斯军被彻底歼灭，失去了保持国土的一切希望，伊嗣俟仓皇逃到帝国东部边境的谋夫。

逃到谋夫以后，伊嗣俟还想最后挣扎，就向相邻地区求援。当时，索格底亚那的突厥首领亲自率军来援。伊嗣俟不以礼接待，引起了突厥首领不满。突厥首领便同谋夫太守马贺（Mahoi）合谋，消灭了波斯国王的亲卫军。伊嗣俟孤立无援，逃到一个磨坊躲避。他服装华丽，满身珠宝，引起了磨坊主的贪欲。磨坊主在波斯王睡熟时将其杀死，把他的头颅割下抛入水磨的激流中，时在公元651年秋。曾经统治中亚、西亚的萨珊帝国的末主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一生。[④]如不算伊嗣俟之子卑路斯，则萨珊王朝延续了427年而亡。

阿拉伯人在摧毁了萨珊王朝的统治以后，遂占领了伊朗，势力推进到了东边的呼罗珊。阿拉伯哈里发给呼罗珊派了总督（汉文史料中称之为大食东道使）。以后，波斯东部的这个地区就成为

---

① 卡的西亚在幼发拉底河上的希拉附近。

② 泰西封，在今巴格达东南。

③ 尼哈文（Nehavend），在今哈马丹以南约68公里。

④ 汉文史料说伊嗣俟是被阿拉伯士兵杀死的。如《新唐书》卷二二一记波斯灭亡经过云："伊嗣俟不君，为大酋所逐，奔吐火罗。半道，大食击杀之。子卑路斯入吐火罗以免，遣使者告难，高宗以远不可师，谢遣。会大食解而去，吐火罗以兵纳之。龙朔初（661年），又诉为大食所侵。是时天子方遣使者到西域分置州县，以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即拜卑路斯为波斯都督；俄为大食所灭。"

阿拉伯人入侵中亚的基地。

伊嗣俟之子卑路斯继其父为名义上的波斯王，得到唐朝的承认。唐朝于公元661年立卑路斯为波斯都督，又在公元662年春立他为波斯王。[①]由于阿拉伯人的继续东进，卑路斯在疾陵城亦不可久留。公元667年，阿拉伯将领阿勒·哈卡姆·布·阿姆尔·阿勒·吉法里率军东征下吐火罗与伽尔契斯坦。[②]卑路斯在其追逼下，极为困窘地逃往中国。[③]《旧唐书》和《资治通鉴》提到，卑路斯于公元674年入朝于唐。[④]而《新唐书》则说："波斯为大食所灭，虽不能国，咸亨中犹入朝，授武卫将军。"[⑤]从此以后，卑路斯就留在中国首都长安。史料还提到："仪凤二年（677年），波斯王卑路斯奏请于此（指长安醴泉坊）置波斯寺。"[⑥]不久，卑路斯即死于其地。

卑路斯有一个儿子，名叫泥涅师（Narses？），也留在唐朝。这时（677年），中国西部发生了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别帅李遮匐与吐蕃联合进攻安西的事件。唐朝准备出兵讨伐。在讨论中，吏部侍郎裴行俭建议用智取而不出兵。他说："今波斯王身没，其子泥涅师充质在京，若遣使立之，路出二蕃，便宜从事，可不劳而成功。"[⑦]唐高宗采纳了他的计策，派他为安抚大食使，前往西域册立波斯王。

裴行俭提请任命肃州刺史王方翼为副使兼安西都护同行。他们在到达西州后，扬言正当天气炎热，不可远行，必须等秋凉时节才能西上。阿史那都支侦知后，不作防备。裴行俭把安西四镇诸胡

① 《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② 伽尔契斯坦，相当于今卑路斯库赫，在木尔加布河上游，是一个山区。

③ 吉布：《阿拉伯人在中亚的征服》，英文版，第16页。

④ 《旧唐书·高宗纪》；《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374页。

⑤ 《新唐书·波斯传》。

⑥ 宋敏求：《长安志》卷一〇。

⑦ 参考《新唐书·裴行俭传》、《旧唐书·裴行俭传》及《张说之集·裴行俭碑》。



酋长都召集拢来，佯言要行猎。诸胡子弟都请求随同出猎。于是裴行俭以畋猎为名，整顿其所招募的诸胡部队，倍道兼程西进。阿史那都支突然听说唐军来临，率其子弟前来迎接，被擒获。李遮匐听说都支被擒，便也投降。裴行俭将都支、遮匐二人囚系解送长安，让波斯王泥涅师自返其国。

另外，把王方翼留在安西，令其筑碎叶城，在该城刻石纪功，并于调露元年（679年）将碎叶列为四镇之一。据说，王方翼于是年筑碎叶城，立四面十二门，为屈曲隐伏出没之状。街郭回互，莫究端倪，五旬而毕。西域诸胡竞来观看，不能测其方略。[①]看来，王方翼是在原来碎叶城的基础上增建的，所以才能在50天之内筑成。当时安西四镇的诸胡族，都参加了擒获阿史那都支与李遮匐的行动，说明四镇是在唐朝的掌握中。近年在吐鲁番发现的大量文书，如《汜德达告身》、《调露二年名册》等，还说明有许多汉人应募参加了这次的行动。

泥涅师返国，当然还是不能回到伊朗。史称其："客吐火罗二十年，部落益离散。景龙初（707年），复来朝，授左威卫将军。病死，西部独存。"[②]可见他最后还是死在中国。

以上就是7世纪后半期伊朗的情况。同一时期中国西北边疆有些什么重要事件呢？总起来看就是东突厥的复兴及其西侵与吐蕃的开始扩张。

东突厥自颉利可汗亡后，其部落居于河套以南，列为州郡，受唐朝直接统治达五十年。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起，东突厥部落开始反叛唐朝，先后都被唐朝镇压。公元682年，属于颉利族的骨咄禄又反，自立为可汗，以其弟默啜为设，咄悉匐为叶护。公元690年，骨咄禄死，默啜为可汗，逐渐强大起来。"大抵兵与颉利时略

① 据《新唐书·王方翼传》，《张说之集·王方翼碑》，《旧唐书·王方翼传》，《全唐文》卷二二八，张说《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唐会要》卷七三，《新唐书·地理志》。

② 《新唐书·波斯传》。

等，地纵广万里，诸蕃悉往听命。”[①]自垂拱年间（685~688年）以后，默啜西侵十姓部落，使西突厥部众死散殆尽，日益衰弱。[②]

在公元7世纪中期，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开始崛起。标志着吐蕃强大的藏王是弃宗弄赞，或叫松赞干布。松赞干布于公元629年即位，从山南迁都于拉萨，先后统一诸部，兼并苏毗、羊同（今阿里地区），在公元633年前后建立吐蕃王朝。他仰慕唐朝文明，几次请求与唐通婚。唐太宗于公元641年以文成公主嫁之。吐蕃之进入西域并对其地进行扩张，为时甚早。古藏文史料常提到所谓“北方突厥地”，从那里得到食盐之事，其实这就是指的西域。公元647年冬，契苾何力、郭孝恪进攻龟兹，曾命突厥、吐蕃、吐谷浑连兵进讨。吐蕃既对西域及入西域之路早已熟悉，必与西突厥部落（如阿悉阙俟斤部与弓月部等）及其所属地区有所勾结。吐蕃势力进入西域的道路，起初主要是经过于阗南山（今阿克赛钦地区）。

公元7世纪后半期，吐蕃权臣禄东赞用事，史称其“用兵有节制，吐蕃倚之，遂为强国”。[③]早在龙朔年间（661~663年）吐蕃就与叛唐的南弓月部勾结，以图西域。阿史那都支与李遮匐也都曾依附于吐蕃。公元659年（显庆四年），西突厥阿悉结俟斤都曼率同疏勒、朱俱波、渴槃陀三国反叛唐朝，击破亲附唐朝的于阗。唐朝派苏定方征讨，擒获阿悉结都曼。但弓月部仍然继续反叛，“南结吐蕃，北招咽面”，共攻疏勒。唐朝再派萧嗣业征讨，弓月与疏勒乃惧而降。这是史料中明确记载吐蕃参与西域叛乱之事。[④]其后，公元662年（龙朔二年），唐朝派苏海政讨龟兹，海政枉诛随征之西突厥首领阿史那弥射，引起其部属反叛，其中南弓月部又引吐蕃军来与唐兵战。苏海政以军资赂吐蕃，与之言和而还。以后西

① 《新唐书·突厥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第1018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③ 《新唐书·吐蕃传》。

④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319、6372页。



突厥群龙无首。于是，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二人收集余部，依附于吐蕃。到这时，吐蕃参与西域的事务就更加积极了。

公元665年，疏勒弓月部又勾引吐蕃侵于阗。五年后（670年），吐蕃竟攻陷西域十八个羁縻州，又与于阗合兵攻陷龟兹拨换城，迫使唐朝放弃安西四镇。

公元7世纪70年代末，吐蕃与西突厥连兵攻安西，势力强大，其所控制的土地："东接凉、松、茂、嶲等州，南邻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

公元692年，西州都督唐休憬请求出兵收复于公元670年放弃的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唐朝派王孝杰为武威道行军总管，率同西州都督唐休憬、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击吐蕃。冬十月，大破之，收复了安西四镇。

看来，当时吐蕃似也卷入到东西贸易的经济利害之中，故吐蕃在公元696年请求唐朝撤回安西四镇的戍军，欲与唐朝分西突厥十姓之地。唐朝派郭元振去吐蕃，中道遇到其权臣论钦陵，钦陵重又提出上述要求。郭元振说："西突厥十姓与吐蕃不一样，早已是唐朝的编民百姓了。"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以后，吐蕃仍然继续侵扰西域，成为唐朝的威胁。

东突厥的复兴和吐蕃的争夺四镇、十姓，对于中亚地区唐朝政权的巩固是有影响的。而唐朝政权的削弱，则有利于阿拉伯人对中亚地区的入侵。

中亚地区内部的情况是许许多多的小王国小城邦，独立地或半独立地存在着，互相之间不断地进行战争，不能团结。而各地那些勇而好斗的骑士阶层则完全没有组织，也是互相争斗不休。所有这些不团结的现象也便利了阿拉伯的入侵。所以，巴尔托里德说："阿拉伯人的胜利，部分地是在当地人的帮助下获得的。"

阿拉伯人对中亚的入侵，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公元7世纪下半期是前一阶段，从公元8世纪初开始是后一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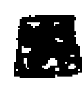
前一阶段的特点是以掠夺财富与虏获战利品作为主要目的。现代学者们经过研究都说，出身于游牧部落的阿拉伯人之对外进行征服，最初并非出于宗教的热情。他们的出征不一定是要传播伊斯兰教，而是为了掠夺财富，在其他地方如此，在中亚也是这样。正如希提（Philip K.Hitti）在《阿拉伯史》中所说的："使得许许多多贝杜因部族离开荒凉的故乡，到北方肥沃的地方去征战的，不是宗教狂热，而是经济的需要。……他们参加各种侵略的目的，是为了夺取战利品，而不是为了取得永久的立足地。"[①]所以，呼罗珊地区的阿拉伯总督派遣军队渡过阿姆河去侵掠索格底亚那地区。他们掠夺到大量的财富以后，每年都要返回呼罗珊过冬，并不在那里停驻。只是在公元8世纪以后，阿拉伯人才去占领那个地区。

关于前一阶段阿拉伯人入侵的情况，确切的史料是极少的。巴尔托里德说："关于欧麦尔时期阿拉伯征服的进程的报导，仅以半传说故事的形式流传至今，长期以来系口耳相传，仅后代人才将其笔之于书。许多说法互相矛盾，年代也不确，其原因即在此。甚至关于阿拉伯人初次越过阿姆河的时间，流传下来的报导也不一致。"所以，在这方面，也要参考汉文史料的记载。

穆罕默德以后的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在公元644年11月3日被一个基督教的奴隶刺杀。奥斯曼被选举为继任的哈里发，在位十二年（644~656年）。而阿拉伯穆斯林对中亚的进犯，就是始于哈里发奥斯曼时期（644~656年）。

据汉文史料《新唐书·西域传》、《唐会要》、《册府元龟》等书的记载，阿拉伯人在灭掉萨珊王朝和征服呼罗珊地区以后（萨珊末主伊嗣俟死于651年），于唐高宗永徽五年五月（654年5月22日至6月19日，回历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七日）就

① 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马坚译，第168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越过阿姆河进攻中亚的米国，围攻了康国（撒马儿罕）。这可能是为了追剿波斯王或其余众，也可能只是进行掠夺性的偶然袭击。故史称："永徽五年五月，大食引兵击波斯及米国，皆破之。波斯王伊嗣俟之子卑路斯走投吐火罗，遣使来告难，上以路远，不能救之。寻而大食兵退。吐火罗遣兵援立之而还。"①

阿拉伯人既灭了波斯，将波斯王子卑路斯驱往中国，就统治了呼罗珊地区。接着便征服了吐火罗，从而控制了索格底亚那的南大门巴里黑，为征服北面的河中诸地做好了准备。

公元656年，哈里发奥斯曼被暴动的穆斯林攻杀，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阿里被宣布为第四任哈里发，并从麦地那到库法就任，以其地为新的首都。但前任哈里发奥斯曼的同族、时任叙利亚长官的穆阿维亚举起为奥斯曼报仇的旗帜。阿里与穆阿维亚之间发生了战争，前者初战获胜。穆阿维亚就请求以调停的方式来解决争端。达成的调停办法是将阿里和穆阿维亚都予以废除。而穆阿维亚却于公元661年在耶路撒冷僭称哈里发。这种结果使许多阿里的追随者脱离了他，这部分人就称为哈列哲派（Kharijites）。此派主张只有最虔诚的穆斯林才有资格当哈里发，而不必问其属于什么民族和什么社会出身。他们甚至发展到反对阿里本人。阿里于公元658年7月17日在尼哈文的一次血战中打败了哈列哲派，但并未能将其完全镇压。以后一个哈列哲派分子为报此战之耻，于公元661年1月24日在库法将阿里刺死。阿里党（什叶派）既失去首领，穆阿威叶便成为哈里发政权的独占者。他出身于阿拉伯古莱氏的伍麦叶家族，故其所建立的哈里发王朝被称为倭马亚王朝（661~750年）。这个王朝以大马士革为首都，中国史料中称之为白衣大食。

只是在穆阿维亚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以后，才开始关注于巩固

① 《册府元龟》卷九九五。

阿拉伯对东伊朗的统治，在谋夫、锡斯坦等地建筑戍防堡垒，并从那里派军入侵中亚。公元670年，呼罗珊总督阿勒·哈卡姆死于谋夫。次年（671年）拉比（Rabi ibn Ziyad el Harith）继之。据说，他也曾渡过阿姆河，但未对中亚进行远征。

前章曾经讲到，在回历纪元初年，布哈拉地区的统治者（布哈拉·胡达特）名叫比顿。据说，比顿死时遗留下一个只有几个月的幼儿，故由其母后摄政。公元673年，拉比死，穆阿维亚任命济雅德之子乌拜都拉为呼罗珊总督。他奉哈里发之命率军渡过阿姆河，首先进攻布哈拉地区的沛肯城。该城人口稠密、商业繁荣，控制着经过阿姆河的商道，是布哈拉地区的政治、经济重镇。乌拜都拉经过一个冬天的战斗，夺得拉姆坦（Ramtina）及沛肯城，掠夺到大量的战利品和4000多俘虏，接着就向布哈拉进发。在阿拉伯人的进攻面前，布哈拉女王仓皇地向撒马儿罕逃跑。据塔巴里说，她慌张到如此程度，以至于逃走时把一只靴子丢掉了，其价值达2万迪勒木（dirhem，共合4166英镑）。最后，王后被迫向阿拉伯人求和。她同乌拜都拉签订了和约，答应每年向阿拉伯人纳贡100万迪勒木。乌拜都拉带着大量战利品、金银财宝、武器、服装、器具等返回谋夫。在返回的路上，阿拉伯人又大肆抢掠，连沿路的树木也砍掉了。当乌拜都拉回到伊拉克的时候，哈里发穆阿维亚派他去巴士拉任总督，而另派奥斯曼之子赛德到呼罗珊来接任他的职务。

布哈拉王后满以为同阿拉伯人签订了和约就可以免除后者进袭之虞了，但事实大为不然。新任的呼罗珊总督赛德并不同意其前任订立的和约，仍决心要征服布哈拉。他于公元676年率领大军渡过阿姆河进攻布哈拉。布哈拉女王由于在同乌拜都拉的斗争中耗尽了资财，加上人民和军队对她不满，故已无能力对赛德进行抵抗，便向阿拉伯人投降。阿拉伯人提出条件，要她送人质。她挑选了80个布哈拉的贵族送到赛德那里。赛德押着这些人质转而向东进攻撒马儿罕。在那里打败了突厥达干（Tarkhan）的军队，虏



获了3万俘虏和无数的战利品，凯旋而回。

当赛德在返回呼罗珊的途中路过布哈拉时，布哈拉女王要求他释放那80名人质。但是赛德表示对她的忠顺还不放心，要在渡过阿姆河以后才能考虑她的要求。在阿拉伯人后撤的行军当中，布哈拉方面又不断提出这个要求，赛德又说要到谋夫再谈。到了谋夫，他又不放。就这样拖延，一直把他们带到了麦地那。在那里，布哈拉的贵族们随身所带的兵器、贵重物品、珠宝、服饰等均被夺走，并按照伊斯兰教法律把他们通通变为奴隶。这些贵族宁愿死而不愿蒙受耻辱做奴隶，便一齐拥入赛德的内室将他杀死，然后一齐自杀。此一事件发生在公元680年（回历六十一年）。当时在位的哈里发是叶齐德一世（680~683年）。

赛德被杀后，叶齐德一世任命萨勒姆（Salm ibn Ziyad）为呼罗珊总督。由于赛德以前严重地背信弃义，欺骗了布哈拉人，故索格底亚那地区谁也不相信阿拉伯人了。他们纷纷进行起义，以反对阿拉伯入侵者。萨勒姆同其手下的将军穆哈拉布商量前去镇压。公元684年，他们以谋夫为基地，带了6000阿拉伯军队向布哈拉进发。布哈拉女王在恐惧中向索格底亚那的突厥达干求援，答应如蒙支援，便同他结婚。于是达干率领12万突厥人前来援助，并击溃了由穆哈拉布率领的阿拉伯前锋侦察部队。但是，突厥人却被阿拉伯的主力部队打败。布哈拉女王又不得不向阿拉伯人投降求和。萨勒姆虏获大量的战利品而归。据说每个阿拉伯战士甚至分得一万迪勒木之多。

阿拉伯哈里发穆阿维亚在逝世以前，曾废除选举产生哈里发的制度。其子叶齐德一世的即位是由他指定的。这种做法引起了穆斯林们的反对，什叶派（阿里的拥护者们）就这样发展起来。

穆阿维亚死后，阿里的后裔就造反，企图推翻倭马亚王朝，被叶齐德所镇压。这样一来，穆斯林们愈益把叶齐德视为杀害“圣裔”的凶手，加以仇恨。阿拉伯世界内部政派与教派的纷争愈益激

烈。叶齐德一世于公元683年死，其后继者穆阿维亚二世（683~684年）只做了几个月的哈里发便退位，阿拉伯帝国陷于无政府状态。两派争位：一派以麦尔旺一世（684~685年）为首，以大马士革为都城；另一派以阿布杜拉·伊本·佐拜尔为首，盘踞麦加、麦地那，并得到也门、埃及等地的拥护。当时呼罗珊的长官阿布杜拉·伊本·喀即姆也是他的代表。斗争的结果是前一派获胜。麦尔旺一世死后，其子阿卜杜勒·麦立克继为哈里发。他同东罗马联和，镇压了自己的对手，统一了阿拉伯帝国。

呼罗珊长官阿布杜拉·伊本·喀即姆原为阿拉伯开西特部首领，他在呼罗珊任内，以自己的名义铸造货币，甚至金币，拒不服从哈里发阿卜杜勒·麦立克的命令。于是，哈里发就在公元692年收买和怂恿喀即姆手下的一名将军布开尔（Bukayr）将他杀掉，并命其取而代之。[①]但哈里发对布开尔也不信任，又于公元696年派乌玛亚·伊本·阿布杜拉·伊本·哈立德去接替其职位。

这时，在哈里发朝廷掌权的是阿拉比亚长官哈查只，他于公元694年末被哈里发阿卜杜勒·麦立克任命为伊拉克总督，以经略东方。

在此以前，阿拉伯人也曾多次越过阿姆河侵入河外地（即河中地），如统治了渴石（今沙赫里夏勃兹）地方的阿拉伯将军穆哈拉布（Muhallab）就曾于公元700年派其子哈比布率大军前去进攻布哈拉。次年（701年），穆哈拉布死，其子耶济德继任。公元703年，耶济德为伊拉克总督哈查只所黜，离开呼罗珊，其弟穆法达尔继任。他在任职九个月的短时期中，曾进攻花剌子模，大肆进行掳掠。

哈查只在平定了阿拉伯的动乱以后，就于公元704年推荐屈底波任呼罗珊长官（中国古代史料称为“大食东道使”），以接替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I卷，第242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穆法达尔负责河外地的经略。后来真正征服了索格底亚那并占领其地的就是这个屈底波。把伊斯兰教传播到河中地区的也是这个屈底波。

第二节　屈底波的征服

当阿拉伯人对索格底亚那进行侵袭掳掠之时，突厥人在中亚仍有相当大的势力，有些地区还是由突厥人直接统治着。但西突厥诸部落也是经常发生内争。从公元7世纪末期起，西突厥十姓之一的突骑施部就开始强盛起来。公元699年，唐朝任命原濛池都护阿史那步真之子斛瑟罗去管治西突厥，他甚至都不能回去就职。突骑施部首领乌质勒，原为斛瑟罗的部下，为莫贺达干。由于斛瑟罗为政残暴，其部众和中亚各族都拥护乌质勒。乌质勒屯驻于楚河西北，于各部各地设立20个都督，每个都督统兵7000人。随后，乌质勒就攻占了楚河的碎叶，为大本营。同时也占据了弓月城，作为其小衙。一时称雄于西域。公元706年，唐朝封乌质勒为怀德郡王。同年，乌质勒死，其子嗢鹿州都督娑葛袭其封爵。就是在娑葛的时期，阿拉伯的屈底波进行了对中亚的征服战争。他不但利用了中亚各地区的四分五裂，而且利用了西突厥的内争，从而取得了比其以前的阿拉伯将领更大的进展。

阿拉伯倭马亚王朝哈里发阿卜杜勒·麦立克死后，即位的哈里发是韦立德一世（Al-Walid Ⅰ）。在其即位的同年，屈底波来到谋夫任呼罗珊总督。他担负着哈里发与哈查只交给他的征服中亚的使命。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他在谋夫以《古兰经》来号召人们参加所谓圣战，征集军队，筹备粮秣。然后，就于公元705年先夺取吐火罗斯坦及其首府巴里黑，以巩固自己的后方。

屈底波率军从谋夫（今土库曼斯坦的马雷）出发，首先到达巴里黑（今阿富汗北部的马扎里歇里夫西）与梅尔维鲁德（即巴

拉·木尔加布）之间的塔里寒城。巴里黑的德赫干和贵族们慑于屈底波的淫威，前来迎接，并引导阿拉伯人渡过阿姆河，到了石汗那国，也即唐朝的悦般州都督府。当时石汗那王与愉漫（Shuman）[①]和阿哈仑（Akhrun）的统治者为敌，他迫切希望得到阿拉伯人的帮助来对付这两个小邦。据阿拉伯作者巴拉祖里及塔巴里的记载，在（8世纪初）屈底波出征时，这两个地区属一个君长统治，以后似并入了石汗那。[②]

屈底波刚一过了阿姆河时，石汗那王就把其都城城门的金钥匙送来，邀请屈底波进入他的首都咀密。屈底波接受他的投降后即进攻愉漫与阿哈仑，遭到抵抗。阿拉伯人没有得到多大的收获就返回谋夫。屈底波此行因不成功，受到上司哈查只的指责。另外的史料上说，这次，阿拉伯人还同八的吉思（Badghis）的达干·尼扎克（Tarkhan Nizak）订了和约。

翌年（706年），屈底波率军从谋夫出发，进攻河中。一路经过了梅尔维鲁德，阿模里[③]，然后渡过阿姆河，直趋沛肯城。阿拉伯作者塔巴里说，沛肯城是一个遐迩闻名的"商人之城"，属布哈拉，在沙漠边缘，距阿姆河最近。这里的商人由于经营中国的丝绸而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常常是游牧人劫掠的目标，所以修建了强固的防御工事。沛肯城人民在得知屈底波来侵的消息时，就立即武装起来，加强防卫，准备御敌，并派人到相邻的各地区去求援。索格底各地都派了人马前来援救沛肯城。因此，屈底波的军队一进入泽拉夫善河地区，就被从四面八方来的索格底军包围，达两个月之久。阿拉伯军甚至不能派出一个使者突围去向哈查只告急。

---

① 愉漫，即唐朝的天马都督府。按，愉漫与阿哈仑都在苏尔汗河谷与卡菲尔尼汗河谷之间的平原上。阿哈仑在愉漫之西。

②《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125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③ 阿模里（Amul），今查尔周。

这时，有一个名叫坦达尔（Tandar）的波斯人请求屈底波接见他，企图说服这位阿拉伯将军撤退。屈底波当即将坦达尔斩首示众。其部属为之惊骇。次日，便个个奋勇争先，自旦及暮，将索格底军击退。阿拉伯军追之，斩俘大半，直到沛肯，围其城。据纳尔沙喜说，围攻持续了50天，仍不能陷。阿拉伯人死伤甚多。最后，他们以一部分人在堡砦附近的城墙下挖沟，使其与城堡内的马厩相接，又悬重赏以鼓励首先攻入的士兵。于是，阿拉伯兵人人争先，蜂拥而人，夺其设防堡垒。沛肯城的人民求和乞饶。屈底波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命副将瓦尔卡（Varka bin Nasrel-Bahili）率小部分军队留城驻守，而自己则率大军返回。但在屈底波刚走了五程的路时，沛肯城内就发生了反抗阿拉伯人的人民起义。瓦尔卡及留下的小部分阿拉伯部队都被杀死。据说是瓦尔卡暴虐，强抢一富商的女儿，引起了当地人的不满。屈底波听到这个消息后，就立即回师镇压。

阿拉伯人再次围攻沛肯城，达一个月之久。他们在城墙下面挖掘阴沟，塞满木材，点火焚烧。城墙倒塌，压死40人。城破，陷落，阿拉伯军人城。沛肯人再次求和讨饶，但屈底波毫不留情地杀死所有进行了抵抗的人。领导这次起义的眇一目者，在被阿拉伯人俘获后愿出100万迪勒木赎身，遭到阿拉伯人的拒绝。看来此人不是一个宗教领袖。阿拉伯人把他当做一个不可调和的敌人而处死了。[①]妇女儿童都被转为奴隶。这次阿拉伯人掳掠到大量财富。纳尔沙喜说，沛肯城内有一佛寺，中有一银制佛像，重达4000迪勒木。有一个佛像的眼睛是用两颗珍珠所造，这两颗珍珠有鸽子蛋那么大。屈底波将这些珍宝献给哈查只，后者感到极为惊异和赞赏。此外，还缴获大量优良兵器，分给了士兵。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239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在沛肯城被包围和陷落时，城里的商人大部分都经商到中国和其他地方去了。他们回来以后，用大量金钱从阿拉伯人手中赎回他们的妻子儿女。而且很快地重建了这个城，使其恢复了商业城的繁荣。沛肯城人同意每年向阿拉伯人缴纳贡赋，以换取后者对和平的保证，并由条约规定之。屈底波在完成了对沛肯城的征服后就返回谋夫过冬。

公元707年，屈底波再率军进攻河中。拉姆坦城不战而降。但索格底亚那其他地区的统治者和人民都不愿意像沛肯城那样蒙受阿拉伯人的烧杀抢掠，便联合起来进行抵抗。参加这一联合的有索格底的达干·马里克、胡努克·胡达特、瓦尔丹·胡达特、库尔·马甘农[1]和费尔干纳的君主。他们集合了约4万人，在塔兰（Taran）、洪奔（Khunbun）和拉姆坦之间的一个地方把阿拉伯人包围起来。屈底波避免与索格底军进行阵地战，而是拖延，等其疲劳后迅速突围，渡过铁门关，于咀密渡过阿姆河返回。在回师的路上，屈底波接到哈査只的一封信，命令他转回去再进攻布哈拉王瓦尔丹·胡达特。于是，屈底波就又转回去，取道那色波、渴石、撒马儿罕，来到布哈拉的附近扎营。与布哈拉军交战多次，阿拉伯人最后获胜。但仍未能占领布哈拉。屈底波又返回谋夫，向哈査只报告情况。哈査只坚持要他完成征服布哈拉的任务，下令说：“要镇压渴石，毁掉那色波，赶走瓦尔丹！”

公元708年，屈底波奉上述命令进攻布哈拉。瓦尔丹·胡达特得到消息立即向索格底王求援。但在援兵到来之前，布哈拉已被阿拉伯军包围。双方相持很久，接触中互有胜负，不能攻陷这座古城。最后，由阿拉伯塔明部落的首领瓦基（Waki）率步兵、骑兵猛攻，将突厥兵击退。布哈拉周围地区都为之惊骇。索格底的达干·马里克出于恐惧向阿拉伯人求和，签订条约，称臣纳贡。屈底波才

① 库尔·马甘农，据说是中国皇帝的外甥。



同意不去劫掠撒马儿罕。随即班师返回谋夫。这是屈底波的第四次侵略布哈拉。到公元709年，他已完成了对布哈拉及其周围地区的征服。

在屈底波撤回以后，索格底人因对达干·马里克的行为不满，遂将其废黜，另拥立乌勒伽为索格底王。乌勒伽在位期间（710~737年），同阿拉伯人进行了不断的斗争。乌勒伽表面上信奉伊斯兰教，并表示臣服于阿拉伯哈里发，但实际上却向唐朝请求与中国军队一起驱逐阿拉伯侵略者。①

这次阿拉伯人之所以同意签订和约，不去劫掠撒马儿罕，是因为其后方不稳。当时愉漫与吐火罗等地都进行反叛，不承认哈里发的统治权。在这种情况下，屈底波急于前去镇压，以便巩固后方。而这也是为了下一步征服撒马儿罕作准备。

吐火罗地方起义的领导者是八的吉思地方的达干·尼扎克。他也是吐火罗国王的宰相，自从归服阿拉伯后，一直跟随屈底波征战于中亚。他很希望突厥人能击败这个侵略者，但始终未能如愿，眼看阿拉伯人一天一天地强盛起来，就担心以后再也不能摆脱其桎梏了。因此，尼扎克请求屈底波让自己回吐火罗一下。获准后他回到吐火罗，在那里同巴里黑、梅尔维鲁德、塔里寒、法腊布、胡实健等地的邦君联系，一起举行反对阿拉伯占领的起义，得到了普遍的响应。屈底波在得知这一情况时已是冬天，他的军队已经分散到各地驻冬。于是，他便派其弟阿不都拉赫曼率领1.2万人去巴里黑，先控制住那里的局面，并防止尼扎克东来，等冬去春来以后再派军去镇压。

公元710年春初，屈底波集合各地的军队向塔里寒进发。第一仗是猛攻梅尔维鲁德。其首领逃走。在塔里寒击溃了突厥军。法腊布与胡实健投降，屈底波命将率兵戍守其地。然后向巴里黑进

① 加富罗夫：《中亚塔吉克史》，第15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军，在这里停一天，进至距巴里黑二日路程处的胡耳姆山隘。[1]

这时，尼扎克已退往巴格兰，在那里扎营，另派一支军队守住山隘。阿拉伯军很难通过，悉没言地方的统治者以保住自己的生命为条件，把一条秘密的通路告知了阿拉伯人，使屈底波得以通过峡谷，击溃突厥人，向巴格兰前进。尼扎克听说屈底波临近，就退往克尔兹（Kerz）。此地形势险要，只能从一面向其进攻，而且根本不能骑行通过。屈底波围之二月，亦不能下，又恐在这远离后方的地方停留太久，有粮秣不继，遭到土人袭击之虞，便派手下参军苏莱曼前去劝降。尼扎克在得到屈底波答应宽恕他的保证下同意投降，随同苏莱曼来到屈底波的军营。屈底波将其拘禁，请示哈查只如何处理。哈查只下令将其处死。屈底波自食其言，将尼扎克及其追随者700人尽杀之。

屈底波在回师途中释放了曾被尼扎克禁锢的吐火罗王，并接受了胡实健王的投降。胡实健王根据屈底波的要求，将其家族的许多成员送到阿拉伯军中作为人质，本人亦随同去谋夫。屈底波在谋夫同胡实健王签订了和约，但在他要返回故地时将他毒死。这引起了胡实健人的愤怒。他们杀死了屈底波派在胡实健的代表哈比布。屈底波为了报复，将胡实健的所有人质都杀死。同年，屈底波征服了愉漫、渴石和那色波。

屈底波在征服了上述诸地后准备进一步去征服撒马儿罕的时候，又得到了一个侵入花剌子模的机会。这时，花剌子模的国王名叫契甘（Chighan）。他的弟弟霍尔扎德（Khorzad）领导着马兹达派的人民进行反对国王的斗争，篡夺了契甘的许多权力，夺去

① 巴尔托里德说："胡耳姆地处胡耳姆河岸，距该河流出峡谷处不远，在商业和军事上最为重要。今称为塔希库尔干。通往兴都库什山的一条最活跃的道路总是要经过胡耳姆河谷。距胡耳姆二日路程的地方为悉没言，此镇或即相当于今海巴克，河谷到此变得很狭窄。这里现在还有一个控制着周围地区的堡垒。自悉没言行二日至巴格兰（缚伽浪），距巴格兰河流入昆都士河处不远。所以，这一段路把胡耳姆河谷同昆都士河谷联接起来了。"（《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117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许多土地，成为契甘政权的严重威胁。为此，契甘派密使来请求屈底波去帮助他镇压霍尔扎德，条件是成功后向阿拉伯纳贡。屈底波感到控制花剌子模对于其完成征服中亚的计划甚为有利，便表示同意了。他于公元711年率军突然降临于哈扎拉斯普，[①]将霍尔扎德俘获，交给了契甘。契甘重酬之，接着又请求屈底波帮助他镇压喀姆吉尔德(Khamjird)王。屈底波将此任务委之阿不都拉赫曼。后者征服其地，杀其王，俘获4000人，带回谋夫做奴隶。

之后，屈底波就开始征服撒马儿罕。撒马儿罕的统治者乌勒伽及其人民眼见以前阿拉伯人侵略的残暴，决心进行抵抗。屈底波的军队在同抗战者的战斗中遇到很大的困难，但由于布哈拉人和花剌子模人帮助阿拉伯人作战，所以他们仍坚持围攻撒马儿罕。粟特人向塔什干国王及费尔干纳的可汗求援。后者派了2000人来，遭到阿拉伯人的伏击，被驱散。两天后，撒马儿罕只好求和。屈底波同意在其缴纳重额贡赋后撤退，但坚持进城。阿拉伯人进入该城以后，在那里建筑清真寺，并焚毁城内的佛寺，强迫当地人信仰伊斯兰教，然后返回谋夫。

公元712年年初，屈底波率领大军从谋夫出发，渡过阿姆河，向锡尔河流域挺进，征服了塔什干、忽毡、卡散(渴塞)诸城。

屈底波返回谋夫以后，各地居民要求突厥的帮助以反对阿拉伯人。东突厥可汗默啜派其侄阙特勤率军征六姓昭武及粟特。[②]巴尔托里德说其事发生在公元712年年底。结果只有撒马儿罕仍然处在阿拉伯人的统治下。[③]屈底波总计用了三年的时间(710~712年)，征服了撒马儿罕和花剌子模。

阿拉伯历史学家塔巴里所著《编年史》说，屈底波在公元714年进行了最后一次远征，到达了喀什噶尔。看来，这是无稽之谈。

① 哈扎拉斯普，是花剌子模的三个主要城镇之一。

② 突厥文《阙特勤碑》；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65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③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245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版。

英国学者吉布曾著文驳斥此说。巴尔托里德在其所著《蒙古人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一书中也说，此事为不可能。[①]近年的研究著作中否认这一事实的更多。只有万伯里的《布哈拉史》不但采用这一传闻，而且铺陈其说，以讹传讹，殊不可取。

公元715年，屈底波率领阿拉伯军队到达了锡尔河流域的费尔干纳。至此，阿拉伯人可以说实现了对中亚在政治上的征服。

公元713年，屈底波的后台哈查只死去。公元715年，支持屈底波的哈里发韦立德亦死。韦立德的兄弟苏莱曼即位为哈里发，这对屈底波是极为不利的。因哈查只曾经支持前任哈里发想要传位于其子而不让苏莱曼即位。所以苏莱曼甚为愤恨，即位后即追究哈查只的党羽，把屈底波也牵连进去了。屈底波得到苏莱曼登位的消息时正在费尔干纳。他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担忧，就召集自己的部属，表示要叛变哈里发而独立，可是没有人响应。恰恰相反，在他进入内室时，其部属一拥而入将他杀死。时为回历九十六年助勒·希哲月（714年），死时才47岁。其坟墓在安集延，称为“伊玛姆·舍黑·屈底波之墓”。

屈底波不但是阿拉伯征服史上的著名人物，而且也是一个积极传播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他在征服的地区，强迫当地的人民放弃原来的袄教或佛教，改信伊斯兰教。他摧毁当地的火神庙和佛寺，在其废墟上建立清真寺。屈底波规定，在星期五到清真寺去做礼拜的人能得到两个迪勒木的奖赏。德国人勒柯克曾经发掘一个坟墓，其中埋葬了成百的佛教徒，都是被杀死的。这说明屈底波为传播伊斯兰教采用了残暴的手段。他甚至派阿拉伯士兵住到老百姓的家里，以监视其是否真的信教和礼拜。

然而，起初并没有大批人接受伊斯兰教。历史事实证明，改变信仰对任何民族来说都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对中亚这样原来就有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245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悠久文化和多种宗教信仰的地区更是如此。祆教是中亚各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而佛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不但有较高的文化内涵,且在中亚传播和流行很久,中亚各地信仰者不少。故中亚人不可能轻易地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如果说,初期有一部分人改信伊斯兰教的话,那也是迫于经济的原因。因为早在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的时期就已规定,如果一个人改信了伊斯兰教,就可以免缴包括人丁税在内的一切贡税(但要缴济贫税和土地税),新人教者还享有各种福利。在倭马亚王朝时期,因怕顺民们大量改信伊斯兰教会减少税收,似乎也没有大力强制人们改信伊斯兰教。在哈里发帝国内,非穆斯林的社会地位要比穆斯林低一等,不能服兵役,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当然难于进入统治集团。这些原因,也导致一部分人率先信奉伊斯兰教。他们的目的是为了逃税和取得同阿拉伯人的平等的身份。

阿拉伯人为了推行伊斯兰教,就在布哈拉、撒马儿罕等大城镇建筑清真寺。有的清真寺规模宏伟,装饰华丽。这类清真寺成为中亚著名的文物,有的至今犹存。但由于中亚地区长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所以,也出现一些中国建筑风格修建的清真寺。

随着中亚的征服,有大批的阿拉伯人迁来其地。屈底波在征服布哈拉后,还曾命令该城百姓将一部分房屋让出来给阿拉伯人住。巴尔托里德说:"屈底波在布哈拉、撒马儿罕和其他一些地方建筑清真寺,并强迫布哈拉的居民们将内城房屋的一半让给阿拉伯人(在头几任呼罗珊总督时期,也曾在谋夫采取这个办法)。据一个作者说,撒马儿罕的人民被迫从他们的城镇中完全撤出。当时该城已被阿拉伯人占领。"[①]在布哈拉,有一些外地富商被迫把内城中的房子让给了阿拉伯人,而自己则在另外一个地方建筑了700个堡坞以居住。迁到中亚的阿拉伯人在当地定居,与当地妇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243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女通婚，他们的后代不再是纯粹的阿拉伯人。他们不仅是阿拉伯帝国统治的支柱，而且也积极传播伊斯兰教。他们尊敬屈底波，把他称为殉教者。屈底波在费尔干纳的坟墓甚至成为朝拜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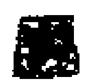
屈底波征服的范围，总的看向北基本上未进入巴尔喀什湖西南的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向东则未能越过帕米尔而达到塔里木盆地。就是塔什干、费尔干纳、布哈拉、撒马儿罕以及阿姆河流域诸地也并不甘于接受阿拉伯的统治。他们习惯于接受中国唐朝的封号，向中国朝贡和进行贸易，而且一直在同唐朝维持关系。一当阿拉伯的统治削弱时，他们就请求唐朝支持，以便驱逐阿拉伯侵略者。

第三节　中亚各地反抗阿拉伯统治的斗争

屈底波死去，意味着什么呢？吉布曾经说过："屈底波的死，不但标志着阿拉伯在中亚二十五年征服的结束，也表示其衰退时期的开始。"以后，"没有一个领袖或组织来代替他。他死后二十年的历史说明，阿拉伯人的权力是多么的松弛和不稳定"。[①]与此相反，中国的唐朝却开始了一个在西域复兴的时期。公元712年，唐玄宗即位。他也是唐朝的一个比较能干的君主。在他统治时期，不但国内生产得到发展，经济相当繁荣，而且制服了突厥，重振了唐朝在西域的权威。著名诗人杜甫称之为"开元全盛日"，是不错的。在这东、西两个大国一盛一衰的有利条件下，中亚地区在半个世纪中不断进行了反抗阿拉伯的斗争。中亚各族的反抗运动，是与西突厥对他们的支持分不开的。自公元708年以后，西突厥突骑施首领娑葛被东突厥默啜攻击，[②]后为其所杀。娑葛部将车鼻施

① 吉布：《阿拉伯人在中亚的征服》，第54页，伦敦1923年英文版。

② 吕温：《三受降城碑铭序》；又《旧唐书·张仁愿传》："时突厥默啜尽众西击突骑施娑葛。"



啜苏禄，纠集余部，自立为可汗。在西突厥中，自认为是娑葛部族的都称为“黄姓”，而苏禄的部族则称为“黑姓”。黄黑二姓，互相敌视。公元716年默啜为九姓拔曳固所杀。以苏禄为首的西突厥部落称强于西域。汉文史料讲，苏禄是一个比较好的部落首领，说他“善抚其下”，“爱治其人，性勤约，每战有所得，尽以予下，故诸族附悦之，为尽力”。“众至二十万，于是复雄西域。”公元717年，苏禄朝于唐。唐朝封他为突骑施都督，又派王惠册拜他为顺国公、金方道经略大使，并以阿史那怀道女为交河公主嫁之。巴尔托里德在谈到苏禄同中国的关系时说，阿拉伯人是把索格底亚那看成为穆斯林统帅之花园，而突厥人也认为占据这个地方对他们有重大意义。因此，苏禄在位期间，一直支持中亚造反的德赫干们反对阿拉伯人，使阿拉伯人遭到如此严重的损害，以至于他们给苏禄取了一个外号，叫“阿布·穆扎欣”（意为“抵人者”，即象或牛）。[①]

这时，参加中亚政治斗争的另一势力是吐蕃。正如前面所讲过的，吐蕃仍然是想谋取四镇、十姓。吐蕃曾在锡尔河以兵帮助阿拉伯人，而阿拉伯人也帮助吐蕃人。中国史书记载：“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费尔干纳）王，发兵攻之，拔汗那（费尔干纳）王兵败，奔安西求救。（张）孝嵩谓（安西）都护吕休景曰：‘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遂帅旁侧戎落兵万余人，出龟兹西数千里，下数百城，长驱而进。是月，攻阿了达于连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巳至酉，屠其三城，俘斩千余级，阿了达与数骑逃入山谷。孝嵩传檄诸国，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②]时在开元三年（715年），这正是屈底波死于费尔干纳之时，说不定唐朝打败的就是屈底波的余部。白寿彝说：“这大概是唐与大食第一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246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②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713页。

次短兵相接。这次大食是打败了。”[1]这也说明了在屈底波死后阿拉伯势力的衰退，有利于人民起义的发动。

屈底波死后，中亚各地都想趁机驱逐和消灭阿拉伯人。巴尔托里德曾经指出，屈底波的继任者不能胜任其职。他死后数年中，阿拉伯人即已丧失锡尔河流域诸省。显然，这里的阿拉伯人被驱逐或被消灭了，其地被费尔干纳王所占据。[2]其他地区当然也想驱逐阿拉伯人，他们主要向唐朝和突厥人求助。当时上书向唐朝请求发兵救援的有：康国王乌勒伽（719年），东安国王笃萨波提，石国王伊捺吐屯屈勒（721年），吐火罗叶护支汗那，俱蜜王那罗延等。其表文如下：

开元七年（719年）二月，康国王乌勒伽遣使上表求援，称："从三十五年来，每共大食贼斗战……经今六年，被大食元率将异密屈底波领众军兵来此共臣等斗战，臣等大破贼徒。臣等兵士亦大死损，为大食兵马极多，臣等力不敌也。……伏乞天恩知委送多少汉兵来此，救助臣苦难。……如有汉兵来此，臣等必是破得大食。”[3]

同时，东安国王笃萨波提亦遣使上表求援，并有奉献，表文称："如蒙天恩滋泽，请赐臣鞍辔、器仗、袍带及赐臣妻可敦衣裳、妆粉。”并“请敕下突骑施令救臣等。臣即统领本国兵马计会翻破大食”。

又同时，俱蜜国王那罗延亦上表求援。

开元十五年（727年），吐火罗叶护遣使上表求援，表文称："奴身今被大食重税，欺苦实深，若不得天可汗救活，奴身自活不得，国土必遭破散。求防守天可汗西门不得，伏望天可汗慈悯，与奴身多少气力，使得活路。又承天可汗处分突骑施可汗云：‘西头

① 《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11期，第70页。

②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244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③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事委你，即须发兵除却大食。’”[①]

关于唐朝当时的对策，白寿彝曾经说：“（诸国）上书请求援助，唐朝不允，可见唐朝已不能拥有霸权，保护蕃国。”[②]但这种求援也可以说是尚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地人民与突厥人对伊斯兰教进行抵抗的证明。

屈底波死去九个月后，哈里发任命耶济德·伊本·穆哈拉布代之为呼罗珊总督。新总督主要致力于西方。公元717年，哈里发苏莱曼死，欧麦尔二世即位。耶济德被捕，加拉赫被任命为呼罗珊总督。新上任的哈里发欧麦尔可能是为了推行一种比较温和的政策而采取这个措施的，因为耶济德为政暴虐不得人心。但加拉赫并不奉行他的政策，坚持对新入教的穆斯林征收人丁税，严重压迫人民。欧麦尔不久死，叶齐德二世继为哈里发。耶济德乘机从监禁中逃出，举兵反抗新哈里发，但于公元720年被伊拉克总督马斯拉马（Maslama）所镇压。同年，马斯拉马任命赛伊德（Said ibn Abdul aziz）为呼罗珊总督。所有这些呼罗珊总督因更换频繁，便都在任期内尽量对东部中亚各地人民进行极度的压榨，以便发财致富。而对阿拉伯统治的愤怒与日俱增的中亚各族人民，在这段时期中特别加强了同唐朝的联系，并利用突厥人的支持进行反抗阿拉伯统治的斗争。

中亚各小国除纷纷向唐朝上书求援外，还不断来唐朝进贡。史书记载逐年来贡的有：公元718年，米国、康国。公元719年，俱蜜、罽宾、东安、吐火罗、康国、诃毗施。公元720年，护密、乌苌、固失密、大勃律、葛达罗支（阿拉霍西亚）。[③]

一场反抗阿拉伯的起义终于8世纪20年代在索格底亚那爆发了。中亚人民的起义是在突厥人的支持下进行的。阿拉伯作者说，

①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② 《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11期，第66~67页。

③ 《册府元龟》及《新唐书·西域传》。

此时率领突厥兵进入河中的人名叫库尔苏勒（Kursul），又说此人曾杀其可汗。[①]如与汉文史料对照，则库尔苏勒应是莫贺达干。公元720年末，他率领一支部队与粟特人一起反抗阿拉伯人，并向撒马儿罕前进。当地的小邦君们大都支持突厥人。赛伊德被突厥人打败，龟缩于撒马儿罕城内。公元721年哈里发另派哈拉什来接替赛伊德的职务。哈拉什号召造反的粟特人投降，但粟特人不愿忍受阿拉伯人的压榨。

这时有许多贵族和商人决定外迁。其中有商人400人，从中国经商回来，手中握有大量货物与财富。他们知道阿拉伯人是不会放过他们的。于是，这些贵族和商人连同他们的随行人员，就离开撒马儿罕迁往费尔干纳。在他们的号召下，随着外迁的人越来越多，以至超过万人。粟特王乌勒伽尽力阻止这一迁徙运动，未能成功。

向费尔干纳迁徙的人群，一部分到了忽毡，另一部分则已进入了费尔干纳。费尔干纳王在同这些人谈判时表面上表示愿意帮助他们，但却秘密地请阿拉伯人前来消灭他们。哈拉什就利用这个机会紧紧追赶而来。忽毡地方的统治者也出卖他们，开放进入忽毡的道路让阿拉伯军进入，粟特人无法，只好投降，以苛刻的条件与阿拉伯人达成和议。哈拉什把贵族和商人们同他们的士兵分置二地，然后背信弃义地进行大屠杀。据说杀了3000人，另一说杀了7000人。留下了商人，目的是要榨取他们的财产。此事发生在公元722年的夏天。

经过这次血腥的镇压，阿拉伯人再一次占据了索格底亚那。他们大肆进行掠夺，在每个农民的脖子上都打上烙印，以便向其征收人丁税。这就更为加深了当地人民对阿拉伯人的仇恨。

塔巴里的《编年史》还说，哈拉什曾率领军队取道布哈拉与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250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撒马儿罕进攻费尔干纳，包围其地。费尔干纳王最后以缴纳十万迪勒木和许多奴隶才求得了和平。但在次日晚上，当绝大部分的阿拉伯人都熟睡了时，费尔干纳王就率领士兵万人对其进行突然袭击，杀死许多阿拉伯人。阿拉伯军主力闻警来救，将费尔干纳兵击溃，斩其王及随从2000人。

公元722年冬，木思里姆（Muslim b.Said al-Kilabi）接替哈拉什的职务。据说他在公元723年曾去进攻费尔干纳，被突厥人击退，几乎全军覆没。很可能当地人这次又得到突骑施部的援助。

次年（724年），希沙木（Hisham）继叶齐德二世为哈里发。阿拉伯人又准备进攻费尔干纳。这次进攻的指挥官是木思里姆。他们在渡过锡尔河后，包围其首府，砍伐果树，大肆蹂躏。但在得到突骑施兵来援的消息后就赶紧撤退。突骑施兵尾追之。阿拉伯人在撤退中沿路到处受到攻击，使得他们不得不焚烧辎重，轻装后撤，在到达锡尔河时，道路又被塔什干与费尔干纳的军队所阻，被突骑施兵包围的饥渴的阿拉伯军拼命夺路而逃。断后部队的指挥官丧了命。剩下的残兵败将最后到达了忽毡，然后从那里撤回到撒马儿罕。据说，突骑施兵这次是由苏禄的一个儿子指挥的。

英国学者吉布对阿拉伯人的这一次失败作了一个评论，他说："这次的灾难在阿拉伯的征服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实际上是阿拉伯人十五年中对河中的最后一次入侵，但更重要的是打击了阿拉伯的威望。现在，作用倒转过来了。从此以后，阿拉伯人发现自己成了防守的一方，并且逐渐地被从阿姆河外的所有地区驱逐出去。"①当然，阿拉伯势力并不是一下子就被驱逐了的。

在阿拉伯人对外征服和对属国的统治中，始终有一个对待异教徒的问题。阿拉伯统治者的信念认为，他们的力量的源泉在于伊斯兰教，被征服的人民如果信奉了伊斯兰教将不会反对阿拉伯

① 吉布：《阿拉伯人在中亚的征服》，第66页，伦敦1923年英文版。

的统治。因此,哈里发欧麦尔二世宣布,对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不征收人丁税并受伊斯兰法律的保护。这就吸引人们纷纷入教,尽管人们不过是以此作为逃税的一种途径。如哈里发希沙木在公元727年任命的呼罗珊总督阿什拉斯（Ashras ibn Abdullah, 公元727~729年）,在任职之初就采取这种政策。他尽力想使中亚的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祆教徒改信伊斯兰教,派了两个传教者(一个阿拉伯人,一个波斯人)到撒马儿罕和其他地方去宣传上述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这个政策也有对阿拉伯统治者和本地邦君不利的一面。由于免税的人愈益增多,势必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日益减少。当时的粟特王乌勒伽就曾经写信给阿什拉斯表示反对,说这个政策的实行将使国家无税可征。阿什拉斯相信了乌勒伽的话,就改变政策。他重新提出一个规定:新入教者,只有行过割礼,执行伊斯兰教法令并能诵读古兰经章句的人才能免除人丁税。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自然引起了中亚各地人民的不满,终于酿成起义。巴尔托里德说,阿什拉斯是引起整个河中发生反阿拉伯运动的肇始者。①

反对阿什拉斯重新实行征税的中亚人以及德赫干们,从布哈拉派出一些代表向他提出:"当地人已信奉了伊斯兰教,并建筑了清真寺。这样,'所有的人就都成了阿拉伯人',为什么还要缴纳人丁税呢?"可是,阿什拉斯却回答说:"对过去纳过税的人,都要征税。"阿什拉斯和他的官员们采取一系列严厉的措施,开始对所有的粟特人(包括普通农民、贵族和德赫干们)征税。奉命去执行任务的穆巴什尔对当地居民使用了各种残酷的强制手段,这就引起了总起义的爆发。参加起义的不但有粟特农民和德赫干,而且那些对阿什拉斯背信弃义行为不赞同的阿拉伯传教者,如前面提到的那两个传教者,也都参加到起义的队伍中来。

①《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248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粟特的起义者仍然向突厥人求援。不久，突骑施可汗苏禄就率军前来与起义者会合，把阿拉伯人赶过了阿姆河，甚至布哈拉也被其攻下。只有撒马儿罕及其附近的两个小据点卡马尔加（Kamarja）和达布西亚（Dabusia）仍然在阿拉伯人手中。[①]阿拉伯人之所以能守住撒马儿罕，是因为有粟特王乌勒伽的支持。

阿拉伯的军队这时都集中在阿模里，由于粟特、突厥联军的威逼，几个月不能渡过阿姆河。由喀坦（Qatan b.Qutayba）所率领的一小支阿拉伯部队虽在突厥军到来之前过河驻扎，但遭到围攻。突厥人甚至攻掠到了呼罗珊。直到公元729年，阿什拉斯才率军过了河，与喀坦会合，向沛肯城进军。突厥人沿路截断水源以困阿拉伯军，只是由于后者的奋战才迫使突厥军后退。阿什拉斯继续向布哈拉进军，重新占领该城。突骑施可汗苏禄向撒马儿罕的方向退走，围攻卡马尔加，不能下。据说，随同突骑施可汗出征的有波斯王伊嗣俟之孙、卑路斯之子库思老。吉布说："萨珊王族既避居于中国，则库思老之从军可能表明起义者也得到中国的鼓励。不过中国记载未提及此役。"[②]以后，突骑施军即撤往塔什干与费尔干纳。

起义的影响是很大的，连花剌子模也进行了公开的起义，但被当地的穆斯林所镇压，也可能是阿什拉斯派军去镇压的。这一年，阿什拉斯在布哈拉附近的沛肯城过冬。

公元730年，中亚的起义军又对阿什拉斯发动了新的进攻。威尔豪森说，阿什拉斯实际上是被围困着的。当时，哈里发希沙木已另派朱奈德（Junayd b.Abdur-Rahmanal-Murri）接替阿什拉斯的职务。此人以前在信德（Sind）任职，以贪婪残暴著称。朱奈德率军

① 德国作者威尔豪森（Welhausen）说，卡马尔加这个地方是在沛肯城附近。吉布纠正之，说是在撒马儿罕以西数程之地。见所著《阿拉伯人在中亚的征服》第71页。巴尔托里德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及《乌兹别克共和国通史》都没有提到这个地方。达布西亚，距贵霜匿（即卡塔库尔干）约75里。

② 吉布：《阿拉伯人在中亚的征服》，第71页，伦敦1923年英文版。

前去支援阿什拉斯。在过了阿姆河以后，阿什拉斯从沛肯城派遣一队骑兵前来接应，在路上冲破起义军的包围和袭击才得以到达。而在他们返回沛肯城时，半路上又进行了一次严酷的战斗。朱奈德在到达布哈拉并占据该城以后，突骑施可汗教才率军退去。阿拉伯人追至撒马儿罕，以解救那里的驻军，然后取道咀密返回。朱奈德在咀密停留二月，与石汗那王安排重新征服吐火罗与骨咄之事，然后返回谋夫。

公元731年春，突骑施可汗和粟特人聚集军队围攻撒马儿罕，粟特王乌勒伽公开支持之。撒马儿罕的阿拉伯长官萨乌拉(Sawra)派急使向朱奈德求援。朱奈德当时本要去进攻反抗的吐火罗，由于突骑施军攻入粟特，便立即率领一支人数不多的军队渡河到达渴石，在此征集了一些地方武装，准备前往撒马儿罕解围。为了避开沿路的起义军，朱奈德决定取捷径经邵达尔山(Shawdar)前往，但在距撒马儿罕约六十里的一个山隘中遭到突骑施可汗的包围和袭击，阿拉伯军被迫掘壕自卫。朱奈德令萨乌拉率军经河道来会，留一部分主力戍守撒马儿罕城。萨乌拉也抄山间近路前来，在距朱奈德十二里处受到突厥军的攻击。突厥人将草点着，使萨乌拉的人马与水隔离。炽热与干渴令阿拉伯人焦急如狂，他们拼命冲出，多被烧死。萨乌拉丧命，余众也被突厥骑兵追杀，1.2万人仅剩2000人。在萨乌拉军于此奋战时，朱奈德亦经受严重损失。他从山隘的被围困境中脱出，逃往撒马儿罕。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时期，休养士马，同时派人去向哈里发希沙木报告。哈里发立即派二万人马携带大批武器辎重从巴士拉与库法前往呼罗珊，并让朱奈德有权自行招兵。

这时阿拉伯军已经士气低落了。朱奈德决定提高士兵的饷银，才得以在克尔米纳(Karminia)附近的一次接触中小胜。次日，突骑施可汗在布哈拉绿洲边缘的塔瓦维斯(Tawawis)附近袭其后卫。因朱奈德预先得知，故突骑施的袭击被击退。时已寒冬十一

月，突骑施军退去，而阿拉伯人则进入布哈拉，他们的部队也转入驻冬地。

朱奈德从此以保住布哈拉与撒马儿罕为满足，在其任职的其余时间里再未进行攻城略地的战争。正如巴尔托里德所说的：他“经过重大的困难才保持住自己的军队和击退突厥人”。但突厥人仍然是河中地区的主人，阿拉伯人仅仅是占据着布哈拉和撒马儿罕这两座孤城而已。在南面，阿拉伯人的势力不能超出巴里黑与石汗那。

据汉文史料记载，公元733年，有阿拉伯使者摩思览达干等来朝于唐。[1]这应当是朱奈德所派。同年，呼罗珊天旱，发生严重饥荒。这饥荒甚至扩展到了粮食丰收的谋夫。朱奈德不得不从各地大量输入粮食。他还采取严厉手段在周围地区征粮。根据他自己的说法，饥荒是由于异教徒控制了泽拉夫善河流域所引起的，因为在这以前谋夫还要从那里输入粮食。

朱奈德于公元734年2月死去，哈里发任命阿西姆（Asim b. Abdullah al-Hilali）为新的总督（734~735年）。这时已是倭马亚王朝的末期，阿拉伯的统治处在腐朽没落、危机四伏的状态中。这不仅表现在中亚各地不信伊斯兰教各族的不满和反抗上，而且也表现在呼罗珊和下吐火罗等阿拉伯控制较牢固的地区阿拉伯人的不满和反抗。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派运动在当时可以说是同阿拉伯人的反抗运动合流了。塔巴里说，早在欧麦尔二世时呼罗珊地方就已经有什叶派的活动了。公元733年，呼罗珊发生大饥荒，引起的社会不安，加之历任总督和官吏们的贪婪暴虐，事事都引起阿拉伯下层人民的不满，什叶派就利用这些挑起社会的矛盾。而自30年代以来，由于同突厥人的战争多次失败，中亚的大部分地方仍归于异教徒之手，更易于引起革命的爆发。所以，在公元

①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734年，有一个名叫哈里斯（Al-Harith b.Surayi）的阿拉伯军官顺应这种普遍的不满情绪，举起了反抗倭马亚王朝（白衣大食）的黑旗。

据格尔德齐（Abu Said Abdal-Haiy ibn Duhak Gardezi）说，哈里斯提出的口号是："遵照同受到保护的宗教的信仰者（ahladh-dhimma）[1]所达成的协议，不向穆斯林征收赋税，也不压迫任何人。"在这个口号的号召下，呼罗珊地方的基本群众和许多阿拉伯人都参加到哈里斯的反王朝运动中来。胡实健、法腊布、塔里寒等地[2]的邦君和人民也都支持他。作为倭马亚王朝的一个军官，哈里斯起初并没有就要推翻这个王朝的意思，他接受了呼罗珊总督阿西姆的建议，与之共同遣使者去哈里发宫廷，要求哈里发希沙木实行穆罕默德的法令。希沙木不但不予理睬，而且下令将阿西姆撤职，另派伊拉克总督哈立德的兄弟阿沙德（Asad b. Abdullah）来接替阿西姆任呼罗珊总督（735~738年）。这就迫使阿西姆也与哈里斯联合一起抵抗阿沙德。

阿沙德来谋夫就任时，发现整个呼罗珊的东部都是控制在造反者的手中，其首府谋夫不但受到东面的威胁，也受到来自南面的威胁。他派阿布都拉赫曼（Abdur Rahman b.Nu`ayn）率军前往梅尔维鲁德阻止哈里斯的主力前进，而自己则去镇压阿模里与扎姆（Zamm）的造反者，然后又进攻巴里黑。

在阿布都拉赫曼到来之前，哈里斯已退往巴里黑，并从那里渡过阿姆河到河外地去了。于是，阿沙德控制了下吐火罗。公元736年，阿沙德将呼罗珊的首府从谋夫迁到巴里黑。据吉布分析，他采取这一措施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巴里黑便于控制吐火罗以及阿姆河以外地区的局势。当时吐火罗是主要的战场，也是一切

---

① 按：ahladh-dhimma的本意是"书记"（ahlal-Kitab），即指基督教徒或犹太人。这里也包括祆教徒，但是不包括佛教徒。

② 这几个地方均在今阿富汗的北部。



动乱之源。直接掌握吐火罗的首府巴里黑，就好镇压当地的起义。

阿沙德对哈里斯的战争，起初主要是在呾密附近和骨咄境内进行。站在哈里斯一边的有骨咄王、那色波王、吐火罗叶护、粟特王乌勒伽以及塔什干与突厥的军队。只有石汗那王是支持阿拉伯人。在以突骑施可汗苏禄为首的盟军的防堵下，阿拉伯人无法渡过阿姆河。突厥人甚至打到了阿姆河以南，阿沙德不得不退回巴里黑。以后，阿拉伯人只是经过极为艰苦的斗争才转败为胜，使突厥联军退往苏对沙那。哈里斯则由于同骨咄王不和而退往巴达赫善。

公元737年，阿沙德进攻河中的撒马儿罕，但并不能占领其地。粟特王乌勒伽在突厥人的支持下，并利用阿拉伯人内部的不和，把阿拉伯人赶走。以前屈底波在阿姆河以外所征服的地方，现在只有布哈拉和石汗那仍然保留在阿拉伯人的手中。由于河中诸地获得了独立，阿拉伯人的威胁有所减轻，所以以后也就不再见到中亚各国向唐朝求救了。

同年，阿沙德进攻骨咄，对其王支持哈里斯的行为进行惩罚。骨咄求救于突骑施。苏禄可汗率骑兵从碎叶出发，七日内赶到骨咄救援。阿沙德闻讯后撤。苏禄到达吐火罗后，哈里斯前来与他会合，并建议他乘冬令阿拉伯军后撤的时机进攻下吐火罗。苏禄可汗接受其意见进军到胡实健。阿沙德率领4000人前来迎战，得到胡实健的支持。他们取道西德拉（Sidra）及喀里斯坦（Kharistan）向沙布尔干[①]进军，在喀里斯坦附近大破苏禄军。可汗与哈里斯侥幸逃脱，返回突厥斯坦。这次战役关系重大，是西突厥与阿拉伯势力消长的转折点。

由于突骑施的苏禄可汗一方面并不服从唐朝，另一方面又是受到阿拉伯人在中亚的经常威胁，所以，唐朝与阿拉伯帝国都想

① 沙布尔干（Shaburgan，即Ushburgan），在安巴尔河下游。

要消灭苏禄的势力。据汉文史料的记载，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秋，唐朝曾派使者张舒耀去阿拉伯人那里，商量从吐火罗和勃达岭两方面出兵夹攻突骑施可汗的驻地碎叶的问题。[1]当时，阿拉伯人虽因发生哈里斯的叛乱未能及时出兵，但还是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派军攻入吐火罗，叶护被杀。而唐朝的安西驻军却又未能进讨。故当时未能达到双方约定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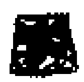
苏禄返回后，于公元738年为莫贺达干与都摩度所杀。[2]同年，粟特王乌勒伽亦死，唐朝封其子咄喝为嗣王。[3]这样，当地反抗的君主既死，支持他的西突厥可汗亦亡，不但有利于阿拉伯人重建其对河中的统治，也有利于唐朝恢复其在中亚的势力。

公元8世纪中，在中亚角逐的几大势力，除了唐朝和阿拉伯以外，还应当提到吐蕃。这时吐蕃向西扩张的突出事件是侵吞小勃律。小勃律相当于今吉尔吉特地区。开元初年（713年）其王没谨忙朝于唐，唐朝以其地为绥远军。小勃律经常遭到吐蕃的攻击。吐蕃说："我并不是要吞并你们，而是为了假道于你国以进攻安西四镇。"公元722年，吐蕃又攻小勃律，夺其九城。没谨忙向北庭求救。他写信给当时的北庭节度使张孝嵩说："勃律之国，是唐之西门。唐若失之，则以西诸国，陷吐蕃矣，都护其若之何？"张孝嵩给他回信，表示要去救援。随即派疏勒副使张思礼率汉族及少数民族的

① 郭平梁：《突骑施苏禄传补阙》，载《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② 参见《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250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据阿拉伯历史家塔巴里的记载，苏禄于回历119年（737年）冬末回到突骑施地，因与Kursul下棋，发生争执，为其所杀（《塔巴里》Ⅱ，1613）。而《旧唐书·突厥传》则记载，开元二十六年夏，莫贺达干勒兵夜攻杀（苏禄）。二者所记的情节与时间皆相近，应可信。韩儒林说："苏禄之死，《新唐书·突厥传》、《旧唐书·突厥传》均谓'莫贺达干勒兵夜攻苏禄杀之'。《旧唐书》且系此事于开元二十六年夏。但据同书卷九《玄宗本纪》，则系此事于开元二十七年七月，且谓'北庭都护盖嘉运以轻骑袭破突骑施于碎叶城，杀苏禄'。司马君实亦舍《本纪》而采《突厥传》文。但据伯林民族博物馆所藏高昌残碑证之，攻杀苏禄之役，实有中国人参加。"（见《禹贡》半月刊第六卷第六期所刊之韩文《突厥文〈苾伽可汗碑〉译释》）

③ 《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步骑兵4000人赴援，昼夜倍道兼行，与没谨忙所率领的小勃律兵左右夹攻吐蕃，大破之，杀其众数万人，缴获器械、羊、马等甚多，收复其九城。以后吐蕃好些年不敢再来侵犯。

当时小勃律完全是处在唐朝的管辖之下。《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就说："小勃律属汉家所管。"公元727年，吐蕃又西击勃律。勃律遣使向唐朝告急。唐玄宗遣使谕令吐蕃罢兵。吐蕃不听，遂攻破其国。没谨忙死后，其子难泥继为小勃律王。吐蕃历史文书讲，吐蕃于龙年(庚辰，740年)夏，以弃玛勒(Khrima-lod)公主嫁小勃律王为妻。难泥于公元741年死，唐朝册立其兄麻来兮为王。只是在唐朝本身衰弱的时期，吐蕃才得以扩张其势力于西方。

第四节 倭马亚王朝统治下的中亚

阿拉伯的呼罗珊总督阿沙德于公元738年死去，其继任者为纳斯尔·布·色雅尔(Nasr b.Sayyar 738~748)。此人可以说是倭马亚王朝的最后的一个支持者。在他任职时期，阿拉伯统治下的呼罗珊及所属的中亚的一些地区，恢复了一种相对的安定和兴旺。这种局面的出现，与西突厥的分裂和衰亡不能再对阿拉伯人进行威胁是有关系的。

西突厥突骑施可汗苏禄自公元738年被莫贺达干、都摩度所攻杀以后，都摩度又背着莫贺达干拥立苏禄之子吐火仙骨啜为可汗，居于碎叶城。并勾引黑姓可汗尔微特勤保据怛逻斯城，连兵合击莫贺达干。莫贺达干遣使向碛西节度使盖嘉运告急。唐玄宗令盖嘉运前往招抚突骑施、拔汗那以西诸国。都摩度及其卵翼下的吐火仙以及尔微特勤联合抗拒唐军。

盖嘉运在中亚的一些小国的支持下向吐火仙进攻。当时参加这个战役的有莫贺达干、石国王莫贺咄吐屯与史国王斯谨提。公元739年，他们在盖嘉运的指挥下在碎叶城以东之贺逻岭大破吐

火仙军。吐火仙弃旗走，唐将追之，擒吐火仙及其弟叶护顿阿波等，并缴获骆驼、马、牛、羊数以千计。

另外，盖嘉运分遣疏勒镇守使夫蒙灵詧率精兵与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进攻据有呾逻斯城的黑姓可汗尔微特勤，乘其不备突袭之，遂入呾逻斯城，斩尔微特勤及其弟拔斯，其党羽皆逃走。唐军收集诸散落百姓，共数万人，都交给了拔汗那王。于是中亚诸国皆来归附于唐朝。[1]阿悉烂达干因帮助唐朝平定吐火仙有功被册拜为奉化王。[2]斯谨提加官为特进。莫贺咄吐屯被封为石国王，加特进。[3]

吐火仙平定后，唐朝封阿史那怀道之子阿史那昕为十姓可汗，领突骑施部落。莫贺达干不满说："平苏禄，是我的功劳。现在为何立阿史那昕为可汗？"便发动部落叛乱。唐朝派盖嘉运前往招谕，莫贺达干降。但几年以后，唐朝又封阿史那昕为西突厥可汗。公元742年，阿史那昕前往赴任，至碎叶西南俱兰城，为莫贺达干所杀。[4]公元 744 年，唐朝的安西节度使夫蒙灵詧讨伐莫贺达干，将其斩首，另提请立黑姓伊里底密施骨咄禄毗伽为十姓可汗。巴尔托里德说："库尔苏勒（即莫贺达干）被俘处决后，来自游牧人方面的对阿拉伯人的一切危险都消除了。这样阿拉伯的官员就有可能派到塔什干与费尔干纳来。"[5]

西突厥统治者以前不但威胁阿拉伯人，而且也压迫中亚各小邦。西突厥既已瓦解，其对中亚各地的压迫也即解除。现在中亚各小国的敌人就主要是阿拉伯人了。所以，汉文史书提道：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石国王"伊捺吐屯屈勒上言：'今突厥已属天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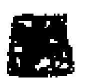
① 据《新唐书·西突厥传》，《册府元龟》卷三五八，《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② 《新唐书·西域传·宁远》。

③ 《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④ 《通鉴考异》卷一三引《唐会要》，今《唐会要》无此文。《新唐书·西突厥传》作"莫贺咄所杀"。

⑤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250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阿拉伯的传说说俘斩库尔苏勒者是纳斯尔。



汗，惟大食为诸国患，请讨之。’天子不许”。[1]公元745年，曹国王葛逻禄遣使上表要求把自己的国家合并于唐。[2]唐朝既不愿意干预中亚的事务，也就使阿拉伯人比较易于卷土重来。

公元738年就任的呼罗珊总督的纳斯尔，曾经是屈底波的部属，以前就对中亚十分熟悉，并同当地的德赫干们有个人的关系。纳斯尔就任此职时已届暮年，他首先关心的是恢复阿拉伯人在锡尔河流域的统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利用了西突厥的分裂和衰落。在到任的头一年，纳斯尔就派喀坦去侵略河中，自己也去愉漫镇压当地的起义。公元739年河中的德赫干们似乎没有抵抗就降附了纳斯尔。纳斯尔率军重新戍守撒马儿罕。

公元740年或741年，纳斯尔又率领阿拉伯军及一部分在河中征集到的军队进攻塔什干。[3]这次的进军，中途经过苏对沙那，其王降附了阿拉伯人。但他们在到达锡尔河时却遇到了塔什干军队的抵抗。当时，哈里斯和一些突厥军队也在塔什干的阵营中。纳斯尔没有同塔什干的主力交锋，而是同其王进行谈判。结果双方签订了条约，塔什干王同意驱逐哈里斯和接受一个阿拉伯长官来塔什干。哈里斯遂去法腊布。随后，阿拉伯军即侵入费尔干纳，追其王，至于库巴（Quba，即后来的库瓦），然后谈判求成。其后，纳斯尔似第二次进攻费尔干纳，此外在中亚没有进行过其他的军事行动。

在对呼罗珊与河中的管辖方面，纳斯尔采取依靠与联合贵族、德赫干的政策。他本人就娶了布哈拉·胡达特的女儿为妻。他尽力维护德赫干、地主贵族的特权，因而得到后者的拥护。在人头

① 《新唐书·西域传》。

② 《册府元龟》卷九七七。

③ 巴尔托里德说，纳斯尔于公元739年同苏对沙那王、塔什干王及费尔干纳王缔结了条约（见《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250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但吉布说，公元739年时塔什干与费尔干纳的军队正对西突厥吐火仙作战，阿拉伯人的进攻塔什干不能早于公元740年（见《阿拉伯人在中亚的征服》，第90页，伦敦1923年英文版）。吉布的说法是对的。

税的问题上，曾经有三万穆斯林非法地征了税，有八万非穆斯林则免了税。现在纳斯尔把税赋都从穆斯林转到非穆斯林的头上。由于这时中亚信奉伊斯兰教的人越来越多，纳斯尔这一措施也实施得很顺利。

以前曾有许多粟特人为逃避阿拉伯人而去突厥寻求保护。当突厥可汗被杀时，这些人很想返回故乡。公元741年，他们同纳斯尔进行谈判，纳斯尔接受了他们提出的所有条件，绝不对他们中那些以前信了伊斯兰教又背弃之而复信原宗教的人进行迫害。对返回故乡的人既免去其出走前所欠的私债，亦蠲免其欠交国库的税款。看来这些决定也是得人心的。

应当看到，中亚地区自阿拉伯人侵以来，经历了几十年连续不断的战争，这对于当地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都是一种灾难。人民已经厌倦战争，希望和平。纳斯尔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的这种愿望。因此，在这个时期，中亚的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按照塔巴里的说法，是达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然而阿拉伯统治下的各种矛盾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如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地主贵族与农民的矛盾，非穆斯林与阿拉伯统治者的矛盾，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矛盾等等，都在不断地发展中。这些矛盾的爆发，终于像火山一样把倭马亚王朝摧毁了。纳斯尔统治时期的相对繁荣只不过是这个王朝的回光返照而已。

第十章
阿拉伯统治在中亚的解体

第一节　阿布·穆悉林与阿拔斯王朝的建立

从公元7世纪后期到公元8世纪前半期，唐朝在中亚的政权，受到阿拉伯的挑战。在60年当中，阿拉伯人不断侵入中亚，对那里的人民进行掠夺，征收贡赋，使唐朝的政权名存实亡。中亚人民不断进行反抗斗争，虽未能完全驱逐阿拉伯人侵者，但终于导致了阿拉伯统治的解体。伊朗语各族在新建立的阿拔斯朝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于到9世纪前期时，出现了由中亚民族建立的对阿拉伯哈里发独立的王朝。中亚北部的突厥民族，经过一系列的部落纷争和兴亡更替，愈益参与到以伊朗语各族居民为主的河中的政治事变中来，最后也信仰了伊斯兰教并建立自己的王朝。所有这些，当然不是一下子就出现的，而是经过了半个世纪乃至一百年的过渡。

首先讲一下回纥。公元7世纪末，东突厥在其首领默啜为可汗时，兵马强盛。漠北的铁勒诸部（包括回纥）被其吞并，受其统治。回纥、契苾、思结、浑等部族有一部分迁徙于甘、凉二州之地。[1]到

[1] 参看《旧唐书·铁勒传》、《新唐书·回鹘传》。又见岑仲勉：《突厥集史》上册，第330页。岑仲勉说："所徙者某一部，非全部也。"

公元8世纪40年代，东突厥衰落，回纥与葛逻禄、拔悉密击破之。回纥首领骨力裴罗与葛逻禄的首领自称左、右叶护。其后不久，骨力裴罗即自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唐朝封之为奉义王。从此，回纥便逐渐南移，占据原东突厥的土地，以鄂尔浑河流域的喀喇巴尔噶逊为其首府。史称其："南据突厥故地，徙牙乌德犍山、昆河之间"，以后"斥地愈广，东极室韦、西金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①]

回纥之西为西突厥别部葛逻禄。葛逻禄部是继突骑施部的瓦解而称雄于西域的。自突骑施首领莫贺达干于公元738年被擒斩之后，其部便陷于分崩离析。这时，葛逻禄部已开始乘虚逐渐从阿尔泰山与额尔齐斯河上游流域向西迁徙。唐至德（756~757年）以后，突骑施部黄、黑二姓都各立可汗，互相攻击，已不能与东面的葛逻禄相抗衡。葛逻禄既东有强邻回纥，便西徙到楚河、塔拉斯河流域的西突厥十姓可汗故地。故汉文史料讲："至德后，葛逻禄浸盛，与回纥争强，徙十姓可汗故地。尽有碎叶、怛逻斯诸城。然限回纥，故朝会不能自达于朝。"[②]对于葛逻禄在西域的分布情况，汉文史料只是笼统地讲其"徙十姓可汗故地"。而根据10世纪时胡实健地方的佚名作者所著的波斯文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Hudud al-Alam），就了解得比较具体。

据《世界境域志》所述："其东为吐蕃的一些地区与样磨之边境以及九姓古思（指回纥）；其南是样磨的某些地区与河中省（Transoxiana）；其西为古思人的边境；其北为突骑施人、炽俟人和九姓古思人（按，这里关于四邻方位的说法，是不十分确切的）。其地繁荣，为突厥地区之最令人喜爱者。那里有奔腾不息的河流与宜人的气候，输出各种各样的皮毛。葛逻禄人与（文明）民族相近，性格可亲，喜欢交际。过去，葛逻禄之王皆称为叶护。其地有城镇与乡村。葛逻禄人有的从事狩猎，有的种地，有的放牧。其财产

① 《新唐书·回鹘传》。

② 《新唐书·葛逻禄传》。



为羊、马和各种各样的皮毛。其人好战，习于劫掠。”[①]该书又讲到葛逻禄境内的一些具体地点，从中可以了解到该部的分布，如：“俱兰[②]，是一个小小地区，与穆斯林世界相毗邻。[③]此地有农业。梅尔克（Merki），是一个村子，住着葛逻禄人，也有商人来此。在这两个村子（指俱兰与梅尔克）之间，有三个葛逻禄的部落，名叫比斯坦（Bistan）、海姆（Khaym）与布里什（B.rish）。”[④]以上二地均在塔拉斯河流域。此外提到的地方还有：“Tun.L与Talkh.Za，是两个村子，在炽俟部与葛逻禄部边境地区之山中，伊塞克湖附近，居民勇武好战。巴尔斯罕[⑤]，是湖畔之一城。其王（德赫干）是一个葛逻禄人，但其（居民）服从九姓古思。Jamgh.R，是葛逻禄境内的一个小区，在沙漠边缘。过去属葛逻禄，但现在其政府代表九姓古思王。”[⑥]

这进一步说明，波斯文的记述同汉文完全相同。当时葛逻禄部主要分布于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其南面已到了伊塞克湖以南。还有一部分葛逻禄人居于阿姆河以南的吐火罗地区。其他突厥部族的分布情况在以后再叙述。

阿拉伯的倭马亚王朝基本上是统一的，它占有的领土甚为广大，地跨亚、非、欧三洲。所以塞克斯在他著的《波斯史》中说：“倭马亚王朝与伊斯兰帝国这两个称谓可以互换使用，意思一样。”但是，随着阿拉伯领土的扩大到各民族和各国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就以这个帝国的东部领土伊朗和中亚来说，这里的居民主要是操伊朗语和东伊朗语的各民族。入侵的阿拉伯人不管怎样总是少数。而且，在波斯、在阿姆河盆地以及河中地，都有着古老的文

① 佚名作者：《世界境域志》，第97页，1937年英文版。

② 俱兰，今阿吾里也-阿塔的Tarti。

③ 佚名作者：《世界境域志》，第97页，1937年英文版。

④ 此地现在仍叫梅尔克，它与俱兰二地现为两个火车站。

⑤ 巴尔斯罕（Barskhan），应即徐松《西域水道记》中提到的巴尔珲。

⑥ 佚名作者：《世界境域志》，第98页，1937年英文版。



化。在波斯人看来,阿拉伯人简直是野蛮人。他们无论在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化、科学、艺术等方面都要比波斯人落后得多。塞克斯写的《阿富汗史》中曾经提到一个阿拉伯人轻视教育的例子。据说,一个阿拉伯古莱氏人看到另一个阿拉伯人在学文化,就骂道:"呸!这就是学校老师的本事,叫化子才觉得了不起。"正因为如此,波斯人是瞧不起阿拉伯人的。可是,在政治上,阿拉伯人是统治者,他们在这方面有一种优越感。久而久之,矛盾就越来越尖锐。波斯人受到阿拉伯统治者的压迫,即使信仰了伊斯兰教,也不能受到平等的待遇,被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因此,波斯人和中亚的伊朗语各族人民要求在政治上的平等,也要求在政府中的地位。

在经济上,阿拉伯国家对伊斯兰教徒有种种优待,如不征人头税等。而对非伊斯兰教徒则加以歧视,对他们不但要征人头税,而且往往将他们贩卖为奴隶,加以种种压迫。后来,甚至新入伊斯兰教的人也没有平等待遇。所以,在伊朗东部的呼罗珊,在吐火罗与中亚,人民对阿拉伯的统治极为不满,反抗与起义连年不断。

在阿拉伯社会内部,也有着人民群众同贵族、统治者和军事将领的矛盾。穆斯林虽可免人头税,但还是要缴土地税。阿拉伯统治者长年驱使各阿拉伯部落的成员去进行无休止的征服战争,而获得的战利品和财富,则大部分被少数阿拉伯贵族和高级将领所瓜分。普通的部民则受着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所以,阿拉伯人就曾经支持中亚人民的起义。与此同时,又有什叶派、哈列哲派、阿拔斯党等阿拉伯和伊斯兰内部的不同派别的反抗运动,都企图推翻倭马亚王朝的统治。其中的阿拔斯党,是以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为号召。阿拔斯的后裔从公元718年起就进行着反倭马亚朝的活动与宣传,企图夺取哈里发之位。他们还尽力争取什叶派同自己站在一起。特别是所有这些反对倭马亚朝的派别,都在波斯、呼罗珊和中亚得到特别多的追随者。这同前面讲到的这些地区在

阿拉伯帝国中所处的被压迫的地位当然是有关系的。

阿拔斯党是一个秘密组织，为穆罕默德叔父阿拔斯的曾孙所创。他们鉴于在库法[①]不易开展活动，就前往阿拉伯人较少的呼罗珊进行宣传。在这里，得到伊朗人的拥护，并把什叶派也争取了过来。著名的阿拔斯党徒阿布·穆悉林[②]就是一个呼罗珊人。

阿布·穆悉林的全名是阿布德尔·拉赫曼·布·穆悉林，是一个伊朗人。他在信仰了伊斯兰教以后，曾经伙同一帮穆斯林到麦加去朝觐，在那里遇到阿拔斯党的首领穆罕默德·阿拔斯。后来他又在一个富有的阿拉伯人家里当雇工，专做马具。穆罕默德·阿拔斯很赏识这个20岁的青年，便引为同党，并派他作为自己的代表返回呼罗珊，宣传阿拔斯党的主张和进行反对倭马亚朝的活动。阿布·穆悉林于公元747年来到呼罗珊。当地人多信灵魂轮回之说，阿布·穆悉林把伊斯兰教同各种信仰调和起来，因而争取到了德赫干们和乡村居民的支持。据说，一天之内就有60个村子的居民加入了他的行列。阿布·穆悉林成功地把一切反对倭马亚朝的分子（包括哈列哲派）都争取到自己的一方面来。

阿布·穆悉林的活动，引起了当时的呼罗珊总督纳斯尔的不安。纳斯尔向人民宣布说，这些人的目的是要屠杀阿拉伯人，企图用这种说法把阿拉伯人都团结起来反对阿拔斯党。但是，却没有达到这种效果。纳斯尔便派军镇压。倭马亚朝的旗帜是白的，而阿布·穆悉林举的旗帜则是黑的。当时，无数对倭马亚王朝不满的分子都聚集到黑旗之下来了。故阿布·穆悉林很快就夺得了呼罗珊东部和赫拉特，并进军粟特。他下令诸地在聚礼日讲道时都要念阿拔斯的名字（意即以阿拔斯为宗教领袖和哈里发）。纳斯尔既感大势已去，就向哈里发求援，指出：呼罗珊的丧失对倭马亚朝将是致命的打击。但没有得到回答。纳斯尔无法，乃于公元748年初

① 库法（Al Kufa），在今伊拉克境内幼发拉底河西岸的纳贾夫附近。

② 阿布·穆悉林，《新唐书·大食传》、《旧唐书·大食传》译为并波悉林。

退出呼罗珊，取道谢腊赫斯[①]，逃往你沙不儿[②]。在此，被阿布·穆悉林手下大将卡赫塔巴追及，被其击溃。公元748年秋，纳斯尔在败逃到哈马丹时因年老力竭死去，享年85岁。

随着纳斯尔的死亡，倭马亚朝也就被埋葬了。公元749年，阿拔斯接替了前倭马亚朝哈里发的政权。阿布勒·阿拔斯[③]担任哈里发。而阿布·穆悉林则成了呼罗珊的总督，统治了伊朗东部和中亚地区。他手下的两员大将，一个名叫阿布·达乌德·哈里德·布·伊不拉音，一个名叫济雅德·布·萨利赫·阿勒·胡扎伊。这两个人既帮助他战胜了倭马亚朝的军队，也帮助他镇压了各种反对派。[④]

阿布·穆悉林可以说是阿拔斯朝的建国元勋。他的成功意味着伊朗人的胜利和波斯影响在哈里发帝国中逐渐增强。倭马亚朝的灭亡，也敲响了伊斯兰统一的丧钟。尽管在这以前帝国各地曾不断发生起义，但倭马亚朝从未承认过地方的独立统治者。在倭马亚朝灭亡以后，阿拉伯帝国就走向解体。不但北非、西班牙、近东分裂出去，而且在呼罗珊和中亚以及伊朗本土，也随着本地民族势力的增强，终于导致各地独立的伊斯兰王朝的出现。所有这些王朝虽然名义上仍奉哈里发为宗主，但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以前那样的统一了。现在的阿拔斯王朝不同于倭马亚王朝，国家不再单单是属于阿拉伯人，而是更加具有多民族性和国际性。在这个多民族参与建立的国家中，波斯人占着重要的地位，而阿拉伯人不过是诸多民族中的一员。被征服的各个民族不再甘于处在比阿拉伯人低一等的社会地位。波斯人，特别是波斯的知识界，本来就认为自己有比阿拉伯人更优越和更灿烂的文化，他们不仅仅要争

① 谢腊赫斯，在土库曼共和国与伊朗边界上的赫里河畔。

② 你沙不儿，在今伊朗东北马什哈德以西60公里处。

③ 阿布勒·阿拔斯，汉文史料中译为“阿蒲罗拔”。

④ 阿拔斯朝世系：阿拔斯①赛法哈（750）②曼苏尔（754）③麦海迪（775）④哈迪（785）⑤赖世德（786）⑥阿明（809）⑦马蒙（813）⑧穆耳台绥木（833）⑨瓦西格（842）⑩穆台瓦基勒（847）。

取政治上和社会地位上与阿拉伯人的平等,而且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超过阿拉伯人。

公元8世纪40年代末期,在中亚历史上除发生了阿拉伯帝国的王朝更代外,吐蕃的扩张也是当时的大事,并且仍然是对唐朝的一大威胁。

吐蕃为了谋取四镇,继续想占据小勃律。自公元722年吐蕃围攻小勃律被唐朝北庭节度使张孝嵩击退以后,经过20年平安无事。但在小勃律王麻来兮死去、苏失利之即位之后,吐蕃便于公元740年以女妻之,用这种引诱的办法使其势力又伸张进来。于是,西北二十余国受其威逼,不得不向其称臣。在吐蕃的阻隔下,中亚诸国对唐朝贡献不通。在公元742~746年的五年中,唐朝曾先后派节度使盖嘉运、田仁琬、夫蒙灵詧三次对其进行讨伐,均未能获胜。

公元747年,唐玄宗命安西副都护高仙芝率步、骑兵一万人(步兵都带了私马)前往讨击。唐军自安西(库车)出发,经过阿克苏、巴楚、喀什、帕米尔等地,行军一百多天,到达特勒满川,即五识匿国[①]。高仙芝将其军分为三路:一路骑兵三千人,由疏勒守捉赵崇玭率领,从北谷入,直取吐蕃所据的连云堡;[②]一路由拨换守捉贾崇瓘率领,自赤佛堂路[③]入;高仙芝本人和中使边令诚自护密国(瓦罕)入。约定七月十三日晨在连云堡会师。当时连云堡内有一千守兵。城南十五里处因山为堡,有守兵八九千人。城下即婆勒川(瓦罕河),正当涨水。仙芝令部队带三日干粮,渡过河整军攻城,登山挑战。吐蕃守军不意唐兵突然来临,大惊。依山拒战,炮石如雨。

① 即什格南,在喷赤河东岸今塔吉克共和国与阿富汗交界处之荷罗格以北不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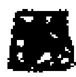
② 连云堡,在萨尔哈德(Sarhad)附近。

③ 斯坦因在《赛林的亚》(Serindia)一书中考订说赤佛堂是在从兰伽尔(Langar)到博再·拱北(Bozai-gumbaz)去的路上的一个石堡。这是一个小僧房(Vihara),近代土人称之为喀尔万·巴拉西(Karwan-balasi)。王小甫说高仙芝返回的路线是先至赤佛堂,后至连云堡,故认为斯坦因的考订有误。

当时高仙芝以郎将高陵、李嗣业为左右陌刀将，命令他们在午时以前必须拿下此城。于是李嗣业率领步兵持长刀于险峻处攀缘而上，诸将领随其后登山力战，不到午时，大破之，陷其城，杀五千人，生擒千人。余敌溃散奔逃，多在水中淹死。边令诚见已深入敌境，怕死不敢再进。高仙芝给他三千人马以守其城，自己率军继续前进。

行军三日，到达坦驹岭（Darkot），岭峻绝，直下四十余里，前面为阿弩越城（Gupis）。[①]高仙芝估计，部队会害怕地势险峻，不敢前进。便先令骑兵二十余人，假装为阿弩越的胡人起来迎接唐军。果然，高仙芝的部队到达时，见山势险峻，都不敢往下走。都说："将军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正好这时佯装为胡人的骑兵来迎，部队才愿下山。明日，至阿弩越城。当日，令将军席元庆，贺娄余润先修桥路。仙芝明日进军。又令席元庆率骑兵千人前去对小勃律王说："不取你的城，也不砍你的桥，只借你的路通过，前往大勃律。"阿弩越城城内有首领五六人，都是一心忠于吐蕃的。高仙芝对席元庆说："我们的军队到达后，其首领百姓必定会逃入山谷。你可招呼他们来取唐朝赐给的丝绸等物。等其首领到来时，即逮捕他们，等我发落。"到时元庆全按高仙芝的吩咐行事，逮捕了诸首领。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未能捉到。高仙芝到后，将其中附于吐蕃之首领五六人斩首。随即急令席元庆去砍断距城六十里的藤桥，刚刚砍断，吐蕃的援兵到来，但已不能渡河了。于是，高仙芝招谕小勃律王及公主出降。公元747年8月，将其俘虏，取道赤佛堂班师返回。9月，至连云堡，与边令诚会合。月末回到播密川。

① 坦驹岭是兴都库什山的一个山口，是从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到巴基斯坦的契特腊耳去的通道。其地海拔1.5万尺，下临雅新谷地。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中说："当我立在山口顶端闪光熠熠的积雪上向那直到6000英尺下雅新山谷尽头的峻坂下窥，对于起初拒绝向前移动、后来他们努力挣扎前进，高仙芝的勇敢，才能认识清楚。"（见《西域考古记》，向达译，第31页，中华书局1936年版）



小勃律既平，唐朝于其地设归仁军，驻兵三千镇守。从此，中亚各国同唐朝的往来又得以通行无阻。

唐朝决心平定小勃律，固然是为了打击吐蕃的扩张势力，掌握国家的西大门，以控制安西四镇的通路和商贸要道，同时也是为了维持对中亚各小国的宗主权和影响力，以阻遏阿拉伯势力的东侵。所以，唐朝不但对小勃律，而且继续对有离心背叛表现的属地属国采取了行动。

公元748年，北庭节度使王正见伐安西碎叶，毁其城。①

公元749年，吐火罗叶护失里怛伽罗遣使上书唐朝，请求唐朝讨伐亲附吐蕃、阻遏小勃律驻军粮道的朅师。公元750年，高仙芝击破朅师，虏其王勃特设，立其兄素迦为王。

公元750年，费尔干纳的伊赫希德（Ikhshidh）请求唐军帮助打击自己的敌人塔什干王。当时已继夫蒙灵詧任安西四镇节度使的高仙芝应费尔干纳之请，伪与塔什干约和，实则出兵袭击之，虏其王车鼻施及部众而归。②并破九国胡及背叛的突骑施。至此，唐与吐蕃的斗争可说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在唐朝处于极盛时期的条件下，其边疆将领往往恃功骄傲，对边疆少数民族很不尊重，干出贪鄙枉法的行为。故塔什干王子在被高仙芝击败后就到中亚各地诉说，并向阿拉伯求援。当时的阿拉伯阿拔斯朝（黑衣大食）的呼罗珊总督阿布·穆悉林乃派其手下大将济雅德率军来援。汉文史料说，高仙芝“举兵围怛逻斯，黑衣救至”，指的就是这支阿拉伯军队同唐朝的冲突。

怛逻斯之战发生在公元751年。关于此战，汉文记载较多。阿

① 《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天宝七载，北庭节度使王正见伐安西，毁之。”这里的所谓安西，乃指碎叶，非指龟兹。《杜环经行记》云：“天宝七年，北庭节度使王正见薄伐，墙壁摧毁，邑里零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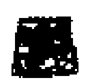
② 阿拉伯史料如此说（见《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254页）。《旧唐书·李嗣业传》说：“初，仙芝绐石国王约为和好，乃将兵袭破之，杀其老弱，虏其丁壮，取金宝瑟瑟驼马等，国人号哭，因掠石国王东献之于阙下。其子逃难奔走，告于诸胡国。群胡忿之，与大食连谋，将欲攻四镇。”汉文史料反说此事的起因是“石国王无蕃臣礼”。

拉伯史料方面，无论是塔巴里，或是流传下来的阿拉伯人早期的历史著作都绝未提及此事。只有伊本·阿勒·阿西尔曾述及之。其中的说法可与汉文史料互为佐证。据汉文的记载，高仙芝在虏获石国王以后，其王子潜引大食欲攻四镇。高仙芝得到消息后，即率蕃、汉军三万人前去迎击阿拉伯军。[①]唐军深入七百余里，至呾逻斯（塔拉斯）城，与阿拉伯军相遇。两军接战，相持五日。在战斗



塔拉斯故城墓葬的唐军遗骸

① 关于参加这次战役的唐军的人数，汉文记载为3万人。而阿拉伯历史家说唐军战死者达5万人，被俘者2万人，则总数超过7万人。巴尔托里德说这是夸大了。白寿彝在《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11期发表的《从呾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一文中分析说："当时实际参加战争的军队最多不过两万人"，但与唐军一起参战的还有蕃军，"蕃军是可以多多地参加的"。《通典》卷一八五边防类总序自注云："高仙芝伐石国于呾逻斯川，七万众尽没。"则其数与阿拉伯史料的记载相同。这应当是作者杜佑根据其族子杜环的叙述而说的。杜环曾亲身参加这次战役，其后又经历中亚各地，而他的说法应当是比较可靠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伊本·阿勒·阿西尔的说法就不能被认为是夸大之词。按照白寿彝的分析，唐军为2万多，其余四五万人应是西域诸胡国的蕃兵。蕃兵之数如此之多，说明当时唐朝在中亚还是有权威的，是能号令诸国的。从战斗的情况看，也可想见参战的胡兵之多。



进行中，葛逻禄部叛变，与阿拉伯军夹攻唐军。关于战斗的情况，汉文史料记载说："仙芝大败，……右威卫将军李嗣业劝仙芝宵遁。道路阻隘，拔汗那部众在前，人畜塞路；嗣业前驱，奋大梃击之，人马俱毙，仙芝乃得过。将士相失，别将汧阳段秀实闻嗣业之声，诟曰：'避敌先奔，无勇也；全己弃众，不仁也。幸而得达，独无愧乎！'嗣业执其手谢之，留拒追兵，收散卒，得俱免。"[1]结果高仙芝大败，士卒绝大部分战死，最后只剩下了几千人。高仙芝及其部属右威卫将军李嗣业、段秀实等经过苦战，撤回安西。

按呾逻斯战役发生在阿拔斯王朝建立的次年。其时，距艾卜勒·阿拔斯于公元749年10月30日在库法被拥立为哈里发不久，倭马亚王朝的势力未见得就已完全肃清。新建立的阿拔斯王朝正忙于镇压倭马亚王朝的残余势力，面临着巩固自己的政权的问题，可能也无暇顾及其边境事务，不见得能够派出大量的军力去与唐军作战。所以，这次唐朝与大食的战争，不过是一次遭遇战，而不是双方的大决战。唐军也并非仅仅是被大食军打败，而是与唐朝边军将领的贪婪腐败、失去民心和少数蕃军（如葛逻禄部）的叛变倒戈有关。

呾逻斯之战失败，阿拉伯史料说被俘的中国人有二万人，虽不一定准确，但人数肯定是很多的。在这些被俘人当中，有许多都是能工巧匠，有的还是知识分子。如唐代著名政治家和历史家杜佑的族子杜环，就因参加这次战役被俘。这些被俘人员被阿拉伯统治者当做奴隶役使，有的在中亚各地服劳役和做工，从而把中国文明和生产方法传到了西方。

中国的纸传到西方较早，匈牙利学者哈尔马塔推断，在东汉蔡伦发明纸后一个世纪，中国边境和索格底亚那就已经用纸通信了。斯坦因曾在敦煌附近发现了古代的商业书简。哈尔马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亦见《旧唐书》李嗣业传与段秀实传。

塔选择其中一些有趣的书简译成英文，断定其年代为公元196~197年。而亨宁断定其年代为311年，藤枝晃断定为公元6世纪前半期。到公元3世纪初，中国纸已传入伊拉克。[①]总之，要比呾逻斯战役为早。但是，造纸法的西传却普遍地被认为是在这时传到中亚的。

据说，中国的造纸法是由呾逻斯战役中被俘的中国人传到中亚去的。他们教会撒马儿罕地方的居民用碎布、亚麻或大麻屑来造纸。[②]到公元 10 世纪时，撒马儿罕的造纸工业已经很发达了。不久中国造纸术又从撒马儿罕传到伊拉克。阿拔斯朝的许多城市纷纷建立撒马儿罕式的造纸厂，但撒马儿罕出产的纸张仍然被认为是最精美的。[③]《世界境域志》一书中就说："撒马儿罕生产纸，输出到全世界各地。"公元12世纪前期的阿拉伯作者马卫集（约死于公元1120年）也说："中亚撒马儿罕一带原属中国。穆斯林占领其地后，中国人大都徙回。惟制造精美纸张的技术尚留于撒马儿罕。"[④]卡特引用《道里邦国志》这部阿拉伯文地理著作讲道："纸是由俘虏自中国传入撒马儿罕的。这些俘虏为济雅德所有，其中有些是纸工。造纸工业发展以后，产品不仅可以供应本地的需要，也成为撒马儿罕人民的一种重要的贸易品。由此它得以供应世界各国的需要。"[⑤]

随着纸在西亚被使用，造纸法也在不久被当地人掌握了。就在公元8世纪结束之前，巴格达就有了自己的造纸厂。公元9世纪末，造纸法传到埃及，其所生产的纸张输出到说希腊语的地区。大约在公元900年或更早一点，埃及建设了造纸厂。公元10世纪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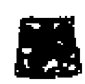
① 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上册，第491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② 巴尔托里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236~237页，伦敦1928年英文版。

③ 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上册，第49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④ 密诺尔斯基编：《马卫集论中国、突厥和印度》，第18节，伦敦1942年版。

⑤ 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吴泽炎译，第113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参看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74页。



整个穆斯林世界都已使用纸张了。[1]摩洛哥大约在公元1100年，西班牙大约在公元1150年，先后设厂造纸。[2]

12世纪中叶，造纸术再从摩洛哥传入西班牙。雅古特说，沙兑卜（Shatibah即Jativa，哈提发）是西班牙的造纸工业中心。在西班牙之后，造纸工业又在意大利兴盛起来（约在1268~1276年），也是由于穆斯林的影响，大概是从西西里岛传入的。法兰西有第一批造纸工厂，应归功于西班牙的传授，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应归功于十字军的归国。这些国家，造纸工业逐渐传遍了欧洲。[3]

造纸术的发明和纸张的使用，对于印刷术的出现，从而对于文化的传播与普及是有决定作用的。由此可以说，中国造纸法的西传是对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巨大的贡献。要是没有纸，15世纪中叶在德意志发明的活字印刷是不可能成功的；要是没有纸张和印刷术，欧洲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普及教育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就在怛逻斯之战的翌年（752年），东曹（苏对沙那）王设阿忽与安国王就来向唐朝请求击大食。[4]同年，阿布·穆悉林手下另一大将、巴里黑长官阿布·达乌德曾派军进攻骨咄，其王罗全节奔突厥，以后又从突厥逃往唐朝。[5]唐朝册立罗全节为叶护。[6]这些事实说明，公元751年以后唐朝对中亚仍有很大的影响，至于通商朝贡之事那就更多了。事虽如此，但总的说来，公元8世纪中叶，在中亚几大政治势力——唐朝、吐蕃、阿拉伯的斗争，还是阿拉伯的势力占了优势。阿布·穆悉林及其支持下建立的阿拔斯王朝，维持了对中亚大部分地区的统治。人民反抗这种统治是以后一个时期中亚史的主要内容。

---

① 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上册，第49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② 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上册，第406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③ 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上册，第406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④ 《新唐书·西域传》。

⑤ 吉布：《阿拉伯人在中亚的征服》，第82、95页，伦敦1923年英文版。

⑥ 《册府元龟》卷九六五；《新唐书·西域传》。

第二节　中亚各族人民反抗阿拔斯朝的斗争

阿拔斯朝是在伊朗和中亚各地对倭马亚王朝心怀不满的人民的支持下才夺得哈里发的权力的。但阿拔斯朝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倭马亚朝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正如巴尔托里德所说的："这个王朝最初的一些代表人物乃是像倭马亚朝一样的世俗统治者。""他们与倭马亚朝的区别主要在政治意图不同。后者首先是阿拉伯民族的代表；而阿拔斯朝则企图建立这么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波斯人居住的省份同阿拉伯人居住的省份能有平等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拔斯朝的建立乃是波斯人和伊朗语各族在一定程度上的胜利和为过渡到本地民族自己建立伊斯兰王朝准备条件。例如，阿拔斯朝的宰相（Wazirs），从曼苏尔哈里发（754~775年）时起，就属于波斯的显贵家族——伯尔麦克[①]家族。第一任阿拔斯朝的宰相是哈立德·伊本·伯尔麦克（死于公元781年，约75岁），其父是巴里黑地方一个佛教寺院的伯尔麦克，即大和尚。哈立德初次信奉了伊斯兰教，在阿拔斯朝的前三个哈里发时期均被授以高职。由是波斯人在阿拔斯朝的势力逐渐发展起来。这个王朝懂得："要使国家完全服从于穆斯林的统治并充分确立外部与内部的安全，就不能经常更换地方的总督，而是必须任命出身于本地贵族、十分熟悉当地情况并得到居民信任的世袭统治者为地方长官才行。当然，这些统治者会更多地为自己的利益行事，而更少地为哈里发的利益行事。他们对哈里发的从属关系很快就会变成纯粹名义上的从属关系。"[②]

在阿拔斯朝建立后，东部的呼罗珊省及其所属中亚的一些地

① 伯尔麦克（barmak），是佛教大和尚的意思。见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上册，第49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②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257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仍然是很尖锐的。这里有阿拉伯统治者同当地民族的矛盾，有本地民族中贵族、地主同农民、手工业者的矛盾，也有阿拉伯人内部的阶级矛盾。这些矛盾激化，终于爆发成为大规模的起义。如阿拔斯朝一建立，在布哈拉就发生了由舍里克领导的什叶派起义。在伊朗，具有强烈民族感情的波斯人，也曾以什叶派作为外衣来进行反对阿拉伯统治的政治斗争。同样，在中亚什叶派的教义被利用来作为反对阿拔斯朝的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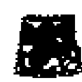
舍里克（Sharik b.Shaykh）是一个阿拉伯人，为驻布哈拉的戍卒。他发动起义的原因主要是对哈里发之位被阿拔斯朝夺去不满。但他的追随者却有广大的群众。一般认为这次起义发生在公元751年。巴尔托里德说是发生在怛逻斯战役以前。印度作者罗候罗在其所著《中亚史》中则说是发生在公元755年。纳尔沙喜说舍里克是一个什叶派分子，曾参加过反对倭马亚朝的运动，但也不同意阿拔斯族任哈里发。所以他提出的口号是："我们为反对倭马亚朝进行了斗争，流血牺牲，并不是要臣服于阿拔斯朝！"由于阿拔斯朝，特别是该朝的代理人阿布·穆悉林实行暴政，继续以前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政策，所以舍里克的口号得到广大群众的响应。据说有三万人参加了他的队伍，绝大部分是布哈拉的劳动人民，包括城镇居民和农民、手工业者。此外，布哈拉的异密阿布都勒·加巴尔、花剌子模的异密阿布都勒·马里克也都响应和参加了这次起义。另一方面，布哈拉的贵族、地主、商人则反对这次起义，其首领为布哈拉的胡达特库特巴。特别是其中的商人，他们原来被阿拉伯人从布哈拉内城迁出，搬到城西北筑堡居住，所以他们本来是敌视阿拉伯人的，而这次则站在阿拉伯方面来镇压起义。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这次起义的阶级性质。各个不同的阶级对它采取了明显不同的互相对立的态度。

当阿布·穆悉林得到起义的消息时，就立即派济雅德率领一万军队前去镇压。济雅德渡过阿姆河来到布哈拉城下。在同起义

者的战斗中，阿拉伯人多次被打败。后来库特巴率领一万人的队伍来援助济雅德，阿拉伯人才转败为胜。库特巴手下的地主、德赫干们到周围的村庄活动，使起义者得不到粮食和饲料。起义者为饥饿所迫，只得放弃据点，转移到努肯村（Nukende）。该地以出产水果闻名，他们便以之充饥。在以后同阿拉伯军的战斗中，起义者渐不能支，大批死去，舍里克本人亦战死。领袖既亡，群龙无首，起义队伍遂瓦解。济雅德攻入布哈拉，下令放火烧城，烟火连天，三日不息。布哈拉人民怨恨之极竟不投降。阿拉伯人进行大屠杀，居民大部分丧生。未死于刀下者都被阿拉伯人吊在城门之上。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就这样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在镇压了布哈拉的起义后，济雅德立即去花剌子模，把那里的反对阿拔斯朝和阿布·穆悉林的运动也镇压下去了。布哈拉的胡达特（布哈拉王）库特巴尽管对阿布·穆悉林效力，参加镇压起义的人民，但还是被指责背离了伊斯兰教而被处死。同样，为阿拔斯朝效忠尽力、镇压人民起义的呼罗珊总督阿布·穆悉林也得到这种下场。因哈里发了解到，阿布·穆悉林在东部各省的势力和影响很大，俨如独立王国，惟恐有朝一日这个危险的人物将要颠覆哈里发的政权。虽然阿拔斯朝是依靠阿布·穆悉林的力量而得以战胜倭马亚朝的，但现在也不能顾及他的功劳了。哈里发决定除掉他。

公元752年，哈里发阿拔斯（Abul-Abbas，汉文史料中译为阿蒲罗拔，公元750~753年）怂恿撒马儿罕长官济雅德举兵进攻阿布·穆悉林，但未成功，济雅德被撤职处死。哈里发的计谋没有得手。公元753年，当阿布·穆悉林与阿布·加法尔（Abu Jafar，汉文史料译为阿蒲恭拂）自麦加朝觐返回时，哈里发逝世。这个阿布·加法尔是故哈里发之兄，曾被指定为即位者。但其叔父阿布都拉与之争位。阿布·穆悉林支持阿布·加法尔。他统帅下的波斯军将阿布都拉的叙利亚军击败，使其不得不放弃争夺哈里发位的要求。



因而阿布·加法尔得以登位。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二任阿拔斯朝哈里发,也称为曼苏尔。

曼苏尔哈里发仍然对阿布·穆悉林不感恩，继续设法要除掉他。阿布·穆悉林意识到了这一点,就决定尽快返回自己的老巢呼罗珊。这时,曼苏尔立即任命他为叙利亚与埃及的总督,并召他到迈丹[①]谒见。阿布·穆悉林不愿去,仍然返回呼罗珊。但曼苏尔已任命阿布·达乌德为呼罗珊总督,并诏谕呼罗珊说,阿布·穆悉林已叛变,罪当处以极刑。呼罗珊的军民人等见此诏书后,便接受阿布·达乌德为总督。阿布·穆悉林既无家可归,乃同意接受哈里发的任命去迈丹朝见。他到了迈丹后,即被哈里发手下的人暗杀,享年45岁,时在公元754年。

消灭了阿布·穆悉林其人，并不等于能消灭反阿拔斯朝的各种力量。巴尔托里德指出:“其后,阿布·穆悉林的同党自然就成了阿拔斯朝的敌人。他死之后,在呼罗珊立即就发生了波斯人的起义。”[②]这次起义的首领名叫新巴德（Sinbad）。据塔巴里说，他是你沙不儿附近阿罕村人,信仰祆教。他可能受过阿布·穆悉林的保护,对之感恩戴德。他发动反阿拔斯朝的起义就在阿布·穆悉林被杀的当年,口号是要为这位总督报仇。一时附从者甚众,很快形成浩荡大军。他们占据了你沙不儿、库密斯[③]、剌夷[④],夺得阿布·穆悉林留在剌夷的财宝库。哈里发曼苏尔派加赫瓦尔（Jahwaribn Marrarel-Jili）率军一万人前去镇压。双方在哈马丹与德黑兰之间的地区进行了战斗,起义军被击败。新巴德逃走,阿拉伯军追之。在追击的过程中,新巴德被杀。起义者之死于此役者达6000人。这次起义只延续了70天就被扼杀了。

---

① 迈丹（Maidan）,在今伊拉克东北迪亚拉河上游与伊朗交界处。

②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255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③ 库密斯,在今伊朗的达姆甘附近。

④ 剌夷,在今伊朗德黑兰附近,故城废址在德黑兰以南7公里。

新巴德起义虽然发生在伊朗的东北部，但对中亚也是有影响的。阿布·穆悉林的党羽继续进行着反对阿拔斯朝的活动。波斯与中亚的什叶派都把阿布·穆悉林当成一个殉教者加以崇拜。什叶派运动的领导人都把自己的活动同阿布·穆悉林的名字联系起来。他们穿白衣、打白旗，与阿拔斯朝的黑旗相对立。在以后从未停止过，一直延续到12世纪。如在中亚，阿布·穆悉林的信徒伊斯哈克（Ishak）就举行了起义。此人以前曾由阿布·穆悉林派遣去过突厥，故也被称为突厥人。他的起义虽被镇压，但他的同党却于公元757年刺杀了呼罗珊总督阿布·达乌德。公元759年，又有一个名叫巴拉兹（Baraz）的人举起白旗起义，甚至得到继阿布·达乌德为呼罗珊总督的阿布得·阿勒·加巴尔（Abdal Jabbar）的支持。这位总督因对阿拔斯朝不满，参加了巴拉兹的运动，下令处决布哈拉的阿拉伯长官。但随后却被阿拉伯军击败，他在逃走当中于梅尔维鲁德被部属所杀。据说，约在公元777年布哈拉地区还发生过哈列哲派玉素甫领导的起义，起义者占据了梅尔维鲁德、塔里寒、胡实健等地。军事行动主要是在今阿富汗的西北部进行的。①

以后最著名的，也是影响较大的，乃是木坎纳的起义。木坎纳的原名是哈希姆·布·哈基木（Hashim b.Hakim），是谋夫附近开扎村的人。纳尔沙喜的《布哈拉史》中说："最初他是以漂布为业，但后来他却勤于研究学问，获得了各种知识。"有的则说他以前曾在阿布·穆悉林手下当一名军官，并参加过反对倭马亚朝的运动。后来又在阿布得·阿勒·加巴尔手下做事。他可能不信仰伊斯兰教，而是一个马兹达教的信徒。他以宣传这个古老的宗教来进行反对现政权的活动。当呼罗珊总督掌握了他的活动情况后，就把他逮捕起来，从谋夫解送到巴格达加以监禁。但几年以后他却逃脱，返回谋夫。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257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木坎纳回到自己的故乡以后，更加积极地进行说教。约在公元776年初以前，当胡迈达·布·卡赫塔巴任呼罗珊总督的时期，他发动了起义。木坎纳对自己的追随者宣称，他像以前的亚当、诺亚、亚伯拉罕、摩西、耶稣、穆罕默德以及阿布·穆悉林一样，乃是神的化身。他经常用一块绿色的布把自己的脸蒙上，并说凡人经受不住他脸上发射的光芒。因此，阿拉伯人就称他为“木坎纳”（Al Muqana），就是“蒙面者”的意思。而纳尔沙喜则说，这是“因为他生得秃头，一只眼”，不让其追随者见到先知形象之丑陋。

木坎纳从谋夫派遣自己的追随者到各地去进行宣传鼓动，特别是到阿姆河以北的中亚地区。在那里，响应他的人特别多。如渴石（今沙赫里夏勃兹）地方苏巴赫村首先宣布拥护木坎纳，在其带头人乌玛尔·苏巴希的领导下举行起义，杀死了当地的阿拉伯长官。在布哈拉也发生了同样的起义。布哈拉的胡达特布尼阿特本人也支持他。布哈拉地区的纳尔沙赫村是当地起义者的大本营。此外，索格底亚那还有许多乡村也接受了木坎纳的宣传，纷纷起来反对阿拉伯统治的斗争。

在中亚各地人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情况下，呼罗珊总督下令逮捕木坎纳。木坎纳逃走，渡阿姆河，到了渴石，因为这个地方拥护他的人最多。他决定以此地为据点，遂下令在色姆山上修筑一个坚固的寨子，以与阿拉伯人相抗。

木坎纳的起义，是以前中亚各地起义的继续，所以他们也是打白旗、穿白衣，被称为“沙庇得·加马甘[1]”。这时归附于木坎纳的白衣人越来越多。在中亚各地，有许多阿拉伯人被他们驱逐，有的逃往呼罗珊，有的逃回阿拔斯朝的首都巴格达。木坎纳还得到中亚突厥人的支援，声势日益壮大。

哈里发麦海迪[2]对木坎纳起义的滋蔓深感忧虑，决定亲自出

① 沙庇得·加马甘，阿拉伯语作al-Mubayyida，意为“白衣人”。

② 汉文史料中译为迷地。

马去镇压。麦海迪征集一支武器精良的大军，一部分派到河中，一部分由他亲自率领去你沙不儿。

斗争在布哈拉进行得最为激烈。起义者于公元776年攻占了布哈拉附近的努木奇克特村。因该村的阿拉伯人最多，即使不是阿拉伯人也倾向于阿拔斯朝。该村被起义者攻占以后，许多阿拉伯人被杀。在布哈拉城，则有一些粟特的地方首领支持起义者。但木坎纳未能占领布哈拉本城，只是占据了纳尔沙赫。这一年的四月间，阿拉伯的军队前进到纳尔沙赫的围墙边。他们对起义者劝降，遭到坚决的拒绝。阿拉伯军对他们发起进攻。双方经过残酷的战斗，起义者被击溃，700人被杀，余众奔逃。最后，他们不得不同意与阿拉伯人签订和约，同意不再进攻阿拉伯人。可是，在阿拉伯军刚刚离去尚未到达布哈拉时，他们就又进行暴动，布哈拉周围地区又落入起义者的手中。

麦海迪哈里发十分恼怒，就派撒马儿罕的长官吉卜拉伊尔率军前去和木坎纳作战。此人从撒马儿罕前往，由北面进至布哈拉，在该城的撒马儿罕门扎营。看来，他是想进一步去起义者的心脏地带、木坎纳所在的渴石，后采纳布哈拉异密的劝告未去。

吉卜拉伊尔在布哈拉战斗了四个月，每天都打败仗，几乎陷于束手无策的境地。最后采用计谋才攻陷该城。纳尔沙赫对这次攻城的情况作了如下的描写："（他）下令由宿营地挖一条地道直通堡砦的墙。派军队进入，并命令所有挖通的地道都用木头、芦苇和黏土使之坚固，在上面加以掩蔽。（命令）把五十腕尺[1]面积的地方挖开，并用柱子支起来。当五十腕尺的一块地方挖完的时候，他们用木柴塞满，并往上面倒油，他们点起火要使柱子燃烧，并使堡砦的墙倒塌。但是火着不起来，因为使火燃起的风还不够大，而且也没有使风刮入堡砦。他们对着下面被挖（地道）的碉堡架起

[1] 一腕尺（Cubit）约合18~22英寸。

石弩。他们射出石头并打开一个缺口。风有了通口，火开始着起来。柱子被焚烧了，五十腕尺面积的（墙倒塌了）。”阿拉伯人涌入城内，进行巷战。这次白衣人抵抗不了武器优越的阿拉伯军而被击败。于是议和。按照和约，白衣人应交出武器。但有的人这样做了，有的人则把武器藏了起来。以后又突然把武器拿出来进攻阿拉伯人。“吉卜拉伊尔命令他的军队都上马作战。斗争比以前更加顽强。他们（指起义者）勇敢地战斗，再度遭到失败。他们中大多数被杀，剩下的逃走了。”

阿拉伯人抓住了纳尔沙赫村守卫战中起义军的指挥者哈基木·伊本·阿赫马。吉卜拉伊尔命自己的儿子阿巴斯将其秘密处死。这激起了起义群众的极大愤怒，他们又拿起武器与阿拉伯人战斗，但由于力量悬殊，再次被打败。

纳尔沙赫村陷落后，阿拉伯人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木坎纳本人。鉴于渴石地方木坎纳的势力太大，吉卜拉伊尔就先攻撒马儿罕。他带了（被杀的“白衣人”的）头到粟特，用以恐吓粟特的“白衣人”。粟特人的长官名叫粟底延，是木坎纳所派的一个首领。粟特人拥护他，吉卜拉伊尔不得不多次和粟特的居民作战。最后，一个布哈拉人杀死了粟底延，粟特居民才被击溃了。

吉卜拉伊尔从这里前往撒马儿罕，他在那里和突厥人以及“白衣人”多次作战，一直到穆阿兹·伊本·木思里姆作呼罗珊总督的时候。穆阿兹在谋夫仔细准备对木坎纳的进攻。他下令制造武器……准备了三千名有刀、锹、桶和斧子的工人以及在军队中有用的各种匠人。制造了石弩和弩炮，他凭借最好的组织向粟特出动。在粟特有许多“白衣人”并有多数突厥人已经到达。

穆阿兹·伊本·木思里姆前往粟特与撒马儿罕，并多次与突厥人以及“白衣人”作战。在两年的时间里，双方互有胜负。

哈里发麦海迪对战争的旷日持久甚为不满，决定撤换指挥人员。穆阿兹因而去职。公元780年，穆赛雅布继之为呼罗珊总督，他

于是年赖哲卜月（3~4月）来到布哈拉。在布哈拉，有木坎纳的一个军事首领，名叫库拉尔·特勤。他有一支装备得很好的骑兵。穆赛雅布不得不同他多次作战。

哈里发麦海迪派去同木坎纳作战的指挥官名叫赛伊德·阿勒·哈拉什。赛伊德看来是归穆赛雅布指挥的。同木坎纳作战的最后一个阶段——围攻木坎纳在萨那山中堡砦，就是由赛伊德完成的。

木坎纳所在的堡砦分为里外二层。外层驻扎了精兵良将，不易攻下。所以围攻了很长的时间。关于战斗的具体情况不详。只知“赛伊德率领大队兵士在（木坎纳）堡砦的门前扎营”。当木坎纳的军队被击溃，情况危急之时，“堡砦里一个军事首领打开门出来投降”。阿拉伯人冲了进去。据塔巴里说，木坎纳知不可免，就服毒自杀。但纳尔沙喜的《布哈拉史》则说：“木坎纳知道他在内砦里无法支持……就走近火炉，脱下衣服，纵身跳入火炉内，然后冒出了烟。”[①]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是被杀的。关于木坎纳死亡的年代，也说法不一。纳尔沙喜提到两个年代，一为公元782年，一为公元783年。比鲁尼则说是在公元785年。同情和支持起义的布哈拉的胡达特布尼阿特被阿拉伯骑士所杀。

木坎纳的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阿拔斯朝对中亚的统治也就接近尾声了。在其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亚就脱离了哈里发的统治。伊朗与中亚各族争取民族复兴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木坎纳起义是这一系列斗争中的重要一环，它在历史上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① 以上据《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所收纳尔沙喜著《布哈拉史》的部分译文，郭守田译。



第三节　阿拔斯朝统治中亚的最后阶段

在木坎纳起义被镇压以后，穆阿兹仍拒绝服从哈里发的命令返回巴格达。因此，麦海迪于公元785年亲自率军前往呼罗珊，但在路上突然死去。他死后由哈迪[1]继任为哈里发。此人即位不久，就有阿里党在麦地那进行反抗。结果，阿里党被镇压，其首领一人逃往伊朗的底廉（Daylam），一人逃往摩洛哥。哈迪之弟拉什德为波斯女所生，故哈迪不愿让其即位，但在他尚未采取措施之前即于公元786年死去，拉什德乃得以继任为哈里发。

拉什德哈里发于公元787年任命加法尔·阿勒·阿什阿斯（Jafar el-Ashath）为呼罗珊总督。其后相继担任呼罗珊总督的还有其子阿勒·阿巴斯·阿勒·阿什阿斯，其叔父阿勒·吉特里夫·伊本·阿塔。以后则有哈姆扎·阿勒·胡扎伊（Hamza el-Khuzai，公元792年），阿勒·法兹勒·伊本·雅希亚（El-Fadhl ibnYahya，公元794年）。哈里发拉什德在呼罗珊境内建筑清真寺，设置邮站。他对阿姆河以外地区进行所谓“圣战”，因而受到苏对沙那王哈拉哈拉的攻击。[2]

以后任呼罗珊总督的还有满速儿·阿勒·希米阿里（Mansur el-Himyari，公元795年）、加法尔·伊本·雅希亚（Jafar ibn Yahya，公元796年）。以上诸人，如法兹勒、加法尔及其父雅希亚，都属于波斯显贵的伯尔麦克家族。由于这个家族失宠于哈里发，加法尔于公元803年突然被捕斩首，雅希亚与法兹勒被囚禁，其财产也被抄没。在呼罗珊一直握有重权的显赫的伯尔麦克家族从此被消灭。拉什德在消灭此族后，任命阿里·伊本·伊萨（Ali ibn Isa）为

① 哈迪（AlHadi），汉文史料中译为哈弟，在位时间为公元785-786年。

② 斯克兰、罗思：《亚洲的心脏》，第95页，伦敦1898年英文版。

呼罗珊总督。此人为政暴虐，鱼肉人民。于是，公元806年在河中又发生了由拉飞·伊本·来斯所发起的暴动。

拉飞本人是上层社会出身。他的祖父是在倭马亚朝当过呼罗珊总督的纳斯尔。他的父亲来斯参加过镇压木坎纳起义的战争。他本人在阿拔斯朝服兵役。由此看来，他的一家同阿拔斯朝的仇恨已经消解，不想再为其祖父报仇。所以，塔巴里说他是出于个人的原因（据说，他因与一妇女通奸而受到哈里发的惩罚），而反对阿拔斯朝的。但追随他的人却很多，这是与当地阿拉伯长官的暴虐有关系的。拉飞利用人民对阿拉伯政权的不满，在突厥人的支持下，带领群众杀死了撒马儿罕的阿拉伯长官，完全控制了这个地区。那色波的居民也请求拉飞帮助他们反对政府，拉飞派了塔什干的统治者带着突厥人前去支援。此外，费尔干纳、忽毡、苏对沙那、石汗那、布哈拉、花剌子模及骨咄等地的居民都支持拉飞，甚至九姓古思人、葛逻禄人及吐蕃人都给拉飞派来了援军。所以说，尽管拉飞本人出身于统治阶级，而其暴动的动机又不明，但他发动的运动却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当时中亚各族人民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来反对阿拉伯统治者。

这时的呼罗珊总督阿利·伊本·伊萨奉哈里发拉什德之命来镇压，被拉飞打败。哈里发随后又派其亲信大将哈尔萨马（Harthama）攻打拉飞，也不能阻止起义的继续发展。拉飞占据了布哈拉，实际控制了整个河中地区。

拉什德见情况越来越严重，便率军亲征。他把首都巴格达交给自己的儿子阿明管理，自己亲率大军前往呼罗珊。但他在行军的路上患了重病，走到徒思（Tus）时死去，时为公元809年3月24日。

拉什德死以前去麦加朝觐时，曾经正式将阿拔斯朝的领土分给自己的继承者——阿明与马蒙。这两个儿子生于公元786~787年，但前者出身于阿拔斯朝的贵族，而后者则为波斯女奴所生。在名义上阿明继承了哈里发之位为宗主，马蒙则统治东部呼罗珊诸

省。马蒙在呼罗珊得到广泛的支持，组建了自己的军队，由著名的伊朗族将军塔希尔（Tahir）指挥。马蒙实力的发展，使其同阿明的关系紧张起来，终于导致双方在公元811年发生了战争。阿明屡被打败，其首府巴格达也被包围。最后，哈里发的军队完全失败，阿明本人被俘，在企图逃走时被杀。马蒙继之为哈里发（公元813~833年）。

河中的起义者拉飞在哈里发阿明时已遭到镇压，突厥人也于公元809年离去，哈尔萨马攻下了撒马儿罕。马蒙即位后拉飞被其收买，得到宽恕。但是，在马蒙统治时期各地的起义，仍然是起伏不断。如前述哈列哲派玉素甫的孙子满速儿·布·阿布达拉赫的起义，锡斯坦与八的吉思等地的一系列哈列哲派的运动等，直到马蒙去世，仍然未能镇压下去。东方各省的起义，使马蒙穷于应付，他被迫不得不于公元820年将呼罗珊的管治之权完全交给了塔希尔。于是阿姆河以外的中亚地区遂处在塔希尔的统治之下。

公元8世纪后半期到公元9世纪前期，是阿拉伯统治走向解体的时期，也是唐朝中衰趋于没落的时期。自公元751年高仙芝败绩于怛逻斯以后，不久就在公元755年发生了安史之乱。唐玄宗被迫迁蜀，肃宗即位于灵武。唐朝为了平乱，将驻扎在安西等地的军队调回内地；同时也征调了回纥兵、拔汗那兵、中亚其他各地柘羯军和阿拉伯兵帮助平乱。①

在这种情况下，唐朝西北边疆的防卫力量一时为之空虚。因此，吐蕃乘机攻陷其地。《资治通鉴》的作者总结当时的情况说：“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

①《旧唐书·段秀实传》云：“肃宗即位于灵武，征安西兵，节度使梁宰……乃出步骑五千，令（萧）嗣业统赴朔方，以（段）秀实为援。”又《旧唐书·回纥传》：“遣故邠王乘……使于回纥，以修好征兵。”又《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又发拔汗那兵，且使转谕城郭诸国，许以厚赏，使从安西兵入援。”又《旧唐书·西戎·大食传》：“用其国兵以收两都。”又《资治通鉴》卷二一九：“上闻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诸国兵至凉、鄯。”又《旧唐书·封常清传》：“常清使骁骑与柘羯逆战，杀贼数十万人。”

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供糗粮，设监牧，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乃安禄山反，边兵精锐者皆征发入援，谓之行营，所留兵单弱，胡虏稍蚕食之。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陷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唐朝同中亚的关系被隔断了。在这段时期里同中亚直接发生关系较多的是吐蕃和西域地方政权。

以上形势，从汉文记载的中亚各地使臣来唐朝朝贡的情况也可见到。[1]据《新唐书》、《旧唐书》和《册府元龟》的记载，历年来贡的国家有：公元752年：葛逻禄，归仁国，宁远国，康国。公元753年：罽宾国，谢飓国，归仁国，葛逻禄，火寻，宁远，安国，吐火罗，护密。公元754年：康国，火寻，曹国，宁远，米国，突骑施，吐火罗，石汗那，俱蜜，东曹，安国。公元755年：陀跋国，康国，石国，宁远，归仁。公元758年：护密，罽宾，乾陀罗，吐火罗，康国。公元759年：宁远，安国。

呾逻斯战役以后来唐朝朝贡较多的主要在公元759年以前，公元760年以后朝贡之事就较少了。这时，中国内地同西域的交通则要取道于外蒙的回纥地境。由此看来，唐朝势力退出中亚，并不只是由于呾逻斯之战，而是由于这里所说的一系列的原因。

阿拉伯和中亚各地当时出兵帮助唐朝平乱。他们同吐蕃的斗争看来也减轻了吐蕃对唐朝的压力。史称贞元中（786年），大食“与吐蕃为劲敌，蕃军太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力不足也”[2]唐朝名臣李泌甚至主张联合阿拉伯以制吐蕃。他在贞元三年（787年）给唐朝的建议说：“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马亦易致矣。……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

① 白寿彝先生对呾逻斯战役前后大食使臣来华的次数作了一个统计，见《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11期，第73~74页。

② 《旧唐书·大食国传》，《唐会要》卷一〇〇。



也。”但由于李泌在公元789年死去，唐朝未能实现联结大食的计划。以后，吐蕃于8世纪90年代攻陷北庭，与回鹘争战，日益衰弱的唐朝更无力过问中亚的事务。汉文史料关于西域的记载也更稀少了。

吐蕃虽与阿拉伯人发生接触和冲突，然而阿拉伯方面关于吐蕃情况的记载却很少。

第四节 阿拉伯统治时期中亚的经济与文化

后来被称为“突厥斯坦”的中亚地区，在公元9世纪以前，还是以操东伊朗语的雅利安人为其主要居民。虽然这个地区在此以前二百多年就已经受到突厥人的统治，但突厥人还没有大量来这里定居。从事游牧经济的突厥各部主要在锡尔河以北的草原地带。东面费尔干纳地区的鄂什与讹迹刊（Uzgand）曾经被认为是突厥边境的两个主要城镇。后者是同突厥人进行贸易的一个中心，从这里经过阿忒八失可以通往中国的碎叶。阿姆河流域最初为古代雅利安人所居住，不但为前述历史所证明，而且这条河的古雅利安名称——瓦赫舒河，也说明了这一点。它的被突厥化也是后来的事情。总的看，本书所涉及的地区，包括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在内，其地域是广阔的，人种是复杂的，民族是众多的，而经济上也是多样化的，既有绿洲农业地带，也有草原的游牧区，既有其独特的手工业，也有发达的商业贸易与城市经济，既有保存着氏族部落制度的突厥宗法封建制，也有以德赫干为特点的雅利安封建土地贵族制度。

中亚农业区主要是在绿洲地带，这些绿洲又往往以一个一个的城镇为中心。当地的小邦君、贵族、德赫干、地主、商人就住在城镇中。他们掌握着大量的土地，垄断水利，操纵商业贸易，役使其统治下的农民。各城邦间，互相为敌，战斗不止。有的城镇是很古

老的。如撒马儿罕,人们传说到阿拉伯人侵前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可能夸大)。传说中的额弗拉昔雅卜古城,就在该城的中央。在布哈拉的法拉赫沙村(Farakhshah),当阿拉伯人入侵之时,一所胡达特的旧宫殿,传说已有一千多年。布哈拉的胡达特布尼阿特曾将这个宫殿加以重建。前苏联考古工作者曾在法拉赫沙发掘出古城废址和大型壁画。这壁画大约是在公元6世纪重建该城时所绘,一直存留到阿拉伯人侵以后。法拉赫沙的壁画全属世俗性质,色彩鲜艳,是研究该地区前伊斯兰时期后期历史和文化的宝贵资料。

城镇为大地主、大贵族统治的中心。如巴里黑,曾为大夏的古都,被穆斯林誉为"城市之母"。该城附近有一佛寺,名瑙巴哈尔,其住持为伯尔麦克家族。这个家族拥有的地产,长达8法尔沙赫(farsakh),宽4法尔沙赫。[①]在布哈拉,胡达特(即统治者)占有大量的土地。布哈拉境内的瓦尔丹村,该村的胡达特也是一个大地主,他甚至与布哈拉的胡达特竞争。

撒马儿罕的灌溉工程早在阿拉伯人入侵以前就已经很发达。其地渠水纵横交错,以溉农田。阿拉伯占领者垄断渠水,向人民征收水税,用渠水两岸土地的收入作维修水渠之费用。这里的袄教徒和其他宗教的信仰者承担维修水渠的劳役以顶人头税。布哈拉的灌溉渠也修筑得很多,有些乡区甚至就以水渠的名称来命名。阿拉伯的呼罗珊总督阿沙德,为了切断撒马儿罕的水源,曾于公元736年在瓦拉格萨尔(Waraghsar)修一水坝拦阻水流。当时,阿拉伯的和本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垄断水利,而采取这种自阿赫门王朝时期就采取的办法是很普遍的。由于水利控制在地主贵族手中,农民不得不沦于对封建主的依附地位,固着在土地上,为封建主劳动。

① 法尔沙赫,为波斯的里程单位,冯承钧译为"程"。1法尔沙赫约合15里。



封建统治者都是居住在城镇的内层，即中心部分。在每个城镇的发展史上，这部分是建筑得最早的，阿拉伯人称之为“麦地那”，波斯人称之为“沙赫里斯坦”，也就是内城，或可称为本城。大部分城镇的内城是在阿拉伯人侵以前就有了的。内城可以说是封建庄园，它不但有封建主居住的城堡，而且有大片耕地。在布哈拉·胡达特住的城堡中，还有国库、粮食储藏室、手工作坊等。居住在城堡中的，除胡达特外，还有宫廷人员、官吏、警卫、仆役等。胡达特在这里发号施令，每日从其中出来受理政事。撒马儿罕的内城有东西南北四门，东门称为中国门，西门为瑙巴哈尔门或铁门，北门为布哈拉门或奥斯鲁沙纳门，南门为佉沙门。佉沙门为市场所在，也是居民集中居住的地区。巴里黑与撒马儿罕的内城，都有大清真寺。巴里黑内城中央的大清真寺据说建于公元8世纪中期，其周围都是集市，繁华富庶，收入很多。布哈拉的内城则有七个门，内城与城堡之间亦有清真寺。内城之城堡，阿拉伯语称为“卡拉”，而外城则称为“拉巴特”。

外城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而逐渐兴建起来的，它最初多半是一些供商队停驻的客栈（Caravan Sarai），外面修了围墙以防游牧人或盗匪的袭击。如撒马儿罕，其市场大部分都是在拉巴特。渴石亦如此。鄂什的拉巴特则建于山顶上，以为斥候。中国史料提到的白水胡城，是商人汇集之地。这里修建的拉巴特（商队客栈）达1700个，有的为会馆，如布哈拉人的会馆，撒马儿罕人的会馆，那色波人的会馆等，多是本地人为其同乡所建，或为商人所捐建。有的则为达官贵人捐款所建。多历年所，遂臻繁盛。

由于中亚地区扼中西商路，所以商人们在城镇中占有重要地位。布哈拉附近的沛肯城，是一个巨大的商业中心，被称为“商贾之城”。纳尔沙喜说沛肯城的居民全都是商人。这里的商人经营着同中国的丝绸贸易，也同里海沿岸诸城市进行海上贸易。《世界境域志》一书说，沛肯城之拉巴特达千个。在阿拉伯入侵之前，布哈

拉曾经有许多外地富商，被称为佉失·贵霜人（有人认为是贵霜人或哌哒人的后裔）。屈底波攻占该城后，他们将内城的房屋让给阿拉伯人，而自己则迁至城郊，建筑了700个堡坞以居。撒马儿罕，地当来自中国、印度、波斯、突厥各方面的商路会合之处，故世界各地的商人皆汇集于此。呾密，是骨咄与石汗那商业之中心。布哈拉的塔瓦维斯，也是商贸胜地。当地人很少从事农耕，而以做买卖为其收入的主要来源。每年秋天在这里要举行十天的集市，买卖各种商品。河中各地的商人，甚至费尔干纳与塔什干的商人也要来这里赶集。布哈拉有一个名叫哈桑的商人，所建筑的堡垒比国王的还好，所占有的土地每月收入达1.2万迪纳尔。这说明商人经济实力之大。

公元751年呾逻斯战败以后被俘而流落于中亚的杜环，曾经对其所经历的地方有所记述。如楚河、塔拉斯河流域，据称：其地“城堡间杂，日寻干戈。凡是农人，皆擐胄甲，专相掳掠，以为奴婢”。从塔拉斯一直到西海（里海）的中亚广大地区，都是“自三月至九月，天无云雨，皆以雪水种田，宜大麦、小麦、稻禾、豌豆、毕豆”。石国（塔什干）地区，则“土地平敞，多果实，出好犬良马”。费尔干纳地区，“土宜葡萄，馣罗果，香枣，桃，李”。其风俗“尽居土室，衣羊皮叠布，男子妇人皆着靴，妇人不饰铅粉，以青黛涂眼而已”，与现在相似。他还谈到末禄①说：“大食东道使（即呼罗珊总督）镇于此。”其地“村栅连接，树木交映。四面合匝，总是流沙。南有大河（指木尔加布河），流入其境，分渠百数，灌溉一州。其土沃饶，其人洁净”。其城镇的建设“墙宇高厚，市廛平正，木既雕刻，土亦绘画”。其土产“有细软叠布，羔羊皮裘，估其上者，值银钱数百”。当地出产水果，“有红桃白柰遏白黄李”。蔬菜有“蔓

① 按：末禄见《新唐书·西域传》、《旧唐书·西域传》及《太平寰宇记》。《杜环经行记》王国维校录本作朱禄，非是。末禄，即木鹿、马鲁之异译，今作马雷，中世纪作谋夫（Merv）。



青、萝卜、长葱（即大葱）、颗葱（即圆葱）、芸苔、胡芹、葛蓝、军达、茴香、英薤、瓠芦。尤多葡萄”。又有“黄牛、野马、水鸭、石鸡”。谋夫地区的居民，为“波斯、大食参杂”，当时已信仰伊斯兰教，故其风俗习惯亦受宗教的影响。

从中亚各地的物产，一般也可以看到其手工业生产的情况。根据《世界境域志》一书的叙述，可以把中亚各地的手工业生产分为如下几类：纺织业方面，生产棉布的地方有呼罗珊、你沙不儿、赫拉特、谋夫、花剌子模。生产丝织物的有你沙不儿、谋夫。生产毛织品的有布哈拉（出好毛毯）、石汗那。制毡的地方有花剌子模、白水胡城、塔里寒、胡实健。制革，有安巴尔，其地生产的胡实健皮，输往外地。造纸，主要在撒马儿罕。酿酒，有悉没言、塔里寒、苏对沙那。做醋，有谋夫。做葡萄干和葡萄浆，有赫拉特。制马具，有胡实健，如制鞍囊、肚带。制弓箭，有塔什干。开矿冶炼，中亚各地有金、银、铁、铅、绿松石、铜、锑、硝石、盐等矿，到这个时期不但已经学会开采，而且会冶炼了。如苏对沙那就出铁，渴石产盐，布哈拉出硝石，巴达赫善出金银，徒思出绿松石、铜、铅、锑等。其他的手工业还有呼罗珊制药，渴石出吗哪，愉漫、石汗那生产颜料，咀密生产肥皂、席子、扇子，花剌子模生产坐垫、衣服，徒思生产袜子、裤带等等。当然，该书所列举的这些地方，仅仅是比较有名的。酿酒、制毡、制革、纺织等手工业，在中亚各地普遍得到发展的，并不限于上面列举的地方。当地人民生产的这些方面的产品，既满足了自己的需要，也输往外地，进行贸易。

中亚各地商人同德赫干土地贵族的利益是紧密结合的，在政治上也是互相依靠的。商人们贸易的主要对象当然是中国内地，贩运的货物以丝绸为主。从前述撒马儿罕的东门叫做“中国门”的事实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塔巴里曾经讲到一个史实，说在回历一〇三年（721~722年）时，有400个粟特商人从中国贩运了大量货物回来，刚好遇到阿拉伯总督赛伊德入侵撒马儿罕。他们就同

该城的贵族一起离开，迁往费尔干纳，以示抗议。[1]作者又讲到，阿布·穆悉林手下大将阿布·达乌德在公元752年攻下渴石时虏获的战利品中，有大量中国制造的器皿以及马鞍，皆镂金镶银，还有各种各样的丝绸织物，五光十色，皆见所未见，令人惊叹不已。由此可见，当时中亚同唐朝贸易规模之大，以及中国的奢侈品对当地统治阶级生活的影响。

中亚商人除主要同中国进行贸易外，也同突厥、吐蕃、印度、西亚以及欧洲各地贸易。他们将粮食、布匹等物交换游牧地区的牲畜、皮毛。特别是，还把突厥人买来做奴隶，贩运到伊朗、西亚与北非各地去。与突厥交界处的费尔干纳的鄂什等地乃是奴隶交易的中心。巴达赫善为商人汇集之地，除了从那里贩运丝绸之外，也从那里输入吐蕃的毛驴。按照伊斯兰的法律，把异教徒贩运来做奴隶是合理合法的。然而这种突厥奴，有的后来服务于宫廷，得哈里发之宠信，以至于跻身高位，掌握政权。

从前面讲到的关于城市的情况中，还可以看到地方性的集市贸易也是很繁荣的。城镇中的集市称为“巴扎”，农民、手工业者和商贩们，都带着自己的商品到巴扎上来交易。据纳尔沙喜的叙述，布哈拉就专门有市场门、集市门。内城城墙附近有“食料杂货店”、“丝织服装商场”等。伊斯塔赫里曾经说，巴扎在古时是在内城的城门边。而巴扎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指城门边的事情。在中世纪初期，手工业者也是住在内城的墙下从事生产。当时城乡的分化是不明显的，这是早期封建社会的特点。

为满足地区交易和征税的需要，中亚的地方统治者也发行货币。如布哈拉的胡达特曾铸造纯银的迪勒木（dirham），其上有胡达特的带王冠的头像。这种银币在哈里发艾卜·伯克尔（632~634年）时期发行，到公元9世纪末就被花剌子模钱币所排挤，不再使

[1] 此事件在本卷前面已经讲过了。



用。在这种银币之前的五六世纪时，还有仿照萨珊银币铸造的粟特币。布哈拉·胡达特的钱币就是仿照那种粟特币铸造的。花剌子模币，正面铸国王像（无须），反面为点着圣火的祭坛。有的上面铸一向右走的骆驼，正面有文字。除以上两种类型的本地铸币外，还有阿拉伯统治者铸造的钱币，用以纳税。这主要有三种：穆罕默德币，史料中提到过的呼罗珊总督中不见有此人，他可能是呼罗珊总督派到河中去的地方官。这种钱币主要通用于苏对沙那、费尔干纳、怯沙（渴石）、那色波等地。穆色雅布币，是在穆色雅布·布·祖赫尔任总督时（780~783年）铸造的，主要通用于塔什干、忽毡及诸突厥城镇。吉特里夫币，吉特里夫·布·阿塔（792~793年）是哈里发拉什德时的呼罗珊总督。据说他是应布哈拉人的请求而铸造这种钱币的。当时布哈拉人因布哈拉·胡达特币被花剌子模币所排挤而不满。吉特里夫币系用金、银、铅、锡、铁、铜6种金属的合金铸造，其式样与布哈拉胡达特币同，但有吉特里夫的名字。这种钱币主要通用于布哈拉。以上三种钱币都是既铸了像，又有文字。吉特里夫币由于成色低，布哈拉人拒绝接受，因此便规定它对布哈拉·胡达特银币的比值为六比一。当时，布哈拉及其周围地区对阿拉伯当局应纳之税略少于20万银迪勒木，故规定应交1168567吉特里夫迪勒木。可是，不久吉特里夫币价格上涨，以至于与银币相等，而应交之吉特里夫迪勒木数不变。故布哈拉人实际上缴纳之税额，等于以前的6倍。在这以后，吉特里夫币继续增值，布哈拉人民受到阿拉伯人越来越重的压榨与剥削。从这个事例，也可以看到在阿拉伯统治时期人民反抗一直持续不断的深刻根源。

在古代和中世纪，文化总是同宗教密切相关的。中亚地区，过去同萨珊朝的波斯有过紧密的联系，所以波斯的祆教、摩尼教以及从波斯东传的景教，在中亚都有信徒，而尤以祆教为最普遍。从印度传来的佛教，也在中亚得到发展。从近代考古发现的许多用

粟特文字书写的这几种宗教的文书可以看到这一点。《杜环经行记》曾经讲康国有祆祠。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说到安、曹、史、石、米、康:"此六国总事火祆,不识佛法。"阿姆河上游的瓦罕、什格南等地,甚至到公元10世纪时还不信仰伊斯兰教。大夏古都巴里黑曾经佛教盛行,伊斯兰作者伊本·阿勒·法基赫曾说,其地瑙巴哈尔寺之僧徒与中国皇帝及喀布尔沙信奉同一宗教,各地的朝拜者纷纷来此向该寺的大佛像顶礼膜拜(此寺后为阿拉伯人所毁)。距布哈拉45公里的塔瓦维斯村,以前既有佛寺,也有祆教寺院。布哈拉有一个西雅武什墓,是祆教徒崇拜的古迹。在每年的纳乌鲁兹节,祆教徒在太阳出来以前就来到那里,宰一只公鸡作为牺牲贡献。这里的市场上还有佛像出卖,其交易之价值达数万迪勒木。而求神问佛之俗,亦颇盛行。前面提到过的布哈拉商人——佉失·贵霜人,多信祆教,他们所居之处都建有祆祠。著名的拉姆坦城也有祆祠和佛寺。总之,在伊斯兰侵入以前当地有多种宗教并存。

据文献史料的记载,阿拉伯人在进攻中亚的过程中,曾拆毁当地的祆教祠庙,毁坏佛教(穆斯林称之为偶像崇拜)寺院,破坏佛寺中的佛像和壁画,焚毁佛教经典。可见阿拉伯灭波斯和入侵中亚,对那里的各种宗教给予了沉重的打击。

阿拉伯人在其入侵中亚的初期,为了增加税收,掠夺财富,并没有要求人们改信伊斯兰教,只是到了屈底波时代以后,才开始强迫人们信奉伊斯兰教。但用暴力强迫人们改教的手段可能收效不大,只是阿拉伯人约许可以免税时才有大量的人改教。波斯人和中亚的东伊朗语民族,或是为了免缴人头税和土地税等歧视性的捐税,或是为了获得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或是为了享受到更多的自由和安全等等,就普遍地放弃自己原来的宗教而改信伊斯兰教。直到阿拔斯王朝建立100多年以后(即公元9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在波斯和中亚才得到传播。



然而，也有一些祆教、摩尼教、佛教或景教的信徒不愿受伊斯兰教的压迫而东逃，使这几种宗教进一步向中国内地传播。史料记载，开元七年（719年），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赊给唐朝献懂天文知识的僧人大慕阇（即摩尼）。以后，到宝应、广德年间（762~763年），摩尼教又传人回纥。在外蒙古喀喇巴尔噶逊发现的《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中就讲到，摩尼教僧人随当时支援唐朝平安史之乱的回纥可汗去回纥地区传教的历史事实。这正是公元8世纪中期的事。当时阿拉伯人已在中亚强制推行伊斯兰教了。

阿拉伯的征服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对于以前中亚的文化肯定有所打击。11世纪时的作者比鲁尼曾说，阿拉伯的征服者们，特别是屈底波，曾在波斯、索格底亚那、花剌子模等地把那里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书籍通通消灭了。巴尔托里德认为此事不大可能，但阿拉伯人对异教文化的敌视和破坏是不能否定的。中亚地区以前肯定是有粟特文的文献的，也肯定遭到阿拉伯人的破坏。阿拉伯人常将原有的祆祠和佛寺改建成清真寺，对于佛像、壁画予以破坏，佛经、文物往往付之一炬。所以，这类文物更多地是在中国的新疆、敦煌等地有所发现，而在中亚则所见甚稀。

伊斯兰教传播的同时，也是阿拉伯语言、文字的传播。这种语言、文字的被接受，是由阿拉伯人在政治上的统治所促成的。首先，在从阿拉伯人征服中亚到公元9世纪中叶本地民族建立自己的伊斯兰王朝之间的200年当中，阿拉伯文一直是官方通用的语言，也是一切散文文献所使用的语言。在阿拉伯人统治之下，国家在发布政府公文、收税、进行一切学术文化活动等方面，也无不使用阿拉伯文。再者，阿拉伯语也是伊斯兰教的语言，无论传教、诵读古兰经、礼拜、教长讲道和各种宗教活动，都是用阿拉伯语，人们如不懂阿文，就很难适应统治者的要求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需要。而对于知识界来说，如不懂阿文，不但不能担任政府官职，也



穆格山发掘的古代盾牌绘有骑士像（公元7世纪）

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又由于阿拉伯文是穆斯林世界通用的语言，学者如不用这种语文进行创作，则他们的作品就很难在穆斯林世界得到传播，从而提高他们在学术文化界的地位，故伊朗和中亚早期的穆斯林学者普遍地只用阿拉伯文进行写作。这样一来，在知识界学习和掌握阿拉伯文的人也就越来越多。而知识界掌握和使用阿拉伯文，对广大群众学习阿拉伯文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由于这种种影响，在伊斯兰教以前通用于中亚各地的文字，就逐渐地被阿拉伯文所代替。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波斯语或突厥语，都开始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以后，即使在波斯文化复兴的时期，也未能排除这种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文字。可见其影响之深。

当然，在阿拉伯统治者推行阿拉伯语的过程中，被征服民族也进行了最大的反抗。他们甚至宁愿放弃政治上和宗教上的信仰，也不愿放弃本族的语言。[①]因而，在被阿拉伯征服地区，阿拉伯语的普及只在城市、知识界和民族的上层中较为成功。在中亚，尽管有许多人会说阿拉伯语，但在乡村中会说阿拉伯语的人很少。

① 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第424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相继统治中亚的阿拉伯倭马亚朝与阿拔斯朝，对待被征服地区文化的态度是不同的。倭马亚朝作为阿拉伯民族的代表，并不尊重古老而优越的波斯文化。阿拉伯统治下文化的发达，实际上是在阿拔斯朝的时期。而那时的所谓阿拉伯文化，也并不完全是阿拉伯的。阿拔斯朝既继承了波斯的文化传统，也重视翻译，以吸收希腊、罗马和印度的文化、科学成就。当时，中亚地区已经受到阿拉伯的入侵达100年之久，波斯、中亚等地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掌握了阿拉伯语文。从哈里发马蒙时期开始把希腊的哲学、法学、医学、物理学、地理学等方面的著作以及印度的天文学、医学著作大量译成阿拉伯文。这些先进的文化典籍被翻译过来，对于以后阿拉伯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吸收上述各种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一种新的伊斯兰文化。在这种新文化中，阿拉伯原来的文化因素已不占优势。

也就是从这个时期起，有了关于中亚历史、地理的阿拉伯文著作。阿拔斯朝教育之普及，导致一切领域的著作大量发展，以致于到公元10世纪末就出现了目录学著作Fihrist al-Ulum（意为《诸学科目录》）。在这本书中提到的阿勒·马代尼（死于830年），伊本·伊斯哈克（死于767年），阿布·乌拜达（死于822年），呼罗珊总督阿里·布·伊萨（796~807年）的秘书哈夫斯·布·满速儿·马卫集等人，都是比较重要的早期阿拉伯文作者。可惜的是他们的著作多已失传，其内容仅见于后来作者的引述。至于塔巴里等著名历史学家，则属于这以后的时期。

中亚地区同唐朝的关系是密切的，在文化上当然也互相影响。这种情况，首先是由于中亚之曾经隶属于中国所促成的。这一历史事实在伊斯兰著作中也有反映。公元10世纪的阿拉伯作者伊斯塔赫里就认为，“马维阑纳尔”（意为阿姆河以外的地区）曾经是属于中国人的。巴尔托里德指出，粟特人不但受到西亚文化的影响，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他说：“同中国人的接近，无疑地促

进了本地工商业的发展。”[①]前面讲到的造纸法的传入中亚，就是一个例子。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文中详细考证了中亚各地人入居长安，以及他们将中亚宗教、文化、艺术等带到汉族地区的情况。从这些事实，我们也可以想见当时中亚地区文化的一些状况。如当时的音乐、舞蹈、绘画、饮食、服饰等，都与现在中亚各族相似。中亚的音乐家如康昆仑、曹保、曹善才、曹纲，俱以琵琶名手，知名当世。舞蹈有康国（撒马儿罕）的胡旋舞，石国（塔什干）的柘支舞、胡腾舞。此外，波斯的波罗球，康国的泼胡乞寒之戏以及苏莫遮调，均风靡一时。而当时之所谓胡饼、饆饠，更与现今的馕与抓饭相似。只要读一读中国古代诗文对这些的描写，当时中亚各族人民的生活、情趣，就生动地映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由于伊斯兰教的传入，中亚各族人民的文化、艺术等受其影响而有所改变，但中亚各族人民能歌善舞的天才并没有因为信仰伊斯兰教而丧失。伊斯兰教并不提倡音乐、舞蹈。《杜环经行记》在讲到大食时就说其“断饮酒，禁音乐”。这与中亚各族人民的性格显然不同。直到现在，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仍然以爱好歌舞著称。这说明任何一种宗教，一种思想理论，不但不能完全改变一个民族的特性，反而必须适合这个民族的需要，否则是不能生根和成长的。中亚地区的文化，自古以来就有着它的特点，在世界文化中占据着应有的地位。

中亚地区，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文化上，都是同中国有着密切联系，它们之间的互相交流是亘古不断的。这种交流对于促进各自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3卷，第107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大事年表

○ 旧石器时期　　捷希克·塔什人。

○ 旧石器时代晚期　　土库曼西南和塔吉克的中、南部以及撒马儿罕与乞尔乞克河谷发现母系氏族人类活动遗迹。鄂毕河与叶尼塞河上游、贝加尔湖周围、克拉斯雅尔斯克附近阿凡托瓦山的遗址，布赫塔尔马河河口不远，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猎人临时居住的山洞。额尔齐斯河上游发现人类居住遗址。

○ 公元前七千纪末到前六千纪　　南土库曼哲通农业文化克尔特米纳尔文化。

○ 公元前六千纪到前四千纪　　塔吉克斯坦西部喜萨尔的牲畜家养文化。

○ 公元前五千纪到前四千纪　　哈萨克斯坦北部发现羊骨（山羊或绵羊）。

○ 公元前四千纪中石器时代　　纳马兹嘎1~2。

○ 公元前四千纪到前三千纪铜石并用时代　　阿什哈巴德附近安诺的农业文化——北丘文化（包括安诺1与安诺2）。

○ 公元前三千纪　　纳马兹嘎3~4。

○ 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和前二千纪　　南丘的安诺3则属于青铜时代。

○ 公元前2500年　　印欧人（雅利安人）处于石器时代。

○ 公元前三千纪末到前二千纪初　　阿凡纳美沃的铜石并



用文化。

○ 公元前2000年左右　　雅利安人游牧于里海以东的大草原上。

○ 公元前二千纪前半期到前800年之间（青铜时代）　　中亚开始驯养马，仍为原始社会时代。

○ 公元前1800年前后　　雅利安人瓦解，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向东南游动，最后到达印度。另一部分则向西方和西南方迁移，进入肥沃的新月形地带边沿的山区，这部分印欧人被称为伊朗人，即雅利安人的变音。

○ 公元前二千纪前半期　　纳马兹嘎5。

○ 公元前二千纪中叶　　安德罗诺沃文化，属青铜时代的早期和中期。

○ 公元前二千纪后半期　　纳马兹嘎6。细石器的畜牧文化。

○ 公元前二千纪中期到前一千纪初　　铜器和石器（细石器）并用的塔扎巴格雅布文化苏雅尔干农业文化。

○ 公元前二千纪末和前一千纪初　　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最后阶段，过渡到游牧经济。

○ 公元前1766~前1112年（商殷时代）　　有人从中国北部迁到叶尼塞河流域。

○ 公元前1200年（青铜时代晚期）　　南俄草原钦麦尔人。

○ 公元前1200~前700年（青铜时代的末期，时间约为中国的商周时期）　　卡拉苏克文化。

○ 青铜时代后期（或早期铁器时代）　　阿密拉巴德农业文化。

○ 公元前11~前8世纪间　　阿拉米亚人据有叙利亚北部，并夺得两河流域之地。

○ 公元前9~前8世纪　　一些斯基泰部落与奇姆美利亚人游牧于黑海以北的草原上。



○ 公元前8世纪~前7世纪间　钦麦尔人在斯基泰人的驱逐下来到高加索以南的乌尔米亚湖地区。亚述国王萨尔恭二世（前722~前705年）。

○ 公元前825年（或前824年）　秦兴。秦仲伐西戎。

○ 公元前778年　秦人又伐西戎。

○ 公元前770年　秦襄公为诸侯。

○ 公元前753年　秦败戎师于岐。

○ 公元前7世纪以前　波斯人处在亚述强国的统治下。

○ 公元前673年　亚述国王阿萨尔哈东进军到里海南部地区，势力达到伊朗东部的柏尔提亚。

○ 公元前625年　钦麦尔人、米底人、斯基泰人开始进入西亚。

○ 公元前612年　斯基泰人会同其他游牧民族（米底人和迦勒底人）联合攻陷尼尼微，亚述亡，米底强国代之而起。

○ 公元前7世纪后半期　秦穆公（前659~前621年）进攻西戎。

○ 公元前1000年初期到前1世纪　塔加尔文化铁器时代。

○ 公元前7世纪　花剌子模农业文化。琐罗亚斯特建立袄教。

○ 公元前7~前5世纪　戈尔诺—阿尔泰地区的迈埃米尔文化。

○ 公元前7世纪末~前3世纪　斯基泰人占据黑海以北的南俄草原（东起顿河西至多瑙河）。

○ 公元前7~前5世纪　阿尔泰文化的迈埃米尔时期。

○ 公元前6~4世纪　阿赫门王朝统治波斯。

○ 公元前5~前4世纪　图雅赫塔文化。相当于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沿岸的撒乌罗玛泰伊文化时期，又有新的部落迁入阿尔泰地区。

○ 公元前558年　　居鲁士即位。

○ 公元前550年　　灭米底居鲁士称波斯王。

○ 公元前546年　　波斯军与吕底亚军会于撒尔迪斯之前。吕底亚败，溃入城内。波斯军围城十日陷之，吕底亚亡。随后，波斯人又征服爱琴海东岸的希腊城邦。

○ 公元前545~前539年　　居鲁士攻下巴克特里亚，导致了玛尔吉亚那与索格底亚那的降服。居鲁士的势力达到了锡尔河，建立居鲁士城等据点以控制交通要道，作为进攻游牧人的基地。

○ 公元前538年　　波斯占领巴比伦的大部分。

○ 公元前529年　　居鲁士战死，其长子冈比西即位。

○ 公元前527年　　冈比西出征埃及，在阿拉伯游牧人的支援下迅速征服了整个尼罗河流域，但于公元前522年在回师途中死去。

○ 公元前522年秋　　大流士谋杀高墨塔，夺得波斯王位。

○ 公元前522年秋~前520年之间　　大流士平定各地叛乱。

○ 公元前518年　　大流士一世远征玛撒该塔伊人，失败。

○ 公元前516年或前513年　　大流士进攻南俄的斯基泰人。

○ 公元前512年　　大流士一世征服了印度旁遮普的大片地方，将其划为一个郡。

○ 公元前6~前5世纪　　印度列国混战时期。悉达多（前560~前480年）创立佛教。

○ 公元前5~前3世纪　　巴泽雷克时期。

○ 公元前492年　　夏，大流士一世进攻希腊，希波战争开始。

○ 公元前337年　　科林斯会议不久，亚力山大进攻波斯帝国。

○ 公元前331年　　亚历山大出埃及。同年9月与波斯军决

战于高加米拉，彻底打败了由大流士三世统帅的波斯大军。

○ 公元前330年　7月，大流士在逃跑中被比苏斯所杀，阿赫门王朝灭亡。同年冬，亚力山大东征伊朗与中亚，先取希尔克尼亚，继下阿列亚，南取德兰吉亚那。

○ 公元前329年　年初，亚力山大开始进攻巴克特里亚。夏，攻克玛拉坎达（撒马儿罕）。

○ 公元前328~前327年　亚力山大镇压了斯皮达马的起义，留在脑塔卡过冬。

○ 公元前326年　2月，亚力山大军进攻印度。

○ 公元前324年　亚历山大回到波斯之苏萨城。

○ 公元前323年　6月13日，亚历山大在尼布甲尼撒皇帝的故宫死去，年仅32岁。

○ 公元前320年　月护推翻了难陀王朝，在华氏城自立为王，创立孔雀王朝。

○ 公元前312~前250年　塞琉古王朝统治中亚时期。

○ 公元前305~前304年　月护打败塞琉古王朝，双方缔结和约。

○ 公元前3世纪　花剌子模附近的科依·克雷尔干·卡拉（意为死羊城）的陶罐上的铭文起源于阿拉米亚文。

○ 公元前297年　月护大王死，其子宾头沙罗继立（前297~前273年）。

○ 公元前293年　安提俄克统治东伊朗。

○ 公元前280年　塞琉古被属下官员所杀，安提俄克即位，是为安提俄克一世（前280~前260年）。

○ 公元前273~前232年　印度阿育王在位。

○ 公元前260年　安提俄克二世即位，在位15年（前261年~前246年）。

○ 公元前2~1世纪　阿尔泰文化的希伯时期。阿尔泰的游



牧部落过渡到了早期铁器时代，同时青铜器仍继续使用。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时期。

○ 公元前253年　阿育王召集佛教僧侣在华氏城举行第三次“结集”。

○ 公元前250年　巴克特里亚太守狄奥多托斯宣布独立，脱离塞琉古王朝；同时，帕尔提亚与希尔克尼亚的太守安德拉戈拉斯也宣布脱离塞琉古王朝而独立。

○ 公元前250~前135年　秦始皇称帝前五年至汉武帝建元六年。巴克特里亚国享国近一个半世纪之久。

○ 公元前248年（或247年）　分布于今土库曼斯坦南部属于萨喀种族的达赫人（中国史料中译为“大益”），在其首领阿尔撒西斯的率领下侵入帕尔提亚。

○ 公元前248~前224年　安息王朝。

○ 公元前247年　安息国王提里塔特称王。塞琉古王朝出兵镇压安息，安息王提里塔特与巴克特里亚的狄多托斯二世合力抵抗塞琉古王朝。塞琉古王朝军队退去。安息兼并了希尔克尼亚。

○ 公元前245年　巴克特里亚希腊王狄奥多托斯死去，狄奥多托斯二世（前245~前230年）即位。

○ 公元前230年（即阿育王死后二年）　巴克特里亚发生政变。狄奥多托斯二世被索格底亚那总督攸提德谟斯（前230~前187年）所杀（攸提德谟斯为塞琉古二世寡后之女婿）。安提马库斯被宣布为继承人即位为王，但不久被攸提德谟斯所杀。巴克特里亚王攸提德谟斯篡立时，喀布尔地区的统治者为苏布哈伽色纳。

○ 公元前230~前190年　攸提德谟斯在位。

○ 公元前225年左右　巴克特里亚攸提德谟斯王朝开始。

○ 公元前214年　阿尔塔班努斯一世继提里塔特一世为安息王。



○ 公元前209年　匈奴冒顿杀父自立为单于。塞琉古王朝的安提俄克三世出兵进攻巴克特里亚。

○ 公元前206年　安提俄克三世与巴克特里亚议和结盟。

○ 公元前206年以后数年　攸提德谟斯东征，占据了费尔干纳等地。

○ 公元前190年　攸提德谟斯的统治结束，其子德米特里即位（前190~前160年）。是年，巴克特里亚同塞琉古王国开战，大败安提俄克三世。

○ 公元前176年左右　匈奴完全击破月氏。

○ 公元前174年　攸克拉提德斯宣布自己为巴克特里亚的国王。

○ 公元前174~前161年　匈奴王稽粥，号为老上单于。老上单于杀月氏王，月氏灭亡。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德米特里在位的时期。

○ 公元前174~前160年　大月氏西迁伊犁，即匈奴老上单于在位的时期。

○ 公元前161~前160年　大月氏被从伊犁河流域驱逐出来。

○ 公元前160 年　德米特里被杀或被废。

○ 公元前141年和前128年之间　巴克特里亚的最后一个希腊王赫里奥克里斯亡于一次游牧人的入侵。征服巴克特里亚的是四个部落：亚细部、帕西安部、吐火罗部与萨喀劳卡伊部。

○ 公元前141年和前128年之间（或公元前135年，或公元前128年）　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灭亡。

○ 公元前138年（即月氏征服巴克特里亚前三年）　汉朝汉中人张骞出使匈奴，被拘留。张骞滞留匈奴达十多年之久。

○ 公元前135年　受到月氏人逼迫的巴克特里亚希腊王赫里奥克里斯及其家族，因不愿接受野蛮的游牧人的统治，撤出

巴克特里亚，退到兴都库什山以南，以喀布尔地区作为自己的统治中心。安息趁机夺回去一部分巴克特里亚的领土。同年，月氏人灭掉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王国。

○ 公元前134年（即大月氏灭大夏之次年）　汉武帝对匈奴开展大规模反击。

○ 公元前130~前100年　赫里奥克里斯的继承人安提阿勒西达斯。

○ 公元前119年　汉朝中郎将张骞出使乌孙，派遣副使去安息。安息也派了使者随同来汉朝观光，并且以大鸟卵和犁轩善眩人献于汉朝。

○ 公元前115~前90年（或前155~前130年，前165~前130年）弥兰在位。

○ 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　汉朝派李广利两次伐大宛，共用了四年时间。

○ 公元前102年（太初三年）　汉朝通西域。

○ 公元前2世纪以前　于阗立国。公元前2世纪以后，佛教从迦湿弥罗传入新疆的龟兹、于阗、疏勒地区。

○ 公元前2世纪末至前1世纪初年　大月氏人之始信佛教。

○ 公元前99年　汉朝苏武等出使匈奴。

○ 公元前90年　汉朝派李广利等出击匈奴。李广利降。安息王朝的首都迁到幼发拉底河上的泰西封。

○ 公元前87年　汉武帝去世。匈奴逐渐衰落。

○ 公元前74年（汉昭帝末年）　匈奴进攻乌孙，占据车延、恶师。乌孙向汉朝求救。

○ 公元前71年　汉朝派五将军，率骑兵十余万出击匈奴。

○ 公元前68年　匈奴又发生饥荒，人口、牲畜死去十分之六七。壶衍单于死，弟左贤王虚闾权渠立为单于。

○ 公元前63年起　丁零连续三年抢掠匈奴，匈奴遂一蹶不振。

○ 公元前60年　匈奴虚闾权渠单于死，握衍单于继立。日逐王率部降汉朝，西域骑都尉郑吉受其降。汉朝在西域设都护，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

○ 公元前1世纪中叶　安息人Vonones在德兰吉亚那（今锡斯坦）、阿拉霍西亚（今坎大哈）独立称王。

○ 公元前1世纪后期（大月氏人征服大夏的初期）　五部翎侯统治早期。

○ 公元前58年　乌桓进攻匈奴东边的姑夕王。

○ 公元前58~前56年　屠耆单于。

○ 公元前58~前31年　呼韩邪单于稽侯 　。

○ 公元前57年　乌揭单于。

○ 公元前57年　乌藉单于。

○ 公元前57~前56年　车犁单于。

○ 公元前56~前54年　闰振单于左贤王呼屠吾斯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

○ 公元前36年　讨伐郅支单于。

○ 公元前2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　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 公元1世纪的前期　五部翎侯统治末。

○ 公元20~30年　贵霜国王丘就却在位，他统一诸翎侯，约在公元24~25年间。

○ 公元1世纪前半期　安息内乱频仍，叛变不断。戈塔尔兹与瓦尔丹尼斯一世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双方都求助于大月氏。

○ 公元44年　安息王朝仍然统治着呾叉始罗。

○ 公元48年　冬，比自立为南单于（48~56年），匈奴从此分裂为南、北两部。



○ 公元1世纪前半期　中原发生王莽篡汉，匈奴及西域各地发生反叛。

○ 公元1世纪50~60年代　丘就却活动的年代。

○ 公元52年　北匈奴率领西域诸国“胡客”一起来汉朝要求和亲。呾叉始罗才大夏被征服。

○ 公元64~78年　自称为“伟大救世主”的权臣把持贵霜国政。

○ 公元73年　2月，东汉分四道进击北匈奴，其中窦固部的假司马班超平定天山南道，东汉重新统一西域。

○ 公元74年　班超又平定北道，重新派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

○ 公元75年左右　丘就却活到80多岁去世。

○ 公元1世纪后期　贵霜的势力和统治范围已及于原巴克特里亚帝国的全境。

○ 公元78年　班超在平定姑墨、石城的战争中有康居的军队参加。

○ 公元84年　疏勒王忠反叛，班超前去镇压，康居派兵来援救疏勒王。班超请贵霜王劝说康居王退兵。康居王不但退兵，而且把疏勒王忠逮捕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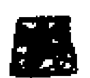
○ 公元87年　西域长史班超击破莎车。贵霜国遣使者向东汉贡献扶拔、狮子。鲜卑入左地击北匈奴，北庭大乱。北匈奴基本上被打垮。

○ 公元90年　贵霜派其副王谢率兵七万进攻班超。

○ 公元91年2月　窦宪遣耿夔与任尚率军出居延塞，大破之北匈奴。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其地为鲜卑所占据，留下来的匈奴人达十余万落，都自称为鲜卑。

○ 公元97年　班超派遣其属员甘英出使于大秦。

○ 公元98~138年　阎膏珍在位的时间约相当于罗马皇帝



图拉真与哈德连时期（98~138年）。

○ 公元114~120年（安帝元初年间） 疏勒王安国之舅臣磐，因为有罪被送到月氏（即贵霜国）去当质子。

○ 公元2世纪中期 北匈奴被鲜卑所灭。

○ 公元128~151年 迦腻色迦在位。佛教兴盛时期。

○ 公元130年 疏勒王向东汉送质子，与大宛、莎车王一起来贡献。

○ 公元132年 敦煌太守徐由还派臣磐率领疏勒兵去攻打于阗。

○ 公元172年 胡韦斯迦在位。

○ 公元3世纪初 中国纸已传入伊拉克。此时，造纸法西传。

○ 公元3世纪以后 贵霜帝国逐渐衰落。

○ 公元3世纪 花剌子模的居民大部分信仰祆教。贵霜国开始衰落，沦于波斯萨珊王朝的控制之下。

○ 公元215年或216年 摩尼生。

○ 公元224年 阿尔达希尔在阿瓦士东面的霍尔木兹平原上打败安息，安息王阵亡。

○ 公元226年 阿尔达希尔夺得安息的首府泰西封，建立萨珊王朝。

○ 公元229年（太和三年十二月癸卯） “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氏王”。此王即韦苏特婆（希腊文作Bazaho），他是迦腻色迦王系中最后一位贵霜王。

○ 公元4世纪末 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

○ 公元226~240年 萨珊帝国创建者阿尔达希尔一世在位。亚美尼亚王霍斯洛一世组织反萨珊王朝同盟，贵霜王参加这个同盟。

○ 公元240年 阿尔达希尔去世，亚美尼亚的哈特拉地区



反叛。沙普尔一世即位后西征平叛。

○ 公元241年　摩尼创教，被允许在波斯王沙普尔一世的加冕典礼上宣布其宗教。波斯王沙普尔一世率军侵入罗马所属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攻陷安条克城，挑起了第一次萨珊—罗马战争。

○ 公元241~242年　沙普尔一世出兵击垮贵霜，巴格兰被毁。

○ 公元253~254年　沙普尔一世侵占叙利亚。

○ 公元275~276年（晋武帝咸宁元年和二年）　鲜卑进攻西域戊己校尉被讨平。

○ 公元310~370年　萨珊王朝沙普尔二世在位。

○ 公元4世纪前半期　印度笈多王朝。

○ 公元4世纪后半期　贵霜复兴，称为寄多罗，延续至5世纪中期，为嚈哒所灭。

○ 公元330年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拜占廷建都。

○ 公元350年（萨珊王朝初年）　《阿维斯塔》编撰成书。

○ 公元357~367年　嚈哒灭粟特，征服索格底亚那。

○ 公元369年　萨珊王朝取得对巴克特里亚的胜利。

○ 公元374年（或375年）　贵霜与嚈哒合作打败了沙普尔二世。

○ 公元399年　法显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去西域求经。

○ 公元402年　法显到达北天竺。

○ 公元411~415年间　撒马儿罕建立基督教的主教（亨利玉尔说是在公元503~520年间建立的）。

○ 公元420~438年　波斯王巴赫兰五世（420~438年）在位。时寄多罗为嚈哒所逐，西迁，建国于中亚。

○ 公元436年　北魏王朝派遣使者董琬、高明等经西域，

到乌孙、费尔干纳、塔什干等地。

○ 公元5世纪20年代　嚈哒人占据索格底亚那以后，很快南攻贵霜，占领其地。公元5世纪30~50年代嚈哒人西迁。

○ 公元438~457年　巴赫兰五世于公元438年死，其子伊嗣俟（耶斯提泽德）即位，史称伊嗣俟二世。

○ 公元5世纪前半期　聂思托里派的基督教（景教）产生，其主张于公元453年被斥为异端邪说。

○ 公元457年　伊嗣俟二世死，霍尔穆兹三世即位。

○ 公元5世纪中叶　嚈哒人开始侵入印度。当时印度笈多王朝在位的皇帝是塞建陀笈多（455~467年）。

○ 公元461~465年间　阿哇尔人压迫Savirs族西奔，而后者又驱逐着Saraguri、乌罗、浑三族西走。

○ 公元465年　卑路斯进攻嚈哒。

○ 公元480年　卑路斯率军进攻巴克特里亚。

○ 公元484年　卑路斯又发动对嚈哒的战争。

○ 公元484~488年　卑路斯死后，其弟沃洛格斯即位，亦名巴拉斯。

○ 公元487年　高车反叛柔然。

○ 公元488年　沃洛格斯被废，居和多立为波斯国王（488~531年）。

○ 公元5世纪末或6世纪初　嚈哒人灭兴都库什山以南、健陀罗及印度河流域的寄多罗王朝或寄多罗子孙统治的诸小国。

○ 公元502年　居和多与嚈哒联盟进攻拜占廷帝国。

○ 公元503~513年　波斯与嚈哒之间不断发生战争。

○ 公元516年　高车与柔然发生战争。

○ 公元518年　北魏王朝僧人宋云从洛阳出发去西域取经。

○ 公元519年　宋云路过嚈哒国。



○ 公元530年　　埃及旅行家科斯马思·印第科卜流斯提思到过印度西海岸。

○ 公元6世纪前半期　　哌哒来中国通贡。

○ 公元6世纪中叶　　哌哒衰亡。

○ 公元6世纪中期　　突厥开始强大。

○ 公元6世纪40年代　　突厥于每年冬季河水结冰后寇掠绥州（今陕西东部的绥德）。

○ 公元545年　　西魏宇文泰遣酒泉胡人安诺盘陀通使于突厥。

○ 公元546年　　突厥可汗土门大败铁勒，吞并其众五万余落，突厥势力由此大振。

○ 公元552年左右　　蚕丝传入拜占廷。

○ 公元553~558年　　突厥与波斯联合，大举进攻哌哒。哌哒大败，其王被杀，其领土被突厥与波斯瓜分。

○ 公元554年　　突厥的木杆可汗同波斯王库思老一世（531~579年，又名奴细尔汪）建立了关系。

○ 公元564年　　粟特等国遣使到北周朝贡。

○ 公元570年　　穆罕默德生。

○ 公元572年以来　　波斯同拜占廷作战，战争延续一个世纪之久。

○ 公元572年　　突厥木杆可汗死，他钵可汗即位。

○ 公元576年　　拜占廷皇帝提比留二世派遣瓦伦丁再次出使突厥。

○ 公元579年　　波斯萨珊王朝国王库思老一世死，其子霍尔穆兹四世即位。

○ 公元581年　　隋文帝采纳长孙晟的意见，对突厥采取瓦解的办法。是年，他钵可汗死，摄图（即土门之孙，他钵兄科罗之子）立，是为沙钵略可汗。摄图以大逻便为阿波可汗。突厥又围攻

克里米亚半岛。

○ 公元583年　隋军分八道出击突厥。

○ 公元587年　处罗侯打着隋朝赐予的旗号，西攻大逻便，将其生擒。

○ 公元588年　处罗侯又率兵30万进攻波斯。

○ 公元590年　突厥撤出克里米亚半岛。同年，巴赫兰叛变弑君，霍尔穆兹四世之子库萨和·巴尔维兹（590~628年）于公元590年被拥立为波斯王。波斯王库萨和，愤于其父霍尔穆兹四世之被弑，借东罗马兵与巴赫兰作战。巴赫兰被击败逃到突厥人当中后被杀。

○ 公元598年　突厥可汗给东罗马皇帝毛里斯写信，自称为“七姓大首领，世界七国之主人”。并说“曾征服回纥等族”，“国家遂安，由是与桃花石订立条约，维持和平”。

○ 公元599年　都兰可汗为部下所杀，达头乘东突厥之乱占据漠北。

○ 公元600年　达头率兵南下，在大斤山（大青山）遇上隋军，达头不战退走。

○ 公元602年　东罗马毛里斯皇帝被弑，波斯王库萨和便借口为其复仇进攻东罗马帝国所属的美索不达米亚与亚美尼亚。

○ 公元603年　突厥汗国分裂为二。泥利死，其子达漫继立，是为泥橛处罗可汗。

○ 公元603~611年　处罗时期，西突厥衰乱。

○ 公元605~617年（隋大业年间）　史国强盛，与中国发生了关系。国王逖遮，筑乞史城。

○ 公元605年　处罗可汗进攻铁勒诸部。各部落反抗，举行起义。

○ 公元611~630年　西突厥由射匮可汗统治，处于强盛时期。



○ 公元615年末或616年初　射匮曾遣其侄率领西蕃诸胡到隋朝贡。

○ 公元618年以前　射匮可汗死。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使内附"。

○ 公元618~626年（唐武德年间）　东曹西曹与康国一起遣使者入朝。

○ 公元619年　罽宾国遣使向唐朝进贡宝带、金锁、水晶盏、颇黎。西突厥与高昌并"遣使朝贡"。

○ 公元619~628年　西突厥统叶护。

○ 公元619~620年　处罗可汗。

○ 公元620~630年　颉利可汗。

○ 公元620年　西突厥来"贡条枝巨鸟"。

○ 公元621年（武德四年）　三月，统叶护可汗遣使到唐朝。

○ 公元622年　7月16日，穆罕默德从麦加转移到麦地那，是为回历纪年之始。

○ 公元622年（武德五年）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使到唐请婚。四月，"遣使献狮子皮。八月，遣使献名马"。

○ 公元624年　东罗马皇帝希拉克略对波斯进行反击，取得了胜利，夺回了小亚细亚与亚美尼亚。

○ 公元627年（贞观元年）　唐朝高僧玄奘去印度求经，路过西突厥地区。康国王遣使到唐朝贡献，请求做臣属。

○ 公元628年　西突厥统叶护被其伯父莫贺咄所杀。莫贺咄立，是为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波斯王库萨和在禁锢中被杀。施利即位，称为居和多二世，在位仅六个月而亡。

○ 公元628~629年　波斯阿尔达希尔三世。

○ 公元629年　松赞干布即位，亦称弃宗弄赞，标志着吐蕃的兴起和强大。

○ 公元630年　　颉利被生俘至京，东突厥至此灭亡。

○ 公元632年　　穆罕默德逝世。6月16日，波斯王伊嗣俟即位。唐太宗派王义宏出使黠戛斯。

○ 公元632~634年　　穆罕默德第一任继承人艾卜·伯克尔。

○ 公元632~651年　　伊嗣俟（即耶斯提泽德三世）即位，他是波斯萨珊王朝最后一位国王。

○ 公元634~644年　　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

○ 公元637年　　阿拉伯与波斯在今伊拉克境内进行卡的西亚之战，波斯军统帅鲁斯塔姆大败阵亡。

○ 公元640年　　唐平高昌，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

○ 公元641年　　波斯与阿拉伯的尼哈文之战，波斯王伊嗣俟手下的波斯军被彻底歼灭，伊嗣俟仓皇逃到帝国东部边境的谋夫。何国遣使者来唐朝贡。

○ 公元642年　　史国国王沙瑟毕向唐献方物。西突厥合并于唐后，在其地置佉沙州，任命其国王昭武失阿喝为刺史。其西面的那色波，称为小史，统属于史国。

○ 公元643年　　黠戛斯向唐朝贡貂裘及貂皮。

○ 公元644年　　焉耆王龙突骑支反唐，唐朝派安西都护郭孝恪击平之，以栗婆准主管焉耆事务。郭孝恪退军后，西突厥又另立薛婆阿那支为焉耆王。11月3日，穆罕默德以后的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被一个基督教的奴隶刺杀。奥斯曼被选举为继任的哈里发。

○ 公元644~656年　　哈里发奥斯曼时期，阿拉伯穆斯林开始进犯中亚。

○ 公元647年　　阿史那贺鲁降唐。是年冬，契苾何力、郭孝恪进攻龟兹，曾命突厥、吐蕃、吐谷浑联军进讨。

○ 公元648年　　平龟兹黠戛斯酋长俟利发失钵屈阿栈朝



唐，表示愿臣服于唐。唐朝授之以左屯卫大将军、坚昆都督，以其地为坚昆都督府，隶属于燕然都护。

○ 公元7世纪中期　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吐蕃与大食、唐朝开始崛起。

○ 公元651年　阿史那贺鲁发动叛乱，唐朝将安西都护府迁回高昌。同年秋，萨珊帝国末主伊嗣俟在谋夫被杀，萨珊王朝延续了427年而亡。

○ 公元652年　唐平处月、处密部。

○ 公元653年　唐朝撤销瑶池都督府，在处月、处密部地区设金满、沙陀二州。同年，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死，其子颉苾达度设（亦号真珠叶护）与阿史那贺鲁发生内讧。真珠叶护几次派遣使者请求唐朝发兵讨伐阿史那贺鲁。到唐朝来朝贡的黠戛斯使者报告说他们那里汉人很多。

○ 公元654年　阿拉伯人在灭掉萨珊王朝和征服呼罗珊地区以后，越过阿姆河进攻中亚的米国，围攻了康国（撒马儿罕）。波斯王伊嗣俟之子卑路斯走投吐火罗，遣使来告难，上以路远，不能救之。寻而大食兵退。是年，吐火罗发兵立卑路斯为波斯王。

○ 公元656年　葱山道行军总管程知节讨西突厥。卡散城主遏波之遣使朝唐进贡。

○ 公元657年　唐朝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又置龟兹都督府。以葛逻禄谋落部为阴山都督府、炽俟部为大漠都督府，踏实力部为玄池都督府，用其酋长为都督。后又从炽俟部分出一部分置金附州，都属于北庭都护府统辖。又在撒马儿罕地区设康居都督府，任命其王拂呼缦为都督。

○ 公元658年　唐朝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故安西为西州都督府，镇高昌故地。在卡散城设休循州都督府，任命阿了参为刺史。在瞰羯城设大宛都督府，任命其王瞰土屯摄舍提于屈昭穆

为都督。以弥秣贺地为南谧州，任命昭武开拙为刺史。以东安国置木鹿州，任命其王昭武闭息为刺史。以罽宾为修鲜都督府。

公元658年起，中亚地区列入中国唐朝版图。

○ 公元659年（显庆四年） 唐朝置焉耆、龟兹、于阗、疏勒四镇，称为安西四镇。是年九月，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挹怛、疏勒、朱驹半等国置州县府百二十七。

○ 公元661年（龙朔元年） 陇州南由令王名远奉使往中亚设置州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以其王都为都督府，以其属部为州县。凡州八十八，县百一十，府百二十六，皆隶安西都护府。是年，唐朝立卑路斯为波斯都督。

○ 公元661~663年（龙朔年间） 吐蕃与叛唐的南弓月部勾结，以图西域。

○ 公元662年春 立卑路斯为波斯王，府治设于疾陵城。

○ 公元667年 阿拉伯将领阿勒·哈卡姆·布·阿姆尔·阿勒·吉法里率军东征下吐火罗与伽尔契斯坦。

○ 公元670年 呼罗珊总督阿勒·哈卡姆死于谋夫。

○ 公元671年 拉比继阿勒·哈卡姆为呼罗珊总督。据说，他也曾渡过阿姆河，但未对中亚进行远征。

○ 公元673年 拉比死，穆阿维亚任命济雅德之子乌拜都拉为呼罗珊总督。他奉哈里发之命率军渡过阿姆河，首先进攻布哈拉地区的沛肯城。

○ 公元674年 阿拉伯军初次渡过阿姆河。卑路斯入朝于唐。

○ 公元677年（仪凤二年） 波斯王卑路斯奏请于长安醴泉坊置波斯寺。是年，中国西部发生了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别帅李遮匐与吐蕃联合进攻安西的事件。

○ 公元679年（调露元年） 王方翼筑碎叶城，在该城刻石纪功，唐朝将碎叶列为四镇之一。泥涅师返国，当然还是不能回



到伊朗。史称其“客吐火罗二十年,部落益离散”。

○ 公元680~681年　阿拉伯军初次在河中过冬。

○ 公元680~683年　哈里发叶齐德一世在位。叶齐德一世任命萨勒姆为呼罗珊总督。

○ 公元682年　属于颉利族的骨咄禄反唐，自立为可汗，以其弟默啜为设,咄悉匐为叶护。

○ 公元683年　叶齐德一世死,穆阿维亚即位。

○ 公元683~684年　叶齐德二世只做了几个月的哈里发便退位,阿拉伯帝国陷于无政府状态。

○ 公元684年　萨勒姆与手下将军穆哈拉布以谋夫为基地,带领六千阿拉伯军队向布哈拉进发。布哈拉女王向索格底亚那的突厥达干求援,答应如蒙支援,便同他结婚。于是达干率领十二万突厥人前来援助,并击溃了由穆哈拉布率领的阿拉伯前锋侦察部队。但是,突厥人却被阿拉伯的主力部队打败。布哈拉女王又不得不向阿拉伯人投降求和。

○ 公元684~685年　麦尔旺一世。

○ 公元685年　麦尔旺一世死，其子阿卜杜勒·麦立克继为哈里发。

○ 公元685~688年(垂拱年间)　默啜西侵十姓部落,西突厥部众死散殆尽,日益衰弱。

○ 公元690年　骨咄禄死,默啜为可汗,逐渐强大起来。

○ 公元697年　哈贯吉为大食东道使(呼罗珊总督)。

○ 公元700年　阿拉伯将军穆哈拉布派其子哈比布率大军进攻布哈拉。

○ 公元701年　穆哈拉布死,其子耶济德继任。

○ 公元703年　耶济德为伊拉克总督哈查只所黜,离开呼罗珊,其弟穆法达尔继任。

○ 公元704年　屈底波任呼罗珊长官(中国古代史料称为



“大食东道使”），以接替穆法达尔负责河外地的经略。同年（吐蕃于龙年，庚辰）夏，吐蕃以弃玛勒公主嫁小勃律王为妻。

○ 公元705年　屈底波到谋夫任呼罗珊总督。在谋夫以《古兰经》号召人们参加所谓圣战，征集军队，筹备粮秣。然后，夺取吐火罗斯坦及其首府巴里黑，以巩固自己的后方。屈底波任呼罗珊总督，进攻吐火罗。

○ 公元706年　屈底波率军从谋夫出发，进攻河中沛肯城。

○ 公元707年　波斯王子泥涅师来于唐，授左威卫将军。屈底波再率军进攻河中，入侵布哈拉之势室羯与阿滥谧。

○ 公元708年　屈底波奉命攻陷布哈拉。挹怛王捺塞叛乱，波斯王泥涅师入朝于唐。

○ 公元708年以后　西突厥突骑施首领娑葛被东突厥默啜攻击，后为其所杀。娑葛部将车鼻施啜苏禄纠集余部，自立为可汗。

○ 公元709年　屈底波完成对布哈拉及其周围地区的征服。

○ 公元710年　春初，屈底波集合各地的军队，向塔里寒进发，猛攻梅尔维鲁德。其首领逃走，法腊布与胡实健投降，屈底波命将率兵戍守其地。虏吐火罗叶护那都泥利，与康国王突昏签订和约。突厥人废突昏，立乌勒伽。

○ 公元710~712年　屈底波用三年的时间征服了撒马儿罕和花剌子模。

○ 公元710~737年　乌勒伽在位期间同阿拉伯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请求唐朝一起驱逐阿拉伯侵略者。

○ 公元711年　屈底波率军进攻哈扎拉斯普。

○ 公元712年　年初，屈底波率领大军从谋夫出发，渡过阿姆河，向锡尔河流域挺进，征服了塔什干、忽毡、卡散（渴塞）诸

城。

○ 公元712~713年　屈底波攻克撒马儿罕，与乌勒伽签订和约。

○ 公元713年　屈底波的后台哈查只死去。

○ 公元713~714年　屈底波入侵塔什干与费尔干纳。

○ 公元715年　屈底波率领阿拉伯军队到了锡尔河流域的费尔干纳。至此，阿拉伯人实现了对中亚在政治上的征服。同年，支持屈底波的哈里发韦立德死，其兄弟苏莱曼即位为哈里发。同年，张孝嵩传檄诸国，大食、康居、大宛、罽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时屈底波死于费尔干纳。

○ 公元716年　默啜为九姓拔曳固所杀。以苏禄为首的西突厥部落称强于西域。

○ 公元717年　苏禄朝于唐。唐朝封他为突骑施都督。

○ 公元717~718年　阿拉伯哈里发伍麦尔二世诏令中亚诸王改信伊斯兰教。

○ 公元718年　米国、康国来贡于唐。从此，阿拔斯的后裔进行反倭马亚朝的活动，企图夺取哈里发之位。

○ 公元719年　俱蜜、罽宾、东安、吐火罗、康国、诃毗施来贡于唐。康国王乌勒伽请求唐朝救援。

○ 公元720年　护密、乌苌、固失密、大勃律、葛达罗支（阿拉霍西亚）来贡于唐。同年末库尔苏勒率领一支部队与粟特人一起反抗阿拉伯人，并向撒马儿罕前进。

○ 公元721年　东安国王笃萨波提、石国王伊捺吐屯屈勒、吐火罗叶护支汗那、俱蜜王那罗延等请求唐朝救援。哈里发另派哈拉什接替赛伊德的职务。哈拉什号召造反的粟特人投降，但粟特人不愿屈服。

○ 公元722年　冬，木思里姆接替哈拉什的职务。同年，吐蕃又攻小勃律，夺其九城。没谨忙向北庭求救。北庭派疏勒副使张



思礼率步骑兵四千人赴援，与没谨忙所率领的小勃律兵左右夹攻吐蕃，大破之，杀其众数万人，缴获器械、羊、马等甚多，收复其九城。

○ 公元723年　木思里姆进攻费尔干纳，被突厥人击退，几乎全军覆没。

○ 公元724年　希沙木继叶齐德二世为哈里发。阿拉伯人又准备进攻费尔干纳，指挥官是木思里姆。

○ 公元727年　哈里发希沙木任命阿什拉斯为呼罗珊总督。

○ 公元727~729年　吐蕃又西击勃律。勃律遣使向唐朝告急。唐玄宗遣使谕令吐蕃罢兵。吐蕃不听，遂攻破勃律。没谨忙死后，其子难泥继为小勃律王。

○ 公元728~731年　突厥可汗支持中亚人的起义。

○ 公元729年　阿什拉斯率军渡过阿姆河，与喀坦会合，向沛肯城进军。

○ 公元730年　中亚的起义军对阿什拉斯发动了新的进攻。

○ 公元731年　春，突骑施可汗和粟特人聚集军队围攻撒马儿罕，粟特王乌勒伽公开支持之。

○ 公元733年　阿拉伯使者摩思览达干等来朝于唐。同年，呼罗珊天旱，发生饥荒，引起社会不稳。

○ 公元734年　朱奈德死，哈里发任命阿西姆为新总督（734~735年）。阿拉伯军官哈里斯举起了反抗倭马亚王朝（白衣大食）的黑旗。同年（开元二十二年）秋，唐朝派使者张舒耀与阿拉伯人商量，从吐火罗和勃达岭两方面出兵夹攻突骑施可汗的驻地碎叶。

○ 公元734~736年　唐朝与阿拉伯合谋破西突厥苏禄可汗。

○ 公元735~738年　阿西姆任呼罗珊总督。

○ 公元736年（开元二十四年）　阿拉伯派军攻入吐火罗，叶护被杀。

○ 公元737年　阿沙德进攻河中的撒马儿罕。粟特王乌勒伽在突厥人的支持下，把阿拉伯人赶走。

○ 公元738年　苏禄为莫贺达干与都摩度所杀。同年，粟特王乌勒伽亦死，唐朝封其子咄喝继之为王。同年，莫贺达干被擒斩，其部陷于分崩离析。

○ 公元740年　吐蕃以女嫁小勃律王为妻，以扩张势力。

○ 公元741年　难泥死，唐朝册立其兄麻来兮为王。

○ 公元742~746年　唐朝先后派节度使盖嘉运、田仁琬、夫蒙灵詧三次讨伐小勃律未能获胜。

○ 公元747年　高仙芝破小勃律，置归仁军。阿拉伯并波悉林到呼罗珊。

○ 公元748年　年初，纳斯尔退出呼罗珊，取道谢腊赫斯逃往你沙不儿。在此，阿布·穆悉林手下大将卡赫塔巴追及，将其击溃。同年秋，纳斯尔在败逃到哈马丹时，因年老力竭死去，享年85岁。同年，并波悉林攻克谋夫。北庭节度使王正见伐安西碎叶，毁其城。

○ 公元8世纪40年代末期　阿拉伯帝国的王朝更替。吐蕃扩张。

○ 公元749年　10月30日，艾卜勒·阿拔斯在库法被拥立为哈里发。同年，吐火罗叶护失里咀伽罗遣使上书唐朝，请求唐朝讨伐朅师。

○ 公元750年　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建立。同年，高仙芝击破朅师，虏其王勃特没，立其兄素迦为王。又费尔干纳的伊赫希德请求唐军助其反对塔什干王。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应其请，袭击塔什干，虏其王车鼻施及部众而归，并破九国胡及背叛的突骑施。



○ 公元751年　　怛逻斯之战，葛逻禄倒戈，唐军大败。同年，阿拉伯人舍里克因对哈里发之位被阿拔斯朝夺去不满发动起义。从此，唐朝对中亚仍有很大的影响。

○ 公元752年　　东曹（苏对沙那）王设阿忽与安国王向唐朝请求击大食。同年，阿布·穆悉林手下另一大将、巴里黑长官阿布·达乌德曾派军进攻骨咄，其王罗全节奔突厥，以后又从突厥逃往唐朝。唐朝册立罗全节为叶护。同年，哈里发阿拔斯（750~753年）怂恿撒马儿罕长官济雅德举兵进攻阿布·穆悉林，但未成功，济雅德被撤职处死。是年，葛逻禄、归仁国、宁远国、康国向唐朝朝贡。

○ 公元753年　　阿布·穆悉林与阿布·加法尔（阿蒲恭拂）自麦加朝觐返回时，哈里发逝世。阿布·穆悉林支持阿布·加法尔夺位成功。是为历史上的第二任阿拔斯朝哈里发，也称为曼苏尔。是年，罽宾国、谢飓国、归仁国、葛逻禄、火寻、宁远、安国、吐火罗、护密向唐朝朝贡。

○ 公元754年　　阿布·穆悉林去迈丹朝见哈里发，被哈里发的人暗杀，享年45岁。阿布·穆悉林的信徒伊斯哈克举行了起义，被镇压。是年，康国、火寻、曹国、宁远、米国、突骑施、吐火罗、石汗那、俱蜜、东曹、安国向唐朝朝贡。

○ 公元754~775年　　曼苏尔哈里发在位时期。

○ 公元755年　　安史之乱爆发。是年，陀跋国、康国、石国、宁远、归仁向唐朝朝贡。

○ 公元756~757年（唐至德年间）　　从此，葛逻禄部开始逐渐从阿尔泰山与额尔齐斯河上游流域向西迁徙。又西徙到楚河、塔拉斯河流域的西突厥十姓可汗故地。

○ 公元757年　　伊斯哈克的同党刺杀呼罗珊总督阿布·达乌德。

○ 公元758年　　护密、罽宾、乾陀罗、吐火罗、康国向唐朝朝贡。



○ 公元759年　宁远、安国向唐朝朝贡。是年，巴拉兹起义。

○ 公元767年　呼罗珊揖呾人起义。

○ 公元771年左右　葛逻禄徙十姓可汗故地，据有碎叶、呾逻斯诸城。西突厥黄、黑二姓突骑施臣属于葛逻禄。

○ 公元777年　布哈拉地区发生哈列哲派玉素甫领导的起义。

○ 公元780年　穆赛雅布继为呼罗珊总督。

○ 公元781年　第一任阿拔斯朝的宰相哈立德·伊本·伯尔麦克死，年约75岁。

○ 公元782年左右　木坎纳死。

○ 公元786年（唐贞元中）　大食"与吐蕃为劲敌，蕃军太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力不足也"。

○ 公元787年　阿拉伯哈里发任命加法尔·阿勒·阿什阿斯为呼罗珊总督。

○ 公元791年　安西四镇全部失陷。

○ 公元792年　哈姆扎·阿勒·胡扎伊为呼罗珊总督。

○ 公元794年　阿勒·法兹勒·伊本·雅希亚为呼罗珊总督。

○ 公元795年　满速儿·阿勒·希米阿里为呼罗珊总督。

○ 公元796年　加法尔·伊本·雅希亚为呼罗珊总督。

○ 公元806年　河中发生了由拉飞·伊本·来斯所发起的暴动。

○ 公元809年　哈里发拉什德率军亲征呼罗珊，在行军路上患重病，于3月24日在徒思死去。

○ 公元813~833年　马蒙继任为哈里发。

○ 公元820年　马蒙将呼罗珊的管治权交给塔希尔。

○ 公元8世纪后半期至公元9世纪前期　阿拉伯统治走向解体，唐朝中衰趋于没落。

○ 公元10世纪　撒马儿罕的造纸业已经很发达。

主要参考书目

中文书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 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隋书·铁勒传》。
◇《新唐书·地理志》。
◇《王延德使高昌记》。
◇《三朝北盟会编》。
◇《辽史·天祚纪》。
◇《辽史·耶律化哥传》。
◇《金史·完颜希尹传》。
◇《金史·宗翰传》。
◇《金史·粘割韩奴传》。
◇《元史·太宗纪》。
◇《元史·世祖纪》。
◇《元史·武宗纪》。
◇《元史·食货志·岁赐》。
◇《元史·地理志》。
◇《元史·刘敏传》。
◇《元史·姚枢传》。



◇ 《元史·赵璧传》。
◇ 《元史·曷思麦里传》。
◇ 《元史·赛典赤传》。
◇ 《元史·速不台传》。
◇ 《元史·按竺迩传》。
◇ 《元史·石天麟传》。
◇ 《元史·阔里吉思传》。
◇ 《元史·忽怜传》。
◇ 《元史·铁连传》。
◇ 《元史·床兀儿传》。
◇ 《元史·术吉台传》。
◇ 《元史·耶律希亮传》。
◇ 《元史·史天泽传》。
◇ 《元史·杭忽思传》。
◇ 《元史·特薛禅传》。
◇ 《元史·术吉台传》。
◇ 《元史·博尔忽传》。
◇ 《元史·乃蛮台传》。
◇ 《元朝秘史》。
◇ 《元朝秘史》续集。
◇ 《明实录·洪武实录》。
◇ 《明实录·永乐实录》。
◇ 《明实录·洪熙实录》。
◇ 《明实录·宣德实录》。
◇ 《明实录·正统实录》。
◇ 《明实录·英宗实录》。
◇ 《明实录·景泰附录》。
◇ 《明实录·天顺实录》。



◇《明实录·成化实录》。

◇《明实录·弘治实录》。

◇《明实录·嘉靖实录》。

◇《明史·别失八里传》。

◇《明史·西域传》。

◇《西域番国志》向达校本。

◇《西域行程记》向达校本。

◇慎懋赏：《四夷广记》。

◇徐松：《西域水道记》。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

◇王国维：《古行记校录》。

◇《圣武亲征录》王国维校注本。

◇吴广成：《西夏书事》。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

◇《刘郁西使记》王国维校注本。

◇《长春真人西游记》王国维校注本。

◇《刘祁北使记》。

◇梁诗正：《钱录》。

◇李佐贤：《古钱汇》。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〇。

◇拉施特丁主编：《史集》第1卷，第1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拉施特丁主编：《史集》第1卷，第2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余大钧译：《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周良霄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虞集：《高昌王世勋之碑》。



◇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三，《句容郡王世绩碑》。

◇ 危素：《耶律希亮神道碑》，见《危太朴文集》卷二。

◇ 邵循正：《史集·忽必烈汗纪译释》，见《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 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 术外尼：《世界征服者传》。

◇ 屠寄：《蒙兀儿史记》。

◇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巴斯喀尔之信》，中华书局 1978 年版。

◇ 张星烺译：《马可·波罗游记》附录，《元代西北三藩源流略记》。

◇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中华书局1962年版。

◇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布哇：《帖木儿帝国》，冯承钧译。

◇ 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 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版1979年版。

◇ 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 Б.Д.格列科夫、А.Ю.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

版。

◇ 岑仲勉：《误传的中国古王城与其水力利用》，载《中外史地考证》下册。

◇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新发现十二世纪初阿拉伯人关于中国之记载》。

◇ 韩儒林：《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

◇ 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及《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载《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

◇ 马雍：《萨曼王朝与中国的交往》，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学习与思考》，1983年第5期。

◇ 周良霄：《鞑靼杂考》，载《文史》第8辑。

◇ 周良霄：《关于西辽史的几个问题》，载《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

◇ 陈得芝：《耶律大石北行史地杂考》。

◇ 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集刊》第1期。

◇ 刘迎胜：《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3期。

◇ 阿·克·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郝镇华译，中华书局1984年版。

◇ 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王家瑛：《波斯古典诗歌奠基人鲁达基》，载《中亚学刊》创刊号。

西文书目

BT = 北京图书馆,KT = 科学院图书馆,NT = 南京图书馆,ND = 南京大学图书馆。书名后未注明图书馆架号者,可能国内无书。

◇ Abdur – Razzak Samarkandi: Matla`os – Sa`dein. (奥都剌匝克:《两幸福之会合》)

◇ Abu al – Ghazi Bahadur Khan: Histoire des Mongols et des Tartares. Repr. 1970.

◇ Abd oullah b. Fazel oullah: Kitab tedjziyet – uemssar ve tezdjiye t – ul A`ssar.

◇ Abdoul – Razzaq ibn Ishaq:《Matla`ous – sadeainve Madjmaq – oul – B ahrein》

◇ Afrian, Soheil M.: Avicenna, His Life and Works. (BT. B751: Z7/A25)

◇ Ali, Muhammed: A Cultural History of Afghanistan. (BT. DS354/A39)

◇ Ali, Muhammed: The Afghans. (BT. 2/K893.72/AM)

◇ Ahmad ibn Arabshah: Tamerlan or the Great Amir, tr. by J. H. Sanders, London, Luzac, 1936.

◇ The Archaeology of Afghanistan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Timurid Period, edited by F. R. Allchin and Norman Hammond, 1978, Academic Press, London.

◇ Ibn Arabsha: Adjaib al – Makdur fi Nawaib Timur. (伊本·阿拉不沙:《命数之奇,帖木儿之侥幸》)

◇ Arberry, Arthur John: Aspects of Islamic Civilization; as depicted in the original texts. (BT. D199.3/A66)

◇ Arberry, A. J.: The Koran Interpreted. (BT. BP109/A661)

◇ Arberry, A. J.: Classical Persian Literature. (BT. PK6190/

A66)

◇ Arberry, A. J.: Discourses of Rumi. (BT. BP188.2/C39)

◇ Arberry, A. J.: Oriental Essays; Portraits of Seven Scholars. (BT. PJ63/A66)

◇ Arberry, A. J.: Shiraz Persian City of Saints and Poets. (BT. DS325/. S52A6)

◇ Arberry, A. J.: Jalal al – Din Rumi, More Tales from the Masnavi. (BT. PK6480/. A21A6)

◇ Arberry, A. J.: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ufism. London, 1942.

◇ Archibald R. Colquhoun: Overland to China. (NT. C/DS709/C722N)

◇ Arrian: Campaigns of Alexander. tr. fr. Greek . A. D. Selincount. Classic S.

◇ Asghar, H. Bilgrami: Afghanistan and British India, 1793 ~ 1907.

◇ Asmussen, Jes P.: Manichaean Literature: Representative Texts Chiefly from Middle Persian & Parthian Writings.

◇ Ibn al Athir: Kitaboul – Khair fil tarikh.

◇ Avicenna, 980? ~ 1037: A Treatise on the Canon of Medicine of Avicenna. (BT. R128.3/A9G8)

◇ Auboyer, Jeanine: The Art of Afghanistan.

◇ The Babar – Nama, E. G. W. Gibb: Memorial Series Leydon. (BT. PT709/G6)

◇ Babur – Nama (in English): Memoirs of Babur, 2 vols. Beveeridge, Annette S. tr.

◇ Bagchi, Prabodh Chandra: India and Central Asia. (BT. DS450/. A8B1, KT. 24.03/b144)

◇ Barfiald, Thomas Jefferson: The Central Asian Arabs of Af-



ghanistan. (BT. 2/E137. 29/BTJ)

◇ Barhebraeus: The Chronography of Gregory Abul - Faraj... tr. and ed. by E. A. Wallis Budge, Oxford and London, 1932.

◇ W. 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 Barthold, V.: 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3 vols. volume Ⅱ. Leiden, E. J. Brill. (BT. DS33/B28)

◇ W. Barthold: The Bughra Khan Mentioned in the Qudadqu Bilik, —BSOS, vol. III, pt, 1. 1923.

◇ Baskakov, N. A.: Turkic Language of Central Asia.

◇ Ibn Battuta: Travals in Asia and Africa. 1325 ~ 1354. Translated and selected by H. A. R. Gibb, 1969, New York.

◇ Beliaev, Viktor M.: Central Asian Music;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the Music of the Peoples of the USSR. Middletown, corm, Wesleyan Univ. Pr. 1975. (BT. 2/J650. 9 <512>/BVM)

◇ Bell, Gertrude: Persian Pictures. (BT. DS258/B4, KT. 47. 116/B433)

◇ Bellew, H. W.: The Races of Afghanistan, 1880.

◇ Bernard Lewis: The Assassins, a Radical Sect in Islam. 1970, London. (BT. 2/K37/L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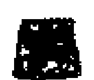
◇ Bernard Lewis: The Emergency of Modern Turkey,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68.

◇ Bhattacharya, Chhaya: Art of Central Asia with Special Referance to Wooden Objects from the Northern Silk Route. (BT. 2/K883. 09/BC)

◇ Binyon, Laurence, etc: Persian Miniature Painting. Dover Publications.

◇ Binyon, Cicely Margaret: Musulman Painting, 12—17th Century. (BT. ND981/B65)

◇ al - Biruni, 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Nations. An English



Version of the Arabic Text of the Athar – ul – bakiya of al – Biruni, or "Vestiges of the Past", collected and reduced to writing by author in A. H. 390—A. H. 1000, tr. and ed. with notes and index by C. E. Sachau, Leiden. 1879.

◇ Alberuni's India: An Account of the Religion, Philosophy, Literature, Chronology, Astronomy, Customs, Laws and Astrology of India about A. D. 1030, ed, in the Arabic Original by E. Sachau. London, 1887.

◇ E. Blochet: Musulman Painting XII ~ XVII Century.

◇ Bonvalot, Gabriel: Through the Heart of Asia. (BT. DS8/B72)

◇ C. E. Bosworth: The Medieval History of Iran,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London 1977.

◇ Bosworth, C. E.: The Later Ghaznavids, Splendour and Decay. (BT. K372.3/BCE)

◇ Bosworth, Clifford Edmund (ed.): Iran and Islam. Edinburgh U. P.

◇ Bosworth, C. E: Sistan under the Arabs, from the Islamic Conquest to the Rise of the Saffavids.

◇ Boukhary, Mir Abdoul Kerim: Histoire de l'Asia Central, Paris, 1876. (BT. C/DA785/B66)

◇ Boulnois, L.: The Silk Route.

◇ Boyle, John Andrew: The Mong World Empire, 1206 ~ 1370. (BT 2/K308/BJA)

◇ Boxer, C. R: Notes on Chinese Abroad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Manchu Periods Compiled from Contemporary European Sources. (1500 ~ 1750) (KT. 22.25/B788)

◇ Boyle, J. A.: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 Columbia U. P.

◇ Boyle, J. A. ed.: Persia; History and Heritage. 1978, Allen



Unwin.

◇ Bretschneider, E. : Notes of the Medieval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BT. C/DS785/B84, C/DS2/B8)

◇ Bretschneider, E. , ed: Medieval Researches from the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The Geography & History of Central & Western Asia from the Thirteenth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2 vols.

◇ E. Bretschneider: On the Knowledge Possessed by the Ancient Chinese of the Arab and Arabian Coloni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Mentioned in Chinese Books, London, 1871.

◇ British Museum: The Treasures of the Oxus. (BT. R/NK620/B86)

◇ Brochelmann, Carl: History of the Islamic Peoples. (KT. 49, 5/B864)

◇ Brown, E. G. : 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 4 vols. (BT. PK6097/B88). vol. I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until Firdausi, vol. II From Firdausi to Sa'di. vol. III A History of Persian Literature under Tartar Dominion (A. D. 1265 ~ 1520) vol. Ⅳ A History of Persian Literature in Modern Times (A. D. 1500 ~ 1924)

◇ Brown, E. G. : The Tarikh - i - guzida. (BT. PJ709/G6/VOL. 14)

◇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5 vols. , 1968.

◇ Nizam ed - Din Chami: Zafar - Nama. (尼扎木丁:《帖木儿武功记》)

◇ Chau Ju - Kua: His Works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 - fan - chi.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and Annotated by Friedrich Hirth and W. W. Rockhill. St. Petersburg, 1911.

◇ Chen, Jack: The Sinkiang Story. New York, 1977. (BT. 2/K294.5/CJ)

◇ Cobbold, Ralph Patteson: Innermost Asia, Travel and Sport in the Pamirs. (BT. D88/C65)

◇ Corbin, Henry: A Vicenna and the Visionary Recital, tr. from the French. (BT. B751/R63C79)

◇ Curtin, Jeremiah: The Mongols: A History. (KT. 24. 1/c978)

◇ Curtin, Jeremiah: The Mongols in Russia. (KT. 24. 1/c978m)

◇ Curzon, G. N.: Russia in Central Asia, 1889.

◇ Marie a. Czaplicka: The Turks of Central Asia in History and at the Present Day. Oxford, 1918. (扎普里斯卡:《历史上和现在中亚的突厥人》)

◇ Dawson, Christopher: The Mongol Mission; Narratives and Letters of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in Mongolia and China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rteenth Centuries. London, 1955. (BT. BV2280/D27)

◇ Donald N. Willer: Iran: Past and Present. (威勒:《伊朗的过去与现在》)

◇ Douglas: Persian Painting of the 14th Century,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Douglas Barrett. (KT. B/48. 39482/P466)

◇ Eckmann, Janos. Chagatay Manua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1966. (BT. 2/H524/EJ)

◇ Elliot, H. M: The History of India, as Told by Its Own Historians, the Muhammed Period. (BT. DS436/E461)

◇ Elphinstone, M: The History of India, the Hindu and Mahomedan Period. (BT. DS436/E48)

◇ Erskine W: History of India under the First Two Sovereigns of the House of Timur, Babur and Humayun. 2 vols.

◇ Moa'yen – ed – din Mohammed El—Esfezari: Kitab raouzat ul



– djennat fi evssaf medinet il Herat.

◇ Etherton, P. T. : Across the Roof of the World, 1911. Etherton, P. T. ; In the Heart of Asia, 1925.

◇ Fadl – Allah ibn Ruzbihan al – Khunzi Surnamed al – Amin, Persia in A. D. 1478 ~ 1490. Tr. by Minorsky. (BT. DS278/F14)

◇ Persia in A. D. 1478 ~ 1490, translation of Fadlullah'Tarikh – i – 'Alam ara – yi Amin. (BT. DS278/F14/)

◇ Fazl – oullah – eddine, Djami ut – Tevarikh

◇ Fell, E. N. : Russian and Nomad: Tales of the Kirghiz Steppes. (BT. DK861/K5F31)

◇ W. J. Fischel: Ibn Khaldun and Tamerlane, Their Historic Meeting in Damascus, 1401 A. D. (803 A. H.) A Study Based on Arabic Manuscripts of Ibn Khaldun's < Autobiography >, with a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and a commenta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52.

◇ Fox, Ralph Winston: People of the Steppes. (BT. DK27/F65)

◇ Frye, R. N. : Islam and the West. (BT. DS38/H33)

◇ Frye, R. N. : The History of Bukhara, tr. from a Persian abridgement of the Arabic original by Narshakhi R. Cambridge, Mass. 1954.

◇ Frye: The Histories of Nishapur ed. by R. N. Frye.

◇ Frye, R. N. : The Heritage of Persia. (BT. DS275/F94)

◇ Frye, Richard N. : The Golden Age of Persia, the Arabs in the East. (BT. 2/K373/FRN)

◇ Frye, R. N. : The Golden Age of Persi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Weidenfeld & N. (BT. R8. 320/III)

◇ Frye, R. N. : Bukhara: Medieval Achievement. D8. Centers of Civilizations Univ. Oklahoma.

◇ Frye, R. N. ed. :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4. 1957.

Cambridge U. P. Gaider, Arkadi, Timur and His Squad. (KT. 22. 2494/G138)

◇ Cahen, Gaston: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of Russia with China under Peter the Great, 1689—1730.

◇ E.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

◇ Gibson: Genghis Khan and the Mongols. Wayland.

◇ Glubb, John: The Course of Empire, the Arabs and their Successors. (D966)

◇ Godard, Andre: L'art de l'Iran. (BT. N7280/G57)

◇ Gray, Basil: The World History of Rashid al – Din, a Study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Manuscript. 1978, London. (BT. 2/k3/GB)

◇ Griffiths, John C.: Afghanistan. (BT. D1471)

◇ Griffiths, J. C.: Afghanistan: with a Historical Note by Olaf Caroe. (BT. D1471)

◇ Grigor: History of the Nation of the Archers and Mongolian Names Andterms in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 of the Archers. By Grigor of Akanc, the Armenian text, ed.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notes by Robert P. Blakeand Richard N. Frye. Cambridge, The Harvard Univ. Press. 1954. (NT. D841. 1/W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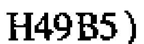
◇ Rene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tr. from the French by Naomi Walford. Rutgers Univ. P. 1970.

◇ A Persi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an extract from Zubdatut Tawarikh of Hafiz Abru. tr. by Maitra, New York, 1970. (BT. D3171, KT. 22. 8/h139)

◇ Hafiz Abru: Zobdetot – Tevarikh.

◇ Hafiz: The Poems of Hafiz. (BT. PK/H13P3)

◇ Hafiz of Shiraz: Selections from His Poems. (BT. PK6504/



H49B5)

◇ Hafiz: A Century of Ghazels. Mollendorff Collection. (BT. M/PK6504/H49C3)

◇ Haidar: 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 Central Asia, being the Tarikh – i – Rashidi of Mirza Muhammed Haidar, Dughlat. the translation by E. Denison Ross, London, Curzon Press,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 Hakluyt, Richard: Voyages 12 vols.

◇ Hakluyt, Richard: 1552 ~ 1616, Plano Carpini. (BT. DS6/G51)

◇ Haamd Allah: The Tarikh – i – guzida, or Select History of Qazwini. (BT. PJ709/G6) vol. 14.

◇ Habib, Isfan: The Agrarian System of Mughul India(1556—1707). (BT. HD1486/. I3H11)

◇ De Hammer: 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 Hammer – Purgstall, Joseph: 1774 ~ 1856. Geschichte der Goldenen in Kiptschak. (BTNC. DK90/H22)

◇ Hazard, Harry W., and Cooke, H. Lester: Atlas of Islamic History, Princeton, 1951.

◇ Hasan, Ibn: Central Structure of the Mughal Empire, 1970. Hasan, an 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abaristan compiled about A. H. 613 (A. D. 1216) by Muhammed b. al – Hasan b. Isfandiyar, based on the India office Ms. compared with two Mss. in the British Museum, by E. G. Browne. Leyden—London, 1905.

◇ Von Hellwald, Frederick: The Russians in Central Asia. Longwood Pr.

◇ M. Th. Houtsma: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Leyden. 1908 ~ 1927, 2 vols. (BT. R/DS37/E5)

◇ Encyclopaedia of Asian History. New York, 1988. (BT. 29—

89/K3—61/E56)

◇ Encyclopaedia of Asian Civilization. vol. 1—3, 1977. (BT. 2G/K300.3—61/EAC)

◇ H. H. 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4 vols. in 5.

◇ Invasions of India from Central Asia. 1967. (BT.2/K351.0/IIC)

◇ Iran Society: A Vicenna Commenmoration Volume. (BT. B751/Z7161)

◇ Isfandiyar: History of Tabaristan. (BT. PJ709/G6)

◇ Jenkinson: Early Voyages and Travels to Russia and Persia by Antony-Jenkinson and other Englishman, ed. by E. Delmer Morgan and C. H. Coot, vol. I, London, 1886.

◇ Curtin, Jeremiah: The Mongols, a History.

◇ John M. Smith: History of the Sarbadar Dynasty.

◇ Jurji Zaidan: Umayyads and `Abbasids. Gibb memorial seris vol 4 (BT. PJ709/G6)

◇ Juvaini, `Ata – Malik ibn Muhammed: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Conqueror, 2 vols. (BT. C/DS22/J58)

◇ Khwandemir: Habib Siyar.

◇ Khondemir: Khoulassatoul – ekhbar.

◇ King – Peter: Afghanistan, Cockpit in High Asia. (BTD1345)

◇ Kinneir, John Macdonald: A Geographical Memoir of the Persian Empire.

◇ Krader, Lawrence: Peoples of Central Asia, 1963. (BT. DK855/.4K9, KT. 23.6/k89)

◇ Krejci Jaroslav: The Civilization of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before the European Challenge. 1990. (BT.2—90/K300.3/K92)



◇ Luc Kwanten: Imperial Nomads; 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500—1500. Leicester Uuniv. Press. 1979.

◇ Lane – Poole, Stanley: History of India from the Reign of Akbarthe Great to the Fall of the Moghul Empire. AMS Pr.

◇ Harold Lamb: Tamerlane, The Earth Shaker. 1928, New York.

◇ Lane – Poole, Stanley: Medieval India from the Mohammed Conquest to the Reign of Akbar, the Great. ANS Pr.

◇ B. Lewis etc. ed.: Encyclopaedia of Islam. Luzac.

◇ Levy, Reuben: Introduction to Persian Literature. Columbia U. P.

◇ J. Malcolm: The History of Persia, from the Most Early Period to the Present Time; 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the religion, government, usages and character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at kingdom, vol. I—II, London, 1815.

◇ Manz, Baatrice Forbes: The Rise and Rule of Tamerlane. 1987. (BT. 2—90/K303/M29)

◇ Margoliouth, D. S.: tr. by, Umayyads and`Abbasids, being the fourth part of Jurji Zaydan's History of Islamic Civilization. Gibb memorial seris. New Dehli, 1978. (2/k37/zj)

◇ al – Marwazi: 1056—1120, Sharaf al – Zaman Tahir Marvazi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Arabic text (circa A. D. 1120)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V. Minorsky. (BT. DS12/M3)

◇ Medlin, William K: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sia. Leiden, 1971. (BT. 2/G751.2/MWK)

◇ Menges, K. H.: The Turkic Languages and Peoples; an Introduction to Turkic Studies. (BT. 2/H512/MKH)

◇ Menges, Karl Heinrich: Qaraqalpaq Grammer. (BT. PL55/. K25M5)

◇ Mirkhond：1433 ~ 1498，The Rauzat – us – safa；or Garden of Purity.（BT. PJ408/06/N. S/V. 1）

◇ Minorsky，V.：Hudud – al – A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a Persian Geography with the Preface by Barthold.（BT. DS258/M66）

◇ Minorsky，V.：A History of Sharvan and Darband in the 10th ~ 11th Centuries.（KT. 24. 023/m666）

◇ Minorsky，V.：Sharaf al – Zaman Tahir Marvazi on China，the Turks and India，Arabic text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KT. 24. 06/m666）

◇ Minorsky：Abu – Dulaf Mis'ar ibn Muhalhil's Travels in Iran（circa A. D. 950）. Arabic text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V. Minorsky.

◇ Minorsky，V.：Catalogue of Turkish Manuscripts and Miniatures，in the Chester Beatly Library.

◇ Mirkhond：History of Early Kings of Persia. 原名 Rauzat us – safa.（BT. M/DS275/M67：Mollendorff collection）

◇ Mirkhond：The History of the Atabeks of Syria and Persia.（BT. M/DS288. 9/M67）

◇ History of Ibn Miskawayh. vol. 7.（BT. PJ709/G6）

◇ Histor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1976.（BT. 2/K311. 5/HMP）

◇ Mohibbul Hasan Khan：Kashmir under the Sultans.（BT. DS485/. K2K45）

◇ Moses，of Chorene：407—492，History of the Armenians.（BT. 2/K124/MC）

◇ Naomi Walford. trans.：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 Nasr，Seyyed Hossein：Traditional Islam in the Modern World. 1987.（BT. 2—91/B96/N26）

◇ al. Narshakhi，Muhammad ibn Jafar.（d. 959）：The History of



Bokhara, tr. from a Persian abridgement of the Arabic original by Narshakhi. (考古 23.5/al. nar)

◇ O. Neugebauer: A History of Ancient Mathematical Astronomy.

◇ A. C. 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1930, London.

◇ Niamatullah's History of the Afghans, pt. I, Lodi Period . tr. with various notes by Nirodbhusan Roy, Satinikatan, 1958.

◇ Mohammed Ali: A Cultural History of Afghanistan , Kubul, 1964.

◇ Munsterberg: Chinesisch Kunstgeschichte, vol. 2.

◇ Nizam: The Book of Government or Rules for Kings, The Siyasat – namaor Siyar al – Muluk of Nizam al – Mulk. tr. from the Persian by H. Darke. London, 1960. (UNESCO Collection of representative works, Persian series.)

◇ Nizami 'Aruzi: 1157 ~ 1160, Chahar Maqala. (The four Discourse) (BT. PJ709/G6/V11)

◇ Nszim, Muhammed: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ltan Mahmud of Ghaz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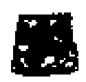
◇ Nobel, Johannes: Central Asia: The Connecting Link between East and West and other Lectures. (BT. DS33/n74)

◇ Neugebauer, O. : A History of Ancient Mathematical Astronomy. (BT. 2/P1—091.2/NO)

◇ Nizam al – Mukk: The Book of Government, the Siyasat – nama. (BT. JC49/N73)

◇ Nizami, Ganjavi: The Haft Paikar. (The Seven Beauties.) (BT. PK6501/N73)

◇ A. T. E. Olmstead: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 Chicago, 1948.



◇ E. E. Oliver: The Chaghatai Mughals. (载《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学报》第20卷)

◇ Olufsen, O: The Emir of Bokhara and His Country; Journey and Studies in Bokhara. (BT. DK871/05)

◇ Owen, Sidney James: India on the Eve of the British Conquest, an Analytical History of India, 1627—1761. (BT. DS461/097)

◇ Palafox y Mendoza, Juan de, bp. of osma: 1600—1659. Th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London, 1671. (BT-NC. DS752/P15E)

◇Pallas P. S. Sammlungen Historischer Nachrichten Uber die Mongolischen Volkerschaften. repr. 1972.

◇ Pandey, Awadh Bilari: The First Afghan Empire in India (1451 ~1526). (BT. DS459/. 7P18)

◇ Parmu R. K: A History of Muslim Rule in Kashmir (1320 ~ 1819)

◇ Patrich Moore: The Story of Astronomy. 1961, London.

◇ Pelliot, P.: Notes on Marco Polo. (BT. R/G370/P54, P39)

◇ Pelliot, Paul: Marco Polo, 1254 ~ 1323. (BT. C/G370/P77)

◇ Pokotilov, D.: History of the Eastern Mongols during the Ming Dinasty from 1368 to 1634. Translation of the Russian text by Rudolf.

◇ Poole, Stanley Lane: The Mohammedan Dynasties, Paris 1925.

◇ Pope, A. U.: Masterpieces of Persian Art. (BT. N7280/P825)

◇ Pope, A. U.: Maxim Litvinoff. (BT. D268/. L7P8)

◇ Pope, A. U.: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the Present. (BT. M296.)

◇ Quatremere: Notices et Extraits des manuscrits t. X Ⅳ,



1843.

◇ De Rachewiltz Igor: Index to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 Rahim, Muhd Abdur: History of the Afghans in India AD. 1545 ~ 1631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relation with the Mughals. (BT DC461/R14)

◇ Raqim: Tarikh – i – Timouri。

◇ Rice, Frances Mortimer: Art in Afghanistan; Objects from the Kabul Museum. (BT. 2/J137. 21/RFM)

◇ Ross, E. Denison and Others: Persian Art, 1930. (KT. 48. 04482/r823)

◇ Ross, E. D: The Persians (BT. DS258/R82)

◇ Rubel, P. G.: The Kalmyk Mongols, a Study in Continuity and Change.

◇ Sami, Nizamuddin: Histoire des conquetes de Tamerlan intitulee Zafarnama, ed. critique par Felix Tauer. (KT. 24. 13/s188)

◇ Samolin, William: East Turkistan to the Twelfth Century; a Brief Political Survey. London, 1964.

◇ Sarasvati, Sarasi Kumar: Glimpses of Mughal Architecture. (BT. N7302/S24)

◇ Sarkar, Jagdish Harayan: Studies in Economic Life in Mughal India. (BT. 2/F135. 19/SIN)

◇ Saunders J. J.: 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 Conquest.

◇ Sauvaget, Jean: 1901 ~ 1950,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Muslim East;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BT. R/Z3013/S26)

◇ Savory, R. M. ed.: Introduction to Islamic Civilization.

◇ Schafi el Katib: Kitab Hassan ul – Menakib is Seriyet el Montaza'atmin Is – zhahiriyet. (书记沙非:《贝巴儿思传》《由咱喜儿(Zahir)传采录之王德》)



◇ Schihab – ud – din Mohammed el – Nessaoui：Siret – us – Soultan Djelalud – din Mangoubirdi.

◇ Schiltberger，Johannes：The Bondage and Travels of Johann

◇ Schiltberger. . . 1396 ~ 1427. tr. by Buchan：Telfer with notes by P. Bruun，London，1879，(Pub. for the Hakluyt Soc.)

◇ Schurmann，H. F. ：The Mongols of Afghanistan. An Ethnography of the Monghols and Related Peoples of Afghanistan，The Hague，1962.

◇ Eugene Schuyler：Turkestan，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estan，Khokand，Bukhara，and Kuldja，1876. (BT. DK854/S39)

◇ Serruys H. ：Genealogical Tables of the Descendants of Dayan – Qan.

◇ Serruys H. ：Sino – 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

◇ Sevyan Vainshtein：Nomads of South Siberia，The Pastoral Economies of Tuva. Cambridge U. P.

◇ Shaban，M. A. ：The Abbasid Revolution. Cambridge U. P.

◇ Shaw，R. B. ：A History of the Khojas of Eastern Turkestan ed. by N. Elias，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1897.

◇ Shaw，R. B. ：A Sketch of the Turki Language as Spoken in Eastern Turkistan. (BT. M/PL55/. Y2S5)

◇ Shaw，R. B：High Tartary，Yarkand and Kashgar.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室)

◇ Sherif：The Zafar nama by Maulana Sharifuddin 'Ali of Yazd. ed. by Maulawi Muhammed Ilahdad，vol. 1 ~ 2，Calcutta. 1887 ~ 1888. (歇里甫丁:《帖木儿武功记》，于 1887 ~ 1888 年间在加尔各答之印度丛刊 Bibliotheca Indica 中刊行，1722 年时由 Petis de la Croix 译为法文，1723 年又由 J. Darby 从法文转译为英文)

◇ Sinor，Denis：Inner Asia：History – Civilization – Languages. (BT. 2/K3/SD)



◇ Sinor, Denis: Inner Asia and Its Contacts with Medieval Europe. (BT. 2/K300. 3/SD)

◇ Skrine, Francis, Henry Bennett and Edward Denison Ross: The Heart of Asia; a History of Russian Turkestan and the Central Asian Khanates from the Earlist Times... (BT. DK851/S62)

◇ Solov`yev, Leonid V.: Adventures in Bokhara. (BT. PG3476/. S65K4)

◇ Spuler, Bertold: The Mongols in History. (KT. 24. 11/s772)

◇ Spuler, Bertold: History of the Mongols Based on Eastern and Western Accounts of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tr. from German by H. & S. Drummond. (BT. D3406)

◇ G. le Strange: Baghdad during the Abbasid Caliphate, Oxford, 1924.

◇ Le Strange, Guy: Lands of the Eastern Caliphate: Mesopotamia, Persia and Central Asia from the Moslem Conquest to the Time of Timur. (BT. DS44. 9/L64)

◇ G. le Strange: Lands of the Eastern Caliphate, Cambridge, 1905.

◇ Strasser, Roland: The Mongolian Horde; tr. from. German by R. T. C. (NT. 292/F91)

◇ Sykes, Ella C.: Through Deserts and Oases of Central Asia. London. 1920. (BT. C/DS793/E259)

◇ Sykes, Percy: A History of Afghanistan. (BT. 2/K372/SP)

◇ P. Sykes: A History of Persia. 2 vols.

◇ Guy Le Strange: Clavijo, Embassy to Tamelane, 1403—1406, Broadway Travellers.

◇ Ali ibn Rabban Tabari: The Book of Religion and Empire. (BT. BP160/A6)

◇ Thompson Walli, Budge, Sir Ernest Afreed: The Monks of

Kublai Khan. (BT. C/BX154/. C6B9) A. Vambery, History of Bokhara from the earlist period down to thepresent. Composed for the first time after oriental known and unknown historical manuscripts, London, 1873. (BT. DK876/V21, 2/K512.962/VA)

◇ Vernadsky, George: Mongols & Russia, (History of Russia ser., No. 3) (BT. DK40/V41)

◇ Vernadsky, G.: The Mongols and Russia. Yale Univ. Press. 1953.

◇ Vladimirtsov, B. Y: The Life of Chingis – Khan. repr. 1972.

◇ Vladimirtsov, B. Y: Mongolo – Oirat Heroic Epos, Gregg Internal.

◇ Vojpevi, Anbikaprasad: Persian Influence on Hindi. Calcutta Univ. (KT. 24.613/v133)

◇ Waley: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1963.

◇ Wilber, Donald Newton: Afghanistan; Its People, Its Society, Its Culture.... (BT. DS356/W.66)

◇ Wilber, D. N.: The Archaeology of Islam Iran, the Il – Khanid Period. (BT. NA1483/W66)

◇ K. A. Wittfogel & Feng Chia – sh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907—1125), Philadelphia, 1949.

◇ Wylie, T. V.: The Geography of Tibet. (考古 22. 7365/wyl).

◇ Yule, Henry: 1820—1889,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4 vols. (BT. C/DS709/Y9/1913—16, KT. 21. 18/h156)

◇ Yule, Henry: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BT. C/G370/P74)

◇ Yusuf, Khas – Hajib: Das Kudatku bilik(BTNC. PL49/Y9)

◇ Zeine: Arab – Turkish Relations and the Emergence of Arab Nationalism. (BT. DK476/Z46/)

◇ Zamcarano, C. Z.: The Mongol Chronicle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r. by Rudolf Loewenthal. (KT. 24. 1238/z24, BT. C/DS793/M7Z2)

◇ Sheikh Mahmud: Zengui Adjem Kermani, Djouch ae – Khorouch. (马合木赞吉撰《感兴录》,波斯文叙事诗,后经其子忽都不丁续撰)

◇ Zenkovsky, Serge A.: Pan – Turkism and Islam in Russia. 1960, Harvard. (BT. DK34/. 79z54)